

斯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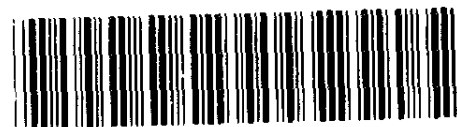


埃德加·斯诺著
宋久 柯南 克雄译

了了了

587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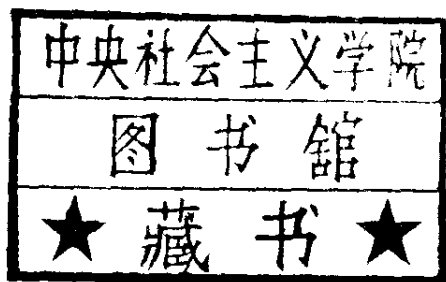
复始之旅



200412785

知天地之为稊米，知毫末之为丘山也，
则差数观矣……消息盈虚，终则有始。

——庄子《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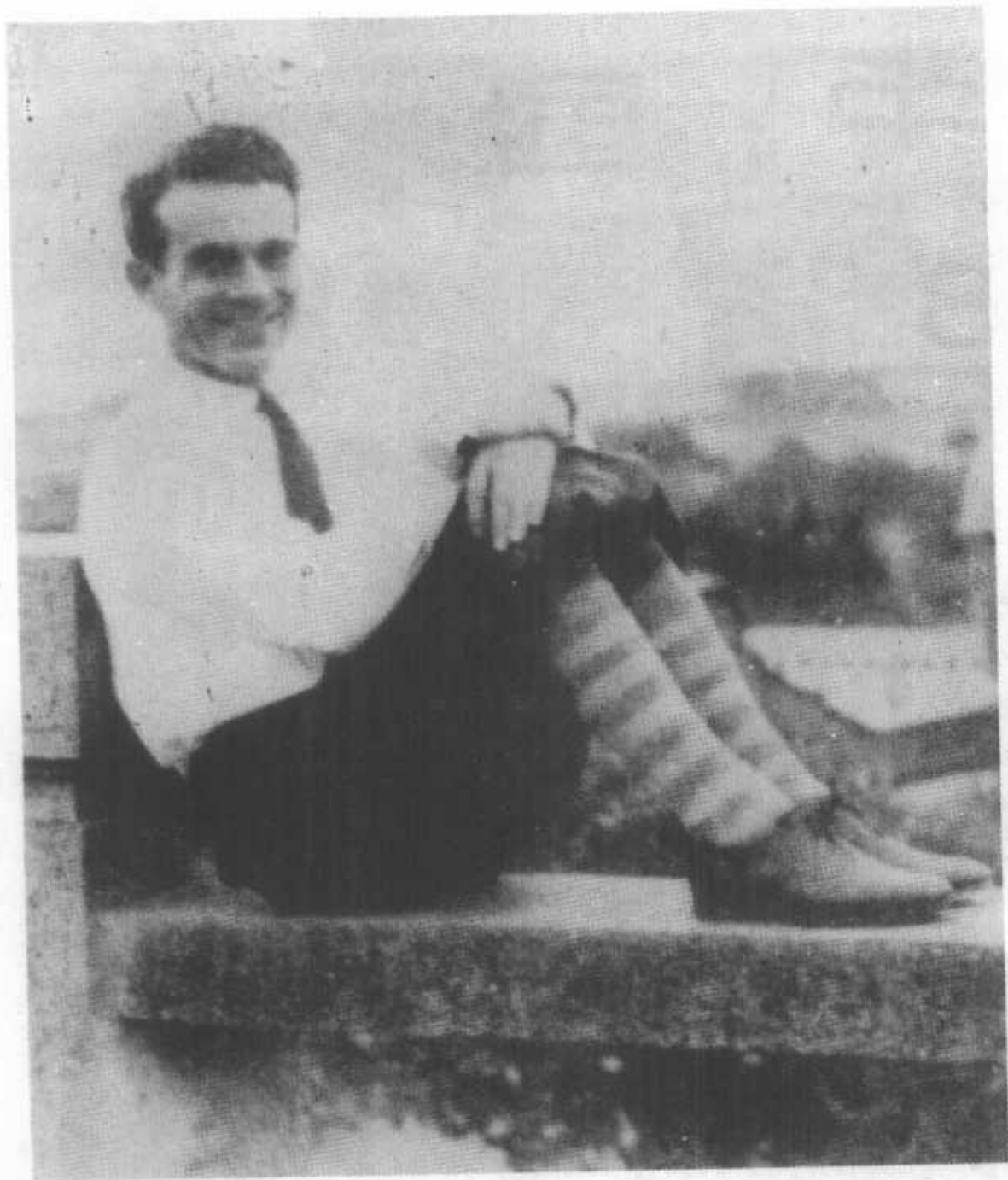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献给洛伊斯、克里斯和西安——
及彼得和萨克斯



埃德加·斯诺作为“雷奥诺尔号”
的一位年轻船员，来到上海。（1928年）



斯诺在上海

斯诺在中国担任上海一家
英语刊物——《密勒氏评论报》
的助理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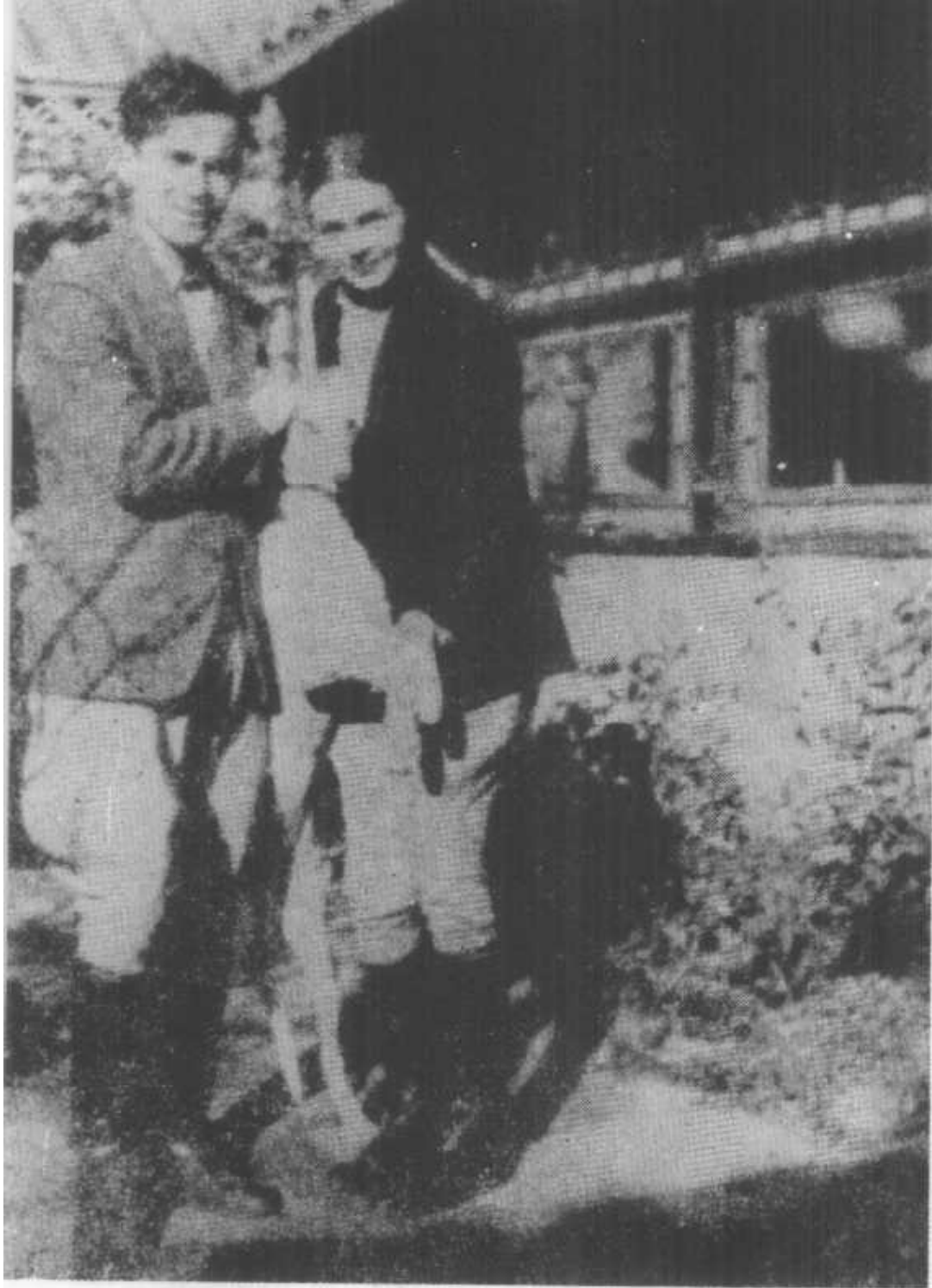




斯诺在上海。(192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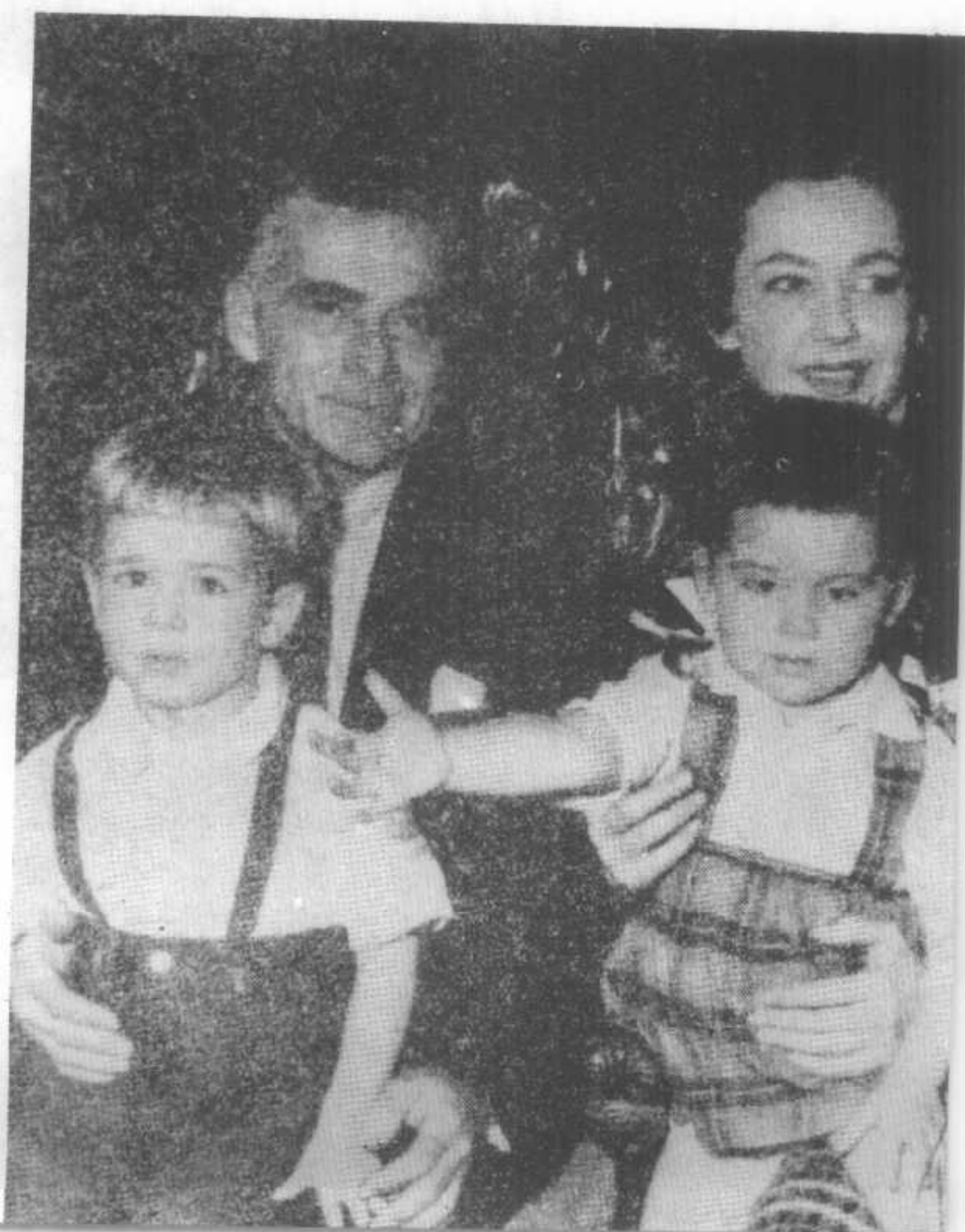


斯诺满怀喜悦拿着中国大刀队
缴获的日本侵略军的机枪。(1933年)



斯诺和《续西行漫记》
的作者尼姆·威尔士，三十
年代在北京。

斯诺全家在纽约。(1953年)





斯诺和路易斯·惠勒、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合影。（1949年）

出版前言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一生写了大量著作，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报道，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写的几部关于中国的名著，曾被连续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有力地促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了解，使中国人民为争取进步的斗争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斯诺的记者生涯，是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斯诺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通过目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同情，增强了正义感。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历时四个多月。他深入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访问了红军指挥员和战士，访问了解放区的群众。这些访问加深了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了解，使他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后，斯诺深情脉脉地写到：“在许多书页里，我仅仅把那些英勇的男女们告诉我的记录下来。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替

DK59/32

时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现在他们每天正在用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未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哩！”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迫害进步人士，斯诺在美国处境十分困难，后来移居瑞士。然而他拿着美国护照，得不到访华的签证，他和中国的关系被人为地割断十余年。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他才以美国作家的身份取得签证，访问新中国。此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〇年又两度来访。每次访问，他都搜集了大量材料，通过报道，生动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讴歌人民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斯诺是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数十年如一日，为促进中美两国伟大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麦卡锡主义对他全家的迫害，国际上对新中国的歪曲和诬蔑，都没有损害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没有使他丧失对中美人民终将冲破重重障碍，开拓友好合作道路的信心。新中国是斯诺心爱的话题。他为读者著书，给青年讲课，对公众演说，给朋友写信，同客人说话，都离不开中国。在临终时，他用尽了生命的最后力量所讲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中国人民沉痛悼念斯诺的逝世，毛泽东主席在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这位诚挚的朋友，为了表彰新闻战线上这位出色的战士，我们决定出版《斯诺文集》。这套文集先出四卷，主要搜集了斯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一九五八年首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斯诺记者生涯的自述。书名取意于庄子的话：“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他的一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结婚以前的游历记者的生活；在北京定居后对中国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对中国、印度、苏联等地的访问情况。这本书穿插了一些回忆和思考，尤其详细记述了他同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往。文笔精练，引人入胜。书中谈到，他已赢得了“报道一贯准确的名声”，甘地曾对他面誉道：“我们尊重你的诚实态度。”

第二卷《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九三七年十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这是访问陕北苏区后震动世界的名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这本书问世后，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五次，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国内外许多青年读后，走上革命的道路，誓作旧世界的叛逆者。当年国统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翻译出版时，为便于躲避反动派的检查，取名为《西行漫记》，如今我们重新出版时，恢复正名《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同志曾经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

第三卷《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asia》)，一九四一

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描述了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热情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的丑态，并以中日战争为背景，论述了国际之间的关系。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充满信心。他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书的后半部介绍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缘起和发展，然后是长篇报道作者在一九三九年重访解放区的见闻，重申了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的信心。此外，在本卷中我们还选了斯诺有关评蒋介石《中国的命运》和有关中国抗战前景的若干篇文章。

第四卷《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九六二年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书前引用了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话：“法律正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这里“河”只是人为国界的代名词。斯诺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讽刺美国对华敌视的政策，主张撤掉中美人民之间的人为障碍，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美国人民介绍“河的彼岸”的真实情况。在书中，斯诺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新中国。他记录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描述了与他们重叙旧谊的欢快。毛主席对斯诺说：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书末一章命题《前面的长征》，正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的前途所寄予的深情厚望。

在这四卷之后，我们还将继续编辑出版斯诺的散文特写集和其他著述。

斯诺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记者，他的作品文字优美，论理

透彻，引人入胜，堪称世界报告文学巨著。作为记者，他采访深入，作风严谨，高瞻远瞩，具有锐敏的洞察力。他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描摹出一幅幅时代的巨大画面，发出动人的异彩。他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史料丰富，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典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诺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史学家。

《斯诺文集》除了《红星照耀中国》曾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过外，均为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行。出版这套文集不仅对新闻文化界是需要的，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于斯诺在中国的老朋友，这些书是极好的纪念品。重温斯诺在中国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

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从斯诺身上可以学习那朴实无华，诚挚勤奋、信任人民、前进不息的品德。他笔下对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朴素而生动的描绘，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几十年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光明前景，鼓舞我们为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作出踏实的和坚韧的努力。

对于新闻文化界的同人来说，斯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而且他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问题的态度，及其为了探索真理，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为了更好地研究斯诺，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除删去了个别章节，和对某些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作了改正外，基本上保持了原作的风格和内容。我们相信，广

大读者是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目光来阅读这部文集的。

在出版本书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对此我们谨致衷心的感谢。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第一篇 游历

- 到达中国.....(1)
- 饿殍遍野.....(6)
- 来自肯塔基.....(12)
- 上海!.....(16)
- 编辑《密勒氏评论报》.....(26)
- 在密苏里的岁月.....(32)
- 游历记者.....(35)
- 华南.....(41)
- 文化传播者.....(47)
- 石头收藏家.....(53)
- 食生肉的国家.....(54)
- 龙云治下的生活.....(59)
- 旅途.....(63)
- 去缅甸路上.....(70)

锡袍的国度	(74)
印度初观	(81)
甘地和尼赫鲁	(87)
孟买历险记	(90)
与宋庆龄的友谊	(96)
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	(99)
宋庆龄和历史	(105)
记一次被遗忘的战役	(113)
尼姆	(121)
南洋	(128)
勿吃邻居	(132)

第二篇 煽火

安家北京	(141)
侥幸	(147)
学习倒立	(151)
活的中国	(156)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	(160)
煽风点火	(166)
行动	(172)
“无为而无不为”	(175)
跨越雷池	(180)
冲破封锁	(183)
周恩来	(188)
与毛一起吃点心	(191)
窑洞里的预言家	(196)

只争朝夕	(203)
出路	(210)
从西安事变到抗战	(219)
出北京记	(225)
战争的实质	(231)
卡尔森对未来的一瞥	(234)
我们在开创一项事业	(238)
我成了一名传教士	(246)
在吕宋的插曲	(253)
蒋家王朝的内争	(258)
幻想的破灭	(268)
“土地改革者”的神话	(275)
战争中的战争	(282)
大屠杀	(287)
惜别	(291)

第三篇 大河彼岸

老实人的归来	(297)
会见军队	(305)
武装部队总司令	(309)
结束与开始	(316)
在非洲上空迷失方向	(319)
经过沙漠上空飞往新德里	(324)
同尼赫鲁辩论	(331)
“爆竹，开始响起来吧！”	(337)
乌克兰交响乐团	(342)

青年	(316)
亲爱的总统先生	(354)
李维诺夫的警告	(358)
“和平革命”	(367)
“非政治”关系	(370)
失去的时间	(379)
同罗斯福总统的最后一次谈话	(385)
从摩西·泰勒夫人的城堡到延安	(391)
最先进入维也纳	(397)
广岛在莫斯科引起的反响	(407)

第四篇 冷战

终身签证	(416)
伊本·沙特国王	(421)
在德里的逗留	(429)
新“帝国主义”	(435)
更远的东方	(440)
我们阻止一场革命	(444)
甘地之死	(451)
甘地的实质	(459)
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共进晚餐	(464)
需要新表	(472)

第一篇 游 历

人是盘根错节的关系之综合
世界即其花朵和果实
——埃默森

到 达 中 国

我初到上海时，还很年轻，充满了好奇心，对世界上一切都感到新鲜。当时，我本来有可能成为同代人中的普通一员，象我的祖先一样，在开发边疆的梦想的驱使和不可名状的自由的召唤下，如同日落后的一颗“坠星”，去西部寻求财富，探索知识。

那年我二十二岁，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几个钱。我想，这点钱省吃俭用也够我一年到世界各地漫游冒险一番了。我计划一年后返回纽约。三十岁以前赚一笔钱，后半辈子就可以悠闲地搞点研究和写作了。在一九二八年的时候，这看起来的确是满容易的。

我取道巴拿马运河，动身去太平洋，在夏威夷和日本住了三个月，然后动身去上海。我原来只准备在中国逗留六周，哪知却在那里住了十三年，我才重返

美国。

出国的头一年底，我离开家乡已相当遥远了。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火城萨拉齐^①。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在很长时期内，我见识过各种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的惨象，这一情景是最令我震惊的一幕。直到十五年以后，我才看到了更惨的情景，那就是纳粹分子不耐烦等人们慢慢饿死，竟然用焚尸炉和毒气室毒杀了六、七百万人。

在上海时，我向《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以后派我去西北的正是鲍威尔。七年以后，我在那里写出了人类历史上伟大革命之一的基本历程，以及投身这场革命的人们。

“你为什么不留在上海，帮我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呢？”鲍威尔问我。“过几个月，我准备出版《新中国》特刊，让顽固派看看，国民党人会坚持下去。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得正视它。我需要有新见地的人帮我出版这个刊物。”

如果新意味着不成熟的话，我的见地可够新啦。“可是，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啊，”我回答他说。“再说，我只打算在中国呆六个星期，不再多住了。”

“那好，上海就是中国，但是这里有许多人还不明白这一点，”他笑笑道。“就在这里住上六个星期再走吧。我相信你会喜

^① 旧县名，在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黄河北岸。——译注

欢这个地方，会在这里住下去的。”

我并不这样想，领略过夏威夷的美丽以及日本的妩媚和井然的秩序之后，上海实在引不起我的兴趣。不过，我喜欢鲍威尔，喜欢他待人的热诚，欣赏他那个进口的棒子芯烟斗和娓娓动听的谈吐。我心想，准能从他那儿学到点东西。

“好吧，”我说，“我们开始干吧。如何着手编《新中国》这个刊物呢？”

我和我的中国助手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给这本两百页的特刊凑足稿子和广告。在上海的美国商人和领事馆几乎没有给予合作。他们很多人都把蒋介石看作共产党人。由于《密勒氏评论报》为蒋说话，他们就很看不起这家报纸。在鲍威尔的藏书中有大量东方学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地摘抄下来作为我的通讯报道的背景材料。我越读越迷。我发现了“古老”的含义；我看到十分年轻的中国正在竭力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这和它的悠久的历史构成了富有戏剧性的矛盾。不等我完成第一项任务，鲍威尔就提出要我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的职务，我接受了。

其后，我为副刊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中国铁路沿线城镇的名胜。鲍威尔想要说服美国人，使他们相信又可以安全地在中国观光游览了。当时的交通部长孙科也热烈赞同这个主意。孙部长答应给我提供各种可能的帮助。

“既然赤色分子已被镇压，”他告诉我，“就没有什么排外主义了。革命已经过去，国家已经统一。你将看到，人民多么和平友善。你就如实报道吧。”

以后的四个月中，我在中国转了一大圈，凡是那八千英里

长的铁路线可到之处都到了，享受着当时最为舒适的条件。我的足迹遍及铁路沿线重要的城镇，领略了各地的风貌，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到长城内外，还到了东北和朝鲜。《密勒氏评论报》连续好几个星期刊登我写的游记。后来，中国旅游局把这些游记当作招徕游客的“宣传品”。旅行未结束，我就看出，这个国家远未统一，真正的革命未必已经开始。

令人大开眼界和心旷神怡的日子慢慢过去了，接着我来到了北京以西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地带。我游览过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所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太湖上的岛屿，芳草萋萋的岸边的桑树和缫丝机；杭州西湖的佛寺和宝塔；扬州优美的渡桥及马可·波罗像。在忽必烈统治时期，马可·波罗治理扬州达三年之久；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河汉交错，以其游船画舫和美丽的歌女而闻名；南京的大明城墙和中山陵所在的雄伟的紫金山；还有北方的许多名胜：神圣的泰山，孔庙和孔夫子的诞生地，以及孟子的故里。最后还有我后来称之为“故里”的北京，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屋顶，汉白玉祭坛，紫红色的城墙，绿树掩映的庙宇和宫殿，挺拔高耸的刺槐和美丽的街景。出了长城，我乘坐流线型的舒适火车，在日本人管理的南满铁路上旅行。在沈阳，我拜会了东北的年轻统治者张学良少帅。我看到了沙俄建设起来的哈尔滨，那里有不少俄国居民。在殖民地的朝鲜，我第一次见到了在外国征服者统治下生活的人民。

旅行过程中，孙科博士给我派了一个身材矮小的旅伴，(好象)叫什么C·T·华盛顿·吴的。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四十一岁。他的名片上写着他是交通部的“技术专家”。当时出

国留学的中国人习惯为自己取一个外国教名，在与外国人的社交场合中使用，吴先生选择华盛顿这个名字寓有向我们的国父表示敬意之意。我很快就发觉，他对铁路事务一窍不通；除去上海和南京，他在中国没有到过多少地方。他是中国官场千千万万食客中的一个，大官们往往出于裙带关系或者私人的交情，给这种人安排一个闲职。吴先生对寺庙、民间传说或者火车头都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吃起鱼翅来却津津有味。这些鱼翅都是沿途薪金微薄的下级官员，慑于吴的意义含糊的头衔，自己掏腰包孝敬他的。

一天紧张的游览结束之后，华盛顿常常一回到他在一家中式旅店的客房后，就喊“老信子”，这时无所不在的茶房就会应声端来热水和毛巾。华盛顿一面洗脸擦手，一面颐指气使地交代一番，茶房连声道是，退了下去。几分钟后，就有人来敲门，接着就会进来一位妙龄姑娘，有时是两、三个一起进来。华盛顿把她们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捏捏她们的屁股，打打趣。照例，他对第一次送进来的女子总是不满意。华盛顿于是又把茶房叫了进来，训斥一顿，说他送来的是“花脸”（麻子）姑娘。最后，总得给他找来一位脸色红润的女孩子，他才满意，才肯赏脸。作乐几分钟后，这位技术专家就作好准备去赴晚宴了。

中国各地城市，娼妓麇集。贩卖妇女是一大行业。人口贩子把大批男孩女孩买去当契约劳工，让他们当学徒、做工或当家仆。漂亮的女孩子就被转送到大城市的人口市场，被人买去当姨太太、歌女或女招待。最机灵能干的歌女有时能争得赎身独立的地位，自己当上“鸨母”。但是，绝大多数都沦为下等妓女，成了老板或鸨母的奴隶。

一九二九年，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共有“婊子”四万八千名。大街小巷里还有五万至十万的无证操业的妓女。陪伴她们的鸨母贪得无厌，往往客人还在讨价还价就把他们硬拉到小巷的妓院里。在上海中国人管辖区内的茶馆和窑子里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女人。在饥荒、水灾和战争快要爆发的岁月里，还有更多的女子沦为娼妓。

在全中国，苛捐杂税和沉重租债不断逼使穷困的农民背井离乡。在连年干旱的地区，成百成千万的人赤贫如洗，卖儿鬻女是常见的事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常说，“这些中国人没有心肝；他们卖掉一个孩子就象是卖掉一头猪一样。”但是，有一个租界，公共掩埋队不断出动，据报道仅一九三〇年一年中，就“埋葬了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了”两万八千多具在街头或河里发现的尸体——大多数是婴儿——在以后的年月里，死尸的数字从未低于这一年。被卖作奴仆固然可悲，但有些人的命运比这更惨。

饿 殍 遍 野

中国西北地区面积比美国得克萨斯州还大。在那饥荒的岁月里，这个地区的政权，在实际上或理论上都掌握在所谓“模范长官”阎锡山的手中。南京中央政府给他封了一个“绥靖主任”的头衔。他有一个同盟者叫冯玉祥，也是个老军阀，人称“基督徒将军”，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事件中曾帮助过蒋介石。但是，蒋委员长这时对他们两个人都不信任，把饥荒看作是迫使他们就范的有效武器。南京没有给饥饿的人们送去粮食。华

洋义赈会用私人捐款购得少许粮食，但政府甚至不给车皮，在运输方面制造巨大障碍。

从张家口到绥远之间只有极少几趟列车往返，贸易萧条。华盛顿·吴想在张家口结束京绥铁路上的旅行。他说，旅游者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争辩说我是奉命考察所有的铁路线的，因此坚持要继续去绥远。经过好一番争执，铁路上的客运处协理终于在一列西行的货车上挂了一节特别车厢，在这里面堆满了食品，还增派了卫兵。他说，要是吴不带我去，他带我去。华盛顿终于还是去了。

出张家口不远，我们来到了尘土飞扬、炎热不堪的旷野上的一个小站。我们的火车停靠在一列相向开行的火车旁边。那列喘着气的火车头拉着几节残破的货车，其中有两节货车挤满了半裸着身体的小孩子，几乎全是女的。她们面有饥色，显得很苍白。看上去，她们是由几个老妇人和男人照管的。我从客运处协理那里了解到，他们是被送到工场或妓院去的。在灾区的边缘地区，张家口是一个贩卖人口的主要集散地。有时，孩子们走运，被守本分的手艺人收为徒弟或被正经人家收养，这至少是一种生存的办法。但是，一切都取决于买主的用意、品质或一时的兴致。就在这时候我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那里还听到了人口贩卖的其他情况。当时我们的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一群长着黑头发的中国人正在下车。路易·艾黎的一头红发，突然十分耀眼地在这些黑头发中冒了出来。

艾黎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任英国工部局的工厂视察。他决心利用年假和几个外国人去灾区办施粥所，并修筑灌溉渠。我在这里结识了他，数年以后，我们共同创办了“中国工业合作

社”，成了知交。当时，在我心目中他是个怪人，但很有趣。我要华盛顿让红头发的艾黎睡在我们车厢的空铺上，分享我们的食物。但这位技术专家傲然拒绝。他不喜欢“帝国主义者”，尤其讨厌“传教士”，他认为艾黎就是这种人。他们“老是议论中国落后”。他认为，这种人使中国“丢脸”。

艾黎对此并不在乎。“这种人我在上海、南京见过几十个，”他说。“卑贱的农民倒是更好相处。”说完又回到农民中间，站在敞篷的货车厢里愉快地向我挥手。

我真想下火车去跟那些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但是，我有我的事情要办，而且我也已开始喜欢在舒服的条件下旅行了。第二天，我们抵达归化，华盛顿摇身一变，又重新成了吴先生了。我和艾黎一起进城去了解人们贫困的状况。次日，我们到了萨拉齐，这是铁路的终点，成千上万的灾民从受灾的平原地区涌到这里来。

由于我坚持往前走。花几天的时间访问几个边远的小镇，横越一度是良田的荒漠地区，这位技术专家对此非常反感。他竭力争辩说，这与考察铁路情况无关。他回到了专车的车厢上，说什么他要一个人往回走。只是因为当地有几个父老误认为他是大官，称他为“大人”，求他帮忙，吴才改变了主意。

我们和负责义赈会运河工程的美国工程师O·J·托德和传教士罗伯特·英格拉姆医生结伴而行。英格拉姆医生的职责是给劳工队和难民营灭虱，防止斑疹伤寒和瘟疫传播。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象是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甚至树也被剥光了皮，正在枯萎下去。村子里绝大多数的泥砖盖的房子坍塌了。屋子里仅有的一些木料也被拆下来变卖几个铜板。

奄奄一息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地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神情麻木。我在一处看到一个光着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于吃树叶和锯末充饥的缘故，肚子涨得象只气球。他使劲摇着他父亲的尸体，想要唤醒他。父亲光着膀子刚刚死在路上。我们把这孩子送到城里的一个施粥所。我们还遇到了两位年轻妇女，她们瘦得象一家中国肉铺里挂着的腊鸭。她们的肤色都一样，都衣不蔽体，干瘪的乳房象空纸袋一样垂于胸前。她们昏倒在村里的大路上，那些还能走动的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她们身旁走过，连看也没看她们一眼。我们把她俩送到了难民营。成千成万的人注定要死去，救活几条命似乎也没多大意义。在我们访问过的两个城镇里，一年之内死掉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墙外挖一条浅沟掩埋了事，即使这样，要找到有气力挖沟的人也很困难。往往尸首还来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飞了。有的村子里，公开卖人肉。

同铁路终点站以远数百英里处无依无靠的人们比起来，萨拉齐居民的日子还算不错的。佃户和自耕农一连捱过了三个春天，但依然不见下雨。为了买种子，他们把仅存的一点土地和劳动力都抵押光了，可是买来的种子又不发芽，他们现在是一无所有了。种子不是播下去了就是吃掉了，眼前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富裕的地主却能活下去，甚至变得更富有了。那年月，一袋谷子可以买下一个农场。在萨拉齐地区，当时正在修筑渠道从黄河引水来灌溉四十万英亩的土地。即使如此，对那些能够活下来再看到土地上长出庄稼的人来说，他们的命运也是悲惨的。小农、佃户和雇工都已破产了，而高利贷者和粮商却在迅速地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他们囤积居奇，获取巨额利润。有钱

人家只要付出通常价格的一个零头，便可把他人的土地据为己有。他们有私人的保镖保护宅院和粮仓。这些保镖吃得好，也甘心为主子效劳以保住饭碗。另一方面，千百万人却在忍饥挨饿。

当然，由于问题过于严重，任何外国救济都无济于事。需要全国或全世界给予大规模援助才行。受到严重影响的至少有两千万人。“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物来为他们百分之一的人解除痛苦！”英格拉姆医生说。“当官的什么也不管，真可耻！他们整天忙于通过决议，因人设事为熟人安排新差事。”

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间的冬天，以及同样可怕的翌年，即干旱结束的前一年，从长城以南到黄河之滨的大片土地落入了高利贷者和外乡地主的手中。在我居留中国的其后十二年中，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总有一些地区不是遭水灾就是闹旱灾。在每次灾难中，我都看到同样的并吞、同样的肆无忌惮的人间剥削悲剧，看到农民倾家荡产，妇女受污辱，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看到官逼民反。到四十年代中期，情况更为恶化，以至饥荒和起义在中国西部同时发生。在抗日期间，格雷厄姆·贝克就亲眼看到蒋介石的军队大批地开到农村去屠杀饥饿的农民。但是，很少美国人愿意费神去读一读贝克这部题为《两种时期》的写实作品。这本书说明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的原因。

然而，读过格雷厄姆·贝克这本书的美国人，总比读过我于一九二九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西北饥荒的报道的人要多一些。到一九四五年，美国给蒋介石政府源源不断送去的数十亿美元，不是用于救灾，而是为了建立军事同盟。这时，我的五千字的报道得到的唯一反应，是来自一位美

国小学生，他在来信中附了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嘱我转送给饥饿的中国“兄弟”。

“中国黄河水灾的受害者有数十万之多，”凯斯特勒所著的《中午的黑暗》一书中的人物伊万诺夫说。“造化在对人类进行无意识的试验时，是慷慨的，人类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进行试验呢？”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是我越来越想提出的问题。

但是那一年，当我们乘火车由北京南下，穿越金黄色的高粱地和绿油油的稻田时，我还远远没认识到：国民党人可以用来履行诺言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华盛顿·吴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也许比我想的还要多。我们的这次旅行使他的头脑有所清醒，受到了教育。

“可怕！可怕！”有一天，我们在讨论沿途见闻时，他突然喃喃地说。“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我把这类事情都忘了。我们的中国是一个多么悲惨的国家啊！”

当我终于听到吴承认，除了白人帝国主义者的罪恶外，中国也还有自己的弊端时，我对他产生了同情。他那傲慢的神情和装腔作势的自尊消失殆尽。从他的言谈里看出，他身上有了一种新的伸张正义的精神，一种新的谦恭的态度和责任感。

“我们必须为拯救中国做点事情——得赶快做，”他说。“可是，从哪里着手呢？”

“你们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我说。“而我这个美国人追根寻源也只有几代人。我怎么回答得了中国的这个问题呢？”

“要有新生，”他若有所思地说。“而新生只能出自我们自身，出自我们历史的自身。”

为什么我也开始关心起这个进程来了呢？为什么我开始觉

得中国有了重要性呢？我不禁想起，我的童年的生活是何等地不同，作为一个富裕的、开放的和新开发的文明社会的一员，比起旧中国生计艰难的人们，我的际遇不知好了多少倍，大自然是慷慨大度的，人们只要劳动就可以得到报偿。而在有数千年人剥削人的历史的旧中国，最严酷的弱肉强食的争斗还要继续下去。

吴沉默良久，心事重重，我也在想心事。

来自肯塔基

在我们家的成员中，祖父大概是最有可能理解我为什么去中国，并留在东方的人了。

祖父霍拉斯·帕克斯·斯诺要是活到今天，该有一百多岁了。他出生在曾祖父的家乡，肯塔基州的克林顿，离坎伯兰的凯尼山峡不远。他的曾祖父威廉·斯诺，是在十八世纪末最早从北卡罗来纳来到这里定居的，他在这里开垦他的父亲由于对革命有“贡献”而分得的一块土地。

据肯塔基作家J·W·霍尔说，到了我祖父的时代，肯塔基这个农场成了全州最美的一个农场。但是，在所有的田地里，绿草如茵的牧场上，牛棚马厩或果园里，找不出一个奴隶。斯诺家族是反脱离联邦主义者。我的高祖塞缪尔·弗罗斯特·斯诺在南北战争前就释放了他全部的奴隶。凯尼山峡虽然与南部相连，那里的人们却都是拥护联邦的。父亲小时候在肯塔基时，曾祖母曾对他说，在整个凯尼山峡只有一个人公开表示同情南部邦联。一天早上，他想参加叛乱，但是傍晚时分，邻居们把他弄了回来，叫他站在自己家门口，要他“留在那儿，在战争期间保

护女眷”。我的曾祖母说，“他就象一颗门钉，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我祖上很多人去西部开发边疆。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霍拉斯·帕克斯·斯诺在堪萨斯发现了很好的耕地和牧场。他娶了路易莎·弗朗西丝·凯勒为妻。她是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人。她的祖父是一个著名的美以美会巡回牧师。斯诺家族坚决反对罗马天主教，原因之一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到了八十年代，我祖父带着路易莎和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来到堪萨斯的温菲尔德附近定居，把家产投放在农田和他们称之为“商业”的杂货铺上。祖父曾夸口说，“他一生没有给别人干过一天活”。他度过了九十年代的“恐慌”，在密苏里、堪萨斯和得克萨斯获得了大片的土地，终于置起了一份家产。

我父亲詹姆斯·埃德加·斯诺和列宁及孙逸仙差不多同时出生，正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十年光景；为镇压这场起义，四千万人头落地。多年以后，这三件事都给了我深刻的影响。然而，当时美国人并不关心太平洋沿岸各国，对中国四千万人被屠杀不曾在意。

亚洲发生什么事，我父亲并不在乎。他生长在肯塔基和堪萨斯，对太平洋彼岸天翻地覆的世界毫无所知。他向安娜·凯瑟琳·埃德尔曼求婚，与她结了婚。她来自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是个混血儿，她母亲是从蒂珀雷里来的爱尔兰移民，父亲是从德国西里西亚来的日耳曼移民，两岁时随我的外祖父移居美国。

斯诺家里人听说安娜是个“天主教徒”，大为吃惊；她是和“来自肯塔基”的斯诺家族成员结婚的第一个天主教徒。而且，她父母双方家里都有人当神父。我的父亲为了和美貌的红头发

安娜结婚，只得答应学习天主教教义，以便改换信仰。他还同意孩子生下后也要让他们按天主教仪式行洗礼，要他们接受天主教教义。父亲不久就为作出这种妥协感到懊悔了。

父亲从西南学院毕业后，在一家畜产行找了份差事，和安娜一起到了芝加哥。不久，他积攒了一点钱，又回到堪萨斯城。在那里，他买下了一家畜牧报和一家小型印刷出版行。当《堪萨斯城星报》成为斯诺印刷公司的最大主顾时，詹姆斯和安娜已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是最小的一个。他们似乎叫我“埃德加”还嫌不够，又在我的姓名中间加上“帕克斯”一节，“帕克斯”对我祖父是合适的，但对我不合适。我把这一节省略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用过它。

我们几个孩子适时地通过了教会的教义问答，行了坚信礼，入了教。但是，父亲坚持要我们上公立学校。由于我们拒绝去教区的学校上学，当地的神父搅得我母亲心灵不安，他们要她履行职责拯救父亲的灵魂，叫他进教会，他们要不是这样逼人太甚的话，父亲也许不致于对天主教如此深恶痛绝。

诚然，他答应过要学习天主教教义，他确实也学了，而且学过了头，要当一个好的普通天主教徒学多了反而不行。他甚至读罗马天主教核定的圣经，还指出了其中前后不一致之处。到了后来，他对天主教的情况比我们周围虔诚的信徒都知道得多，尤其是对教会的阴暗面，他了解得更为透彻。他对我的信仰天主教，并不干涉，可是到我长大懂事时，每逢星期日下午，我都得听他朗读从那些被列为天主教禁书的英格索尔或勃朗德等人的著作中精心选择的章节。我哥哥和姐姐运气好，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不听父亲的朗读。但父亲认为他有责任让我对上

帝有正确的了解。

最后使我丧失信仰的倒不是英格索尔的理论，而是有一天我和一个比我大的孩子到附近的修道院去领圣饼时，我看到了圣饼也是从普普通通的煤炉里烤出来的，这使我感到很奇怪。回来的路上，那孩子打开一个铁罐，当下把那块“基督的肉和血”吃了下去。我以为他准会猝然倒在地上，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比尔笑了。“它们还没有净化，所以不会有灵性！”

这时，我想起了我们教区的神父，可亲的约瑟夫·沃尔什老神父，我突然再也不相信他能把水和面粉做成的圆面饼化成基督的肉和血了。我并没有因认识到这一点，感到特别高兴。“要一个人不信教很容易，但要他改变信仰可不容易。”

为了母亲的缘故，我在家时依然去做弥撒。等到上了大学，我对任何派别的宗教都很淡漠了。许多年以后，我对佛教和道教的哲学发生了兴趣，但并不信神拜佛。

我父亲给我灌输了怀疑主义，使我对事物大都能抱理性主义的态度，厌恶任何形式的教条和专制主义。我青年时代受到的天主教教义的熏陶足以使信仰和理智在我身上并存不悖，这种情况持续了许多年。从孩提时代起就渴望和相信有个救世主，而不愿个人担负责任，这种心情苦乐参半，却也不易抛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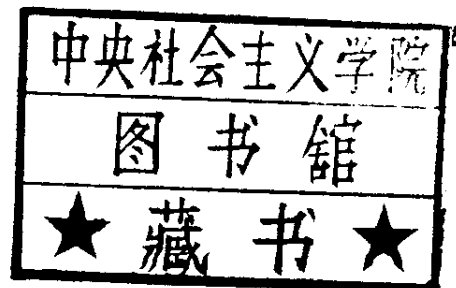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可能会同意爱因斯坦的观点，即上帝是“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一种高级理性力量的体现”，但是，他反对天主教的方式却对我们家庭的和睦不利。他无疑在理智上取得了胜利，但在心灵上却遭受了失败。我知道母亲善良而不自私，十分和蔼慈祥。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变成激烈的反天主教者。

眼下我置身于遥远的异国他乡，C·T·华盛顿·吴先生还在我的身旁，我怀着爱戴和感激的心情想起了母亲，想到要赶紧给她写几封信。可是万万没有料到，我再也不能见到她了。几个星期后，家里来了一封信，报告母亲的病情。但是，这封信我是在接到她去世的电报两星期后，才收到的。

尽管这事发生的时间不是很久，但很难令人相信，在当时，我或者任何别的人都不能在大大少于一个月的时间内从东方赶回家。当时的中国就象现在的月球那么遥远。现在有了火箭时间的概念，更是可以这么说了。不过比起从前一个也姓斯诺的人所作的一次快速帆船的航行来，时空滞差已经是奇迹般地缩小了。那个神情严肃的塞缪尔·斯诺船长被麦迪逊总统委任为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我后来意外地得到了斯诺船长的肖像、文件和皮封面的航海日记。他在日记里描述了他一七九五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和中国的漫长的航行。

上 海！

我和华盛顿·吴还在北京时，约翰·本杰明·鲍威尔给我打了个电报，要我立即返回上海。《芝加哥论坛报》命令他去满洲报道那里的战事，因为张学良少帅贸然地想要把满洲北部中东铁路沿线工作和居住的俄国人撵走，导致了冲突。在蒋介石的怂恿下，这位年轻的将军想要强行取消一项载明这条铁路为中苏合办企业的协定。中东铁路是沙俄时代，俄国出钱出工程师修筑的。事实证明，张学良这一冒险行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苏联出兵满洲，恢复了在这之前存在的现状。事后，苏联



政府邀请中国人去莫斯科谈判。在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后，苏联政府把军队撤回西伯利亚去了，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我回到上海时，鲍威尔已经离开了。我读了他留给我的信，得知他委托我担任《密勒氏评论报》代理主编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鲍威尔还要从满洲去莫斯科，并在那里逗留几个月。就这样，我成了一名驻国外的记者，并且真正地熟悉起上海这个地方来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翰·根室只在外国人统治的上海待了几天，就得出结论说上海是“中国脸孔上的一处政治溃疡”。上海已变得臃肿腐败，不久就要为它的过去付出令人震惊的代价，而西方在上海的继承人都已经忘记了上海的去。历史总是从容不迫的，中国已经等待了一百年了。

但是，我于一九二八年到上海时，那里的西方商人的言谈举止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租界”是他们的不动产，可以永远传下去。他们得意忘形，仿佛觉得自己是大陆，而四万万中国人只是上帝为了方便他们做生意而安排的郊区。然而，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里也是富有吸引力的罪恶的渊藪。

开初，我看到上海，曾错误地认为整个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十分新的事物和十分旧的事物形成奇异的对照，环境丑恶不堪，各国来投机的人吵吵嚷嚷地操着不同的语言，人们直言不讳地宣称金钱就是一切，这种俗不可耐的现象使我感到迷惑诧异。起初，我也隐隐约约地有一种人满为患的感觉。我从没有见过这许多人（而统治者只是极少数）。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个模样，是一个没有什么个人特征的庞大的人群，但有色彩、行动，充满了矛盾。他们书写从右到左，他们是姓在前，名字在后；

同人打招呼，不是招手，而是挥手，好象是让人走开；告别时不握手，而是把双手拢在衣袖里；削苹果皮是刀口冲外，而不是冲内；锯木板时，把锯齿向内拉，而不是向外锯；发纸牌是从右到左；先吃饭，后喝汤；还有，他们想要说“是”时却说“不”！作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我很难立即理解，这些情况竟然并不影响“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人类基本准则。

上海商业区的街道乍看起来同样也象是一个古怪的马戏场，熙熙攘攘，活跃得令人难以置信。三教九流的人们都在公共场所干着各自的行当。人们高声喊叫，比手划脚，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来穿去。他们担惊受怕地在新旧汽车和为了挣几个钱拚命奔跑的人力车夫之间穿行；小心翼翼地走过粪车成行的静安寺路，面带嘲讽的神情从洒满香水、衣着考究、大腿裸露的中国太太们身旁走过；他们见到光脊梁虎背熊腰的苦力推车送吃吃笑着的女佣们去干活或回家时，就说上几句俏皮话；看到小贩挑着美味可口的面条担子在叫卖，他们留心观看；走过挂着金字招牌、琳琅满目的绸缎店铺时，他们羡慕不已；见到睁大眼睛注视着令人生畏的印度巡捕的农妇们，他们脸上毫无表情；经过麻将牌、回力球劈啪作响的赌场时，他们神情严肃；他们躲躲闪闪地穿过弥漫着浓烈的鸦片香味的街道；经过南市的餐馆和灯火通明的歌妓院时，他们使劲嗅着香味；他们神情冷漠地看着衣冠楚楚的年轻英国人坐上奥斯汀汽车去跑马厅打板球；他们窃笑上了年纪的白人绅士带着夫人或俄国情妇乘车去外滩乘凉；他们忙不迭地躲避寻找酒和女人的水手……从喧闹的早晨到凄凉的夜晚，咳嗽声吐痰声不绝于耳；孩童的便溺在路旁汇流成溪；鸨母在叱骂着；永安游乐场里同时演出

十多台戏，传出假嗓的尖声演唱；附近的旅馆里充斥身段丰满的少女，她们是被招来供外省来的富商纵欲的；乐队呜呜咽咽地奏着乐曲为满身珠光宝气、身材苗条的中国舞女伴奏；无数的乞丐和他们赤身露体、肮脏的孩子们在苦苦哀求着；迷人的黄浦江上，布满外国军舰，以及杂乱的货驳、帆船，还有千百艘点着灯笼的舢舨，在月光映照、严重污染的江面上就象是点点萤火！

这就是上海！

但是，这里大片宁静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却很象美国东海岸或法国城镇的最好的住宅区。宽阔的街道两旁，顶上嵌满玻璃碎片的高墙围着很有气派的宅邸和大草坪。墙内有外国人开设的酒店，餐馆，城郊俱乐部，有世界上酒柜最长的酒吧间及现代化的公寓房子，都是供高等民族享用的。中国人除了当听差者外，是不准进入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缴纳大部分税款，却不许进入城里的公园和外滩公园。上海充斥着欧洲人警察和长头发的锡克人交通警察，他们用警棍打人力车夫，吓唬他们，尤其糟糕的是，没收他们车上的坐垫。当时，租界还很“安全”，沉甸甸的金条银条公然由肌肉结实的苦力用吱嘎吱嘎响的推车从一个银行运到另一个银行，常常只有一个自命不凡的中国职员押运。

（一九四九年，眼看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蒋委员长的儿子蒋经国对所谓的“汉奸”——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有钱人——实行了大逮捕，严刑拷打或杀害，要他们把他们隐藏的最后一些金子交出来，好让国民党人带到台湾新的民主政权那里去。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人们是忘不了的。）

我决定在这块杂乱无章、富有刺激、原始而又复杂的地方——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耽一段时间。我随即和一个与我同庚名叫约翰·阿里森的美国人在西摩路租了一套公寓房间。约翰后来成了美国驻日本大使，但是，他在上海领事馆当职员时，挣的钱不比我多——每月六百元。但这些钱已足以使我们保持白人的威严。房租微不足道，交通费很便宜，不管你坐出租汽车到哪里，都只需要付一元钱，相当于三十美分。在美国俱乐部或“吉米”饭馆吃一顿最丰盛的美式饭菜也只花一元多一点。手工缝制的衣服的价钱只及美国成衣价钱的一半。我们没花几个钱就雇了一个厨师。过了不久，我们为了照顾那位厨师的面子又找了一个“学徒”，因为中国人不愿意在只有一个佣人的家庭里干活。

生活不消说是舒适的。由于过于舒适，我们不久就感到腻味了。在外国人的办事机构，所有跑腿的活，以及大部分动脑筋的活往往都交由中国助手去做。这些机构办公时间很短，午餐的时间有两三个小时。饭后再过一两个小时，一般美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就要下班回家，不然就到俱乐部游泳或洗个澡，喝上一两杯。然后，佣人就帮他穿上夜礼服去进晚餐。生活就是一连串的酒会，即使是上等酒菜也很便宜，赊账也没有限额。凡是欧洲人或美国人都只要出示一下名片，签一张单据，便可以在任何商店、酒吧、饭馆或旅馆里买东西。

那种生活方式现在是消失了，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无需费很多时间去寻找答案，因为这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历史的一部分，而在这意义上，上海成了很快就要消失的历史的一部分。下面我就

要叙述这一情况。租界生活的风气体现了我们一世纪来和中国的交往的实质，而所有的美国人，尽管是不知不觉地，却沾染了这种风气。这种遗风至今还表现在我们的舰队开到离本国五千英里之遥的中国海面上去耀武扬威。

上海社会的精神基础可上溯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那时英国在所谓的鸦片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中国开始受到列强的严重干涉。开初，英国商人仅仅取得在黄浦滩上一块泥地上居住的权利。他们从满清统治者手里取得了这一权利。要不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清政府是决不会再多给的。来自满洲的异族征服者的满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忙于镇压革命战争。在这同一时期里，西方世界最大的灾难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残杀掠夺，但是比起中国的这场战争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太平天国和满清的战争，夺走了四千万到六千万人的生命，其残酷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在我们这一代人所见到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二十年大战。

什么叫太平天国？“太平”者“大和平也”。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信奉基督教。他具有中国人的特有的政治敏感，宣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满清败坏了释、儒、道三教的声誉，洪秀全的门徒不仅想要使全民族信奉基督教，还想借此达到明确的、颇得人心的目的。他们力图推翻满清及其傀儡，完全恢复汉人的统治权，取消外国人的特权，平均分配土地，限制鸦片贸易，提高妇女的地位，禁止妇女缠脚，还要实行另外一些“基督教”改革。在社会理想方面，太平起义军走在了亚洲和欧洲的同时代人的前面，而且他们采用的方式也并不更野蛮。

到十九世纪中叶，满人被从中国的最南方赶到了长江以北，

北京本身也处于危险之中。在太平天国和英法的内外夹攻下，清王朝是很有可能被推翻的。但是，清政府在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〇年，在西方人手下遭受了一系列惨败之后，作出了对他们害处较小的选择。他们使鸦片贸易完全合法化，让英国人管理他们的海关，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其中包括扩大上海公共租界，还承认治外法权，外国人得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清政府还同意让基督教宣传和传教士传教完全合法化。这些传教士这时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已开始转变为反对太平天国式的基督教，把它看作比异教更坏的异端邪说。

此时，“西方”作出了它的基督教式的决定，以维护其本身的利益、正义、文明、自由体制和自由贸易。后者主要是指不受限制地向中国出口和销售毒品。法、英陆海军这时和清朝结成了非正式的联盟，渐渐把起义军撵出了沿海和沿江的要塞。美国冒险家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在上海组织装备起来的清朝和美国联军，向南进军，战绩卓著。一支法国和清朝的联军扫清了浙江沿海，他们在英法军舰的协助下，炮轰、劫掠了许多太平军的兵营，把它们夷为废墟，并残杀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百姓。一八六二年，华尔死后，清王朝任命一名英国军官查尔斯·乔治·戈登将军，统帅一支大大扩充了的混成部队，溯长江而上，发动攻势。尽管各处城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都相继失陷了。

美国政府当时虽然忙于本国的内战，从未正式参加干涉，但是议会批准了借用英国正规军官和士兵，批准了大规模的鸦片、武器和船只买卖。许多美国人贪图优厚的报酬，都参加了进去。外国的枪炮远比中国的武器优越，加以有外国人训练和

指挥，这就使太平军损失愈加惨重。苏州失陷。戈登将军俘获了太平天国王族的大多数成员。因戈登亲口允诺给予保护，他们方投降。戈登颇不情愿地把他们转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立刻把他们和他们的数百名追随者一起斩首了。开初，戈登对李鸿章这种操之过急的做法颇为不快，但他们随即言归于好，戈登又继续率领联军乘胜前进。他们彻底击溃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包围了太平军首都南京。这时，李鸿章感到大肆劫掠的外国军队如占领南京，可能会危及清王朝本身，于是坚持要戈登解散他的军队。戈登照办了，他们得到了优厚的酬金。戈登载誉回到英国。后来，他在苏丹担任殖民总督，被起义军击毙于喀土穆。由外国人训练、外国武器装备起来的清朝军队，这时在满清自己统率之下，攻陷了南京。“天王”自杀，太平天国失败，各地太平军余部不久即解体。

就这样，“西方”保持并扩大了它在中国的文明影响，清王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从它的拯救者手里得到完全的独立。就这样，中国第一次国民革命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难道这是对中国现行政策毫无影响的历史陈迹吗？也许，西方在亚洲进行了掠夺，屠杀了一些人，但这已成为过去，被遗忘了。时代改变了，现在已是原子时代，帝国主义死亡了。

然而，昔日是今日之本，无古不成今。新一代摄取着昨天曾是活生生的东西如今却成了恐惧和憎恨的腐肉。历史中的主观性是一个重大因素，它不论何时何地都是未见诸文字的现实“客观”记录的一部分，也是任何外交政策中无形的狂想的成份。无论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主人，或是解放了的奴隶，都不会忘记他们不久前的关系，他们为此而进行的斗争常常超过了为

了现实问题和将来而进行的斗争。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懂得了武力之外的一些东西；也许，我们甚至相信东方也懂得了武力之外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西方有一些崇奉强权即公理的得志者们反应迟钝，至今不相信我们已放弃了武力，我们会感到奇怪吗？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每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都体验过太平天国的革命和它受到的镇压。作为在中国的记者，我发现，特别是在那些最后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者看来，太平天国革命从未结束过。太平天国的烈士是朱德、彭德怀、毛泽东和周恩来从童年时代起就景仰的英雄。太平军的敌人也就是他们的敌人。由于基督徒的武力干涉，基督教义丧失了信誉，代替它的，是他们信奉和崇尚的西方一种新的“普世信仰”，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太平军的余部最后在四川西部的大渡河边陷入包围，全军覆没。七十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那里赢得了对蒋介石军队的关键的一仗，同时高呼“石达开万岁！”（石达开是太平军英雄，殁于大渡河上）和“中国革命万岁！”

在这之前几年，在三十年代初期，日本人便首先闯入了自命不凡的上海，使人们看到种族优越的神话并不比他们所凭借的技术上暂时领先的地位更实在些。但此刻，上海的洋行“大班”们仍然在位。上海意思是“在海之上”，上海当时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居全国之上。上海的大门吞吐着全国半数的进口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货物。这个城市的核心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其面积虽然只有一万英亩，却居住着三百万中国人，这里的熟练产业工人占全国半数以上。但是实际的权力都完全掌握在几

千名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及其领事的手中。

法租界由少数法国阔佬管理，而公共租界同样由少数寡头控制。尽管中国人缴纳了几乎全部的租税，但是，他们不能在自己名下拥有地产，登记地产时，必须雇请外国人做他们的名义代表。甚至在为数仅数千名的外国人中，也只有大财主才有表决权，其数目从未超过三千。只是到了后期，中国“纳税人”才在租界工部局中取得了一些代表权。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之前，控制工部局的总是那些英国的地产主、银行、保险公司、石油公司、轮船公司、纺织厂及其掮客，以及为数较少的这类美国人和美国企业。

当然，使上海保持稳定，使它对中外资本产生吸引力的，正是英国的法律、秩序和对财产的保护，而作为后盾的则是外交、外国军队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军舰。日本人先后于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发动了进攻，破坏了一切，这块圣地的末日便到了。舍此不论，有一点是尽人皆知的，只要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统一全中国，外国干预者和洋人大班的时代便将结束。

早在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以前很久，我就意识到，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实现这一任务。因为国民党的领袖们所不满意的并不是上海的人吃人的现象，而是吃人的竟是那些洋鬼子。仅仅更换主人，是不足以平息被抑制着的革命怒火的。当年太平军信仰的是耶稣基督的兄弟、与耶稣地位相当的人所宣扬的信条，而他们的子孙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创立一种东方派的新信仰的人。当我后来与这位新救世主——他的名字叫毛泽东——结识之后，我的命运便与这一事实联结在一起。

不过，我刚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编辑，还得学上好长一段时间。

编辑《密勒氏评论报》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一个高个儿、宽脸、尖下巴的情报官员，每星期到报社来一次同我交换情况。他叫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我对他的来渐渐地喜欢起来了。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在塞班岛负伤致死。他为海军陆战队的突击营的战斗训练和组织作过独特的贡献。

卡尔逊是一个罕见的集理想主义和实际才干于一身的人。他钦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他和后者一样热心肠，并且同样也是个坚强的军人。（一九三八年，为抗议美国在日本开始侵占中国后，还继续武装日本，卡尔逊一度辞去他在海军陆战队的职务，后来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工作。由此足见他的为人。）我们相互信任的基础，是有一天我们在《密勒氏评论报》的办公室里见面时打下的。那天，他给我看了一份帕特·吉文斯整理的关于我的档案材料的复制件。帕特·吉文斯是爱尔兰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政治部的头目。

根据这份材料，我的真名似乎应是什么“拉文斯基”——是洛杉矶警方通缉的一名罪犯。这个“斯诺”是一个危险的煽动分子，据称曾因同汤姆·穆尼案件有牵连，在监狱服过刑。我被说成是在使用假护照旅行，而且“据信是第三国际的一个代理人”。

“真好笑，”我说着，把材料还给了埃文斯。“承蒙错爱，不

过，汤姆·穆尼案件发生时，我才十二岁，只是堪萨斯城的一个童子军。至于第三国际，我闻所未闻，我现在才开始研究第二国际哩！”

“我知道，”他咧嘴笑着说：“不过，还是去向吉文斯说明一下为好。你知道，这事已传开了。”

我那时年轻幼稚，自尊心又强，不把它当回事。不久之后，我给《现代历史》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章，就到那个爱尔兰警官那里去了解情况。吉文斯简略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作了简洁的回答。我的回答显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因为，这以后多年，我在一些遥远的地方还听说了那份档案的内容，里面还添枝加叶地捏造了许多新的情节。我们后来查明，情报来源是一个混迹于《密勒氏评论报》的白俄告密者。他每送一份材料就可以得到一笔酬金。他后来承认他编造了这一套故事，“跟帕特开玩笑”。于是鲍威尔就把他从报社踢了出去。

毫无疑问，对于上海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纷纷被捕，吉文斯要比任何其他官员负更多的责任。公共租界警方以共产党嫌疑犯罪逮捕了数千人，并把他们转送到龙华的中国警备司令部，在那里许多人惨遭杀害。后来吉文斯退休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给了他优厚的养老金，蒋介石还给他颁发了勋章及其他奖赏。

《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方针是坚决反共，同时坚决反帝。它支持中国国民党人提出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平归还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国租界，以及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鲍威尔是蒋介石的热心崇拜者，从一开始就支持蒋介石，把他看作反对旧北京政府的国民革命领袖。上海的社会名流把他的观点斥之

为“亲华派”，在英国人的上层社会人士的眼里，“亲华派”可是弥天大罪。没多久，我受株连被他们视为罪人了。

多数美国商人也认为鲍威尔“过于激进”。在国民革命之前，他曾是上海商会一位颇受欢迎的年轻秘书。《密勒氏评论报》对蒋介石表示了支持后，他就被解雇了。当时的美国公使约翰·范安特沃普·麦克默里和商界领袖们宁肯要腐败虚弱的北洋军阀。鲍威尔被看作是“本阶级和白人的叛徒”。《密勒氏评论报》轻而易举地成了一份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美国刊物，它报道消息和发表评论。但是，要不是中国人刊登广告和订阅，它就无法维持了。外国商人看不出蒋介石和共产党人有多少区别；许多人还真以为蒋介石就是一个共产党人。此时，他们还一无所知！直至日本侵华，他们中一些较精明的人才认为蒋介石可能“危害性较小”。

鲍威尔为人豁达大度，讲交情，对一个新手来说，这样的上司是难能可贵的。虽然后来我们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是，由于他为人正直，有十年令人叹服的丰富经验，另外，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密苏里州人，在初期，我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他热爱中国，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有一次，他和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姨妹露西·奥尔德里奇一起在山东乘坐“蓝色快车”时，曾遭土匪绑架。他在他的自传《在中国二十五年》中曾讲到此事。但是关于他曾婉拒中国政府为此要给他授勋和给他一笔丰厚慰藉金的事，他出于谦虚，没有在书中提及。事实上，他命中注定要为中国而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由于“亲华”而受到日本人的报复性残酷惩罚，结果，他在上海的监狱里染病死去。

鲍威尔自己也有一个保护人，是一个城府颇深的密苏里人，叫詹姆斯·弗·密勒，他后来也成了我的保护人。他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高级记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远东消息最灵通的新闻界人士。密勒碰巧和我同属一个学生联谊会。鲍威尔和密勒肯定在我身上发现了许多中西部人身上潜在的感情，其中含有显而易见的一种在与当时仍然强大的大英帝国的斗争中，处于劣势的情绪。当我认识到英国政治天才们在干了一些坏事的同时，在有步骤地促进世界团结方面也作出了贡献时，我修正了我对英国人的看法。当我与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一卡尔爵士交上朋友时，我在这方面开始受到了教育。但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年里，英国由于在亚洲一贯实行倒退的政策，它的优点黯然失色了，有远见卓识的英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小时候从爱尔兰亲戚那里听到了他们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指责。看来，他们的言谈一定对我产生了影响，使我相信，凡是英国人在那里当太上皇的地方，道义和上帝总是在叛逆者的一边。

《密勒氏评论报》同样反对当时对中国人的社会歧视，尤其反对在中国人自己的国土上歧视他们。它嘲笑了顽固保守分子的“优等民族”论。它为结束各家俱乐部、公园和外滩花园的排斥中国人的做法，尽了一定的力量。有的办公楼甚至要中国人从另外的门出入。《密勒氏评论报》所在的电报大楼就是如此。在我担任代理主编时，有一天，一位中国人来联系业务，人家不让他使用正门的电梯，因为那是专供白人使用的。我为此写了一篇讽刺性的社论。大楼的英国业主改变了电梯使用规定。可是，当《密勒氏评论报》租期届满时，鲍威尔想续租却遭到拒

绝，只得搬走。虽然他知道其中的原因，但从没对我说过一句责备的话。

对这种改革不合理现象的做法，我们的编辑拍手称快。他是个美国人，名叫乔治·密斯梅尔，有些怪癖，是个个人主义者。他自学了中文和其他五、六种语言。他走遍了全世界，出门总是要带上一堆旧报纸，不然就是旧印刷机。他说，不论到哪儿，他都可以把它们卖了，支付旅费。乔治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活百科全书，知识渊博。他要是从商准能发大财。但是他宁愿过这种吊儿郎当的生活，而不肯担任重要的工作。尽管我编辑《评论报》少不了他，他每天也只工作几个小时，排排版面或校对清样。完事以后，他就去找他的俄国情妇打情骂俏去了。

我很纳闷，那些连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的中国排字工人是怎样排字的，更不理解他们是如何辨认密斯梅尔字迹潦草的勘误的。只要有他在，排印就很少出错误。一旦出了大错，往往会引起轩然大波。达玲、埃丝特丝和沃尔夫三位太太在苏州开设了一家高级美国妓院。有一次，她们的妓院利用假日整修一新后，送来了一份措词谨慎的恢复营业的启事。不知怎地，中国排字工人拿到了这份启事后就把它排入社会新闻栏里。这对上海的道德风尚并没造成多大的损害，然而有几个传教士竟因此停止订阅我们的报纸了。

密斯梅尔对国民党完全持冷嘲热讽的态度，称他们为“一群换了新头衔的老恶棍”。他告诉我，控制鸦片生意的是上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青帮首领杜月笙，在拥戴蒋介石之前，曾在北洋军阀张宗昌手下干过事。

我还从我们的一位中国编辑那里得知，杜月笙从共产党手

里解救了上海。一九二七年三月，国共分裂之前，国民革命的左派人士举行武装起义，在革命军到达上海之前，就迫使北洋军阀从上海的中国人统治地区撤退了。工人们虽然只有三百支枪，但是几乎全体工人都已组织起来，准备迎接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却很快就在长江上游着手清洗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内战迫在眉睫。公共租界工部局雇用的市行政官、美国人费信悖，此时却在法租界的指挥部里同杜月笙进行密谋。他向杜月笙提供五千支枪和一些装甲车，并让这些武器安全运出公共租界，用此袭击并摧毁当时已占领了外围地区的“公社”。上海的中国银行界中支持蒋介石的人士为这一行动提供资金。这件事办得十分成功。在外国警察的护送下，杜月笙雇用的枪手们乘黑夜突然袭击，闯入工人的住宅和工厂，大约有五千到一万的青年人被杀，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国民党左派人士）在上海这场大屠杀中，周恩来虎口余生，纯属侥幸。他过了二十多年以后，才回到上海清算这笔旧帐。那时候，杜月笙已在香港，蒋介石也已去了台湾，都平安无事。

中国人不乏讽刺的才能。林语堂向我谈起的第一件可笑的事情是，杜月笙实际上垄断着长江下游地区的鸦片生意，蒋介石却封他为“禁烟局长”，并授予他大宋玉勋章。

杜月笙和他手下的那帮流氓牢牢地控制着上海的中国人统辖区及租界内的下层社会，不给青帮送礼，妓院别想拉客，鸦片烟鬼别想睡安稳的觉，店主别想赚钱。在三十年代中期，绑架、暗杀和收买都有一定的价钱。这帮流氓的头目们混迹各种董事会中，而且都有乐善好施的美名。杜月笙先生居然还是一个爱国者哩。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之后，他到了内地，他

留下一名副手给日本人做事；这样一来，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走私贩都得向他进贡。

在三十年代，我们这些外国人和体面的中国人都感到杜先生和蒋先生从“暴民”手里拯救了中国。在跟商人和鲍威尔谈起这件事时，我曾认为牺牲是必要的，《密勒氏评论报》的方针是正确的。鲍威尔相信，这一迅雷不及掩耳之举“把中国从共产党手里拯救了出来”。我们所说的中国，当然是上海喽。

可是，天哪，没想到拯救出来的时间竟是那样短，而且是替日本人干的。我当时相信，就象杜勒斯先生三十年后相信的那样，道义是在蒋介石一边。我后来才认识到，在政治上，如同在医学上一样，必须先诊断，然后才能开处方，而这个病人就是中国，而不是局外人；一个民族的政治行动不是取决于局外人道义上的判断，而是取决于民族内部深处的实际要求，它是民族内部的动力。

在密苏里的岁月

我童年时代在堪萨斯城时，只认识一个中国人。他在当地的一家杂货铺附近开了一片小洗衣店。我们这些孩子总爱跑到他那儿，高声念黑人洗衣妇玛丽教给我们的顺口溜：

中国佬，中国佬
爱吃死老鼠！
老鼠当薑饼，
嚼碎吞下肚！

玛丽是因为讨厌那个斜眼的同行冤家而编出这个顺口溜的。

如果我们能够激怒那个可怜的家伙，看着他后脑勺甩着长辫子满肚子火地冲出来，对我们破口大骂，我们就会感到很大的满足。

后来他学乖了，不理我们，我们对这种恶作剧也就渐渐失掉了兴趣。多年以后，我到中国的乡间时，路上常常有一些小孩儿跟在我身后喊：“洋鬼子！洋鬼子！大、大、大鼻子！”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联想起那个中国人来。孩子们用中国话喊的这个顺口溜是押韵的。这些勇敢的小家伙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向可怕的异族挑战的。

那个中国洗衣工与我后来决定去中国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但是我十四岁时那年经历的两件事却对促成我的中国之行产生了影响。其一是，那年夏天，我离家去加利福尼亚州；其二是同年我读了《悲惨世界》。

我父亲让我和哥哥在星期六和假日里干活，为的是要使我们“认识金钱是劳动的体现”。我九岁时，就开始帮忙从斯诺印刷公司往《堪萨斯城明星报》送包裹。《堪萨斯城明星报》报社是一幢迷人的建筑，它的中心是生气勃勃的记者间。在那儿我见到了好几位从远方来的编辑。我崇拜乔治·B·朗根、亨利·黑斯克尔、厄尔·麦克伦姆和罗伊·罗伯茨。麦克伦姆说我：“干活儿不错，比大多数新闻记者强。”当沃斯门药房出每小时十二个半美分的工钱叫我干活时，我就不再给我父亲干了。第二年夏天，我成了“卡蒂”铁路的一个练习生。我可以周末免费去

欧扎克旅行，并因此对“旅行”发生了兴趣。

我十四岁那年夏天，在堪萨斯帮人捆麦束，堆麦垛，干了好几个星期。我用赚来的钱去加利福尼亚玩。很凑巧，我的同学罗伯特·朗和查利·怀特正要乘鲍勃新买的T型旅行车去加州。我于是设法瞒过父母，一直到离家很远时才把这次出远门的事告诉他们。我记得，路上走了两个星期。我们大部分时间走的是当时未经铺砌的圣菲路，这条路常常有一大段消失在泥沙和砾石之中。罗伯特到了圣莫尼卡后就回家和父母团聚了。我和查利的钱都花光了。我们回家时只好过着流浪的生活。要不是那年夏天看到过太平洋，我决不会立下有朝一日一定要飘洋过海的雄心壮志。我要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沿岸坐货车流浪，穿越费瑟河峡和科罗拉多的罗伊尔峡，我就不会那么早早地就尝到飘泊冒险的滋味，不会了解大自然和人类的千差万别，也不可能体会素不相识的人对青少年的关心。我当时刚刚意识到，如果说我还没有足够的智力在世上立足的话，我已有力气干活谋生了。

此外，我还明白了：在人类生存的奥秘中，机遇以及身心的协调十分重要。我们中间有些人真是命大。有一回，我又腿站在两节货车车厢之间的挂钩上，双手紧紧抓住两段铁扶梯，火车在疾驶，但我居然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躺在车轮底下，我准是在停车时掉下去的。一天黑夜里，一列特快火车进站时，我被人赶着从车厢的百页窗里跳了出来。火车重新启动时，我又追了上去。车开得很快，我只来得及跳上末节车厢的升降踏板。不多一会，火车开上了一架高耸的栈桥。低头看到脚下的深渊，我吓坏了，稍有差池，我就可能掉下去

粉身碎骨。火车开到堪萨斯后，我躺在一节平板车的废铁堆上睡着了。不知什么东西把我戳醒了。睁眼一看，原来两个专在收获季节抢劫的强盗各拿一枝枪对着我，他们从我身上只抢走了五十美分（我的鞋子里可藏着五美元哩！）但是，他们把车上一百多名季节工整个夏季的劳动所得全抢光了。在我眼里，他们抢劫穷人是最卑鄙的强盗。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会开枪打死他一个。

杰克·伦敦曾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那年秋天，我回到中学上学，我读了《悲惨世界》，在这本书里我发现了一些“外国的”人物，使我想起我在夏天的冒险期间遇到的一些工人和失业者。对社会名流来说，他们只是些叫化子，可是我喜欢他们。雨果为我展现了一个充满各种观念以及重大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的陌生的新世界，使我关注起遥远的动荡年代的历史。在这之前，象《鲁滨逊飘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以及《金银岛》等一类的小说可能使我产生了想看看异国风情的欲望。只是到了此时，我才借阅读作想象中的旅行，阅读成了我仅次于实际出门旅行的最好享受。我早年的“遨游”及其结果对我以后生活的影响可能比我受过的全部正规教育还要大。

游 历 记 者

在鲍威尔访问满洲和俄国期间，由我代行他的《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的职务。尽管那时我太年轻，难以胜任工作，但由于汤姆·密勒不断指点，加之隔壁的美联社分社社长莫里斯·哈里斯和路透社的弗兰克·奥立弗经常帮助我，情况还不算太

糟。对我这样一个新手的热情帮助是远东新闻界的传统。

我除了给《芝加哥论坛报》提供最新消息外，还写通讯，但很少被采用。这家报纸对有助于充实简单电讯的背景材料不感兴趣。我为这家报纸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学到的主要一点是：一家决不刊登本国最坏消息的报纸，记者只要专门为它撰写报道别国最坏情况的消息，他就可以有饭吃了。

我还在为《芝加哥论坛报》写消息时，就已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周刊上发表内容翔实的报道。这家周刊登载态度严肃、篇幅较长的介绍外国情况的文章。我给周刊写稿多年。当时，《先驱论坛报》日报对亚洲表现出极广泛的兴趣。在我们当时的驻华大使认为北洋军阀已没有恢复权力的希望之前很久，这家报纸就主张承认国民党政权。自日俄战争爆发后，汤姆·密勒就是该报驻亚洲的首席记者，他对这份报纸的编辑方针具有重要影响。

密勒创办了《密勒氏评论报》和《中国新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后者是亚洲的最好的美国日报。他还成了远东密苏里新闻学院出身的那一大群美国人和中国人的良师益友。他们人数众多，因此他们的对手时常抱怨“密苏里人垄断新闻”。多少年来，从东京到曼谷，主要通讯社和许多家美国报纸的代表人物以及主要英语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们都是密苏里人。他们大多数人都和密勒一样持激烈的观点：反殖反帝，支持独立，支持民族平等，支持共和政体，支持实行自决，同时也支持美国。因此，他和我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决非偶然。

一天晚上，当我就要写完《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社论时，密勒走了进来。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说道，“请停笔听一会

儿。”他高声念了书中的一段话。然后，他笑着说，“我写那段话时，年纪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那样写了；但是，当时这样写是对的。永远正确的事是没有的。但是，曾经是正确的事里包含着种子，可以萌发出另一个真理。”

我点了点头，记住了他的话，继续打字。

“你还想去马德拉斯或别的什么地方吗？”

“想去马达加斯加。在这之前，我想先到中亚、印度和波斯去看看情况。”

“你不能留在这里当驻外记者吗？”

“你是说给《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吗？鲍威尔下月就要从俄国回来了。”

“我说的是纽约《论坛报》——《先驱论坛报》。”

我停止了打字，心想：汤姆想让我帮他采访吗？那很好。

“这是上司给我来的电报，”他接着说：“他授权由我自己选择继任人。鲍威尔一回来，你就可以接我的手了。”他笑着折起了电报，似乎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继任人？什么意思？难道你要辞职了？”

这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密勒。他穿着考究，满头银丝，机敏而练达。我也第一次发觉，他已垂垂老矣。我蓦地意识到，他想必已近古稀之年了。我一直以为他比这年轻得多，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现代式”的人。要我接替他的职务？那怎么行呢？

“我老了。我也见过很多同行们尽管跑不动了，还硬挺着，”他说。“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在考虑退休；我想要到欧洲去旅行一段时间。王正廷帮我拿定了主意。他建议我去外交部给他当

顾问，我接受了。我一直在留心观察你的工作。你可以学着干嘛。这位置就是你的了。只有一个条件：你得同意至少在这里干三年。”

三年！这几乎象一辈子那么长。我要求让我考虑两天。我有两个夜晚没有合眼。我考虑的是，除了资历不够之外，我还要有到处走动的自由，去见见世面，写我感兴趣的事。我在上海两年，大部分时间在《密勒氏评论报》报社伏案工作，我感到我得出去多旅行，多学习，多感受，要设法更深入地了解情况。一旦在上海扎了根，我就无法做到这一切了。接受这一位置，在当时就意味着必须留在上海，因为电讯是从这里发出的。“我认为你的想法不对，”汤姆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话之后说。“今后二十年里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将会是举世轰动的大消息。不过，要是你还是丢不下你的旅行癖，那就去旅行吧，祝你幸运，你还会回来的。”

我后来是回来了，而且到头来还是去了《先驱论坛报》。但是，此刻，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没有时间为我的决定感到后悔；几个星期后，有人意外地提出让我担任另一项职务，这一职务很称我的心。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德鲁·皮尔逊和戴维·劳伦斯给鲍威尔打了个电报，请他为新成立的国外新闻社——报联社，物色一名远东代表。报联社为十二家大城市的报纸供稿。它的赞助者是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他们要一个可以无牵无挂地到亚洲各地走动的单身汉。他不必拘泥于日常的新闻报道，只需要在游历中把当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写成报道发回去就行了。换句话说，他们要一名游历记者。我判断，他们是看

中了我。与《先驱论坛报》比较起来，这个职位的报酬较少，但是它提供了学习的时间和旅行的自由。此外，我不必每天花数小时去看那些官方的新闻通报、宣传品及通讯社的材料了。我打电报给鲍威尔（他当时仍在莫斯科），请他推荐我。我得到了“任命”。与此同时，我的朋友爱德华·亨特也成了报联社驻北京的代表，开始了他那阅历丰富的记者生涯。

我的新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鲍威尔回来以后，我在华中各地转了几个月，报道了几场小冲突。接着，我雄心勃勃地想去俄国土尔克斯坦走一趟。报联社国内办事处批准了我的计划，只缺苏联的入境签证了。由于当时南京和莫斯科仍然断绝外交关系，我只得去东京。苏联大使热情地欢迎我，就中国的情况问了我两个小时，收了我二十元美金作为往莫斯科发电报的费用，并答应尽快给我答复。他履行了诺言。不到一星期就有了结果，这是我从苏联大使馆得到的最迅速的一次答复。我的申请没有获准，主要是因为同《密勒氏评论报》的关系。鲍威尔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我们发表了一篇强烈反苏的报道。

既然斯大林先生不许我去苏联，我只得转而计划南行，去台湾、中国沿海地区、印度支那和云南走一趟。我希望从中国步行去缅甸，旅行路线是：渡过湄公河和萨尔温江，看看西藏的世界屋脊，再顺伊洛瓦底江而下，进入缅甸。然后就去印度等地。《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又批准了我的这个计划。这两家报纸出版专登长篇特辑《今日世界》，通过报联社向其他报纸广泛供稿。我的“远征”可以为这个特辑提供好几个月的稿子。

当我就要离开上海时，有一天，我和一位在上海出生的美

国姑娘正站在静安寺路等出租汽车。一条弄堂里传来一阵喧嚷，我们赶紧跑过去看。从一幢楼里，许多中国人蜂拥而出，他们背后烟雾弥漫。突然间，一个浑身着了火的男人，象只火轮似的滚了出来，倒在我的脚旁。不知是由于恐惧还是因为好奇，围观的人们呆若木鸡，谁也不动。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脱下我的新驼绒外套赶快把他裹了起来。说真的我有点舍不得那件衣服，但是没有别的选择呵。火很快熄灭了，但是那人身上的火星子还直冒烟。我用中国话大喊，“水！水！”。一个苦力终于提来了一桶水。我把水泼到那人身上。人们围拢来，起劲地议论着。救火车吼着开了过来。一辆救护车终于把那个还没有断气的人带走了。

我的双手只起了点小水泡，可是那件外套只剩下烧糊了的一团破布。一个人力车夫问我要，我把它扔给了他。过后，拿水来的那个苦力拉着我的衣袖说，“你得付我水钱，付我水钱！”我感到厌恶，挣脱了。灭火救人的水还要付钱！还有五、六个人跟在我后面，大声向我乞讨，向我讨那件烧糊了的驼绒外套的人也夹杂其中。他实在叫我讨厌极了，我把那破衣服夺了回来，骂了他一顿，也骂了这一伙人。他们笑了起来，转身离开了，我也就继续走路，但是心里很不平静。我想，他们丢了脸，但是人类也丢了脸，我也是人类的一部分。当时，我真的憎恨所有的人。

我回到躲在角落里的美国姑娘那儿，她正等着我，漂亮的脸上微微露出恼怒的神色。“中国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国家啊！”我大声说道，蓦地里想起华盛顿·吴就曾说过同样的话。

“我要是早点告诉你就好了，省得惹来这些烦恼，”姑娘说

道。她自幼生长在上海，这类事情司空见惯，早就麻木不仁了。“局外人介入中国的事情，往往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她笑着说。“你为他们烫了手指，他们拿走了你的衣服，还想叫你为此付钱。”

“你真够聪明的，”我生气地说。“不过，我决不会象你这样玩世不恭。”打那天晚上起，我再也没去见她。

当然，我生气的只是她使我感到自己象个多愁善感的傻瓜，而我本希望自己是英雄。当时我在东方呆的时间还太短，还体会不到：一个人对他人的痛苦看多了就习以为常，什么都不在乎了。在上海的白人有一种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他们认为白种人和黄种人本来就不一样。

后来，我又想起了这种毫不隐讳的答案。别人怎么想我管不着。关键在于，如果我听任那人被火烧，我会作何感想。我后来发现，这种恻隐之心并不只是白人基督教徒才有。

华 南

我很少见到过比台湾中部种甘蔗的丘陵地带更为宁静，更富有田园风味的地方。我乘坐的火车经过那里，到了日月潭。湖泊的四周群峰环绕，彩虹辉映其间，很象是吕宋岛北部的伊哥洛山。事实上，附近的土著和伊哥洛人的血缘很近，只是更加原始而已。他们为我举行了一场古怪的音乐会，使用的乐器全是些重量不同、长短不一的棍棒。地上挖了一个个坑，上面覆盖着大小不一的石板。演奏者就交替着把棍子投到石板上面。这想必是人类最早的乐器演奏会的一种形式。

日本人把那些山里人拘禁在一块居留地内。然而，在我到达一周之内，居留地边缘上一个十分幽静的小镇，却成了十年来土著起义杀人最多的场所。在日月潭的日本人几乎所有都是在睡梦中被杀死的。对一个地方的情况不甚了了，光看表面现象容易产生错觉。

我离开台湾，沿中国南海岸悠悠闲闲地向广州进发。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已经三年，但是国民党统治广州和广东省的时间更久。孙科对我说过：“到了广州以后，你会看到我们国民党是如何管理好一个进步和现代化的城市的。”孙科的父亲，孙逸仙，一九二〇年在广州取得了政权。蒋介石和当地共产党人联合，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从广州发起北伐。但是，此刻共产党人早已被赶上山了，而国民党的旗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飘扬。我知道，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名无实的。但是，我还不了解，“革命”到底与新老军阀和匪徒作了多大程度的妥协，才换得了他们承认蒋委员长为国家元首的。

我在福州、厦门和汕头作了短暂的逗留，听到美国领事和其它外国人谈起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劣迹，他们非法没收他人财产，不经审讯就把人投入监狱和施行处决、对工会实行镇压以及煽起排外情绪。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但是，我心想，也许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些对决心要取消他们的特权的政府怀有偏见的人。我想，到了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广州，我要多住些时日，我在那里的见闻谅必会有所不同吧。

在位于珠江口的这个喧闹的港口大城市，我受到了康德元（音）的迎接。他是在檀香山出生的中国人，并在那里结识了孙逸仙和孙科。这时，他正在办一份叫《中国真理》的报纸。国民

党通过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给他津贴。

在一次宴会上，康德元几杯酒下肚后对我说：“王博士叫我写文章，反对外国侵略和帝国主义，但不要涉及我们自己的政府。我的记者本能有时不听使唤，于是我就倒霉了。他们曾经四次发出拘票要抓我。

幸亏有三种“护身符”，康才免遭逮捕。第一，他可以请求王博士进行干预；第二，他可以到沙面小岛上寻求庇护，沙面当时是外国租界，沙面和广州之间由一架桥连接；第三，情况严重时，他可以坐轮船，一夜之间就可以到英帝国主义者治下的香港住一段时间。此刻沉寂无事，但康德元内心对广州的腐败政治感到愤懑，坚持要向我提供事实，通过我去揭露。

“这里每一个官员都借税收敲榨勒索，”他忿忿不平地说。“自从孙科当市长以来，情况丝毫没有好转。”

“是孙科吗？我还以为他主持的是一个‘模范政府’哩！”

“暴发户的模范是真！他丢尽了在檀香山出生的中国人的脸，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他父亲撤了他的职，因为他受贿和挪用公款。他甚至还通过反迷信运动来捞钱！他派人没收并拆掉庙宇，然后出卖地皮捞钱！他来时不名分文，走时就成了百万富翁了。”

我听了感到沮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孙科毕竟是我的旅行的赞助人。但是，我从我们的领事约瑟夫·巴伦丁那里了解到，康德元列举的事实都是十分真实的。

康德元向我揭露了广州的不正常的税收制度。这里的收税员的职务都被私人集团接过去了。这些集团的成员包括官员、商人、银行家和歹徒。地皮税、交通税、盐税、烟草税、酒税、

娼税和其他娱乐税的征收特许权，全被他们包揽了去。餐馆税是油水较多的税收之一。他让我看了已公布的报告，上面记载，餐馆税的征收特许权是以每年六十万美元包出去的，但是餐馆的老板们抗议说，私人集团获取的利润是这个数字的百分之二百。此外，还有一种新奇的专利，这就是粪便，英国人委婉地称之为“夜间排泄物，”好象人的肠子只是到了夜里才蠕动似的。政府把收集粪便的特许权卖给一些“粪行”，由“粪行”把粪便转手卖给郊外的菜园作肥料，从中赚大钱。

正如康德元说的那样，“人们在这里‘大便’也不得安宁，总会有官员借此搜括不义之财。”

这一情况，我从一位名叫 G·爱德华·莱昂的年轻美国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是广州律师协会认可的唯一外籍律师。他的广州话说得十分流利，对广州的情况了如指掌。据莱昂说，私人集团要取得某项征税特许权就要参加投标，但是，甚至光靠竞争还不行。他们得先向官员和军人行贿，才能有得标的把握。

“自然，取得征税垄断权的人会千方百计把行贿的费用从纳税人身上榨取回来。”

“难道人们不可以上法院去要求重新估定税额吗？”

“要是征税人过于贪婪，或者是你有势力，是可以那样做的。否则，到头来损失更大。多数纠纷只由警察局排解，而警察局接受征税人的贿赂。”

当时，我还以为这种收税方式是广州特有的，但，在后来的旅行过程中，我发现，全中国征税的方式大同小异。在多数县份里，地税和其他税的缴纳，传统上是农民与收税人之间的

交易，国民党统治未能改变这一情况。收税人把税收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留归自己，再与县长和其他官员平分一份，余额才被列为正式税收。

拖欠税款者，甚至在清偿债务后，还往往被重新逮捕入狱；而且，我发现，有更多的人不经正式起诉就被拘禁。由于莱昂和广州市的高级官员有交情，我们获准参观了一处“看守所”，这是一座拘禁妇女的“模范监狱”。我们在那里同一部分被拘禁的人谈话后了解到：其中有三名被指控为私娼，另有几人被指控有“不贞”行为，有一人是姨太太，罪名是她离开了比她大二十岁的男人，有三人是“共党分子”，其余的是拖欠税款者。那三名“共党分子”入狱已有三年，可是还未提交法庭审讯。在我们询问过的几十名妇女中，只有两人上过法庭。余者均是未经审讯就被监禁的。

尽管如此，广州仍不失为一座非常有趣的、充满活力的热闹的都市。商店里摆满了色彩鲜艳的绫罗绸缎；小巷里手艺人制作饰有玉石、象牙和次等宝石的精致工艺品以及黑檀木家具；白天，滨水区人力车、电车、冒烟的公共汽车和手推车来来往往，非常热闹。此外，还有象牲畜一样的脚伕，他们汗涔涔的褐色背上驮着沉重的负担。到了夜晚，这里就变成了一部旧中国电影上的一幕：无数舢板上千盏万盏的灯火点缀着暗淡的珠江；码头一带，游艇上的五彩灯笼一个接一个，宛如一条项链；歌女们的尖嗓子和欢声笑语令人兴奋；鸦片烟味和花船上的茶花芳香混成一片；暖和、丰饶和迷人的南国夜色中，弥漫着从成千上万的炭火炉上飘来的大蒜、酱油和饭菜的气味。

看了广州之后，我就没有什么理由再对葡萄牙的小小殖民

地澳门的情况感到气忿了。当我见到澳门总督的秘书时，他坦率地承认，这块殖民地的收入大部分来自赌博、鸦片和卖淫。

“不过，先生，”他一本正经地强调说，“你知道，我们允许这种营生，是因为这里的居民需要它们。我们不能拂逆民意，否则我们就成了帝国主义了，是不是呀！不过，我们禁止我们葡萄牙人赌博、抽鸦片或者嫖妓女，违者将立即被遣送回国。”

在这个穷人的蒙特卡洛^①城里，最有权势的是个姓罗的人家。这家人垄断鸦片和赌博特许权已有三代。罗家付给葡萄牙高级官员相当可观的酬金。这些官员中饱私囊后，将余额作为贡金汇回里斯本。罗家的家长罗竹心(音)，是一位和蔼的绅士，酷爱花卉。有一天，他请我饮茶。我们在华南最漂亮的一座公园里散步时，他对我谈起他对慈善事业的广泛兴趣和他的善行，其中包括他修建的一座帮助瘾君子戒烟的疗养院。

罗的父亲有妻妾六人，生了二十八个儿子。他临死前，入了天主教，他的儿子也全部受了洗礼。但是，这家人改奉新的宗教后，他们的生意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妨碍。光鸦片和赌博两项每年的收入就达一百万美元。不过，罗抱怨说，要从中拿出很大一部分给政府官员送礼。他说，他得到的大约是三分之一多一点，……

中国的第三大都市广州的政府就是靠这种奇特的财政来源支撑的。此后，我曾数次重访广州，始终未见到那里的情况有什么显著改进。我相信，广州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一段很短的时间，鸦片的确被查禁得差不多了。但是，后来日本人来了，

① 蒙特卡洛是西方世界著名的大赌场——译注

鸦片又在中国泛滥起来。广州决不是国民党民主的橱窗，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没有一个官员是经选举任职的。尽管如此，钱赚到手了，人们生了下来，他们受苦，他们生活，他们相爱。广州就是在腐败之中繁荣起来的。有人说：“中国人，除非被绞死，他们几乎在任何条件下都能生活下去。”我在这里的耳闻目睹，深信此言不谬。对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生活相对来说是好的。糟糕的事还在后头。

至少，广东还是由广东人治理着。我到印度支那后，就发现，这一点是颇重要的。

文化 传 播 者

我搭乘一艘一千吨的法国轮船，从香港到海防，航程四百五十海里，一路上风大浪急，小轮船颠簸不已。这艘船上装的主要是绵羊，大米和搭统舱的中国人。我要在海防改乘火车经由印度支那北部东京湾地区^①，到云南府去。房舱旅客除我之外，还有一位经营香水兼做飞机生意的法国商人，一位带着漂亮的红头发小孩的英国妇人。一连三天，我们都在小交谊室里围着一张圆桌吃饭。最健谈的是那位法国人柯德瑞。他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

“你们到了东京湾，就会明白为什么法国是个成功的殖民者。我们尊重原住民，把他们当人看待，不干涉他们的文化，对他们不抱偏见。传播文化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教化他们，然

^① 即北部湾。——译注

后跟他们通婚，因此土著居民感到心满意足。”

柯德瑞是第一次去印度支那，不过他从书刊上了解到法国人实行仁慈的殖民政策，殖民地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而我呢，则持看看再说的态度。

船一开到海防，一群本地人蜂拥而上。他们抢着要帮我们提行李上岸，好赚几个铜板。天气炎热，法国海关警察凶神恶煞地一边挥动长鞭子威胁苦力们，不许他们接近，一边大声呵斥：“混蛋！猪咧！”尽管警察很少真的打人，但是我仍然认为，这种传播文化的方式是有失体面的。

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在停靠法国邮轮的码头上发生了骚动。一些重要的官员和头戴结婚蛋糕式帽子的军官，从舷梯上下来，走进一小群欧洲人的圈子里。这些欧洲人戴着白色遮阳帽，比手划脚地议论着什么。稍远处，士兵和警察正在用鞭子驱散一大群棕色皮肤的当地人。人群很快就散开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笑，笑得令人莫名其妙。要知道，在那年月，东京湾人甚至连面带笑容也是很罕见的哩。

原来，轮船即将启航，而船上的一位高贵的乘客不是别人，恰恰是印度支那总督巴斯吉尔。鼓乐齐鸣，送行的人们挥动着礼帽和手帕，朋友们高声道别，祝福远行人“一路平安”。接着，船长下了启碇的命令，可是不见动静。船上的技师们吓了一跳，他们跑上来报告主机被人破坏了。

“有人破坏！”法国人交头接耳议论开来。“准是些暴徒捣的鬼！有人叛乱！”

“这么说，有人搞革命啰？”我问。

“不可能！”柯德瑞大声说。“这里没有什么动乱，要有的话

我还会没有听说吗！”

但是，明摆着发生了动乱。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我在海防和河内逗留了两个星期。等我回到群山起伏的中国南部边境地区云南时，我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

从表面看来，在东亚要数河内最象一座欧洲城市，只有少数遗迹会使人想起，在一八八五年战争前的许多个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的藩属。市内宽阔的林荫大道，现代化的商店，时髦女装商店，剧院，公共建筑，幽雅的花园住宅以及花香扑鼻的公园，都很象是法国巴黎的讷伊。

海防和河内都给人一个印象：这里的政权稳固，统治者很有信心。当地人逆来顺受，没有什么斗志，他们似乎“不可能”会有革命的念头。这里有三、四个大城市是欧洲人治理这个国家的展览橱窗，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浅薄。这个国家的面积比法国大，它的资源和法国一样丰富，但是却比中国还落后，比起日本来是很不发达的，尤有甚者，全国竟没有一条横贯全境的铁路。在数以千计的肮脏、拥挤、泥泞的村庄里，两千万人民挣扎在贫穷、疾病和愚昧的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法国人半个世纪的统治之后，他们期待着接受文化的传播。

当然，法国人已着手给安南人实施教育，并且选送少数人去法国深造。对这些人，法国人确实给了他们平等的社会待遇。然而这只是装装门面而已，是用来培植傀儡王族成员的忠心的，平民百姓与此是无缘的。法国人繁衍欧亚混血儿的速度也根本无法和当地人的生育能力竞争。荷兰人曾在爪哇有计划有步骤地作过这方面的努力，但失败了。有些法国人是真心愿意和安南人结婚的。但是，大多数法国人和越南人只愿做露水夫妻，

在法国太太开的馆子之类的地方野合。我在一家酒吧间里偶然结识的一位朋友，带我到河内法国太太开的馆子里去开眼界。那里，欧亚混血的姑娘们，只穿条当地产的丝裤在伺候客人吸鸦片或乙醚。新闻记者的职责和特权就是要尽量了解一切(报道其中的十分之一)，但是，那天晚上，我失职了。我试着抽了一会上海运来的鸦片，由于抽过量了，我感到难受极了，乙醚的气味又使我回想起儿时做切除扁桃体手术的痛苦。于是我只得离开这个地方，来不及听馆主法国太太给我介绍法国人和安南人“配种”的情况。据我的熟人告诉我，她在这方面是个权威。

正如河内被称为印度支那的“小首都”一样，“大都会”旅社称为河内的“小首都”，大首都是西贡。殖民军官、官员和商人带着他们的法国夫人或者欧亚混血的姘妇进进出出这家旅社。入夜，这里灯红酒绿，笑语欢声，乐队在一边奏着令人想念巴黎的曲子。我和柯德瑞走进旅社的第一天晚上，看到这里的情况跟我们刚刚驱车从沿海平原来时沿途所见的那些潮湿肮脏的村庄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豪华的场面不免使人感到十分古怪和虚妄！一个马赛人职员给我们登记之后，大声地吩咐两个头发灰白的安南“仆欧”干活。这两人身上穿着镶金边的制服，但是光着脚板。他们没有立即行动。也许是因为那人的法语讲得太快，他们没有听懂。

“快点！笨蛋！”这位职员厉声喊道。他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一把抓住这两个小个儿的衣领使劲晃，扯他们的头发，最后抓着他们的头相撞。他接着打发他们弯着身子过来给我们提行李。

柯德瑞尴尬地看了看我，然后问那职员这样做是否必要。那人听了感到惊奇，抬起双手，耸耸肩膀。“两位先生，你们不了解这些土人，”他说。“对他们没有办法讲道理。他们是‘孩子’！简直就是孩子，笨孩子！”

后来，我得出结论，正是由于这种侮辱人格的方法和制度盛行，从而使殖民主义不断衰落；这是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抗拒的。在东京湾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火车上，一个个子不高的法国列车员，怒气冲冲地在车厢里查票。当地乘客只要出示车票的动作稍稍迟缓，他马上就给人家一记耳光。挨打的有男人，偶或也有几个妇女。他们挨了打脸上没有表情。但是，这些“孩子”对此事是不会忘记的，他们的子子孙孙也是不会忘记的。

也许，还有比这更为卑劣的行为，原因是当时发生了叛乱。当地人叛乱使法国人既吃惊又怒不可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一种不必要的、鲁莽的、不服从的行为。

在法国总督等船回国期间，我访问了他。他对我说：“先生，有必要教训他们一下。的确是件遗憾的事。不过，他们还是些孩子。”他说，叛乱是在接近中国边界的安沛开始的。那里发生了兵变，安南军队缴了他们法国军官的械，接管了驻地。当外国军团来增援时，安南军胆怯了，没放一枪就投降了。巴斯吉尔先生承认，他们的报复手段“太严厉了一点”，就地处决了近六十名安南人。尔后，接连发生了一系列起义和暴动，规模都不大，“但是，搅在一起总是件麻烦事。”现在，经过逮捕和审讯，查清了一起范围甚广但尚不成熟的阴谋。阴谋的目的是发动‘革命’来取得独立”。可笑吗？当然可笑！不过，不能过多责备

人民。他们受了少数狡猾的共产党人的利用，也许甚至是受了一些当地的法国人的叛徒的利用。

我不明白，难道一个人要爱祖国、爱自由，不愿受外国人摆布，就非得是个共产党人不可吗？

这场叛乱的中心在安南(越南)盛产大米的地区，革命者在那里占领了好几个地区，并且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共和国”。在大叻的一次学生示威中，法国人开枪打死了好些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夸大的情况传到了几个村子里，学生们举行了没有武装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到了大叻，向傀儡儿皇帝保大递交了要为死难者举行哀悼的请愿书。法国人头脑又一次发昏，出动飞机进行轰炸，用机枪扫射游行队伍，打死了更多的安南人。现在，他们不得不往越南增调军队。

我通过一个中国商人，见到了一些受过法国教育的安南人。他们帮我搞到了几份叛乱分子向河内提出的实现和解的“条件”。他们的“最高要求”是建立一个立宪政府，一个由民众选举的有立法权的议会，但法国总督对立法拥有否决权。其他“要求”包括废止农奴制(迄今仍是合法的制度)，废止一夫多妻制，减少地租，废除傀儡君主制，建立共和政府。

作为回答，法国人中止了仅存的一点公民权，宣布禁止任何形式的政治演讲和集会。动辄使用断头台。叛乱分子或被控为叛乱分子的首级在大叻、顺化、土伦^①及其他对政府不满的地区示众。七百多人被斩首。法国人认为他们采取这一严厉措施是有道理的，它可以在迷信的越南人中间引起恐怖；他们对

^① 今岷港。——译注

今生这条小命也许可以不在乎，但是想到来世要当无头鬼就很难心安理得了。

第一次大起义，由于时机不成熟，起义大军有许多不合实际的想法，加上武器不精良，组织工作很不完善，不可避免地被强大的法国军队镇压下去了。有关起义的消息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我写的几篇内容比较单薄的报道也只能通过香港偷送出去，而且我相信，有关那里起义的消息，在美国所能看到的恐怕也只有我发的那几篇了。我本人目睹的情况并不多，但已足以使我相信，法国人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履行传播文化的使命了。

领头人物的首级被割下了，但是他们的躯干还会长出新的脑袋来。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们将永远等着，“等待着法国人放松警惕，等待法国卷进别的地方发生的大动乱中去，等待着武器，等待着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永不疲倦地等待着……”

石头收藏家

我料想，我那些披露印度支那情况的报道一旦被美国报纸采用，准会对我国的政策产生影响，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兴奋。直到要离开河内去云南时，遇上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我的心境才又平静了下来。在“大都会”旅社的门厅里，我遇见了一位从得克萨斯来的石油商人，他正在世界各地漫游。他随处拜访他的石油公司的代理商。但是，他真正的兴趣是收集石头。他不收藏宝石，而专门收集大块的岩石，奇特的石块。早先，

他在旅行中收集了埃及狮身人面像、金字塔、雅典巴台农神庙、直布罗陀海峡、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史前大石柱及古罗马竞技场的石块。最近，他的宝库里又添上了富士山和长城的石板。他此刻正要去柬埔寨，想贿赂导游给他弄一块吴哥窟里的石头。

“你拿了吴哥窟的石头又有什么用呢？”我问。

“我要用它做张凳子，可以做一张很好的凳子。”

“我还不明白。”

“在得克萨斯，我们有个很大的平台，一具烤肉架，”他解释说。“当我请小伙子们吃得克萨斯烤牛肉时，我让他们坐下，我会对他们说，‘比尔，你知道你坐的那个大家伙是什么吗？那是世界上第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然后，我对另一个小伙子说，‘吉姆，你是坐在庞贝城上边呢！’”

我依然不懂他的意思。

“真是的，我的老弟呀！你真该看看，当他们知道他们是坐在历史之上时，脸上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在那些梦幻般的年代里，孤立主义依然残留着，我们美国人把亚洲和欧洲都视为没有生命的历史陈迹博物馆。我当时目睹的历史是不能带回美国，去让人们“坐”的。旧世界的活人们远比它的古迹重要，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们的问题将影响我们子孙的生活和命运。

食生肉的国家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段具有挑战意味的旅程。在我初次访问

云南期间，想从中国其他地区去云南，还只能靠步行或者骑马，而十年之后，云南却成了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空军基地。云南这个边远高原地区，其面积相当于德国和波兰面积的总和，而它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现代化设施，只是法国人修建的从河内至云南府的一条铁路。即使使用这条铁路，走迂回的路线，从香港到云南府也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旅行者们极少有走到铁路终点站的，因为火车常常遭到土匪的袭击。

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要“历险”，何况“云南”即“云之南”。这个名字本身颇具魅力。

我喜欢地图上云南的形状，它象个楔子，夹在西藏与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当中。当年忽必烈的蒙古骑兵队扛着牦牛尾旗子，就是从这里浩浩荡荡出境，所向披靡，直捣孟加拉湾的。这些情节我是从马可·波罗游记里读到的。我就是因为读了数百年前马可·波罗关于他越过西藏高原的记述，才树立起雄心，要追随他的足迹，沿这条路线进入缅甸。

“你们听我说，云南人是吃生肉的，”马可·波罗在书中写道，“就象我们吃经过烹调的肉一样。”

马可·波罗可能说的是云南部落众多土著。多少世纪以来，云南就象是中国南方的西伯利亚，是发配犯罪官员的去处。这也许就是这里的人为什么说北方话，而不是说中国南方方言的部分原因吧。自马可·波罗的时代以来，云南人的饮食习惯已经改变了，但在别的方面却没有多少变化，即使有的话，似乎也是变得更糟了。

一个进步就是那条铁路。那是法国人违背中国的意愿，以其工程技术力量建立起来的一项早期的奇迹。法国已把印度支

那从中国分离了出来，北京担心修筑这条铁路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后果是有道理的。云南府位于海拔六千四百英尺的高原上，去那里需要三天的时间，穿过两百多条隧道。出了云南府，就只有石砌的驿道了。这些驿道自元代以来从没有重修过。

云南府，又称昆明或滇。到了那里我很快就知道，对于一个业余旅行者来说，要跋山涉水四百英里去缅甸决非易事。作这样的远征，我一无金钱，二无科学知识，我有的只是好奇心和猎奇的欲望。美国驻云南府领事哈里·史蒂文斯，殷勤地留我住了几个星期。他竭力劝我放弃作这次唐·吉河德式的远征。他担心，万一我被吃生肉的强盗抓了去，又要在他任上增加一次“事故”，而有这种顾虑的还不止他一人。

当我把计划告诉中国盐业专利公司驻昆明专员郭平侃（译音）时，这个大高个子官员大笑起来。他说“哈哈，你会被杀掉的。上星期，我们就有三个实习生在从缅甸归来途中，被盗匪拦劫杀死了。我们有一队盐商就在舍资附近被拦劫；后来查明，原来他们自己的保镖就是土匪，哈哈！今天早上，我房东来找我，说他的商队在禄丰遭拦劫。禄丰离这里只有三天的路程。”

郭先生是山东人，他很看不起当地人。他用流利的法语和口语体的美语谈起了山东的情况。他说，他的家乡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要好；然而，他从没出过国。他的外语是在“东边”的教会学校里学的。不消说山东省也是有土匪的；我在前面就说过，鲍威尔和奥尔德里奇小姐就曾受到他们的“款待”；但是郭认为，云南的盗匪与山东的盗匪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抽一支雪茄吧，刚走私进来的，哈！”他大声说着，递给我一盒哈瓦那雪茄烟，自己拿了一支叼在嘴角上。“我干吗不

抽呢？我是盐业专利公司的人，不是海关人员。再说，这还是省主席送我的哩。”

他对我说，在云南，盗匪和官员之间的唯一差别只在于后者是成功的盗匪。他身为盐业专利公司专员，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外国人控制，他能得到这个职位靠的是上海的势力，而不是当地的势力。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朋友。不过，可别在文章里引用我说的这些话，哈！农民就是虾米，盗匪就是小鱼，当官的就是大鱼了！”

“难道革命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吗？”

“革命？国民党？告诉你，我就是个国民党员，但是，对不起，这里只是旧军阀打出新旗号的地方。就拿云南出兵支持蒋介石打广西来说吧。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嘛？广西方面封锁了运鸦片到广州去的道路。云南的将领十分恼火，因此拉起一支军队，为了“三民主义”开始远征，并有两千五百头骡子随军出发，驮上鸦片去那里卖！一旦鸦片脱手，他们就用赚来的钱购进法国货币。接着他们不发饷就遣散了半数士兵，因此这里的盗匪就增多了，你明白了吗？”

郭先生毕竟是个有办法的政治家。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我应邀出席了他为张凤春将军举行的宴会。张是云南驻军司令、国民党副主席。这一酒席上了二十四道菜，喝的是法国酒和香槟。饭后，张将军请我们看戏。他从上海带来了一个叫胡汉玲的优伶。戏台设在一个长满木兰树的花园里。园里有一个优雅的小湖，四周张灯结彩。但是，在这迷人的壮观场面中，却有

一伙穿着褴褛军装、不带武器的士兵，真是煞风景。他们在大门外围观演员和新贵们的到来。当我们进去时，张将军的卫兵把他们推到一旁去。

座位由石坎隔开，小贩们就在石坎上卖热肉卷、桔子、花生和瓜子等。在整个演出中，小贩们不停地在座位间穿梭卖东西。和平时一样，旁边还有些小孩子，熟练地在人们头顶上扔热气腾腾的毛巾，谁要就扔给谁。当晚演的是一出古典戏，除了外国人外，它的戏文观众都能背得出来。但是胡汉玲却出了一个新花样，他扮演一个正在被道士热烈追求的妓女。当出现舞蹈场面时，灯光全熄了。胡手执两根装有电池的魔杖在变魔术。就在他演得起劲的时候，后台骚动起来了。灯也亮起来了，戏园主走到张将军跟前说了几句话，象是求他点什么事。于是，我看到卫队长带了几个人冲了出去。

“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些被遣散的士兵要把园门毁掉，”郭用十分道地的英语向我解释。“张命令把他们轰走。”我们听到了机枪持续响了好几分钟。枪声盖过了台上假嗓子的尖叫声、饶钹的撞击声和胡琴的呜咽。当我们看完戏出来时，街上被遣散的士兵已无影无踪。只见一处黑暗的墙角横着三具饮弹的尸体。

当地人称张将军为“十个老婆的麻子”和“三十六匹马张”，就是说他有十个老婆和三十六匹马。老婆也好，马也好，他显然仍嫌不足，还想增加。因为，我在昆明时就听说他想霸占一位年轻的女基督教徒。女方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就派了卫兵去绑架。她翻墙逃到一个英国圣公会布道团里躲了起来。后来，布道团的牧师约翰·沃森亲自护送她乘火车去印度支那，

她才平安无事了。

“十个老婆的麻子”深信怨恶要从速。哈里·史蒂文斯领事告诉我，就在我到昆明之前不久，张就公开处决了五十三名“反革命分子”，其中有几名是妇女，被杀者全都没有经过审判。张邀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领事到现场观看。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些外国领事接到了排外的印刷品和恐吓信，张想让他们知道，他的政权与此无关，他的政权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私人财产。第二，前任美国领事曾抗议旧式的施刑方式砍头太野蛮。张想让人注意，他已采取了现代文明而人道的施刑方式。这次施刑是朝不满分子的后脑勺开枪的。

龙云治下的生活

张凤春是云南的三条“大鱼”之一。另外两条是省政府主席龙云和他的表弟，“绥靖主任”卢汉将军。这些大鱼原先都是小虾，后来成了“小鱼”。他们在荣升国民党的地方长官之前，都曾被他们的前任指控为“土匪”。龙云的外号叫“笼中虎”，因为他一度被对手擒获，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任人向他扔石块或吐唾沫。这种做法我以为早已绝迹，后来我才知道，在国共内战的时期仍然经常被采用。有人营救了龙云，使他幸免一死。后来他的表弟卢汉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又搞了一次政变，把他出卖了。那场阅墙之争激怒了龙云，他一气之下转而支持共产党反对蒋介石。

但是，此刻他们沆瀣一气，大发横财。我从史蒂文斯领事和别人那里得知，他们的主要财源是紧紧地把一家半官方的富

滇银行控制在手里。几年以前，云南还使用极好的银币，此时已全部改用纸币，只有西部边缘地区是例外，在那里，人们还使用中国最美观的清朝旧钱币。这些新纸币没有保证金作后盾，光靠武力维持。因此，这些纸币只有在军阀统治的地区流通，凡是不接受纸币的人动辄被按“反革命”论处。在国民党执政的后期，差不多所有地区都是这种情况。下面谈到的在云南已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做法，也同样在全国各地盛行。

在云南，“大鱼”都当了国家银行的董事，同时他们还以商人、地主和投机者的身份，从事私人商业。例如，他们控制锡矿的产量和鸦片的专利权，他们利用银行贷款买下锡矿和鸦片，然后又转卖出去，如此一买一卖，完全不用动用自己的钱。他们知道纸币不可避免要贬值，因此每次币值下跌之前，他们就抛出纸币，囤积别的商品或外币。币值暂时稳定时，他们就抛出囤积的商品和外币。过后，他们又抛出手上的纸币，囤积其他有实际价值的东西，接着又以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储存”更多的外币。到了中日战争和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做法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变得十分普遍。那期间，美国政府为了支撑国民党急剧贬值的金元券，人为地抬高金元券对美元的兑换率。统治阶级的家族及其追随者就借此机会把数以百万计的美钞存入外国的银行。

昆明到处是鸦片烟味；所有的市场上都卖烟枪和烟灯；鸦片就象大米一样容易买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母亲哄孩子不用自己的奶头，而是给他一根涂了鸦片的甘蔗。道德败坏和贫困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儿童的虐待。中国各地的儿童都在遭受剥削，但是剥削程度最残酷的莫过于云南。

我采访了一所教会学校的英籍校长理查德·兰克斯特，他对我说，“云南全省大约有五十万奴隶。仅在昆明，少说也有两万名。他们在商店、工场和家庭里什么样的苦役都干。主人或主妇们可以任意处置他们。他们是货真价实的“丫头”或者“奴仆”，给人家当牛作马。我们传教士的太太们开设了一个收容所，收留逃跑的丫头，打算请几位体面的中国妇女帮着照料他们。那里知道，连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家庭也全都蓄有婢女！”

在收容所，我跟十多个八岁到十六岁的女孩子谈过话。她们让人家参观她们的财产时的自豪表情我至今还有印象。人家给了她们牙刷、筷子、饭碗和廉价的衣服等东西，她们喜不自胜。她们在逃到收容所或被赎出来送到这里以前，甚至连遮身蔽体的破衣服也是属于主人的。一个九岁的女孩被用铁棍打得下肢瘫痪了。另一个孩子因头部受了打击，几乎成了聋子。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曾被转卖过四回。她最后的那个主人有一次整整一个星期不让她吃饭，然后用绳子绑住她的拇指把她吊起来，说是惩罚她“偷懒”。

由于被迫种植鸦片和普遍吸鸦片，农民的贫困化加速了。把土地转卖给在外地主的情况有增无已。当时，在云南平原上有土地的农民不到三分之一。在当地市场上，一个女孩只能卖五美元到十美元不等，不过这比一个雇工一年的积蓄要多，他们每天的工钱只有四美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很穷苦的农民出于无奈把多余的女儿卖掉，但是，除非是在大饥荒之年，实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他们极少出卖儿子。在云南，大多数男孩都做苦役。

在简旧的半官办的原始锡矿里，奴役童工的方式是罪大恶

极的。孩子们一到那里劳动，往往患上佝偻、疥癣或脚气病。锡矿里的竖坑和坑道很狭窄，背着矿篮的童工，要匍匐前进才能勉强通过。许多童工因此变成畸形残废，而被抛弃。美国传教士贝克专门救助这种小可怜虫，他和他的妻子收养了许多这样的孩子，照料他们，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并教给他们有用的手艺和技能。

云南府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是令人憎恶的，但是她的自然环境却很优美。这座历史名城，有着古老的城墙，有着一切边远城市应有的色彩和令人陶醉的格调。这里既是铁路和公路的终点，又是商队的出发地。马匹和骡子从石砌的城门进进出出；狭窄拥挤的街道上熙熙攘攘，这里既有狡诈的商贩，从外地来的人，又有当地给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的男男女女，他们分属于十几个不同的民族，穿着色彩鲜艳，而且往往绣有美丽图案的服装。袒露着宽肩膀的藏民，跟他们的狗一样邈邈，他们在街上东游西逛，张大着嘴巴，目不转睛地盯着文明的内地运来的劣等货色和电灯一类的稀罕东西，出神地望着电影院和蒸汽火车头。那里的电灯光线十分昏暗，在一片明灿灿、十分耀眼的煤气灯光中，不免黯然失色。远山如黛，那个地区资源丰富，景色秀丽，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仿佛唯有人是卑微的。

尽管有可能遇到盗匪的危险，我还是去了缅甸。不过，倘若不是遇上了博物学家和探险家约瑟夫·F·罗克博士，我是决不会去缅甸的。罗克证实了地图上未曾标明的云南西部地区是世界上真正的乐园之一，那里生长着数百种在国外尚无人认识的植物。从而使云南在植物学界名声大噪。在云南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不是传教士，罗克是其中之一。他正准备出发去别

处考察。这次活动是由全国地理协会发起的。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六、七个全副武装的纳西族人。他邀我同行，这时史蒂文斯领事的反对就无济于事了。我接受了邀请之后，弄到了一匹小马，租了几头骡子，买了一些生活用品。接着，我又到处想办法弄一件自卫武器，最后，我居然从一个传教士那里买来了一支勃朗宁自动手枪。

当我去找郭先生，请他通过盐业专利公司驻云南西部大理的办事处给我兑换点白银时，他大声说：“你到底还是要去了！别担心，要是你给土匪掳了去，我会给你出赎金的，哈！哈！”他要求我给他寄一些我沿途拍摄的照片。他送我到门外，我临上马时，他又叮嘱了我一番。

“别忘了，”他说，“当盗匪的，无非是为了几个钱。别跟他们争吵，把你身上的钱给了他们，他们也就不会伤害你了。”说罢，他从长衫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绞盘”牌香烟，对我说，“把这带上。他们也喜欢抽烟！一路平安。祝你好运气。哈！哈！”

郭先生真是个人物。我喜欢他。

旅 途

我们沿盗匪出没的崎岖小道跋涉了两个星期，才到达巍峨的苍山、白皑皑的峰峦矗立在洱海边，那里是通往昆明、西藏和缅甸的道路的汇合点。

和约瑟夫·F·罗克博士一起旅行，真是受益匪浅。他曾在中国的西南和西藏东部考察和收集标本多年，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谁都熟悉。这会儿，他又在探索新的植物。

罗克是第一个测量中国最高的山——大雪山的主峰贡嘎山的人(贡嘎山终年积雪, 堪与珠穆朗玛峰和干城章嘉峰相比)。他是一位植物学家、探险家、制图家、人种学家、作家和摄影家。我们沿途见到的灌木和乔木, 都是他的朋友, 他都叫得出它们的拉丁学名, 有的树木还是他给取的名哩。他已经“发现”了数十种花和植物, 其中有许多种杜鹃花是西方闻所未闻的。他采集了大风子树的种子。他把这些种子带回夏威夷, 经过他精心的栽培, 首次在亚洲以外培育出了大风子树苗。长期以来, 大风子油是人们所知道的唯一能治疗麻风病的药。麻风病和甲状腺肿一样普遍, 在云南是十分常见的。罗克随时都带着品种齐全的药物箱和一袋医疗器械, 而且, 他还是个巡游牙医。他是个不可知论者, 十分鄙视福音传教士, 然而, 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成了传教士。

“花钱派这些灵魂拯救者到这里来有什么用处? 他们只能在愚昧之上再增添一种无知而已。”他常常这样说。“他们中有的人在家时都不该让他们随意行动, 更不用说派他们来“拯救”中国人了。就拿约瑟夫·布朗那个家伙来说吧, 他嫌基督教里派别还不够多, 他自己又另立门户。在信笺上端用中文印上布朗救世军协会的字样。你猜猜管事的都有哪些人? 会长; 上帝; 副会长; 耶稣基督; 司库; 约瑟夫·布朗! 真不要脸!”

“就算这样吧,”我总是争辩说, “这种行径对云南并没有什么害处。”

“没有害处? 这种人比土匪还坏。有一对天主教翻滚派夫妇曾来过。这两口子在一所基督教学校时, 在梦幻中见到一位天使, 天使要他们来这里‘拯救’中国的汉族和西藏人。他们相信

祈祷可以医治百病，不相信药物和手术。他们劝人‘要信上帝，信仰可以除百病’。想想看，他们竟然要用这种办法治疗肺结核、梅毒和麻风！这种玩艺儿西藏的喇嘛和巫师不比他们逊色。尽管街上到处是要饭的。他们也没能说服任何人皈依基督教。”

“不过，”我说，“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至少它对治疗精神病有用吧？”

“连他们自己的小儿子的病也治不了。有一天，我听说，那孩子病得很厉害，我明知他们不会听我的话，我还是去看了那孩子。那孩子得了阿米巴痢疾，已经瘦得皮包骨了。我对他们说，我有土根素可以治好他的病，可是他们不让我给孩子吃药。我发脾气了，临走前我怒斥他们：‘你们简直是罪犯！是蓄意谋杀，’他们说：‘只要主同意他活下去，他就能活下去。主会倾听我们的祷告的。’

“我只能说，他们用他们那种洋腔洋调的中国话祈祷，恐怕连上帝都听不懂。十天以后，他们到底派人来找我。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对我说：‘我们在想，要是你为主的事业出力，主也许不会介意的。’可是，太晚了。一小时之后，孩子死了。他们连哭也没有哭。这是主的旨意，’他们一再说。‘主需要他，主自然是有理由的。’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自负，居然充当起上帝的代言人来了呢？仿佛是上帝自己不会说话似的！”

“云南府英国圣公会那个叫华生的传教士怎么样？我看他象是个行善的传教士”。

“噢，他是个医生，那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那些‘拯救灵魂’的人。比方说我们在云南府见到的那些提着口袋出城的福音传教士吧！”他轻蔑地哼了一下说：“他们真是疯子。”他指的是那

两个耶稣再生论者，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要出门，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全省各地去传教。除了口袋之外，他们什么食品也没带，也不带铺盖。他们说要“象当地人一样生活。”

“你以为中国人会听他们那一套吗？他们会说，‘看这些洋鬼子吃的什么玩意儿。要是牧师们吃我们拿来喂猪的东西，那基督教也好不了！’”他又哼了一声。“这两个小伙子要是能活着回来就算运气了。”天哪，他的话不幸言中了。这两个“小伙子”本人倒是安全回来了，但是，在他们外出的期间，他们的妻子却在昆明被人谋杀了。一天夜里，他们的厨子既喝酒又抽鸦片，头脑晕乎乎的，趁她们熟睡时割断了她们的喉咙。那年月，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罗克从不走近中国人的小旅店，经常是在树林中或寺庙里宿夜。他带的用具一应俱全，包括可以折叠的洗澡桶和全套炊事用具。旅途中，他的随从人员一部分开路，另一部分断后。由厨师带头、帮厨和管家打前站，他们一找到视野开阔而阴凉的所在，就把豹子皮铺开，摆好桌椅，铺上干净的台布，然后摆上碗碟、刀叉和餐巾。等我们来到时，饭菜也差不多准备好了。我们的晚饭往往有好几道菜，饭后还喝点茶和酒。如果我们在村子里过夜，全村的人都会跑出来，蹲在不远的地方望着我们。要是碰上我们想在寺院投宿，这很容易办到，只要给和尚一点小费就行——罗克的纳西族随从人员就先给武圣和观音等的塑像彻底掸尘，把地冲洗干净，然后在佛像脚下把帆布床给我们支好。

罗克总是说，“如果你想在这荒郊野地居住，你得让人们相信你是个重要人物。尽管这一来要花费不少钱，但是看来还

挺有效。当地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洋大人”。

我们遇上了藏民商队，他们在头一天遭到了土匪的袭击，被抢走了几驮毛皮。藏民们说他们杀死了四个土匪，把他们赶跑了。他们有点发愁，因为他们是奉达赖喇嘛之命给省主席龙云送礼去的。再往前走了一段路，我们又遇上一大队贩盐的商人，他们也遭了抢劫。我们沿途经过的村子，不是刚刚摆脱土匪的骚扰，就是依然在其威胁之中。有一回，我们留宿的村子在清早四点受到了匪徒的袭击，第二天我们跟着半心半意追赶土匪的当地军队上了路。

“他们是去分赃的，”罗克轻蔑地说。

乡吏们给“洋大人”和我派了二十到五十名卫兵做我们的保镖，而我们也留意给他们充裕的鸦片钱。此外，我们自己的小队人马也有相当数量的弹药。罗克不相信强盗会发善心，而我自己认真想想以后也不相信这一点。罗克带着六十头骡子和马，对盗匪来说，这可是一笔很有诱惑力的横财。他还带着大量的给养和值钱的科学设备，以及价值一万美元的银子，这是我们上路之后我才得知的。他打算在“野外”至少待一年。他因此每天都要认真考虑可能遇到的危险。有几次，他在和他的纳西族“参谋”研究了情况之后，准备停止前进或往回走。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决定增加保镖继续往前走。

当地的匪徒并非蒋介石称为“赤匪”的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叫做“白匪”的人：破产的农民或被遣散的士兵，他们只是靠打劫生活，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背景。匪首如果幸免于死而又发展了势力，当局就会把他们收买过去，封他们为地方指挥官。后来，在其他省份有许多这种土匪头目参加了国民党，有的则

“改邪归正”参加了共产党。多少年来，每逢乱世，中国的军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走过这些崎岖小道四年之后，云南成了红军求生存的战场。那时，红军正在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后卫部队同追赶他们的中央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云南人有句俗话：“汉人占平原，寨民占高山，土匪占大路。”然而，真正统治云南的却是鸦片。云南府和大理之间的平原地区，将近一半的土地都种上了用来提制鸦片的罂粟。此后数年，各种鸦片税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罂粟的种植面积，通常由地方官吏确定，而种植面积的比例要看他们为谋得职位所花的代价而定。农民要逃避种罂粟，得向“禁烟局”缴纳“罚款”。

我们的骡伕每天夜里睡觉都要抽鸦片。不过罗克不许他的纳西族保镖抽。烟瘾最大的是几个四川轿伕，是罗克在得疟疾骑不了马时雇用的。轿子用竹子和藤条编成，固定在四根竹竿做的轿杠上，座位设在中央，上面盖着一块油布，轿夫一前一后，各抬两个轿杠。在中国没有公路的地方，轿子可算是旅客们最舒适的交通工具了。

云南人为了赚钱，什么都愿意干，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就是不屑于抬轿，抬轿子成了四川人独占的行业。罗克雇了四个轿夫，分两组轮换着抬。他们裸露的肩膀上都长了一英寸厚的老茧。他们唯一的私人财产就是拴在布腰带上的烟枪。晚上，他们除了吃粘性很大的米饭外，很少吃别的东西，一吃完饭，他们就抽鸦片，晕乎乎地进入梦乡。然而，他们体力惊人，抬轿子的姿态优美，可以颤悠颤悠地连抬几个钟头而不知疲倦，他们迎风吐唾沫，使罗克大为恼火，可是一听到他们即兴编的号子，罗克也禁不住笑了。

“云南人是狗，用脚抓虱子，”在前面的轿夫大声说。

“他们不是人，他们也说话，但说的不是人话，”后边的轿夫应道。

“靠一边呐，”前头的哼着，“来了一个大人物”。

“为啥，只是个龟儿子官！入他奶奶哟！”后头的大声应道。

有时，一个只是哼着，“哎，哎，哎，哎，哟，哟，唷”——另外一个就接上来，“和一小一妹一子一睡一哟。”中文里的“妹子”和“阿哥”也是一种亲昵的称呼。

有的骡夫赶骡时，也会哼起在云南府学的一些戏曲唱段。但是，他们往往忘了词儿，于是就从头到尾用“妈的”来代替……“妈的”是中国最常见的骂人的话……不过，我用不着在这里赘述这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作家鲁迅写了一篇经典性的文章，专门介绍了“妈的”的历史、盛行的情况及其艺术性。对中国社会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英文版的鲁迅作品集^①中找到这篇文章。这本书是我和鲁迅结交后编辑出版的。

我们过着奢侈的生活，并且雇了大队人马保护财产，这和周围贫困老百姓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渐渐为此感到难为情。罗克退烧后。把轿夫打发走了，我感到好受了一点。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们的处境确实象他们的外表一样可悲呢？道教教义不是劝乞丐要养志，要服从命运安排，并把它看作是完全合理的东西接受下来吗？这些轿夫认定他们四川人是比云南人高一等的种族，象我这样连“人”话都不会说的洋鬼子当然更不

^① 《活的中国》(Living China)，1936年在纽约出版。——原注

在话下了，这一事实难道我可以忽视吗？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信念更能使人心满意足吗？

“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罗克说。“革命总有一天要爆发，而且，它将是历史上最残酷的革命。到那时，我希望不在这里，可是，我不责怪他们。看看我们要带回漓江去的那个孩子吧！他才十四岁，就被抓去当壮丁顶替别人，因为那人的母亲用钱买通了官府。人家用绳子套着他的脖子，把他带走了，然后发给他一支枪，这会儿他从广西回来了，胳膊也断了一只，一个人爬回来的。他到我这里的时候，那断了的胳膊上都长满了蛆！再想想昨天我告诉你的那桩事：一个老太太眼看着两个儿子都让张凤春手下的人用绳子套着脖子给拉走了，她只能等着饿死，因此投湖自尽了！这种事情人们还能忍耐多久呢？”

去 緬 甸 路 上

离云南府越远的乡村，环境越宁静，景色也越秀丽。到第十二天，我们骑马朝历史名城前进，一千七百多年前，诸葛亮曾在这里凭着能言善辩和军队，征服了掸国。整个上午，大雨滂沱，我们不停地攀登，一直到中午才登上九千英尺高的山巅。然后，我们这一行就沿着一条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的泥泞道路下山。这条山路如今成了淤泥的河床，从这里流下的污泥浊水，淹没了当年的忽必烈大道。

不时有骡子因不胜重负趴倒在地，赶骡人一面咒骂，一面使劲拉它起来。骡背上的货物全盖着一块黄油布。赶骡人也都戴着用油布包边的大草帽。这些大草帽在雨中看起来宛如一朵

朵硕大的葵花。只有轿夫不戴帽子，光着背，赤着脚。领头的驴，身披彩带，铃儿叮当作响，跟赶骡人的悲歌相应和。我们往下走了三千英尺后，来到了平原，但见茅屋重重，炊烟袅袅，从纸窗里透出了过早点着的灯光。风儿飘忽不定地掠过湖边的稻田。山腰间林木茂密，郁郁葱葱，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峰回路转，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来到了一座寺院。在那里，我们观看了一个年轻的和尚用粘土塑造一尊佛像。

翌日，我们骑马到了大理平原，苍山群峰隐约可见。峦峰一色白，显得威严秀美。这座有城墙的古城上空笼罩着一片沉寂。靠近山麓的山坡四周，有成千上万座坟墓，其中有许多精致的石棺，墓门对着湛蓝的湖水，石棺周围桉树成荫。墓碑上刻有掸语^①、阿拉伯语、满语、藏语和汉语等的碑文，这和中国东部的土坟岗大不一样。一千年前，大理是一个鼎盛的独立王国，这些碑文就是那个时期前后的达官贵人留下的所剩无几的遗迹。

在故都新近打扫干净的石砌街道上，我们遇到了一条红绿相间、身长一百多英尺的巨龙。中国的春节刚刚开始，商店关门，人们还清了债务，可以吃上松糕和甜米饭了。灶君面前也供了香火。黄脸的商人们，身穿黑绸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帽，彼此见面时鞠躬作揖，双手笼在长衣袖里抚摩着精致的玉器；他们一笑，就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酒的气味和鸦片的气味。双颊通红的顽童们，穿着棉袄和开裆裤，乐呵呵地在放风筝。妇女们穿着绣袍，一双缠过的金莲巧妙地塞进了比巴掌还小的鞋

^① 掸是史书上对傣族的称呼。——译注

子里，三三两两站在那里聊天。她们的孩子们睁大着眼睛，在那里吃红色的蜜饯苹果和糯米团。老头们蹲在太阳底下，手里端着铜的或银的水烟袋在吸烟。喝得醉醺醺的藏民，袒露着上半身，象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大喊大叫，骑着烈性马穿过人群。赶骡人紧紧拉着他们受惊的牲口，生怕骡背上的货物掉下来，同时为自己不能及时赶上热闹的庆祝活动怨这怨那。上面说的那条龙正在人群中腾跃。这条龙是从传说中的龙王宫洱海来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狂欢的。表演者数人藏在纸糊的龙头和长长的龙身底下模仿传说中的龙的习性和动作。

大理的商店里出售玉石、翡翠和琥珀，售价只及他处的一个零头。大理石遐迩闻名，是在大理开采的一种纹理十分美观的石头。把大理石切成薄片以后，其纹理很象天然风景或人物形象使人产生遐想，因而在东方各国受到珍视。但是，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个肯卖给我几件大理石纪念品的商人。玉石和琥珀在节日期间，都被藏了起来，人们看不到也买不到。我是在再往南走了一程之后，才买到几条玉石和琥珀项链的。从大理开始，我就和罗克分手了。他要往北和往西去，而我则要去南面。幸运的是，除了离开大理的头两、三天路上遇到点麻烦之外，去缅甸的路上没有遇到土匪。我有了我自己的“厨师”，一个经过教会训练的青年人，他能讲几句英语。我们搞到了四条骡子，两匹小马，两个赶骡人。通过这两个赶骡的，我们和一队受到很好保护的腾越的商旅结了伴。新年快要过完的时候，我和罗克在大理握手言别。我当时想可能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没想到我们后来还是见了面）。然后，我用中国话说了声“走”！我们就出发到马可·波罗称之为“金牙人”的地方去了。

当年，那里的人镶金牙显然完全是为了好看。

我真希望能够把我所看到的雄伟的湄公河和萨尔温江附近地带的荒凉而壮丽的景色详详细细地描绘一番。我在那一带走了两个星期，看到了火红的树木点缀着浓密苍葱的森林，瘴气弥漫的百丈深渊，走过了参天竹林中的幽径。暮色苍茫，竹林里传来神秘的呜咽。快到缅甸的低洼地丛林中，长尾鸚鵡和猴子唧唧嘎嘎的叫声不绝。我可以叙述商队处理事情的本领和他们省吃俭用的作风，旅伴们一路的情谊，肮脏的旅店（现在没有罗克同行，我开始经常在这种地方投宿）；黎明前的宁静以及柴火、皮革、汗水和炭火等发出来的闻起来很舒服的气味。我可以讲讲我在保安看到一个老绅士要奶妈给他挤奶当早餐；一个来讨药的麻风病人；一个赶骡人在自己腿上扎一段绳子“医治”梅毒；在盈江，一家旅店主人殷勤地想把女儿给我。我还可以讲讲我遇到的那些阿拉伯和犹太人血统的中国人是怎么会来到那个地方的。在湄公河以南，你越往前走，田野越青翠，自然景观越秀丽，土著居民穿戴也越丰富多彩，峡谷里稻米生长良好，物产富饶。

这段旅程快结束时，我下了决心，总有一天要重返这块人类学的奇境。我们这次路过这些部落居民祖辈居住的地方，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他日旧地重游时，我要进一步了解这些部族的男男女女的情况：勤劳的苗人；充满反抗精神的喀钦人^①（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他们相信他们的耶和华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拴着每个人，掌握着他们的命运）；侬人，美丽的侬族

^① 喀钦，景颇族的别称。——译注

妇女们裸露着上身；侏人以及性格温和的暹罗人和掸人——他们是三种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民族的后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这里抵制汉族的同化。

不过，所有这些经历都是留着写另一本书的材料——一本关于云南的书，我开了个头，但一直没写成。

西南在某些方面是很独特的；但是，后来我得知，政治情况却与西部和西北部各省大致相同。在后来的数年中，因粮食问题更加严重了，减少了鸦片的生产，修筑了几条肮脏的公路，官员和土匪之间分赃更为均匀，因为后者多数已成了军人。除此以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云南府成了美国空军基地为止，情形极少改变。

我离开八莫^① 郊外芳草萋萋的丛林小道时，但见伊洛瓦底江在远处闪闪发光。我怎么也想不到，几年之后，我会乘军用飞机只用两个钟点的时间便飞越了这个河源水流湍急、道路崎岖的地区，而我走过这里却花了一个多月的日子。然而，迅速的飞行享受不到旅行的乐趣，想到我是为数极少的徒步从中国到达缅甸的美国人 and 欧洲人之一，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锡袍的国度

离了八莫，我们沿伊洛瓦底江上的“隘道”往下走，前往曼德勒，一路上多次在集镇上停留。这些地方正在迎接本周的一件大事——“太平号”轮船抵达。张灯结彩的码头上人声鼎沸，人

^① 在缅甸，邻近中国。——译注

们穿着丝绸的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等候欢迎轮船的到来。沿江两岸林木繁茂，每隔不多远，就有一座维修得很好的饰金白塔，塔尖镶着宝石，光灿耀眼，高耸云霄。这里的老天温暖仁慈，给物产丰富的土地适时地降下丰沛的雨水。我们追过了一些大木筏，它们需要在江上漂流两个月才能到达仰光。每张木筏上都有一间小草屋。筏夫的皮肤黝黑的孩子们从草屋里跑出来，向我们大声叫喊和招手，木筏落到我们后头了，孩子们仍高兴地在木筏上摇晃着。

旅伴中有一位叫道格拉斯·巴门提尔的，他是《哈泼氏评论报》的前主编。他厌倦了尘世的功名，跑到东方来寻求智慧。他总觉得他会在某一佛教国家里找到智慧。无巧不成书，船上有一位美国传教士对自己的信仰也发生了动摇，变得半心半意了。

“三年前，我在这儿来向人们传福音”，他说。“但是，我得先学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宗教，才能从他们的教义中挑毛病。我作了研究，现在我几乎相信乔答摩^①和基督给人以同样的启示，只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基本信仰。我要回家去了，我不想再到这里来了。无论如何，不再到这里来当传教士了。”

但是，并非船上所有乘客都只满足于冥思苦想上帝，领略伊洛瓦底江宁静的美景，探索绿油油的丰饶江岸的秘密。一个印度乘客，他是胜家缝纫机公司的经纪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客舱里，打开他刚从美国买来的手提唱机在放音乐，吵得人心

^① 乔答摩是佛主释迦牟尼的姓。——译注

慌。他的唱片很有限，放来放去就那几张，大部分时间放的是梅恩·斯坦唱的歌曲。

梅恩的歌曲，所有崇拜他的人翻来覆去唱了百把遍，使人听腻了。因此有一天我发牢骚说：“我希望能换换口味，希望他放一张胜家缝纫机之歌的唱片听听。”

与此同时，当我们往下游驶去，穿过大片优质木材的森林，进入亚洲大产粮区之一的肥沃的稻田时，缅甸就展现在我们四周，宁静而富饶。缅甸得天独厚，耕地面积足以养活它的人口的一倍。这是一个昌盛的国度，英国人在这里统治期间似乎作出了真正的贡献，树立了高度的法律观念，在五十年间以和平和统一取代了锡袍王后的苛政。作为个人，英国人，特别是苏格兰人，在缅甸颇得人心。英国文职人员和缅甸人相处，要比和印度人相处得好些。然而，恰恰是由于英国人施行了严格的“法治”而导致了他们的统治的结束。

在仰光，我发现同样存在对外国统治的不满，青年人同样充满反抗精神和对民族自由的渴求。当时这种情绪正在向每一个东方殖民地迅速蔓延。缅甸的知识分子公开宣称要求成立自治政府，从印度划出来，并要求归还国家资源。他们已开始谋划争取完全独立。仰光大学的学生，如吴努等，已着手组织德钦党。吴努后来成了缅甸独立后第一任总理。这个政党的名称本身就有民族主义的反抗意味，因为“德钦”（主人）以前是对欧洲人的尊称，如今，每个缅甸人都可以戏称他自己或朋友为“德钦”了。

吴努、昂山、吴觉迎等人不久就要组成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这个运动是在一家英文书店里举行的一场讨论中决定成立

的。书店老板是令人敬爱的J·S·弗尼瓦尔，他是缅甸人的朋友，支持缅甸人争取自由。数年之后，我结识了弗尼瓦尔，他当时是那个年轻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国顾问。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帮助那些叛逆的学生组织读书会的。这个读书会跟维克托·戈朗兹、哈洛德·拉斯基和约翰·斯特雷奇领导的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英国左翼读书会挂上了钩。倘若没有它的影响，缅甸革命很可能会走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道路，而不会选择费边社会主义。

然而，在我第一次在缅甸访问期间，我不可能了解这一点，也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我写的几部书会在当时尚未诞生的仰光读书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而英国人当时也不会料到那些青年学生竟能对他们的利益构成威胁。英国人当时看来仍然十分牢靠地掌握着缅甸的锡矿、木材、油料、交通以及其它方面的垄断权。在缅甸投资利润率之高是其他任何地方也无法比拟的，投资者时常在一年之内便可得到百分之两百的利润（如同今天在阿拉伯投资一样）。这些企业尽管被榨取了巨额的利润，却也给缅甸的劳动力带来明显的好处（这也和阿拉伯的情况相同）。然而，导致英国统治跨台的，倒不是这些企业，而是破坏了缅甸农业稳定的英国“法律”。

英国的严重错误是让一帮高利贷者（主要是印度移民）控制了最肥沃的稻田，从而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雇农阶级。在英国统治前，所有的土地名义上属于王室，实际上，则归各村集体所有。农民因此得以安居乐业；任何外来人都不准买卖土地。由于实施英国法律，首次出现把土地分成小块出卖的现象和个体所有制。安分守己的缅甸农民突然产生了发财致富的幻

想，完全经不起诱惑，很快就把土地抵押了出去，为的是购买进口的奢侈品，或去赌博，或摆盛宴讲排场。大批农民的庄园落入了放债人的手中。放债人成千成千地涌来，他们很快就发了财。到了三十年代，印度地主已占有了缅甸南部大半的良田，而当地农民却在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为外国人耕作。萨雅山^①在这些新产生的无地农民中得到拥护，有许多狂热的追随者。他在一九三〇年发动了缅甸的首次土地革命。这次革命不光是个不祥之兆，而且迅猛异常，震惊了洋洋自得的英国人。一旦揭竿而起，缅甸人的做法就不同于印度人，印度人提倡非暴力主义，缅甸人不信这一套。起义开始时，我正好在那里，就多待了一个月，写了一篇详细报道，这也是在美国发表的有关缅甸起义的报道。甚至英国报界对此事也没有作报道。伦敦《泰晤士报》驻仰光记者愤愤地对我说，他曾打算报道这一件事，就在这时候他的编辑给他发来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小事一桩，不感兴趣”。他的上司的意思是报道一下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就够了。但是，那次起义使我很早就确信没收私人土地、收归国有的日子迟早会到来。萨雅山后来被杀害了，但是，他的事迹在亚洲各国迅速传开，成了这个处于社会革命前夜的大陆争相效仿的榜样。

在这些流血的事件面前，我在旅馆里看到英国人那种自以为是的神态感到恼火。我喜欢英国人，还跟一些在山区勤奋工作的文职人员交了朋友，可是在仰光的那些英国暴发户却跟上海的那些投机发财的商贾们毫无二致。在我看来，旅馆坚持要

^① 萨雅山是1930—1932年缅甸咖叻会起义领袖。——译注

房客穿上礼服去吃乏味的晚餐实在无聊，但是其它客人却欢迎这种规定。我穿上便服去时，他们老是说，“可不能拆台呀，老兄。你知道，穿上礼服可以显出白人的威风。”

我无可奈何，只得依从他们，但是，这完全是因为我不能叫这些英国中产阶级的势利小人认为美国人买不起丝翻领。然而，在用餐时，我往往留恋云南山区清新的空气和篝火。

因此，当膝盖又剧烈疼痛起来时，我倒感到有几分宽慰。我可以借口让人把饭菜送到房间来。经X光透视诊断，膝盖骨头并没有折断，只是韧带错位引起了严重的炎症。我卧床一个多月，疟疾又复发了。一天夜里，我发高烧，痛苦万分，昏迷不醒，好象有许多小马在我的血管里奔腾，眼前直冒金星。我睡着了，醒来浑身汗水湿透，恍惚中又看到护士芭塔拉在微笑。我睁开眼睛一看，方知不是做梦，我听到了绸衣的窸窣声，闻到了茉莉的芬芳。

“你的信收到了，”她说。“我知道你会又需要我的。”

芭塔拉一来，仰光好象也变了样。当我的身体好一些时，芭塔拉带我去她姨母的茅屋，请我吃美味的咖喱食物。晚上，我们去参观剧场和寺院。白天她陪我去逛出售上乘丝织品的地方。我们买了纱笼和缅甸凉鞋。我看到了精雕细琢的象牙，去过出售纯真无瑕的玉石和红宝石的店铺。适逢泼水节，到处一片欢腾的气氛，我们常常被人们从阳台上泼下的水淋得浑身湿透，这时雨季未到，仰光的气候干燥，风沙较多，凉水泼在身上还真使人感到愉快哩。

我的膝头好得差不多了。有一天夜晚，我们登上了瑞光大金塔塔顶。我们看着虔诚的佛教徒们烧香，或往塔柱上贴金箔，

塔尖上镶有宝石、翡翠和钻石，在温和的南国苍穹下闪闪发光。我没看到有其它欧洲人。缅甸佛教规定，向佛龕顶礼膜拜时，必须脱去鞋袜。但是，我在那里时，当时的英国皇太子爱德华拒绝这样做，给欧洲人立下了规矩；他说：“任何英国人不得为人或神灵脱鞋。”

然而，为了做生意，英国人是会脱鞋的。十五年后，英国当时的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就乖乖地遵守了当地的习俗。

我在仰光的一些英国朋友出于妒忌，对我和芭塔拉的交往表示不以为然，说我是怪人。不过我是美国人，不在乎这些。白人男子可以带着当地的女子在村子里到处游荡，而且在殖民初期，有的英国总督还和缅甸女子结了婚；但是，仰光这时成了和印度一样的上流社会。白人男子和缅甸女子交往就会在社会上招致孤立：如果是英国青年，就会被遣送回国；如果是美国人，就会被运动俱乐部开除。乔治·奥威尔当年在缅甸时就曾说过，英国“是在太阳底下阶级意识最浓厚的国家，”最讲“势利和特权，主要由老朽愚蠢的人在掌权。”此一评语对英国来说是有点过头了，但对仰光是再确切不过了。

“我们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威望来统治这个国家，只有在当地人认为我们比他们高一等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统治下去。”

这位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朋友说的这番话也许是对的。然而，只要能和芭塔拉愉快地厮守，英国的威望对我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泥捏的花容月貌”，当然与此无关。

印度初观

初访印度，我在那里待了四个多月。考虑到这个神话般的国度疆域辽阔，姿态万千，我看了许多地方。我从一端走到另一端，从闷热的加尔各答到崎岖的开伯尔山口，从凉爽的西姆拉到繁忙的孟买，从庄严的拉杰普塔纳到马德拉斯和马都拉的年代久远的寺院，接着穿过海峡到了锡兰，然后往回走。我日后还要回到印度，作时间长短不等的逗留，然而，我始终是个旅行者，而且还不能算一个真正见多识广的旅行者。因为印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多样化，更加错综复杂，民族也更多，国情也更不易为外国人所理解，因此在这里研究人类的艰辛史，也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一个到异国去旅行的人，如果事先没有初步掌握该国语言，应该先学习，然后再旅行。”国外关于印度的报道，只是暴露了作者的无知，并未起到令人增加对印度的了解的作用。英国人将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强加给印度的知识分子——这是英帝国主义留给这个多语种的大国的一点好处——，这才使外界得以了解印度。

比起刚从西方来的旅行者来，我有曾在中国居住过的这一有利条件。这至少在一些两国具有共同点的问题上，对我了解印度的感情、精神或社会政治生活，起了点“入门”的作用。然而，我很快就看到，印度和中国不仅是同属于亚洲的国家，两国人民加起来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它们却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在历史和发展上很大程度上互不相干。尽管印度在宗教思

想和艺术方面曾不时给予中国以巨大的影响(比中国给印度的影响要大得多),两国之间的接触仅限于少数的旅行者之间;作为国家,彼此依然是陌生的。

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险恶的森林和丛林,土耳其斯坦沙漠以及把中国和印度隔开的大河源头奔腾咆哮的暗绿河水,就象海洋一样,是两国进行密切交往的巨大障碍。现代民族主义浪潮在中国和印度同时掀起,然而,彼此之间却没有真正的联系。我记得,我在第一次和圣雄甘地谈及中国时,发觉他对那里最近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极为淡漠,这使我很吃惊。中国面向东方,而印度却把眼睛盯住西方。

本世纪中叶,因为西方日渐衰落,古已有之的竞争复始,使亚洲这两股主要的文化潮流为取得在东南亚的优势而进行了微妙的争斗,加上在原子时代,世界显得迅速在缩小,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了其邻国的守门人,焦点随着有些转移。

印度是个信仰宗教的国家,靠宗教生存,同时也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陷于分裂。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除边境地区外,全国统一使用一种文字和书面语言。印度则有十一种主要语言,使用许多文字,更不用说还有二百二十五种方言。中国居民属于蒙古人种,有着共同的发展史。对印度人来说,黄种人是异族。萨洛吉尼·奈都曾在甘地的工作委员会中任职多年。我记得她曾说过一句使我感到惊讶的话。她见到了宋美龄,并不觉得宋长得漂亮。“唷,她看上去就象一个普普通通的尼泊尔小姑娘。”她觉得如此而已。她说的尼泊尔人,是当时印度边境的一个民族,属蒙古人种。

虽然,绝大部分高加索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同属一个人种,

但是“印度人”比中国人的血统更为复杂。在印度，长期以来存在着显著不同的各种文化、衣着和语言，这些因素不时引起冲突；在中国，北方农民和南方农民都穿蓝色衣服，信奉儒道两教，他们是同宗兄弟。在印度境内，尽管有世界上最高的白雪皑皑的山峰，有终年无雨的沙漠，也有世界上最潮湿的地区，但是就总体来说是个“炎热的国家”，在那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人们只须有缠腰布或棉“莎丽”^①就行了。在中国境内，各地的气候和降雨量大致相同，自然条件比较接近。

使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之处的，也就是在历史上使它们共同对西方连续不断的统治构成最强有力的挑战的倒不是共产主义或任何别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而是占这两个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饥饿和没有文化的农民，落后贪婪的地主阶级和自尊心受了伤害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是悠久历史文明的继承者，却有自卑感，因为在科学技术、农业和工业经济现代化方面，他们整整落后了一个世纪），他们为探索弥补这一惊人差距的捷径所作的共同努力，以及全民族的巨大决心：把欧洲帝国主义永远从他们的家园中驱逐出去。

对印度的访问有助于我对中国的了解，使我看到了在反抗中的亚洲的全貌。我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的收获要比系统的研究更多。从我的日记可以看出，我在这段时间里读的书如果不说是杂乱的，也是没有计划的。其中包括：《毗湿摩篇》和《奥义书》的英译本、杜波依斯关于印度民俗的经典著作、一本贝拿勒斯的历史、甘地的《我之真理探索》、安德鲁的《圣雄甘地》，

^① 莎丽是印度妇女的服装，用整段的布或绸包头裹身或披肩裹身。——译注

还有罗曼·罗兰写的另一本“传记”、外国人撰写的包括介绍玛约·凯瑟琳和芬纳·布罗克纳等人观点的社会政治书籍、尼赫鲁讲话的小集子以及一本萨洛吉尼·奈都的诗集。

在我离开印度的前后，还读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的论家庭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我对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兴趣显然并没有排除对他的孪生兄弟，性的天使，“混乱的思想和感情”的好奇。

我初次听甘地先生讲话时，我对禁欲主义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希腊人主张的凡事节制，和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似乎比完全的自我克制要更切合实际，更成熟。现在，我还这样认为。然而，对甘地来说，是一种凡人望尘莫及的献身精神的一部分。我本来无须费神从甘地的关于性的观念和他的政治观点中寻找共同点。诚如尼赫鲁所说，甘地是“印度最伟大的充满矛盾的人物”。

我作为美国人，很快就和印度青年人交上了朋友。幸好，在“被压迫人民”的心目中，我们尚未取代英国人而成为富人的罪魁，美国人依然受到尊重。我们答应给菲律宾人以自由，而欧洲帝国主义却持顽固态度，两者截然相反，给许多印度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洲人认为我们年轻，还不够成熟。但是，我们曾为摆脱英国争取独立而战，凭这一点，我们和亚洲人在精神上成了同盟军。

到印度不久，我就去见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桑地尼克丹”他的家中，我遇见了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印度诗人，叫松达拉姆，他成了我在印度政治迷宫中的第一位向导。他是班迪特·摩丹·马拉维亚的秘书。马拉维亚是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校

长，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印度教大会的领导人。马拉维亚总是那么乐意回答任何问题，总是那么好客，他学问渊博，慷慨大方，使我着迷。显然，他不仅在智力上超过这个国家的多数领导人物，而且十分英俊潇洒。至于松达拉姆本人，他对我异乎寻常的友好热情，几乎令我不知所措的友好的热情，我后来发觉，在敏感的印度年轻人中间，要是相处融洽，说话常常是相当随便的。也许有点奇怪，松达拉姆居然是一个婆罗门：甚至他邀请我去他家作客时，也让我单独吃饭，不跟他和他的妻子在一起吃。他把他对宗教的正统观点和他对人类的博爱截然分开。

当然，今天象他那样严守教规的婆罗门不多见了。但是，印度妇女，在尼赫鲁可爱的夫人和妹妹、甘地夫人、萨洛吉尼·奈都等人的带头影响下，也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群众集会时，很惊奇地看到会场中有一大块黑布象一堵墙把男女听众分隔开，以免男人用邪恶的眼光去张望妇女、姑娘和穆斯林闺秀。

我在贝拿勒斯期间，班迪特·马拉维亚邀请我跟他和松达拉姆一起去西姆拉出席甘地和欧文爵士的一次谈判，他们希望能签订一项协议，结束一九三〇年的大规模内乱。我很乐意去，但不久就发现，欧洲人和印度人以平等的身份结伴而行，被认为是叛逆行为。法律并没有规定种族歧视，但实际上，“欧洲人”要求与当地分开坐，即使印度人找不到座位，列车员也不会让他们和欧洲人坐在一起。何况，尽管马拉维亚信奉保守主义，他仍被视为“反叛分子”；他的确也是支持甘地的。当我们到达西姆拉时，我已成了处理政治案件的罪犯调查部的特别

监视对象。

在马拉维亚设在夏都西姆拉的总部，我见到了许多民族主义者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青年联盟成员眉飞色舞地谈论着甘地以及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计划。

我和他们在山丘上猴群出没的雪松林中作了长时间的散步。我们的头顶上矗立着神象般的喜马拉雅山终年冰雪覆盖的群峰，远处传来西藏商旅从多风的山隘上下来时的铃铛声响。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松达拉姆大声说，“但是，如果我们不摆脱奴隶的地位，我们就不配在这里居住。英国人必须滚蛋！”

我们回到城里后，我想到勇敢的新世界不知要比西姆拉充满种姓压迫的社会（无论是由英国人或是印度人统治）好出多少，因为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是白人超级婆罗门——总督府的先生和太太们。事实上，印度财富分配的情况很简单。几千名英国资本家，他们的投资额很小，却从中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另有几千名商人和行政官员过着奢侈的生活。只要看看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看看腐败和任意挥霍的王公贵族，再对照一下大多数一贫如洗、不得温饱的人们的境遇，你就会知道，这种不合时代的局面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然而，“独立”真的能改善被蹂躏的悲惨的人们的命运吗？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人自己——伊斯兰教徒、印度教教徒、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看法不一致。尼赫鲁说，共产主义不行，得添一个音节，要的是“地方自治主义”。^①宗教分歧为英国人施展

^① “共产主义”英文是“Communism”；“地方自治主义”英文是“Communalism”。——译注

“分而治之”的故伎维持其统治提供了温床。而对此，甘地除了“真理”“爱”和印度群众对他的崇拜之外，别无他策。他不允许印度人拿起暴力的武器。

我得去见见他，跟他谈谈。

甘地和尼赫鲁

班迪特·马拉维亚把我介绍给了这位圣雄。他正在和总督欧文勋爵（即后来的哈利德克斯勋爵）进行一系列的重要会晤。甘地实在太忙，根本没有时间接见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我那时没能正式同他谈话，只能在他去拜访他的同事或去总督府时，跟他走一段路，聊上几句。

甘地当时已年过六十，但是他遵循原则，拒绝坐人力车。不论去那儿，他总是步行。他迈着矫健的大步登上西姆拉山间的陡坡，并且横越印度，到了海边。在那里，他带领农民们作出了象征性的挑战姿态，收回了领海，从海水中提取了“上帝的盐”，而英国统治者曾宣称盐是他们专有的。这一别出心裁的策略震撼了全印度，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以争取独立为目标的不合作运动。甘地及其数万名追随者因此被捕入狱。而此刻，甘地、尼赫鲁和马拉维亚等人已获释，以便同英方谈判“解决问题”的条件。

我只同甘地进行过时间短促、断断续续的谈话，无从了解甘地的办法，即他把宗教和政治“奇异地混为一体”的要旨。过后很久，我才有所了解。他从他对《吠檀多经》的理解中汲取了政治灵感，认为爱和非暴力合二为一即为终极真理的一部分，

并因此在民众中获得威望，这一事实远非我所能理解。在我看来，这和印度革命的冷酷的现实并不相干。我不知道他通过谈判能有什么成效。我认为这样的谈判无异于在成功在望时刻屈膝投降。

塔列兰^①说过，“政治是一门关于可能发生的事的艺术，而甘地不必要地把它和宗教，不可能发生的事的艺术混为一谈。我当时不懂得，这一格言对维持现状的政治固然适用，但是革命的政治确实需要一位探求不可能的事的艺术家。甘地在脚踏实地追求真理时，竭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是他的天才。

当我向甘地提出一个问题表示我对这些路线的怀疑时，他温和地劝我“多研究一点”。甘地这时决定放弃独立的要求，停止反抗，以换取英国人同意谈判，建立一个有限的立宪政府的许诺，对此连尼赫鲁也同样抱有怀疑。

尼赫鲁在自传中回忆道，他自问，“难道我国人民英勇奋斗了一年就是为了这个吗？难道我们所有的豪言壮语和业绩就此终结吗？还有国民大会党的独立决议，多次重申的保证？我的内心充满了迷惘……”

可是，到头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肉体的痛苦，”尼赫鲁屈从了那奇怪的权威，“甘地身上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他以后也常常这样屈从。“我们的思想也许更符合逻辑，但是甘地比我们更了解印度，一个人要是能得到如此强烈的爱戴和忠心，他的身上必定有和民众的愿望和理想息息相通之处。”不知

^① 塔列兰(Charles Mavrice de Talleyrand Perigord, 1754-1838)法国外交大臣。他以权变多诈闻名，为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怎地，出于他的政治本能，甘地知道印度还没有独立的准备，他还得对英国人和印度人双方作一些开导。

在我看来，尼赫鲁是一位更为现实主义的领袖，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我喜欢他雷厉风行和直率的作风，喜欢他为了解决贫穷落后、备受苦难的祖国的实际问题而求独立的迫切心情。他曾说：“现实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暴力和冲突的基础之上的，甘地似乎能接受，但我不能接受。”我对这句话十分赞赏。圣雄甘地的最基本的似非而是的理论始终使他迷惑不解，也给印度革命留下恒久的影响。

尼赫鲁要求迅速用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印度的问题。他强烈反对甘地把贫穷理想化，强烈反对把牛奉若神明之类的拜物信仰，反对保留庙宇等做法。这些都和我的想法相符，我越来越感到根本性变革必将很快到来。

“我要彻底废除种性制度，废黜封建王公，节制或结束地主所有制，实现工业化，从头开始重建印度的经济，”在我们第一次在孟买会见时，尼赫鲁这样对我说。“至于印度教，弊多利少。对任何使民众安于饥饿、肮脏和愚昧的宗教，我都不愿置理。凡是不能教育人民，使他们知道，他们在今世就可以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文明，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灵魂的主宰的一切规程、宗教等我也不会置理。为此，我还要僧侣们去劳动，把庙宇改为学校。人们越早受到教育和获得知识，破除迷信不再从《毗湿摩篇》中寻求毫无意义的慰藉，他们的日子就会越好过。”

实际事件以及人类和历史深刻的力量越来越使甘地和尼赫鲁这两位极其矛盾的人物谁也离不开谁。后来我认识到，尼赫

鲁和甘地一样，他们对我说的话多少都和他们的本意有出入。无论如何，从这时候起，尼赫鲁在陈述见解中表现出来的知识和热情都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我在西姆拉和德里的所见所闻，使我深信印度革命是正义的，我成了它的支持者。英国人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人们有朝一日会承认，他们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日子。但现在，任何一个神志清楚的人都会认为，英国人的责任是离开这里。印度次大陆广阔富饶，有着古老的文明，印度的人口要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要多；如果认为少数白人可以凭借他们碰巧较早垄断了一些新武器和发现，就还可以长期统治印度，那是十分荒唐的，正如今天如果有人认为任何强国可以永久奴役一个不甘愿被奴役的邻国，那也是同样十分荒唐的。

这些想法，我只告诉了另外两个在印度的美国记者，吉姆·米尔斯和比尔·谢勒。我原以为其他人对此不会关心，但不久我就知道并非如此。

孟买历险记

我乘二等车厢随甘地去孟买。一个印度人打开车厢门，怯生生地问我可否进来坐。我请他进来。他看起来挺和气。我们很快就随便交谈起来。在我遇见的印度人中，唯有他在很久的一段时间里不谈“印度问题”，听我吹嘘我从云南到缅甸的见闻。他甚至还瞧了瞧我拍的寨民的照片。当他在亚格拉站起身下车时，我感到扫兴。

“我以为你要去孟买呢，”我说。

“原来打算去，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实话对你说吧，如果你真是我们正在跟踪的那个人，我就逮捕你了。”

“逮捕我？”

“是的，”他说着，让我看了一下他的身分证。“我是罪犯调查部的。不过，我相信搞错了。你不是我们要查访的人。”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呢？”

“我们要找的人以前是一个罪犯，还是个鸦片走私贩。你太年轻了。”他咧嘴笑了。“太年轻而且太爱说话。祝你平安，先生。”火车开动了，他和我握了握手，于是就跳下车去。

他的意思也许是说，罪犯不可能如此幼稚。但是细想起来，我得承认，有几件事得说明一下。我还没有在印度移民机构办入境手续；在云南边境根本没有这种机构。缅甸当时是印度的一个行政区，我进来后，谁也没有问我要护照看。我的护照未盖过许可入境的章。至于鸦片一事呢？这也许又是上海的那个白俄告密者编造出来的。

在孟买，我又见到了萨洛吉妮·奈都。我们都住在塔吉·马哈尔旅馆，几乎天天见面。她精明伶俐。她差不多等于是甘地的女“助手”。她戏称甘地为“米老鼠”。她喜欢称自己为“印度最伟大的女社会活动家”，有一次在议会上，一个过分热忱的人就是这样介绍她的。萨洛吉妮出生于著名的恰多巴迪雅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包括她哥哥哈林德拉那特，和她一样也是一位诗人；她的姐姐，此人在印度开办了第一所采用蒙台梭利^①教育法的女子学校；还有著名科学家恰提·恰多巴迪雅博士，

^① 蒙台梭利(Montessori)，意大利教育家，提倡让儿童自由发展的教育法。——译注

他在德国时曾与史沫特莱结婚。父亲和祖父都曾和海德拉巴士邦的宫廷炼金术士。她告诉我，当时世上最富有的老君主还在专心致志地寻求炼金的秘密。

通过萨洛吉妮的介绍，我结识了一些已出狱的民族主义者。经过一番努力，她还为我找到了她的一位“地下”妹妹苏哈西妮。据萨洛吉妮说，苏哈西妮“比她的祖父更象一位炼金术士”。

苏哈西妮是我在印度遇见的第一位共产党人。就我所知，她也是我在亚洲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苏哈西妮是一位充满惊人的活力、才智过人的年轻人。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场革命运动。尽管她后来脱党，但此刻她完全摒弃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把甘地的领导斥之为虚伪。认为她姐姐的事业是失败的，并预言光明的力量将很快得胜。当她那火一般的信念未能使我熔化时，她把我叫做“冰山先生”，说她很快就要熔化我。她把我带到工厂后，在那里，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孟买成千上万的工人居住在通风不良、窄小的房子里。露天的沟形厕所贯穿阴暗的通道，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就在通道里玩耍。工人们工资微薄，难得一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得肺结核和其他疾病的甚多，遭受着早期机器“文明”典型方式的剥削，这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立论的依据。印度的工厂区棚户的条件与英国的一样差，工人们无论是给印度工厂抑或是为英国工厂干活，并无多少区别。只有少数高度熟练的工人方能为家庭弄到单间房子。单身工人住在排列着格子铺的房间里。他们为了寻求安慰，便到见不到阳光的烟花巷，去光顾那些在兽笼般的低级窑子里向他们招手的印度娼妓。

有一段时期，“阿迪”——阿迪卡里——曾是我的另一位向导。他是青年共产主义工人联盟的书记，在党内成了一位重要人物。后来，他也脱离了党。他总是把一个标有“苏联制造”的旧火柴盒带在身上，盒里的火柴也许早就被当作佛牙散给了忠实的同志了。几经传递之后，火柴盒上的字迹已难以辨认，但是盒子本身是一种神圣的纪念品。“阿迪”说，他讲过世界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工人拥有并管理自己的工厂。这个火柴盒有助于使印度的穷人相信，他说的情况并非是神话，而是确有其事。我不明白阿迪卡里为什么会如此深信不疑，尽管他能从书刊上读到这类情况的介绍，但毕竟从未到过俄国。我后来才懂得，俄国是一种信仰；对它要虔诚，诚则灵。对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伦理学和哲学，而对印度人来说，它是一种宗教。对那些要成为它的宣道者和潜在的官僚的年青的婆罗门来说，一种信仰越是以教条为依据，他们就越喜欢。谁要是没见过印度共产党人，就不会知道在一根针头上跳舞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那些印度共产党人同样也会从经验中学会“可能的艺术”。苏哈西妮和阿迪卡里未能使我理解，在印度如同在中国一样，有两场革命，而不是一场——为生存而斗争和为统治人们而斗争。

毫无疑问，罪犯调查部一直在注意着我的行踪，但我知道以后还是感到震惊。有一天晚上，我和珀西·菲利普斯爵士正在塔吉·马哈尔旅馆的酒吧间聊天，一个年青的英国军官吉米·帕克匆匆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单独与我说话。事情是这样的：吉米是我兄弟在纽约结识的一位朋友。因此，当他在报

上看到我在孟买，就找我来了。他带我到“俱乐部”去了几次。他是个好人。对政治毫无兴趣，但喜欢打扮得整整齐齐与女士们来往。

“老伙计，他们居然把你看作危险的赤色分子在盯住你呢！”他十分激动地悄悄说。

“怎么又来了呢？”

“警察局长是我的朋友。那天他看到我和你在一起，今天就把我喊了去，对我提出了警告，说是再这样下去，就要审问我了。看来，他们这几个星期来，一直在等你上钩，这会儿，他们以为要捕到大鱼了。他们对我说，你从前是个罪犯，鸦片走私犯，你用假名旅行，有两个假护照本，非法进入印度，而且还是共产国际的间谍！上帝啊！”

“吉米，你知道那是胡说！”

“我当然知道。我对警察局长也是这样说的。我告诉他我与你的兄弟很熟，你们俩就象是双胞胎。他们的说法是荒唐的。咳，他认为我是傻瓜，说我不知道你有多么的狡猾！他对我说，最低限度，要把你驱逐出境。听我说，这可有点麻烦。”

我把人家在上海捏造我的材料的事情和进入缅甸的情况告诉了吉米。“但是，他们肯定知道我一直在用真名给报联社写稿，而且还有他们新闻局发的许可证。”

“他们什么也不相信，只信他们手里的黑材料！你最好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主动去见见警察局长。他告诉我他们实际上已经下令要逮捕你。甚至还会把我也牵连进去呢！”

我拒绝去警察局。我为什么要去呢？但是为了安慰吉米，我同意第二天把全部情况向我们的总领事汇报。我真的这样做

了。

“你满可以少给我们招来这许多麻烦的，”总领事先生冷冰冰地说。“就象你自己说的，毕竟有些情况需要解释一下嘛。不过，从现在起，我会留意这桩事的。”此后，我再也没听说这件事，但是，我敢断定，在世界上尚存的每块英国殖民地的卷宗中都会继续保留这份纯系捏造的材料。也许，联邦调查局里也会有这份材料。

就在我接到主编要我回上海去的电报之前，孟买发生了一起前所未有的事件。当时甘地在孟买。一伙自称为“年轻的欧罗巴人”的“激进”团体要他到塔吉旅馆，和他们见面，说说他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圆桌会议上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甘地在萨洛吉妮的陪同下来了。他与平常一样穿着菱形花的衣服，在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他泰然自若地对那些穿着晚礼服和浆硬的衬衣的年轻的欧罗巴人说，完全彻底的独立和“社会主义”是他的既定目标。这使他们大多数人都感到震惊。在这以前，他们一直没把“这些赤色分子”当回事。

在拒绝与“卖国贼”会见的英国记者中有伦敦的《每日邮报》记者，珀西凡尔·菲利普斯爵士，他以前是美国人。“我要在这里办件事，”他老是这样对我说。“《每日邮报》是一贯维护英国利益的。我们不能跟甘地这个恶棍打交道。”

然而，菲利普斯作为记者的自豪感终究压倒了他作为这个王国骑士的尊严。他说：“我忍不住想要看一眼这个混蛋。”他承认他“站在门外的一张椅子上，透过气窗听到了甘地说的每句话”。甘地在世时，我们大多数人也只能在这种距离听他讲话。

我这次在东南亚各地进行的第一次游历花了一年多的时

间。这一切经历都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产生我一时还不能估量的影响。我开始摆脱愚昧的状态，开始对什么叫“无知”有了一丁点儿的了解。只要我的主编们没有觉察到我的发现，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搭一艘日轮，沿传统的航线取道新加坡回中国。

与宋庆龄的友谊

回到中国以后，我就不再是一个旅行者了。汤姆·密勒说得对：中国将发生我们时代的“大新闻”。我希望能亲眼见到它的发生，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在发生之前预先了解一些情况。回来之后，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报道满洲“危机”及随后的日本侵占。然而，从预先了解一些情况的角度来说，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的活动，还不如我在这同一时期里的私人交往的好处大。在这些私人交往中最为重要的是和孙中山夫人的友谊。

我在几次记者招待会上见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就在那些场合我认出了宋庆龄。《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布朗·梅洛尼女士要我写一篇宋庆龄的传略。尽管我知道她曾是孙博士“年轻的妻子”，但未料想到她竟是如此年轻貌美。她当时已有三十五、六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十来岁；依然是几年前吉米·希恩^①描写过的那个白皙苗条的“绝代佳人”。和希恩一样，我发现“她的容貌和命运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孙夫人是

^① 吉米·希恩(Jimmy Sheean)是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
——译注

“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

她并无令人生畏之处。她为人谦虚，不爱出风头。她需要有巨大的毅力和勇气，才能顶住各种迫使她放弃原来的信念的压力，担负起历史赋予她的使命。她并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人。同真诚的人交往，她显得平易近人，但是，对于伪君子，她却是针锋相对。不了解她是个多么出色的演员的人，往往会忽视她的机灵敏捷的思想，而把她的应付裕如的才能误认为幼稚。她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说一点法语和德语。那是她在乔治亚州威斯莱学院学的。

要会见宋庆龄可不容易。对她来说，会见许多陌生人是不方便的；一则，她的住所总是由国民党便衣人员和法国警察守卫和监视着，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她，因为她是圣人的遗孀，并且依然是圣人的代言人，同时又是老蒋的大姨子。其次，她深居简出也是为了避免形形色色的人无端占用她的时间。因此，她在初次同意会见我时，居然选择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上的一家巧克力商店作为会面地点。我们进了午餐后，继续留下来喝茶。到了吃晚餐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已开始对她有所了解。几天以后，我第一次到她在法租界莫里哀路那幢朴素的两层楼房住所拜访她。这幢房子连同那些极好的英文和中文藏书，大约就是孙中山先生留给她的全部财产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他经手的钱有数百万之多，但他逝世时却是个穷人。

宋庆龄所信赖的中国，也是穷人的中国。她相信，在中国，最卑微的苦力也将象其他人一样挺起胸膛来走路。她向往的是一个与世界各国交往的中国，而不是用万里长城自我封闭的中国；不是家家以邻为壑，人人只顾谋私利的中国。她关心的不

是外国人的权利，而是我们习称为四万万人民（后来共产党人发现中国的人口是六亿）的利益。在我看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把这种考虑放在首要地位。

在为数不多但有影响的美国人中间，曾有过一种时髦的观念，即无论你在国外住多久，都要记住美国的利益（俗称硬利益），在任何地方都应高于当地居民的利益，而当地居民则似乎只有“软利益”。在海外工作时，你肯定会注意到每十六个人中间就有十五个不是美国人。那十五个人很可能认为他们的利益比我们的利益更为重要，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相抵触的。而这一点反过来可以使你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按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或者俄国人，或者法国人希望的那种方式发生。相反，事情总是依照历史选择的方式发生，以难以捉摸的方法调和这些敌意。

我认为，如果我们想知道历史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我们称之为世界社会的调和局面（且不说和平）的，我们就必须努力了解别的民族的真正的“软利益”是什么，他们对自己的问题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怎么考虑的。

宋庆龄通过言传身教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在那些年月里，她经常介绍我认识一些未来的历史创造者——年青的作家、艺术家和战士。后来，我和她一起把数以千计的难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收养战争和饥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开办医院，协助年青人学会用有效的新方法为古老的祖国服务。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了解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的抱负。她还帮助我了解她的家族情况，了解她为什么拒绝与宋氏

家族一起和蒋介石政府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我从书本上无法了解到的事实。

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有数年的时间，宋庆龄不能公开发表意见，也不许我在国外发表文章或讲话时引用她的话。我们计划合写她的传记，我并且为此作了些笔记备用。她对我推心置腹了，我对她所处的地位和缘由也就没有疑问了。

既然她的地位已经明确，我说一点她的情况，也不至于有滥用她对我的信任之嫌了。

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

何谓基督教徒？对此众说纷纭。在中国更是这样，在太平天国的例子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汤姆·密勒常常套用卡莱尔的说法说，如果耶稣基督到上海来，人们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也不会请他赴宴；他们只会请他喝杯茶，听他诉说自己的身世，然后把他送交租界警方。然而，当我按这个大意给门肯先生办的《美国信使》写稿时，当地的长老们给报社写信，坚持说上海之所以有今天完全得力于基督教。对此，我不敢苟同。

“你是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夫人”。有一天，我对宋庆龄说，“可是人们想知道：你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出身于一个基督徒之家，受过洗礼——而且还是个威

斯莱卫理公会教徒哩！听人说，因为我不去教堂，传教士认为我不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说，委员长是基督徒。”在说到“委员长”一词时，她总是略带讥讽地加强了语气。

“你认为他不是吗？”

“我听说，他每天读圣经。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吗？”

“我听说你母亲要他答应读圣经才同意那桩婚事，是吗？”

“是这样的，”宋庆龄说。“为了同美龄结婚，他得同意成为一个翻滚派教徒。他需要她帮助建立王朝。”

宋庆龄从她在佐治亚州生活的年代起就知道了天主教翻滚派，而她了解蒋介石，是因为和他共事过。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她妹妹也“背叛”了，玷污了宋姓。

她说：“他使中国倒退了许多年，使革命付出了远远超出它本来需要的代价，变得远为恐怖。他终究会失败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宋庆龄在俄国流亡。两年以后，她回到中国，既没有向新郎也没有向新娘表示祝贺。到那时，蒋介石已经杀害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革命者，她认为这些革命者的信念与她的亡夫的理想最为接近，因此，她把蒋介石看作杀人凶手。而宋美龄的婚姻也无异是对她个人的一记耳光。我初次会见宋庆龄时，她说，这一婚姻的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可是，有人却认为姐妹俩的婚姻有相似之处。宋庆龄是激进分子，她与孙中山结婚时，认为自己是嫁给了中国的救星，宋美龄是保守分子，她与蒋介石结婚难道就不会有同样的想法吗？这两姐妹先后当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她们之间的竞争一直很激烈。今天，宋庆龄成了依然尊孙中山为“共和国奠基人”的北京政府的副主席，而她的妹妹却流亡台湾，她们

的角色似乎是戏剧性地颠倒了一下。

孙夫人回国后，数年中姐妹俩很少见面。一直到了中日战争，她们才有了点和解，而孙夫人对宋美龄的婚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开始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合，”一九四〇年的一天，宋庆龄在香港对我说，“但是，现在我认为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许会坏得多。”她依然厌恶蒋介石，把他看作是民族的灾星。

在这以前的三十年代期间，当孙夫人住在上海时，她支持一切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力量，其中一度包括孙中山前妻的儿子孙科。孙科曾公开谴责蒋介石“篡位”，“败坏了国民党。”他说，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所有的地方政府、省、市政府都已腐败透顶”。孙科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国民党的原则”，嘲讽蒋宣称自己为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他说他父亲“从来就不信任蒋介石”。但是孙科后来和蒋介石和解了，在他手下做了官，宋庆龄于是也同孙科决裂了。

我不知道宋庆龄那时是否是共产党员。也许，她是根据共产党的原则行事的，但又留在党外，因为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首先对他负有义务。她觉得，她留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可以体现两党之间的兄弟合作，孙中山晚年曾明确强调这种合作。在我问她，对她来说，她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时，她表达了上述的意思。她不假思索地说：“那就是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在她提到她的丈夫时，我从未听到她用过孙博士之外的称呼。

只要有“国民党左派”(那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活动，孙夫人就和孙中山的许多老同志一起，予以支持。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左派在其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处死时消声匿迹了。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得意门生之一。孙夫人对邓之死深感悲痛。

不久之后，孙夫人的另一位挚友杨铨(杏佛)，又在上海街头遭国民党的凶手暗杀。杨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中央研究部的成员中有胡适博士、林语堂博士和其他杰出的学者、作家和科学家。杨、胡和林都曾是上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该组织由国民党老党员蔡元培领导，孙夫人任主席。其宗旨是为当时据认为被监禁在各个城市中的“五万名政治犯”争取公正的审判。林语堂发现，是杜月笙的党羽奉蒋介石之命枪杀了杨铨，接着，他本人也受到了威胁。林语堂和大多数成员退出了这个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随即解体。

当时，在中国是无民权可言的。

此后，宋庆龄几乎是单独一人在抗议接连不断的暗杀、逮捕和处决的。她爱护每一位革命者，并亲自干预和营救了许多人。在她遇到的挫折中，最使她感到悲痛的是，一九三二年六位年轻作家遇害的事件。他们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左联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领导的史学家、小说家、短篇小说作者和诗人的团体。被害人之一是富有才华的女小说家冯铿。上海的外国巡捕逮捕了二十四位被指控参加左联的青年男女，并把他们转交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其中最知名的六位被强迫自掘坟墓。然后，他们被捆绑起来，扔进土坑活埋了，这

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惩罚反叛者的方式。

这些详情都得到了证实，虽然中文报纸不准刊登，但外国人的报纸却作了披露。然而，我们在上海的基督徒们对此却无动于衷。被害人中也许有共产党员，他们这些“赤匪”难道不也在内地杀人吗？但是，我很了解鲁迅和杨铨；林语堂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不是。他们都不过是倾向西方的有自由化倾向的个人主义者——在中国，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不合时宜的人。

这一惨案发生后不久，我和孙夫人谈起此事，当时我正在编辑《活的中国》一书，把几位被害的作家的小说收集了进去。孙夫人愤愤地说：“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显然，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哩。”

“你以为他本人知道这桩事吗？”我问她。

“他应该对所有的屠杀事件负责。他一背叛革命，就开始杀人。因此，只要他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决不在其中任职；因此，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

无论他是否应该负责，当然没有哪一部圣典会规定“反革命分子”不能当基督教徒。佛朗哥以及在他之前的许多暴君还不都是基督教徒吗？但是，在宋庆龄看来，没有一个“反革命”能进天国之门——即使是孙中山守门也不行。

“孙博士如果仍在世，”她说，“他也会宁可同国民党脱离关系，解散国民党，而不愿看到它被利用来为屠杀作家和爱国者的行径开脱罪责。”

她说，多年前她放弃舒适安全的生活去日本同流亡的孙中山会合，并不是为了这，决不是的。

“你能确切地告诉我，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吗？”我在结

识她数年之后问她。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她慢条斯理地说。“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他当时在东京流亡，我从威斯莱学院回家的途中，曾去看望他，并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不久，他捎信到上海给我，说他需要我去日本。我父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想把我锁在屋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在当时的中国，这对一个名门闺秀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不仅违背了孝道，也违背了基本的家教和国法。孙博士本人意识到，不明确的关系会被人曲解，就做好了结婚的一切准备。

“在我到达东京之前，”她说，“我不知道他离过婚，也不知道他打算和我结婚。他向我解释说，要不这样办，他担心人们会把我说成是他的情妇，而流言蜚语将对革命有害。我同意了，而且从未后悔过。”

在她抵达的第二天，他们就悄悄地结了婚。她刚满二十岁，而他大约已有四十八岁，后来还活了十年。第二天，她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开始学习密码，不久之后就为他译各种密件了。

孙中山有意把与前妻离婚的事弄得含含糊糊，是为了免遭宋家及其他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的反对，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宋庆龄的父亲多年来一直支持孙中山。这时，他感到他的爱女被他最好的朋友偷走了。

“我父亲到了日本，狠狠地说了他，”她说。“他企图解除婚姻，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父母的同意。他失败了，于是

就与孙博士绝交，并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

中国的基督教徒远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他们对孙中山来说是很重要的，他受过英国基督徒的教育，他的思想一半是中国式的，另一半是西方基督徒式的。但是，宋庆龄从未因她是孙夫人而受到基督教徒的热情欢迎。她轻蔑地说：“他们称我为女冒险家。”也许是孙博士在传教士中的老朋友们对宋庆龄冷落，也许是与宋家的态度有关，也许是当时清教徒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其结果都使孙中山感到忿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后来更易于把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人视为同志。宋美龄也同样嫁给了一个离过婚的人，但是她的婚姻却在基督教仪式上得到了祝福，受到了参加豪华铺张的婚礼的传教士们的赞扬。孙夫人看透了往日的那些传教士朋友们，把他们看作伪君子，不与他们来往。她认为，他们态度的改变，主要是与蒋介石的反动政治有关，而不是因为真正改变了对离婚的看法。

宋庆龄和历史

孙博士、孙夫人和宋家从来没有完全和解过。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和俄国人签订协定后，宋子文南下参加了改组后的革命政府。时值国共合作之初，其势力范围仅及广东一省。一段时间内，宋家仅宋子文一人见过宋庆龄。宋子文是宋庆龄的弟弟，一位经济学家，不久之前才从哈佛大学毕业。蒋介石和共产党破裂之后，宋子文动摇了。尔后他支持了蒋介石，但是他依然是宋庆龄在宋家的一位忠实朋友。他为她筹划了一小笔

年金，偶尔也在政治上帮助她。

蒋介石从未能叫宋庆龄同意在他的政府中任职，但是他把宋家其他的成员全部网罗了进去，以至国民党政府被人戏称为“宋家王朝”。他一直把国库置于他的内兄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掌握之中。孔博士曾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娶了孙夫人的姐姐、宋家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宋霭龄为妻。宋、孔、蒋三家除宋庆龄外，都很快就发了财。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受大笔美援之前，孔夫人本人就已经是个重要的金融家和实业家。在那以后，对这个王朝的朋友来说，“资本形成”就容易得多了。

宋庆龄用既轻蔑又钦佩的口吻对我讲了宋霭龄在金钱交易上的手腕。“霭龄聪明极了，”宋庆龄说。“她从不冒险。只有当她预先从财政部的同伙那里得到政府财政政策变动的情报后，她才决定买进或卖出。可惜的是，她不是把才能用来为人民办事，而是反对人民。”她越来越感到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亲戚们利用国民对他丈夫的尊敬来为自己和朋友们发财致富，而百姓们却在忍饥挨饿。

“在美国也许有条件使一些人富起来，”她常说，“但是在中国办不到。在这里要发大财只能靠使用罪恶的欺诈手段和滥用以军队为后盾的政权。每一元钱都是从我们贫苦人民的血汗中榨取来的，他们极少有吃饱肚子的时候。总有一天，人民会起来把财富夺回来。”

乐善好施既是佛教的，也是基督教的一种美德，而儒家却强调家庭是第一位的，因此在中国慈善事业相对来说较为少见。宋庆龄并不幻想靠施舍来解决贫困的问题。她认为，在中国穷

人就是“人民”，既然人民贫穷衰弱，国家当然也就贫穷衰弱；要想使中国在世界上取得平等的地位，就必须先使“人民”富裕强大起来。她青年时代相对舒适的生活也许给了她一种负罪感。在这点上，她更象一个卫理公会教徒，而不象一个中国人。中国的有钱人对“人民”遭受屈辱毫无羞耻感，他们讨厌宋庆龄；宋庆龄则看不惯他们炫耀财富，认为这是一种对全民族俗不可耐的侮辱。她为了“事业”，卖掉或捐献了她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大部分遗产，这足以说明她的为人。

宋庆龄喜欢美丽的东西，她的生活装饰品不多，但选择得当。她的家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温暖朴素的感觉。她收藏了几幅珍贵的字画。房间里常常点缀着一些奇异的花卉。她身穿色调柔和剪裁合身的旗袍，打扮得很是整洁，乌黑发亮的头发往后梳，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秀美的脸庞宛如浮雕像，除了一只玉发夹外，她极少戴别的首饰。

宋庆龄喜欢西方歌剧，收藏了一些好唱片。她喜欢跳舞，偶而也为年轻人举行舞会，同时自己也可以彻底轻松一下，高兴高兴。她坚决主张男女平等。出于对孙博士的怀念，她意识到，她肩负的历史使命比她的个人生活重要得多，因此，她没有再婚。

求学时代，圣女贞德^①的事迹使她深受感动。尽管她并不是一个把自己看作圣女的神秘主义者，但是，她把自己和她认为是在被压迫的中国的真正解放力量联系在一起，这也许就是她在寂寞的生活中的主要慰藉了。她性情温柔。她由于没有孩

^① 贞德(Jeanne D'arc, 约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

子而感到遗憾，于是就把感情倾注在孤儿院里由她照顾的孩子们身上。她创办了不少孤儿院。中国人遭受的深重的灾难想必使她的心变得冷漠了，但是要论她过去和现在对革命所尽的义务，最低的估计也是跟她在评价她妹妹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时所说的一样。没有她，暴力行为“也许会严重得多。”

“孙博士从来不反对任何同情穷人的人，”她断然地说，“从来不支持任何站在富人一边的人。他自己年轻时就很穷，十四岁以前他没有穿过一双鞋。他从未忘记，我们的人民百分之八十都是这样穷苦。你要知道，我的祖先也是很穷的。我的亲戚从不说起，但是，我们的祖先是海南岛的客家人。几代以前，他们当中有些人移居大陆，来时身无分文只好当苦力。”

宋庆龄看上去并不象客家人。她皮肤白皙光滑，双手纤巧。也许是这个缘故，她在美国并没有遭到种族歧视，而黑人和“黄色皮肤”的广州人在那里是常常受到歧视的。她很少谈起她在威斯莱学院求学时代的生活，我只记得有一桩事能表明她对那岁月的感情。她的教名叫罗莎蒙德，而且她依然喜欢朋友们称她“苏西”，这是她在学生时代的浑号。我以为，这和美妙动听的“庆龄”连在一起，有点不相称。

不幸的是，她牢记着东方人在美国受歧视，黑人受屈辱的生活。她的妹妹宋美龄，是在韦尔斯利受的教育，比她要美国化得多。宋美龄就没有这种体会。在宋庆龄的脑海里，这些情况是基督教实践中的严重缺陷。她认为这与外国人耀武扬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看不起中国人是一致的，虽然她也利用外国人的租界作政治避难所。

有一回我请她谈谈对访问苏联的感想，她对我说：“俄国人

并不把有色人种看作是劣等民族。”她还说：“美国人不让黑人儿童和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学校上学，但是，他们却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这也是使孙博士感到俄国比美国更可亲近的原因之一。”

“但是，孙博士至死不变，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这样啊？你们不是为他举行了基督教葬礼吗？”

“举行了，这是他的愿望。他有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好朋友，我也有。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的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教义付诸实施。”

“那么说，他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共产主义喽？”

“噢，相信的！不过，开头不相信。他曾认为我们的革命应该走一条和俄国的不同的道路。一九二三年以后，他认为我们可以走同一条道路。”

“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言论似乎断然否认这一点。”

“噢，你是说他的那些演讲吧！那都是他即兴讲的。讲话内容完全是根据政治局势和听众而定。他在讲台演讲时，我常常象猫一样坐在他旁边，心里忐忑不安，生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始终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几乎与列宁同时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他的头脑里有很明确的目标——耕者有其田，生产的社会所有制，工业现代化，教育平等，人人都有就业机会，当然，还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

“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怎么看？”

“他认为最终一定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你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这种说法。不过，对那些他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的人们，他说得很谨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

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
‘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

难道伟大的孙中山只是一位搞妥协的高手吗？从宋庆龄的话中，我得到一个印象，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双手尽管沾上了政治和战争的污泥，却从不把权力看得比理想还重。他似乎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警察称之为“十分可怕的人”，这种人不仅仅是无神论者和革命者，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但同时又相信基督教。”

“想想看，孙博士为之奋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国啊，”宋庆龄感叹地说，“人人都把它当作门前擦鞋的棕垫。甚至象葡萄牙和荷兰这样的小国都看不起我们。满洲人可笑的骄傲和无知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外国人利用他们来欺压我们。民国成立以后，列强依然把中国当作它们的殖民地看待。孙博士曾一再去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寻求援助，以便执行他的借助国际力量发展中国的计划。但是，人们总是瞧不起他，嘲笑他，把他打发走。”

“转向俄国是他最后一个机会了吧？”

“你不如说这是他最后的选择。”

这是真的，孙博士甚至在同俄国人达成了协议之后，还向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吉尔德·舒尔曼发出最后一次呼吁，要求他促成大规模的国际干预，这种规模的干预甚至连俄国也从未试图进行过。他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消灭军阀，跟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民做好民主选举的准备。

舒尔曼先生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的梦想。然而，俄国人却

采取了认真的态度。一九二三年，布尔什维克人成了孙中山的盟友。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帮助重组国民党，重新训练和装备他的军队，并支持国民革命——直至蒋介石把他们撵走为止。

“难道孙博士不该为此感到高兴吗？俄国是第一个平等对待中国的强国，”宋庆龄说。确实，俄国是第一个放弃租界和治外法权，并和中国签订‘平等条约’的国家。俄国至今还在从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投资中得到好处。

“孙博士相信，俄国人真诚希望看到中国独立，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宋庆龄说：“他至死也相信这一点。他临终前签署了一封致俄国人的电报，保证我们将永远为求得中国的最终解放而共同努力。”

“因此你认为孙中山对蒋介石采取的态度是无疑问的了？”

“毫无疑问。从共产党人开始帮助他的时候起，他就看出他们是为穷人谋福利的，而其他的人则不是。”

这是否是“客观地”总结历史的好例子呢？也许不是。但在宋庆龄看来，这是历史的本质，而且是千百万中国人愿为之献身的“真理”。我有什么资格去教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夫人用教授的眼光看待历史呢？美国人的时空观念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中国就不一定是正确的。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位著名的辩证论者惠施就曾“论证”过，时间并不是绝对的。在判断遥远国度的事情时，对历史究竟是何种“时间”，人们不可能常常那么有把握。

宋庆龄倾向共产党人和俄国，她深信孙中山要是活着，他也会这样做。但是，在接受共产党的路线方面她并不是没有保留。有一次，我批评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她忽然笑咪咪地走到

书架旁，抽出一本新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被出卖的革命》。“这里面有不少真理，”她边把书递给我边对我说：“你拿去读一读吧。”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在一次兵变中被张学良将军拘留，当了两个星期的阶下囚。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联合了起来。宋庆龄告诉我，在蒋介石被拘留期间，她的姐夫孔祥熙要她——既然斯大林已经表明了态度——签署一项声明，谴责张将军，要求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做得对，”宋庆龄告诉我她是这样对孔祥熙说的。“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显然，她对蒋介石极少表现出威斯莱卫理公会教派提倡的那种同情心。

没想到宋庆龄除了这种坚韧、独立的性格之外，还具有淘气的禀性，喜欢看到炫耀自己的人落得可笑的下场，喜欢取笑任何自命不凡、自鸣得意、妄自尊大的人。她的模仿能力极强。喜爱引述中外外交家、政客及他们的夫人们的蠢话。宽厚的孔祥熙与孔夫子同姓，他曾宣称自己是孔夫子的“嫡系后裔”，宋庆龄从此称他为圣人。倘若说她偏袒中国共产党人，那倒不是因为他们的缺点引不起她的幽默感，而是她认为他们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私人谋利的缘故。

她曾说过：“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就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而他的思想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他考虑的是整个世界。”

“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我很吃惊地问道。

她摇了摇头。然后她又说：“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

记一次被遗忘的战役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漆黑的午夜。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日本人的步枪和机枪声，我从上海北站匆匆赶到出事地点。但见一个人影停了下来，又倒了下去。稍远处，一个中国士兵跪下来，爬进一所房子的门口后就开枪还击。街上空空荡荡。铁闸象蛤蚧似的紧闭着，最后的一点灯光也消失了。枪声呼呼大作时，我挨着墙壁而行，不辨路径，脑子里只有租界和安全的大致方向。此外，我还依稀记得当年在国民自卫队里学到的临时隐蔽办法。当国民自卫队员时间短暂，但很不光采。

我拐进一条狭窄的弄堂，躺了下来，一边咒骂，一边自问，“你为什么要在—场与自己不相干的战争中找死呢？你不能活着把消息发出去了，写出来又有有什么用呢？”

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不象在报道日本占领满洲里时所目睹的那种追击和占领了。我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才从那里回来的。我象其他人一样，曾以为中国人是决不会打仗的。可现在，就在这条臭气熏天的弄堂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战斗开始了。

我不知道沪宁铁路的运输经理程宝成(译音)是否已经把旅客和全部车辆撤离遭到公开袭击的北站。我曾去那里想了解究竟出了什么事，却发现一切都照旧。我忙着找负责人，结果找

到了那位程先生。我对他说，我刚去过日本舰队司令盐泽的司令部，获悉他正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闸北。闸北位于上海中国人管理的那部分地区的中心，在苏州河和公共租界以北的工商业区。

在我们附近的车站里，依然象平时一样拥挤、嘈杂：背着沉重行李铺盖的男男女女，一篓篓新鲜水果和装着鲜鱼的竹筐，堆得高高的坛坛罐罐，嗷嗷待哺的婴儿，端着蟋蟀罐和提着鸟笼的老头。

数以百计天真的旅客正在候车，我同程争论起来了。他是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我把身份证给他看了，在这以前，他从未见过我。

“你得想法子把这些人撤离这个地方，”我说。“日本人已出动了。我亲眼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开始进军。”

他笑了，似乎在问，难道我还不知道上海市长吴铁城当天下午已经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吗？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我掏出司令官盐泽几分钟前发送给吴铁城的一份简短声明的抄件来。那是一位日本记者给我的。声明宣称，日本军队将立即占领闸北和其他中国地区，以便监督中国军队撤退，“维护法律和秩序”。

“这意味着冲突已不可避免。按他们的话说，是要‘教训抗日的十九路军一顿’。你看，是否应该让旅客撤离？”

“旅客？”程这时显然着急了。“车辆怎么办？我们最好的机车都在这儿。抢救机车是我的首要责任。但是，要是你搞错了，我可怎么办呢？”

“错不了，我告诉你。但是主意要你自己拿。”

“要是我采取了行动，到头来却是一场虚惊，那我的脑袋就得搬家，”他惊慌地说。“要是不采取行动，而你说的又是真的，那我就既失机车又丢脑袋！”

我撇下程不管，去给吴铁城打电话，打不通，线路已被切断。接着，我找到了车站的警卫团长。他对日方的计划也一无所知。当我去看依然驻守在租界内虹口边上的士兵时，我听见了钟声、汽笛声响成一片。是不是列车在开动？旅客的情况如何？但是，我此刻已沿着一条街奔逃，什么情况都不得而知了……

半小时后，我回到苏州河边，进入租界的西方人的天地。之后，我发出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第一篇目击记。一连几个星期，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有关这场战争的消息。

我发出的消息不免这样开头：“今晚，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一位慈悲为怀的编辑把导语改掉了。我发的快讯很成功。美国几家大报的编辑向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其中有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开始，在我看来，这是在那场奇怪无聊的战事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我写了一本题为《远东战线》的书，记述发生在上海和满洲里的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今天看来，那些详细的记述和对后来发生的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述一样没有意义。留下的只是对死去的人们的纪念，而他们之所以死亡，正如帕斯卡^①说的那样，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大河彼岸”。后来，我见识多了，对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战争的丑恶情景渐渐

^①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译注

习惯了，然而这些最初见到的情形却一直在我的脑际浮现。

我见到过一具被击毙不久的日本驾驶员的尸体。一名中国士兵刚刚挖走了他那颗还在冒热气的心脏（鲍威尔当时也在场，他认为被拿去烧烤了），用刺刀划开的胸膛上留下了活象一个十字架形状的伤口。我闻到过军用列车被炸后，人肉在钢板上烤糊的气味，在列车的周围，一些青年人在衣服被炸飞后，赤身裸体全身焦糊，显得比他们食不果腹活着的时候还要胖一些。我记得有些穿着蓝粗布棉袍的人象布偶一样被日本人吊起来当活靶练刺刀。侵略军以“维护法律和秩序”为借口，在市里纵火，整整烧了一个月，火光冲天，而在租界里舞会却照旧举行。

外国情报官员向本国发回消息报告重大发现说，一个中国飞行员投弹失误，没有炸中日本的旗舰，而把炸弹扔到了租界境内。它很可以炸死一千名无辜的百姓。那颗炸弹使得南京路空无一人，看上去就象是肮脏的黄浦江突然被抽干了水，或者说象毕加索在他的油画《格尔尼卡》中表现的惨绝人寰的战争综合图象。还有一回，机关枪的子弹在一道木板墙上烧穿了几个洞，离我头顶仅两英寸，从一处倒塌的房子里传出了女孩的尖叫声，我赶快过去把她从一条浸透鲜血的床单上抱了起来，我感觉她异样地轻，才发现她的双腿已断。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弗洛伊德·吉本斯来了以后，就在卡西旅馆住下，在货色齐全的酒吧间里报道这场战争。吉本斯对女孩子被炸断腿的这种情景已司空见惯，而我当时初出茅庐，少见多怪。

就这样，经历了战争，使我对战争产生了厌恶感，但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对这些问题，除非再经历新的战争，不然是很难找到答案的。

如果说前个时期的战斗和战斗中的死者一样，已复归死寂，政治争端是否肯定还会存在呢？是的。那末，都是哪些争端呢？日本对其作战目的的看法，英勇的十九路军为什么样的目标而捐躯以及西方列强又有什么想法等等，都是一些各不相同的概念。战争的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战争不仅没有使其发动者达到目的，而且还会给今后尚难逆料的战争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说战争是“通过实例进行的哲学教育”，麻烦的是这种方法往往要求有越来越大的“实例”。每一场战争都孕育着另一场战争。

这倒不是说战争改变不了任何情况。它使一切事物都发生变化，但决不按照侵略者的意图来改变事物，而总是同他们的意愿背道而驰。

让我们来看看满洲里——上海“战争”的“实例”吧，人们常常称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开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靠近日本军驻地的南满铁路上据称有几英尺铁轨被炸裂。事隔不久，一列快车安全地通过那里。但“这一事件”却成了日本人进行惩罚性行动的借口。结果日本人侵占了中国最富饶的地区满洲里。但是，“沈阳事件”与其说是开端，倒不如说是先前六次战事及其“意想不到”的结果和“争端”的最终产物。

当日本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工业国时，靠轻易扩张以解决国内的棘手问题的途径已经闭塞。印度、缅甸、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菲律宾依然为白人统治者所控制。除美国之外他们毫无让步的迹象，除非用武力才能把他们除掉。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如苏门答腊、西利伯斯^①和婆罗洲^②则荒唐地成了远方小国荷兰

① 西利伯斯(Celebes)，即苏拉威西岛，印尼中部岛屿。——译注

② 即加里曼丹——译注

的世袭领地。荷兰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而整个澳大拉西亚^①已被英国人攫夺。东方国家的移民是受排斥的。

到了一九三一年，日本已强大到足以向所有殖民国家挑战，但其执政者认识到，完全霸占中国是必要的第一步。他们看准了西方各国不讲道义，意见很分歧。他们还看清了法国和英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甚至对帝国主义统治范内部任何对手的害怕。他们小心翼翼地利用了西方国家的幻想，即：日本入侵中国大陆旨在包围俄国，并展开一场圣战，而不是要结束欧洲殖民主义。

要不是有美国，日本早就可以在东亚为所欲为了。多年以来，她一直在观望，美国最终会作出何种抉择：西欧国家在中国称霸，美国可以放弃它在这一格局中的份额，让殖民国家自行设法离开亚洲；或者，接受霸主的角色，公然支持殖民主义；再不然就是，把日本当作帝国主义的最有希望的牵头人和对抗“俄国威胁”的力量，加以安抚和支持。日本侵占满洲里是对美国的一次严重考验。这样一来，美国要么拿出行动来维护西太平洋的未来，要么免开尊口。

蒋介石也在那里观望。正如约翰·费尔班克教授^②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过去，我们“一方面尽情地谴责英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分享她的好处”。现在，我们原则上不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美国犹豫不决，不仅当时拿不定主意，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都是如此。一九三一年，美

^①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n)，大致相当现在大洋洲范围。——译注

^② 费尔班克即费正清教授——译注

国对日本只是劝导一番，并没有采取行动，蒋介石也同样无所作为。奉行不抵抗和“依靠国联”的政策。东北长官张学良将军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长城脚下撤退了大批军队，没打一仗，富饶的东北就沦陷了。国联也没采取任何行动。从那以后，国联盟约和凯洛格—布赖恩森公约就无人置理了。西方新崛起的侵略国家意大利和德国，从东方的事态发展中得到了启发。

中国和中国人民并不完全俯首听命，任饿鹰悠闲自在地把他们当腐肉来啄食。尽管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自发的抗日团体和民众的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对日本的贸易带来不利的影响。东京方面于是要求蒋介石镇压所有此类行动，尤其是上海的抵制行动，因为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蒋介石表示同意。日本接着又坚持说，上海附近的十九路军过于反日，要求把他们撤走，以实现上海周围广大地区“非军事化”。蒋介石再次屈服。然而，日本人并不满足于轻易得来的胜利，旋即挑起了上海之战，它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产生的影响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日本舰队司令盐泽说：“中国人只认得武力。”他认为，要打掉中国的“抗日态度”，出动几千名水兵就够了，用不着陆军的帮助。此时，日本陆军由于已在东北得手而目空一切。海军此刻正得到更多的军舰和兵员的补充，可以同西方决一雌雄了。盐泽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唯独没估量到十九路军的态度。有谁会料想到，在日军的进攻下，甚至在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已从南京逃到洛阳之后，十九路军勇敢而自豪的军官们也没有退却呢？

十九路军是长江下游最出色的军队，一支“新军”，它是国民革命的产物。它的将领曾追随蒋介石反对过共产党，但是，他

们有自己的左派民族主义、政治信仰和信念。对蒋介石在日本最后通牒下投降，官兵们无不感到愤慨，但是他们都是些好军人，他们服从命令撤退了。然而，当日本人发动进攻时，他们便奋起自卫。一、两天内，全国各地纷纷向他们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声势空前。数以千计的青年纷纷志愿参战。在这个大都市的街头巷尾，都进行了战斗。经过三十四天的作战，十九路军约四万五千名士兵，牺牲过半，方告撤退。日方出动了大部分舰只、数十架海军轰炸机和六万五千名士兵，还从上海两侧进行了大规模的夹击。

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次战斗主要靠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始终没有参战。实际上，十九路军的残余部队南下福建之后，遭到蒋介石的暗算。蒋把他们围困在福建，不给补充人员和给养，并伺机打击这支军队。指挥员们忿忿不平。数日之后，他们起来造反了，另建一个“经过改组的”“革命的”国民党。他们甚至想同在江西省已正式向日本公开宣战的中国红军建立抗日同盟。

但是，共产党犯了错误，蒋介石因而得救。共产党内发生了教条的争论，在能否信任这样的同盟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而失掉了宝贵的时间。蒋介石迅速调集了他从未投入上海之战的精锐部队，向十九路军发起突然袭击。十九路军还来不及重新武装，恢复元气并和红军联合起来，就被蒋介石的进攻击溃了。蒋介石于是得以用全副精力来镇压红军，他此时把红军看作“最凶恶的头号敌人”。

然而，上海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的

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够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一“发现”振奋了人们正在消失的斗志，最终造成了一种政治气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他的“最凶恶的头号敌人”妥协，共同抗日。主要是这一事实，而不是这场战斗的表面结果，将使亚洲的历史发生决定性的改变。

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我不时想起上海北站的那位程先生，不知他此刻的情况如何。有一天，我的朋友——美国驻上海领事罗伯特·沃德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一位中国熟人想请我吃饭——答谢我“给他的帮助”。我感到奇怪，就去了沃德的住处。在那里，我见到了程先生。他对我说，那天夜里，他照我的话办了，抢救了价值数百万元的机车。旅客的情况又如何呢？是的，在车站遭到炮轰起火前，他把他们大部分疏散了。程先生因“在战斗中异常主动采取应急措施”而得到擢升，还得到一笔奖金和一枚勋章。

尼 姆

肖伯纳说过“凡是自传都是谎话。”然而，他毕竟还是写了《自述》。他说：“谁也不会糟糕到竟想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讲出来，因为，这必然要涉及他本人的家庭、朋友和同僚的真实情况。在涉及配偶的情况时，这一告诫特别有用，而在涉及前妻的情况时，就更是恰当不过了。

如果说我不能把我本人和尼姆·韦尔斯的实际情况原原本

本的讲出来，那是因为我和肖伯纳同样感到“还有一层更大的困难，即我连对自己都不甚了解”，那么，我至少应该谈谈我跟这位很不寻常的女人共同生活的一些情况。在我此后在亚洲生活的八年间，她是我忠诚的合作者，伴侣和评论者。她常常给我带来苦恼，却又常常激励我。她始终精力旺盛而且富于创造性。

麻烦的是，她不愿意结婚。至少在我们初次相见时，她是这样说的。当时并不是因为我提起了这个话题，其实她也只是泛泛地提醒而已。一个到处漂泊的人，当然应该明白独自行动走得最快。我那时二十六岁，依然是照这种理论行事，即，如果你明确自己是那种“求爱急切，结婚不忙”的人，那么对方可就要对你防范了。象我这样涉世未久的年轻人，我还不知道，一个女人在她认为合适的时间，地点才来找你，而且她要创造她自己的条件。

她的真实姓名是海伦·福斯特，她是美国犹他州一位律师的女儿，但不是摩门教徒^①。在家时，她曾研究过中国，直至有一天她下了决心，象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出来当“亚洲的女皇”。此刻，她暂时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做事。

“先有皇帝才有女皇”，我说。“还得问问你为什么不结婚？”

“女皇么，”她笑了，“我只不过说说而已”。

不过，我注意到，当她周围的人有谁想要提起这个话题时，她就不理睬他，那神情就象是个女皇。总而言之，在这个城市

^① 犹他州百分之七十以上人信奉摩门教——译注

里，她就象是个希腊女神，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可爱。她二十二岁，身材健美，有一双灵动俏媚的蓝眼睛，是在静安寺路上漂流的一位既美丽又聪明的女性。说漂流也不确切；她比我更有心计。由于博览群书，激发了她的好奇和幻想，使她产生了浓厚的求知欲。她说，她殷切希望成为一个作家，但又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我问她。“谁都可以写一点东西。你看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笔名。”

“我们马上来取一个，”我说。我们真的为她取了一个笔名。前一节取自莎士比亚的剧本——尼姆——后一节取自她父母的故园。她在第一本著作上署了尼姆·韦尔斯这一笔名。此后，她一直使用这个笔名。

“你愿意去苏州看看吗？”在我们相识不久后，我建议说。

“要是庄重邀请的话，我愿意去，”她表示同意地说。

我们第一次去邻近的古城的旅行是十分规矩的，后来我们又到过上海周围的一些有悠久历史的城市。那年夏天和秋天，我们去了扬州、杭州、无锡等地方。我们欢欢喜喜地在绿柳荫下或宁静的庙宇里用餐；我们在稻田的田埂上，在丝绸之乡的桑林中和河岸上悠悠闲闲地散步；我们乘龙舟驶过湛蓝的湖面，在月光下，划着舳板从大运河的拱桥下穿过。一天下来，玩得累了，我们就在附近中国人的旅店里过夜；这些城市里都有挺不错的旅店。

“在杭州的大街上，一个负重的苦力，向尼姆翘起褐色的大拇指，咧嘴笑着说：“太太真好看！”我们也向他挥挥手，觉得

怪有意思，因为她还不是象这位好心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我“美丽的太太”。我们是恋人，但由于她坚持她那古怪的想法，我们依然只是柏拉图式的恋人^①。

在许多地方，我们谈到了抽象的大问题，如什么是真理，理性和理智的分界在哪里，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觉，苏格拉底和康德，马克思和辩证唯物主义及形而上学，我的“经验”和她的“纯理念”。

要不是尼姆发现了维克托·弗伦博士，并把 他 介绍给我，我真不知道这种耐性的争论要持续多长时间，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德国教授。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后十年间，他在山西的一所私立学校当校长，那是“模范长官”阎锡山为出类拔萃的中国学生办的。他身材魁梧，不修边幅，有点秃顶，穿着中国布鞋，走路的姿势有点奇特。弗伦是个天才，汉学知识极其渊博，在牛津大学当教授绰绰有余。据说他不屑去那里当教授，不肯受聘。他是半个和尚，半个弥赛亚^②。他著述和宣扬一种“新教育”，主张把西方人的感官能力和“中国人的智力”结合起来。西方人由于接受了圣经犹太书规劝人不要造孽的教义而充满了活力，而据弗伦说，中国人，则因纵欲过度，感官能力衰退了。他希望通过这种东西方的结合，可以造就世间“最高尚的人”，一心一意致力于使人类的聪明才智日臻完善，以美好的事物战胜兽性，置精神于物质之上的人。

“不，这种人不是超人，”他坚持说。“只是普通的人，而且

① 柏拉图式恋爱 (Platonic-love) 是 精神恋爱的意思——译注

② 弥赛亚 (Messiah) 是“救世主”的意思。——译注

眼下还只是一种设想而已。”

“中国错在哪里？”尼姆刚刚介绍我们相识，弗伦博士就问我。“为什么中国人什么都会发明，却发展不了任何东西？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停滞不前了？中国的创造力哪里去了？”

“也许中国的衰退是缺乏竞争所致，”我提出了一种没有什么说服力的看法。

“废话！”他温和地嚷了起来。“中国是通过压制个人而取得稳定的。社会存在下来了，而富于创造性的个性却丧失了。一方面是道教的无为和宿命论，另一方面是可恶的儒教：崇拜祖先，重视生儿传宗接代，膜拜阴茎！一方面思想被经典所禁锢，另一方面感官能力却因房事过早和过于频繁而耗尽了。脑子完全象机械，但依然是一块空白，因为应该为脑子服务并激发其思考的感官能力已经僵死！”

自然，弗伦本人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他一心要物色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师来帮助他贯彻他的主张。显然，他认为尼姆是他理想的助手。他说，她是“感官能力完好无损的天才”，他决心挽救她，要她不恋栈床第和与我疏远。他心里已为她安排好了肖伯纳式的婚姻，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性欲不占有位置”，只是促进工作的次要因素。

我与他初次见面之后就对尼姆说：“这是卑鄙的伎俩！”

“你这是什么意思？”

“搞出个弗伦式的人，是一种巫术。就是这么回事！我想你不致让他再来见我们。”

但是，她又让他来了。一连几个星期，我们三个人各执一端进行了各方面的争论。回想起来，那时讨论的细节听起来象

是超脱尘世的，然而当时我们的态度都是异常认真的。埃默森^①说：“我们必须把男人和女人当作是真人一样来对待，也许他们确是真的。”爱情当然充满了各种感觉，就是没有幽默感。开初，特别是当弗伦有一次慨然邀我入伙时，我自己也对他的博学十分钦佩。我无意去当和尚，但我不禁注意到，尼姆要是真想做尼姑，我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奉献她的。她的求知欲很旺盛，近乎贪得无厌，而眼前就有个现成的一人“学会”，可以无止境地满足她的欲望。我又凭什么去阻拦她呢？

然而，由于不断受到挑战，我被迫要对弗伦的理论——尤其是他关于性和感官能力的奇谈怪论予以反驳。他有一套独特的探讨问题的方式，是我遇到过的最顽固、最狡猾的对手，也许是唯一能在危险的婚姻见解上引起我的利他主义冲动的人。

争论中，我的这位靡菲斯特^②引用了培根的话说，“‘凡有家室之累者，均得听天由命；因为妻子儿女乃是大事业的障碍。’你看，培根只是从性的关系来看婚姻，”弗伦生怕我疏忽了这一点，还添上这一句话。

“那对巴赫^③有二十个子女又该怎么解释呢？”我对如此混乱的思想感到吃惊，但决意要驳倒弗伦。

“不错，”他反驳说，“可是，你知道是谁糟蹋了巴赫的大部分伟大作品？正是他的那些儿子。”

① 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译注

② 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欧洲中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中的魔鬼。——译注

③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德国作曲家。——译注

“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祖先亚当，我们能有巴赫，或培根吗？”

我花了几个小时，援引了从亚力山大、切列尼到普希金等明显的例子。我引证说，甘地直到他养了一大群子女之后，才说要奉行独身主义，实在奇怪。由于弗伦是个新行为主义者，于是我便一口气举出了弗洛伊德、赫胥黎、罗素、多尔塞及罗宾逊等当时一些名人的例子来，指望在他熟悉的领域里把他难倒。

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没有人确切知道内分泌腺和自主神经系统是怎样在大脑皮层中最终形成创造性的思想或想象力的过程中起作用的。而且谁也不能证明有节制的性生活比任何肌肉活动更有害于大脑。更没有人能证实，对性行为强加抑制曾有助于画出伟大的作品，或发明显微镜。

这是一次奇怪的求婚，感情和理智全混淆在一起。最后，城堡没有被科学的论证所攻克——何曾有过这种情况呢？——而是被不可战胜的生活情趣所攻破。因为没有哪一个聪明的姑娘能象她那样机灵地让对手在辩论中取胜，但使他的心向自古延续下来的男人和女人对有机的而合法的结合那种迫切要求低头。

在一个迷人的日子里，我发现紧闭的大门突然打开了，我们于是决定永结同心。我最先向宋庆龄等朋友报喜。宋庆龄为我们举办了豪华的广东式宴会，并赠给我们一把美国造的银质电咖啡渗透壶，由于电压不同的原因，我们在中国怎么也用不上。

我和尼姆避开弗伦博士，跑到东京去，圣诞节在那里结了婚。我们先后举行了三次仪式，手续办得再完备不过了。第一

次，我在上海时，房友约翰·阿里逊给我找了一位牧师；在美国使馆我们又举行了一次仪式；最后，又在日本的结婚登记处办了手续——这全都是人类自由合法好心的监护者。

至于弗伦博士，我们结婚后，我就再也没听到尼姆提起他了。

南 洋

我的上司霍勒斯·埃泼斯委托我去日本采访一些人士，但是我忘记告诉他，一位新同事和我还计划从日本经南洋——苏禄、西里伯斯、爪哇和弗洛雷斯——去巴厘，然后取道新加坡回来，为时两个月。我给埃泼斯先生寄了一份计划书，我说在那条富有魅力而通常被认为毫无新闻价值的路线上，大量的新闻素材有待挖掘。我仅在附言中写道：“附待说一下，我将于圣诞节结婚。”在报联社开办期间，我始终没有离开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埃泼斯富有特点的答复。他立即给我复电：“同意此行，好极了。顺祝蜜月愉快！”

没有哪个编辑会比他更通情理。

我们搭日本大阪商船公司的轮船旅行。这家公司有一队货轮在这些偏僻的地点行驶。我们搭乘的第一艘是“加拿大丸”。船上的客舱少极了，我们被安排在大副的房间里，显然“加拿大丸”完全可以不要大副。这样，船长的甲板有一半就供我们使用了。我们在岁末航行，季节好，气候也好。过了福摩萨（台湾），天气温和宜人。海面银光粼粼，落日余晖五颜六色，相映成趣。入夜，海豚腾跃，在我们四周的海面上划出一道白色的

波纹。仰望天空，南十字座愈升愈高。

“要是人人都是天文学家，”尼姆望着移近的群星说，“就不会发生战争了。”

“韦尔斯先生把你培养成了哲学家，”我说。我们轮流把他的《世界史纲》读给对方听。在回到中国以前，我们还读了詹姆斯·哈维·罗宾逊著的《我们的举止为什么象人》。上述这些书，以及韦尔斯的《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和肖伯纳《聪明妇人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指南》有助于尼姆在哲学上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我们一路上的见闻还坚定了她的反殖民感情，当时大多数美国青年都认为这种感情是他们的天赋遗产。

由于我们是每天和日本旅客在一起吃饭和交谈的仅有的两个白种人，我们还有别的感触。作为一等的亚洲人，他们认为可以跟我们平起平坐——他们不是已在满洲把我们唬住了吗？——日本人认为亚洲最富饶但人口稀少的地区“分配不妥”，而且白人主子们对这部分地区不是使用不当便是不加利用，对此，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蔑视。船长不断彬彬有理地提醒我们，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福摩萨进步、繁荣，相比之下，广大的南洋地区，尽管蕴藏丰富，却是一片空白。我们觉察到，他对美国文明没有使南面的菲律宾群岛普通居民的原始经济水平得到什么提高而感到不满。那里的工农业有很大的潜力但尚未被挖掘，而勤劳的日本人只能在菲律宾北面的弹丸之地胼手胝足求生。

如果说菲律宾可以养活比现有人口多四倍的人，那末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就能维持百倍于现有人口的生计。这些岛屿，虽然面积相当于二十个荷兰，除滨海和森林边缘地区外，依然处

于原始状态，居民落后，资源几乎未经开采，与美洲的印第安人居留地一样，被数千外国兵所把持。

直到不久以前，北婆罗洲的部分土地连同它所有的达雅克居民，仍由一家英国公司所管辖，并被公然宣布为其所有。这家公司光是掠取椰子、木材和橡胶等天然物产，每年都给遥远的伦敦股东们带去巨额的利润。婆罗洲的大部分土地仍然被锁在荷兰人的保险箱中，地面和地下的丰富物产均处于荒芜状态。与此同时，领主们却在一旁悠闲地坐待当地的劳工缓慢且浪费甚大地为在外国吃股息的人们进行所谓的“资本形成”。这些人对他们的利润是怎样来的不甚了然。

有一次，我在一所平房里和一个英国橄榄球迷聊天。室内墙上挂着他在英国公学时代的几张照片。他是驻北婆罗洲斗湖的副驻扎官。“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我对他说，“亚洲其它地方比这个岛的发展速度要快一些。这里在经济上是个真空地带，这个状态持久不了。要不了多久，日本人、中国人或是爪哇人就会来这儿，把你们挤跑。”

“信不信由你！”他回答说。“我们一走，这里就会重新成为猩猩的天下。东方还远远不能掌握我们的文化——他们落后一百年。”十年后，我从英国驻印度的倒数第二任总督的嘴里听到了完全相同的话。

这位年轻官员一面呷着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一面笑嘻嘻地说，“他们和我们相去甚远，更接近于猿猴。你知道‘奥朗乌当’^①是什么意思吗？在马来语里，“奥朗乌当”的意思是‘林中人’。有

^① “奥朗乌当”是马来语“Orang-utan”的音译，意思是猩猩。
——译注

一天，我问帮我们干活的聪明的马来人，他是否真的认为这种猿猴也是人。回答说是的，他们是我们的表亲。‘你们的表亲，不是我们的表亲，伙计’，我说。‘如果他们是人，为什么不会说话？’‘噢，林中人是能讲话的，先生’，他回答我说。‘那他们为什么不讲呢？’我问道。他说：‘他们很机灵，故意不讲，因为他们一开口就得付人头税了’。”

倘若将各帝国主义作一番比较研究，报告一下爪哇人在三十年代的生活水平多么低，处境多么悲惨是有点意思的。当时荷兰人有一种优越感，自诩他们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殖民管理者。”但是，我只想顺便说一句，即使在爪哇，荷兰的“现代化”充其量只是破坏了旧封建主义的组织，打破了旧的生产制和自给自足的状态而已。它只是在佃农、当地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激起不可避免的反抗。

荷兰人比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节俭的当家人，他们从他们的海盗在初期的殖民赌博中下的小小的赌注中，获得了更多的红利。但是，对当地百姓来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荷兰人也爱说：“这些人哪，都是孩子。我们在这里实行治理得处处为他们的利益着想”。然而，通过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滨海地区的短暂的旅行以及在爪哇时间的稍长的逗留，我就已经了解到，这些“孩子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不是预言家也可以预见到，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把荷兰人赶走，而日本人不久就要在无意之中为他们创造这一机会了。

但是，巴厘岛的情况却不同。

出于几种原因，其中包括巴厘人自尊和独立不羁的性格、十分赚钱的旅游业和对巴厘出口的垄断，荷兰人把剥削和对地方

所有权、法律、习俗和农业经济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外来者一律不得购买土地，外国投资微乎其微。巴厘依然完全依靠农牧业，只有商业集中的布勒伦是例外。旧的社会衰落了，新的社会尚未形成，白人借机图利，但矛盾并不明显。荷兰人在这里实行的殖民统治比在印度尼西亚其它地方温和和狡猾。在这种统治下，这个同族社会的古老文化就成了殖民世界的一个畸形儿。

在整个东方世界中唯有这里有几分象佛教黄金时代的“好社会”。这在实际上也许和欧洲中世纪传说的“好社会”一样是难于实现的。

勿吃邻居

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巴厘岛南部的登巴萨我一大早就醒来了。我发现床头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在轻轻地拽我的大脚趾。

“先生，太太，请用茶，”他细声地说，一边把茶盘放在床头桌上。

他鼻子上穿着一只大金环，头发盘在漂亮的脑袋上，上身赤裸，腰间系一条黄色纱笼，光脚丫子。他来自新几内亚开化较晚的巴布亚族。

“谢谢，马蒂。几点钟了”？

“七点钟了。请别忘了您今天要和卡森上尉一起去看土风舞呢？”

“你真是了不起，马蒂。你是不是得把每个人都叫醒，然后

提醒他们当天要做的事情？”

“都得这样”。

“你用几种语言跟他们说话？”

“噢，我爪哇方言、巴厘方言和德语都讲的很好。法语会一些，英语只会几句。不过，要把他们叫醒，扯扯大脚趾就行了，用不着讲话。”他咧嘴笑了笑，露出了一排坚实洁白的牙齿，鞠了一躬就放轻脚步走出房间。

我说：“我不知道在英语里吃人一词说起来是否也和巴布亚话一样顺口。”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是这样，”尼姆答道。“就我所知，英语实质上也不是一种吃素者的语言。”

要不是我遇见了马蒂，后来又在吕宋岛北部遇见一位叫克拉普医生的伊哥洛人（他父亲是个割取敌人人头作为战利品的人），这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克拉普小时候曾和婆罗洲的野人一起在圣路易斯市的国际市场上被展览过。在那里，一位传教士救了他，给他取了名字让他受了教育。克拉普成了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回到家乡开办了一家医院。

据卡森上尉说，马蒂吃过人肉，但自己从未为吃人肉而杀过人。他没有这种机会。卡森是他的德国主人。他是在新几内亚的丛林中捡到这个孩子的。马蒂的父亲吃了许多人，最后自己也被仇人杀死煮熟吃了。后来卡森就收养了他。现在，马蒂成了卡森在登巴萨开设的萨特利雅包伙小公寓的管理员。马蒂的妻子，一个迷人的爪哇女人，是他的助手。一到夜晚，他穿上白色上衣和白裤子，就成了领班。尽管他老是光着那双又大又黑的八字脚，却显得神气十足。

这个温和的巴布亚人和克拉普医生给我提供了形象的例证，说明文明与不文明之间不仅只有一层皮之差，而且也可以说只有一代之隔。这并不是说，遗传就不起作用了；但是，显然凡是人会的东西，一个原始的儿童都可以学会。要是抓得及时，人们也可以把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儿子变成一个吃人者。

巴厘人很敬重马蒂。有一天，卡拉姆亲王来拜访他，他们坐在厨房里吃点心。卡森介绍我们相识。他告诉我卡拉姆是唯一幸存的巴厘王族成员。王族的其他人全都在一九一一年荷兰人占领这个岛的时候，从容不迫地迎着荷兰人的枪火集体自杀了。卡拉姆和马蒂平等相待，无拘无束，很典型地说明巴厘的种姓等级和印度的种姓等级大不相同。

巴厘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个经过规划的社会，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能使人民感到真正幸福的殖民地。这里几乎象是个完美的公社国家，因为这里的文明是建立在一种人人都懂并能接受的宗教—哲学思想综合体基础之上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集体行动紧密相联，而且常常是有条不紊的，因为个人的行为通常都要服从共同的利益，有利于和谐与团结。

巴厘就象是一个大合作社。集体协作使各项劳动都变得轻松了，紧张的关系、挫折和冲突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从白天到深夜，卡美兰^①银玲般的乐声不绝于耳，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绿色的山坡和峡谷一直延伸到银色的沙滩和富饶的碧海。在这个比罗得岛的面积大一倍的伊甸乐园中，一百万混血种的

^① “卡美兰”(Gamelon)是印尼的传统乐器，由铜制的各种打击乐组成，盛行于爪哇和巴厘。——译注

人民将生活变成了一种艺术。

在巴厘，我认识到人们不论是共同工作，或相互掠夺，都是“自然”的。而在一九三三年，要认识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赫伯特·斯宾塞^①的理论是错误的。

巴厘并非是象在白人的鸦片、机器和梅毒的进攻下而崩溃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原始田园式社会。它是一个高度发展和复杂的机体，由于受地理环境的保护，有足够的时间，一代接一代地进化并自我改进。佛教传入才一千年，后来又传入了印度教。两种宗教都是和平地渗入的，而且被历史悠久得多的巴厘文化同化了。巴厘文化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它独特的人情世故。一神论和二百一十天历书等基本观念被作为他们文化的精髓保留下来了。居民凡是遇到重大事件都要参照这种历书的规定行事。

我们所到过的各村子里，并没有实行强制性维持“秩序”的制度，却都秩序井然。即使在那里只逗留了一天的游客也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没有激烈的争吵，人们谦恭有礼，赤身裸体儿童可爱、庄重、愉快，房屋十分整齐，里面居住的人整洁俊美，还有那里的猪猡也干净的难以令人相信，我在别处还没有见到过这样干净的猪。

巴厘的佛教—印度教将社会分成四个种姓，但是，与印度不同，这里没有种姓的社会歧视和隔绝。这里的种姓区分是为了在组织和分工时的方便，有点象中世纪欧洲的行会。

^①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宣称知识是相对的，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译注

巴厘没有不可接触者，没有贱民，没有乞讨的“圣人”，也没有无种姓者。不象在印度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种姓之间通婚十分普遍，多数行业人人向大众开门，男女都可以当祭司或长老。虽然由和尚掌管迷人的庙宇，但在宗教仪式和世俗事务之间是有明显的界限的。每个村庄都设有长老会，负责安排经济事务，决定农民土地的使用期限，负责安排艺人和乐师们的训练和演出以及乐器的购置和保管等等。

我们在巴厘逗留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但是，在卡森等朋友的协助下，我们还是看到了巴厘人的“历书”的作用。参照历书安排播种、收获、建筑、节日、祭祀、舞蹈、戏剧和音乐的演出、婚姻、庆典和火葬等等，做起来既顺利又省事。火葬被看作是人人都必须经历的一次愉快和极其漫长的旅行。佛教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永远象车轮运转一样生死循环变化，而这一切就是这种轮回的一部分。

“在巴厘，你根本看不到有人打孩子，”卡森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打孩子也许就是等于打你的祖父，因为你无法知道某个灵魂已经循环转化到了哪个阶段。”

巴厘的教育既富于哲理又切合实际，没有神秘的色彩。从幼年起，人们就受到明确的社会职责的教育。孩子们一学会讲话，他们就被象成年人一样地对待，很快就学会令人赞叹地担负起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这里五、六岁的小孩就已经是个忙人了，”卡森说。“只要深入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每个孩子都从事一种对本村有用的职业，几年之后，他就学会画画，或雕刻，或演奏卡美兰，再不然就当农民。重要的是，村庄是个整体，在那里人人都有一

个位置，各得其所，而个人只是第二位的。”

我们看到，年仅三、四岁的女孩子就已经开始接受复杂的巴厘舞蹈动作的训练。她们逐渐掌握令人难以置信的节奏感和控制能力，娴熟地运用全身的每一部分来表现协调与和谐的基本观念。所有巴厘艺术都讲求这些观念。只有处女可以在祭祀仪式上跳舞，但在其它场合，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每年都在规定的日子举办村际舞蹈表演或演奏会。

巴厘人对性的态度与亚洲其它地区人不同，与西方更是迥然不同。严禁男女乱交。在以前，通奸是要被处死的，但是荷兰人废止了这种做法，同时废止了寡妇殉夫的风俗。巴厘没有童婚的习俗。女子早熟，通常是在十五、六岁经求婚或自由恋爱后出嫁，但多数须经全村人的认可。自青春期开始，姑娘们便分开睡觉，并受一位长者监护，直至结婚时为止。

日常劳作中，巴厘妇女和姑娘们都裸露着上身，每天要在寺院、林间水池或洞穴中洗一次澡。在登巴萨附近的库塔海滨，有三英里珊瑚色的沙滩，是热带最美丽的地方。在那里，男男女女满不在乎地解下纱笼，赤条条地走进海水中。在这样的地方，无需对孩子们保守“性的秘密”。孩子们很早就有了这方面的知识，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不感到害羞。在亚洲落后的社会和印度部分地区，妇女行经或怀孕被认为不干净，因此要对她们实行隔离，但是在巴厘不这样做。男孩和女孩们会望着母亲渐渐隆起的腹部，计算小弟弟或小妹妹出世的日子，就好象他们也会按照历书计算他们自己重新投胎的日子一样。

巴厘人个子不高，但是长得秀美匀称。妇女们若无其事地袒露着大小不同、形状各异和肤色深浅不一的乳房——从处女隆

起的玫瑰色胸脯，到年轻母亲性感的褐色乳头和老妇人的象布袋一样干瘪的乳房，人们初来乍到看到这种情景不免感到奇怪，但过后，发觉风俗如此，随处可见，即便是外乡人也不会感到这是色情的刺激了。

“有一回，荷兰人派来了一位新总督”，卡森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个故作正经的女人。她见了裸露的乳房，大为震惊，要求她的丈夫立即禁止。他为了讨好妻子，下令妇女不得袒胸露乳。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当他俩驱车去教堂时，数百名巴厘妇女在路旁列队恭候。每到一个村庄，当马车驶近时，那些妇女就把纱笼撩起来，盖在头顶上，这样一来，虽然遮住了乳房，却露出了光屁股。”

我听完会意地笑了。

“是啊，她们可真是富于幽默感。她们借此开了一个大玩笑。总督成了笑柄，荷兰人只得把他撤换了。他们再也没有执行过这位总督的命令。”

巴厘的儿童无论是在工作或玩耍时，都是很风趣的。他们到了十一、二岁往往就成了出色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和大人的作品一起展出，受到称赞。在我们看来，似乎人人都是音乐家。一天工作之余，农民和工匠们就在村中聚集一堂，轮流击鼓或演奏卡美兰，直到深夜，他们一面继续演奏古老的曲调，一面不断创作新乐曲。

“我注意到人人都在干活，谁也不想压倒他人，”有一天，我们驱车外出时，卡森对我说。“大家都不慌不忙。现在除了这里任何别的地方我都待不惯了。”他很会享清福，事事都交马蒂去办。

在田间，常常可以看到姑娘们给男劳力送水果和椰子汁，男人们总是可以撂下手里的活儿在树荫底下歇一会儿，吃些点心，或悠然自得地抽会烟。虽然没有监督，谁也不偷懒，连老年人也如此。他们历书上规定的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一般性的指导。巴厘人没有守时的观念，办事从不按时。象教友派教徒一样，他们凡事都要等人人都酝酿好情绪后再开干。有一次，我们听说某个村子有一间茅屋要拆迁，于是就赶去观看。他们磨蹭了许久才动工。但是，一旦干开了，家家户户都来帮忙，活儿干得又快又好。

有一个隆重的火化仪式，日复一日地延期，叫我们等了很多日子。牌楼慢慢地增高到了四、五十英尺高，从小孩子到老年人，人人都为它尽了一份力量。当一切准备完毕时，姑娘和少妇们头顶着水果、鲜花、核桃、水酒、烤猪、米饭和其它食品走了过来。她们上身穿一件金色或银色的紧身胸衣，下体围一条长长的纱笼。在她们的周围，卡美兰乐队奏起了悲恸感人的曲子。他们用竹子、鲜花、图画和雕塑建造和装饰那座蔚为大观的大牌楼，整个花了十天的时间，如今一点着火，用不了几个小时大牌楼就化为无有了。人们唱歌跳舞，吃吃喝喝，送死者的灵魂愉快地上了路。他们建造的本意不在于永久保留它，只是为了在建造中取得乐趣。

“这么热闹一场的花费也许要比两辆梅塞德斯—奔驰汽车还要多，”卡森说，“但是它可以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大的乐趣。”

“他们有过离开他们的乐园的念头吗？”

“从来没有，”他回答说。“曾经有人怂恿一队巴厘舞蹈演员和乐师去欧洲演出，演出非常成功。但是，谁也不愿意留在那

里。他们由于十分想家，中途取消了后阶段的演出就回来了。他们迫不急待地要脱去衣服，舒服舒服。我问他们‘欧洲有什么不好’？他们回答说，‘人人老是绷着脸。’”

一个荷兰人获准在巴厘开了一家电影院。第一周里，人们争相去看电影，但谁也不去看第二次。过了不久，干脆就没有人去电影院了。老板出来调查原因，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看过洋影戏了，洋影戏还不如我们自己的好。我们自己还可以用音乐伴奏，演得更好，更愉快，而且一个子儿也不要花，为什么还要花钱去看那种蹩脚的影戏呢？”

出于同样的理由，巴厘人对洋布、洋鞋、外国制造的收音机和别的小玩意儿一概无兴趣。

难怪他们把马蒂文明化了！凡是在巴厘人中间生活久了的人，都不可能不意识到，同邻人真诚相待比把邻人吃掉更有好处。

但是，要把巴厘人输送到白人那儿去，即使是到那些居住在温暖富饶的岛上的白人那儿去，也已为时过晚。甚至让巴厘的风土人情长久保留下去也已为时过晚。如今这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已。现在只要民族的硬利益需要，风向一转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巴厘的特点消灭得一干二净。

我已经二十年没有到巴厘去了。我听说在日本占领期间，妇女终于被迫穿上了衬衣，那里开办了一些免费电影院，卖淫业也开始兴旺起来。天晓得爪哇的封建主们后来又引进了别的什么改进措施。

但是，对于能有机会了解巴厘的过去，我感到很满足，而我自己的飘泊不定的生活也从此宣告结束。

第二篇 煽 火

“我没有带燃料来，但期望
用雄辩的劲风把火煽起来。”

——约翰·多恩^①

安 家 北 京

初春，我们回到中国，到了北京。爱德华·亨特^②已去欧洲，我接替他出任报联社驻北京记者。以后的五年，我们就一直住在北京。

北京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的都市。它是一个具有将近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文明古国的中心。市内的紫禁城宽敞美丽。有几分象巴黎，而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寺庙宫殿却又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站在高大的鞑城墙上眺望，你可以看到北海四周槐树夹道的大路，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和园林，长年蔚蓝的天空倒映水面的人工湖；目光掠过油漆的牌

① 约翰·多恩(John Donne 约1572—1631)英国诗人，玄学派诗歌的主要代表。——译注

② 即洪德(1902—)，美国新闻记者，1928年来华。——译注

楼、高大的石砌城楼，一直可以望到远方苍黄的西山。象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北京旧城犹如一个庞大、但是友好和亲密的村子。人人似乎彼此都认识，愉快地在外城狭窄的胡同里穿行。那些胡同大都是未经铺砌的小巷，到了春天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水渠。胡同两侧的高墙背后，总是令人惊奇地隐藏着雅致的亭子、花园，还有瓦房住宅。北京城里住有旧王朝告老的官僚、退伍的军人，学者和在外地主，僧人和手艺人，还有说话文绉绉的人力车夫。北京是一座设计建造得很宏伟的城市，是一个艺术的宝库，堪称钟灵毓秀，文雅的所在。在这里，人们宁可耍无赖也不搞邪恶的阴谋。这里，春天生气勃勃，秋来绿树成荫，入冬白雪覆盖的树木和结冰的湖面上阳光闪耀。这里一团和气，有惬意的笑声，悠闲的生活和天伦之乐，也有贫穷和悲哀，对肮脏的环境麻木不仁。然而，这里也突发过暴力行为，勇敢的青年学生喊出了全国性的战斗口号。从戈壁沙滩不断刮来的风沙使人睁不开眼睛，城内雅致的屋顶上经常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这个饱经沧桑的京城，阅尽了风云变幻，象以往一样，它很快又要受到一次震撼。当我们到达时，已相继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热河这个长城以北的中国最后一块“自由”领土，正被强行合并到日本扶植的新帝国“满洲国”去。此举在世界其他地方开始产生反响。在罗马，有一个前社会主义者编辑，叫墨索里尼，他冷眼旁观国联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行动，于是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他不久就要去占领阿比西尼亚。而在柏林，纳粹分子已支持奥地利出生、制造假钞的人在帝国当权。他后来利用在帝国当权残害了四千万人。但是，眼前数百万德国人把荣誉和

自由拱手交给了希特勒，据说还欣喜若狂。

热河沦陷的那天，罗斯福就任总统，美国的“百日新政”开始。但是，和平和安宁很快降临北京，倏地春临大地。对在中国的外国侨民来说，美国连同它的萧条都是遥远不真实的。而对斯诺夫妇来说，四月的一个早晨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北京找到了一座房子——更恰切说，是一个家。

和上海不同，北京及其近郊全部是由中国人治理的，只有使馆区是例外，那是由围墙围着的六个街口，外国外交官就住在这里。使馆的少数警卫就在前面的斜坡上操练，或举行足球和板球比赛。碰上好天气，他们就打马球。附近有三、四家俄国餐馆和六家西方人开的旅馆，只有这些地方才有“外国式”的夜生活。其中一家北京饭店的房间光线充足、宽敞，供应各式法国菜。不过这家饭店最出色之处还是它的屋顶花园，从那里可以同时看到紫禁城和使馆区，这是颇有点戏剧性的。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但是我们为终于能搬出这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和多数北京的外国侨民一样，都喜欢住中国式的房子。

北京的住宅，四周都有一堵抹上了一层灰泥的院墙，院墙一般是七英尺或更高一点，用以挡风沙和视线，院墙内，房子环绕一个小庭院，或者是由“垂花门”隔开的数个庭院，“垂花门”上开有月亮门儿或其他形状更奇异的门儿。在北京期间，我们搬过好几个地方。第一次住的房子虽小却是新的。红漆大门，外院有一个圆月形的门洞，门后是一道屏门，上面画着威风凛凛的一条龙，用以避邪，据说恶鬼只能走直线。屏门后门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园子，栽着各种花卉和果树。我搬去住时，园子里开满了花，累累果实挂满枝头。

北京人是按间数或天花板上漆梁的数目计算住房面积。横梁的间隔通常是十英尺左右。你可以在街上听到人力车夫嘲讽地喊到：“王百间来了，他妈的！”接着，就可以看到一辆人力车拉着一个穿缎袍的神气十足的商人过来了。我被称作“施乐二十梁”，“施乐”意即布施幸福，是我的名字斯诺的谐音。因为“斯诺”按字面译成中文是“雪”，“雪”一般用于女人的名字，妓女尤其喜欢用这个字眼，男人的名字是不用“雪”这个字眼的。

我们的“二十间”的房子包括厨房、餐室、卧室、浴室、起居室、会客屋、办公室和书房——全都是纸糊的窗户，砖铺的地面。另外还有一排厢房，其中包括三间下房和一个浴室。月租为中国钱六十元，当时约合五十元美金。不知我在前面说过没有，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习惯于过银行行长一样的生活。雇请厨师、杂役和车伕各一名又花去我们十五元。我们的佣人相对来说是“富裕”的。我的车伕拥有两间房子，两个老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老家。外国人付给佣人的工钱要比中国人多一倍。此外，他们还得受敲榨。

北京的“西餐”厨师果然名不虚传。如果他们可以自行选择帮厨，而且在采购材料和营业中不受过于苛刻的勒索的话，他们可以做出物美价廉的饭菜，提供一等的服务。我们多数外国人都在餐馆“搭伙”，和大师付订合同，按一定标准供伙食，我们不回来吃饭可以扣回钱，有客人来就餐则另付款。每人每天平均花不了五角钱。我们雇了曾给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①

^① 即安得恩(1884—1960)，美国人，1916年首次来华，去西藏旅行。1921—1923年间又三次来华，代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往内蒙强行挖掘史前遗迹。1928年秋，他企图带走他搜集的“古物”，引起中国文化界的不满，这批古物后来在张家口被扣。美驻华外交官为此与中国政府进行了交涉。——译注

服务过的一位厨师，他确实为我们干得很出色，我们每月的伙食费极少超出六十美元。当然，酒钱另加，但是，要是能从当地的法国和意大利修道院里买到酒，价钱也是便宜的。

北京经常有拍买。新婚夫妇如果不过分讲究，只需花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足够的黑檀木或柚木的桌、椅、柜子、衣橱、床和箱子。尼姆自己设计了一套竹和藤的家具，让一位手艺娴熟的工匠帮她做好。这位工匠甚至还给一张形状古怪但很实用的书桌配上了一块画架似的玻璃板。另外还添置了北京地毯、丝窗帘、灯笼和电灯，专门定做了银器和瓷器，我们家室内的陈设就齐备了。总共花了一千美元多一点。

就这样，我们在作好准备踏入北京那故作庄严的独特的中外“社交界”时，已几乎破产了。成家之后，第一桩要紧的事就是要准备足够数量的名帖。夫妇需要有各自的名帖，还要有印着某某先生暨夫人字样的名帖。在北京的外国居民中间，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旧习俗至今还象宗教一样保留着，人人都得遵守。

新来户必须亲自登门拜访他们想结识的人，并给他们留下名帖，尽管有些人他们也许已经见过面。先生给先生留名帖，太太给太太留。另外来访者还要给主人夫妇留一张“某某先生暨夫人”的名帖。倘若发现哪一家没人，切不可忘记按格式把三张帖子摺好。好心的老居民常提醒没有什么身份的年轻人千万不要搞错摺叠的格式，也不要弄错投帖的次序。如果一位主妇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交圈中的第五号人物，那么当她发觉新邻居先去拜访第七号人物时，她就会进行报复，不给回帖，把他们排斥在她的小圈子之外。要是新来的人能够切实遵守这一套

礼节，他们有可能很快就会受到大使、司令官、武官、使馆秘书等人邀请，去他们家赴宴，跳舞，看木偶皮影戏或魔术表演。

尽管有这一套使人联想起表现信天翁求偶的舞蹈那种古怪的繁文缛节，北京的社交界却远不是令人窒息的。新来的人不论多穷，地位多低，都能得到友好的对待，特别是如果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更是如此。

与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不同，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大多数都对具有研究者或学者的兴趣，纯粹为了赚钱而去那里的人是极少的。甚至商人也得学中文，因为出了使馆区，欧洲语言就很难通用了。尽管蒋介石把令人沉闷的南京宣布为首都，外国仍然把大使馆和外交官们的家留在北京。外交官们定期南下，只是为了外交礼节的需要。当时，北方领土和中国与俄国及日本的关系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而国民党却贬低北京的地位，这也许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此外，这还是一个违背民众心理的错误。大多数中国人依然称这个城市为“北京”，借此表达他们个人的意见，而不按照国民党的通令称它为“北平”。

然而，在旧北京最后的几个月，生活表面上依然很平静，而在这种假象的背后，北京的四周正酝酿着一场大战和革命。北京社交界照旧沉湎于投名帖之类的俗套。一段时间里，我们夫妇也未能例外。我们不久就买了一匹健壮的蒙古种赛马，又和别人合买了另一匹，并参加了一个赛马俱乐部。在金色的秋天里，我们骑马跑出老远去参观寺院，穿过田野和草地，到了颐和园和西山附近的黑龙潭。一连数日，生活过得安宁、平静、似乎也很安全，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做种种事情。其间，我

还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学起了中文。

然而，令人沮丧的事终于降临到我们头上。报联社宣告破产，我失业了。

饶 幸

我接到了霍勒斯·埃普斯的电报，获悉报联社已关门大吉的不幸消息。数天之后，我坐在北京跑马场的跑道旁，心里非常焦急。这是个天气晴朗的周末，看台上挤满了中国和国外的赌徒们和赛马迷们。经过一番盘算之后，我把钱分成两份，分别押在障碍赛马和赌金独占的赛马上。然而，赛马的结果于我不只是赢钱输钱的问题。

令我作难的是，我已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但又不想干。我的朋友吉姆·米尔斯是美联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后，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只要我同意为他们连续干两年，我就可以当美联社的驻北京记者。他还答应，两年之后就可以任命我为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

问题是我愿意终生当个抢发最新消息的记者吗？在上海时，我兼职替莫里斯·哈里斯和美联社工作，干了很长时间，因此晓得在美联社工作是桩苦差事：事事都得报道，生怕别的通讯社抢先一分钟；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拴在电话旁。我是被娇惯了的。在报联社，我的工作非常特殊。我把日常报道任务交给助手，自己则随意进行阅读和研究，从我感兴趣的事情中发掘新闻。而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如何生活？我对官员们，对他们在会见中说的话以及他们

散发的所谓反映“民众”思想和言论的新闻通报，并无多大兴趣。我发现没有多少官员真正了解下情。美联社不鼓励工作人员游历，规定格式让人们写千篇一律的消息，写稿不让署名，未经总社批准，记者不得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一行字。如果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谁愿意卖文糊口呢？不过，美联社的支票倒是按时发放的，尽管钱数可能不大。

因此，就有这么个问题：我们是否值得为了得到按时发放的支票和养老金，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岁月呢？我已经出版了几本小说，我认为我可靠写小说、文章和其他的书来维持生计。但是我没有积蓄。没有资本的自由撰稿人无异于一个流浪的奴隶。我有几天时间没有去见吉姆斯，为的是想充分考虑一下。然后，我取出了我们的数目小得可怜的全部存款，因为我们当时过的是入不敷出的日子。尼姆尽管没说什么，可我明白，她不会赞成我在跑马场搞赌博，因此，我什么也不告诉她。

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吃惊。此刻我们挨着坐在看台上，障碍赛马进行时，我闭上了眼睛，心想：“要是输了，我就和美联社签合同，要是赢了……”

赛马结束，我看了看计分牌。我的马得了第二名，我的钱增加了两倍。我仍然一声不吭，等待赌金独占赛的结果。这一回，我睁开眼睛望着。真象小说里写的故事情节那样不可思议，而我平生只遇到过这么一次。我中彩了。我押上的那匹可爱的小马赢得了第一名。

“亲爱的，”比赛结束后，我定了定神说，“我们终于不必给美联社干了！”

“和你一起挨饿，我也甘心情愿。”

“谢谢你，不过眼前我们还饿不着。我已经赢得这场 马赛的全部赌金了！”

跑马场场地很小，我总共也只不过赢了一千美元多一点。但是当我把钞票全部倒在尼姆的裙兜里时，她的裙兜看上去就象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故事中的宝库。打那以后，她认为必须每天看住我，不让我再去赛马场。我心里也明白我并不谙此道，只不过是交了好运罢了。美联社的运气也好。他们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密苏里人詹姆斯·D·怀特来当他们的驻北京记者。他成了美联社雇用的最能干的记者之一。

没隔多久，一个中国马夫因白俄马房主抢走了他的大部分生意，感到十分恼怒，毒死了十多匹马，包括我们的一匹半马在内。好在我们也正准备不再去赌赛马，也不想骑马了。我们买了两辆日本自行车，发现在北京自行车是很方便的交通工具，只是式样不大好。接着，斯文·黑丁^①送给我们一条漂亮的白猎狗。这条名叫戈壁的猎狗是甘肃灰猎狗与俄国狼狗交配所生的第二代杂种狗。它在自行车前面跑得再快不过了；它喜欢在平坦的街道上拖着我的自行车飞跑。

不久，我收到了一封美国来信，用的是《星期六晚邮报》的信封。这封信在寄递途中耽搁了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有一张凭单，看上去象是一张七美元五十分的单据。

“你订了邮报吗？”我愕然地问尼姆。“你又要叫我去跑马场了。”

尼姆皱起眉头看了看那单子，扯了扯眉毛。“哪里有这回

^① 即斯文赫定，瑞典人，曾多次在中亚及我国西藏、新疆等地探险。——译注

事，”她说。“你以为我发疯了吗？”突然，她尖声叫了起来，说：“这不是凭单，是支票！不是七美元五十分，是七百五十美元！是开给你的！”

我依然将信将疑，生怕是弄错了，于是匆匆去银行提款。我们居然兑到了现款，真有几分惊奇。

“我们阔了！”我对尼姆说。“我们有本钱了。加上赛马赢的那两笔钱，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上一年。”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烤鸭，喝了香槟——也给戈壁喂了一块肉排。

邮报又给我寄来第二封信，对此事作了解释。几个月前，我读了斯本格勒的文章之后，给邮报寄了一篇题为《西方威望的衰落》的文章。我随函附了邮资，要求稿件不用就转退给我在美国的代理人。我没有接到回音，就把这事给忘了。现在，乔治·霍勒斯·洛里默亲自给我回信致贺，并说要采用我的文章。

我把自己给洛里默的信的复写件找了出来，又读了一遍。“我真是个无礼的傻瓜！”我说。“可是，谁能料到洛里默会亲自审阅我的文章呢！”我实际上说了，邮报关于远东的观点完全是错的，作者们脱离实际。日本正在不断取得胜利，不是节节败退，正在日益富强起来，而不是衰落下去——这是当代的大神话。当然，我接着写道，《星期六晚邮报》肯定不会刊登我的文章，因为我是个无名小辈。但是，我希望洛里默在退稿之前，了解一下远东的“现实”。

洛里默先生彬彬有礼地用六页纸的篇幅写了回信，纠正了我对邮报对待新作者态度的误解。他欣赏我那篇值七百五十美元的文章，并希望我继续写下去。这就是我同洛里默美好的友

谊和联系的开端。这一关系使我得以愉快地涉足全球各个角落，而在其后的十五年中，《星期六晚邮报》却为此付给我将近二十五万美元。

我的那篇文章是根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远东战线》的最后一章压缩而成的，那本书不久之后就出版了。那一章书的中心思想是这样的：

除非侵略者放弃其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战果，否则亚洲就无和平可言……东方各地的殖民地都要求自由，面对这种情况，欧洲人是赖着不走呢，还是鼓起勇气作出明确的努力，同时也（要求）日本作出同样的努力，去放弃他们的征服地呢？……这一步骤将通过和平的方式达成一种局面，并将有恒久的文明影响，否则，就只能通过一系列的血腥冲突实现这个局面。

天哪，在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华盛顿的人们是“主宰地球的君王”，他们显然没有看《星期六晚邮报》。他们继续这样认为，在亚洲终将掀起狂飙，永远粉碎他们的殖民计时器，但是这样的时刻还远未到来。

学 习 倒 立

“斯诺，如果你想了解中国，”一位秃顶、矮小、鹰钩鼻的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林顿^①用他那半截手指头指着地对我

^① 即阿灵敦(1859—1942)，美国人，不满二十岁时来华，进中国水师，曾参加1884年中法马尾战役。战争结束后，进中国海关，后调邮政局任邮政司。1920年退休，居北京，从事写作。——译注

说，“你必须头朝下倒立，好好思考问题！首先要掌握汉语——这件事本身也象倒立一样难。”

阿林顿那时七十多岁了，在中国已住了五十年。他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自传《青龙过眼》，那本书的前言本身就是一部史诗，但仅仅写出了他在中国的惊人历险的开头。他先是被人劫持到船上当了水手，后来又相继当过清廷的海军顾问、海军军官（他常说，在那场滑稽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中失去了一个指关节，那是他唯一的一次受伤）、中国海关官员。他是中国戏剧和北京历史方面的专家。他的“干儿子、干女儿”比谁都要多，大多数都让他送去演戏了。

阿林顿也把我们当他的干儿干女看待。他向我传授了许多关于中国和北京的知识。我不久就体会到，他对汉语的看法是对的。如果不掌握一些汉语知识，谁也不能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他们微妙的语言影响有多大。汉语有它本身的生命力，其内涵的传统还在发挥着莫大的影响。多亏《星期六晚邮报》给我带来的好运气，使我现在得以集中时间学习，过着新闻工作与学术研究兼半的生活。我没有学语言的天赋，而且欧洲语言对学习汉语毫无帮助。尽管失望，我还得耐心，而主要靠我的满族老师的耐心指导（他不懂英语），我终于学到了足够应用的“国语”，即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官话的中国全国通用语言，使我能够与人进行简单的交谈。我充其量只认识一千五百个汉字，但这已足以使我能够阅读一些“白话”文章了。这样我就不完全是个“瞎子”了（中国人称文盲是“瞎子”）。

外国人需要努力一辈子，才能真正掌握汉语。三百年前编纂的《康熙字典》里收集了四万四千个方块字。自那以后，为了

适应现代西方思想和科学的潮流，已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新字。学者们认得的六至十种不同形式的汉字，包括两千多年的字体和今天的简体字。外国人中，能写能读古文，又能用正确的语音语调讲汉语的人为数极少。当然，只要能懂现代汉字，就不算文盲了，但是“现代”一词，是可以被理解为包括秦代以后的一切时代的。中国的毛笔就是在秦代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的。比诸一千年后发明的中国印刷术比德国人谷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早五百年，毛笔的普遍使用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要想让人听懂你的话，至少得掌握几百个基本字的四声（广州方言有九个声调）。在汉语里，有许多同音异义词，连声调也相同，但意义不同，甚至相反。孤立地说一个汉字时，即使中国人也常常听不明白。人们时常要中断谈话，在纸上写个字。解释一下。在我当“瞎子”的日子里，我试着用洋泾浜英语来交谈，碰到谁也听不懂的时候，就会有人拿来毛笔、砚台和宣纸，希望我把话写下来。他们认为，我只不过是在讲一种他们听不懂的中国方言罢了。文字是统一普及的，把说的话写下来人家就明白了。

如今，古汉语和古希腊语一样，是没有人去说了。为了实用，现代汉语是多音节的，虽然方块字一个个分开书写。中文是由象形、表意、表音等形式的方块字以及由方块字结合而成的新词汇构成的，因此阅读中文就象要解开神秘故事一样有魅力。

本书不是词源学论文，我只想举一、二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中国文字是如何表现人民的全部历史和心理的，在西方语言里找不到相同的情况。拿“姓”这个字来说，它是由“女”和“生”这

两个象形字所组合。而“女”字则是在“人”的上面加了一对乳房，这在公元前800—220年时代的“篆”字上表现的更明显。再分析一下，“生”字即由“土”字演变而来，在“土”的上面添了表示发芽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以“女”字而不用人作“姓”字的词根呢？答案只能是，在产生方块字的社会里，子女们是以其母亲的姓作姓的。而史实正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曾实行过一妻多夫制，子女们只知道母系的情况，因而用母亲的姓。西藏至今还是这样。

再比如“愛”字。它是由三个部分撮成的：最上面的部分意思是“飞翔中的鸟”由于感情激动而造成的“急促的呼吸”；中间的部分是象形的“心”字；最下面的部分意谓“威严、优雅地行走的人”。三部分合起来成了一个表意字，同时保留了原来的形象。

这些例子说明，想要把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文化史分开，或原封地以外来的思想取代旧思想，该有多难。即使今天的共产党人想要这么做，他们也不能够改变“爱”字中体现的富有诗意的书法。比方说，把子、女、和拖拉机这些字加在一起就表达不了爱的意思。

由于我还要混饭吃，未能系统连贯地学习中文，但中文还是令我着迷。邮报给我的第一次汇款和跑马场的意外收入并不能维持很久的生活。报联社停办时，《纽约太阳报》曾约我给每周一期的专栏写稿，但报酬微薄，还不够付房租。我开始给历史悠久的《亚洲》杂志撰稿，但这家杂志财政也拮据，稿酬甚低。其后的两年间，我一面学中文，一面写书，同时在燕京大学兼任讲师（燕京大学只给我少量谢酬），我们主要靠《星期六晚邮

报》偶尔寄来的一笔优厚的报酬维持生计。不过，那实在是极少有的事！

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但很快就因战争而结束。

我们在西山和燕京大学附近找到了一座新房子，这使我们喜出望外。原因是我结识了一位燕京出身的中国基督徒、银行家庄占美。

“我在海淀建了一座房子，打算退休后去住，”庄占美对我说，“那里是个旧村庄，就在燕大校园的南边。近几年内，我还不会退休，想在城里住。你既然在燕大教书，你愿意租这座房子吗？”

我把我们的经济状况告诉了他，说担心租不起。

“租金不要紧”，他说，“你去看看。要是你愿意，就按你现在住房的租金付给我好了。是六十块钱一个月吗？”他笑着说。“没关系，你住我的房子就付四十吧！”

我们骑自行车去看了，此事真叫我们难以相信。庄占美的住宅围墙里有一个一英亩大的花园，种上了果树，甚至还有一个家庭游泳池。房子的结构是中美合璧，呈“U”形。地形颇高，从起居室的画窗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里面还有佣人的单独住房和一个马厩。房子本身崭新，西厢各有一个浴室和书房。

我们马上搬家，住到了离城区较远的海淀。现在村庄本身，中国学生和教授们就构成了我们的社会；他们出于共同的知识兴趣和专业爱好，与少数在燕京、清华和附近别的学校的西方学生、教师交往。多数燕大的学生和教职员都住在校园里。海

淀并不属于燕京校园，它原先是满洲旗人的居住地。他们在此守卫附近的王宫，圆明园（于一八六〇年被欧洲军队所毁）和颐和园。海淀的居民阶级出身各异，但都讲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因此这里是学讲中国话极理想的地方。

燕京大学由教会学校发展而来，它是在圆明园的部分旧址上建造起来的，仍保留了一些原先的景色，包括在花园似的校园中心的一个可爱的湖泊。我们常在晴朗的冬日观赏来自海淀的年纪大的旗人表演迷人的花样滑冰。

我们在这个理想的环境里居住了将近两年，接触到了大学里中国现代青年和他们的思想。从这里出发，骑上自行车很容易就可以到中国最富于历史意义、最美丽的地方之一。那里有大钟寺、白云殿、玉泉山、白塔寺、西山丛林、溪谷中名胜古迹众多的“八大处”及颐和园。颐和园春柳夹道，那里有顺斜坡而建的楼阁，碧绿的湖泊和石舫。这些地方连同博物馆、北海、天坛、祈年殿等等数十处名胜，自一九一四年始，已向公众开放。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令人愉快的海市蜃楼罢了，在这海市蜃楼之上，外国人凭借对他们有利的货币兑换率和治外法权，过着十分惬意的日子，幻想着中国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然而，在这个海市蜃楼的后面，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它正酝酿着一场令人痛苦的翻天覆地的革命。

活 的 中 国

还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已开始和姚莘农合作翻译鲁迅的

《阿 Q 正传》。鲁迅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作家，《阿 Q 正传》是那时期最有影响的小说。我到了北京之后，就邀请姚北上，继续合作。姚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从未出过国，但英语相当精通。此外，他也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这在教会学校出身的中国人中是不多见的。就象那时所有的中国作家一样，他进行创作仅能得到微薄的稿酬，因此，他主要靠把外国书籍译成中文为生——甚至鲁迅也是如此。

在上海时，姚和我曾同鲁迅多次见面，我们计划把一些现代白话短篇小说译成英文，结集出版。此事得到了鲁迅的热情支持。正是鲁迅、胡适（后来出任驻美大使）和陈独秀（曾是共产党总书记，后被开除出党）发起了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确立了白话文在全国的地位——这是一场文化革命，其重要性不在推翻清王朝的政治革命之下。

我会见鲁迅时，他已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学者、导师和伟大作家了。他身材不高，肤色浅黑，目光炯炯，眉毛潮润。他当时五十多岁，正患着医不好的肺病，看样子不久于人世了。令人惊奇的是，他不得不避居法租界，而他的多数著作也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虽然共产党后来把他视为民族英雄，他却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极端保守的孔夫子的信徒方能从他的讽刺和幽默中觉察出非常危险的东西。

《阿 Q 正传》叙述了一个典型无知识的苦力在辛亥革命期间的遭遇，揭示这场革命完全脱离了人民。它和西方文学中捷克的经典作品《好兵帅克》有点相似。但是，帅克至少可以寄身于表面纪律严明实则混乱不堪的军队，尽管他自己也莫名其妙，而阿 Q 则不明不白地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阿 Q 时常碰壁，以无

知和迷信来看待世事，浑浑噩噩。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侮辱，但总是能用精神胜利法把失败解释成胜利，接着又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出现(请参阅孔子、尼采和华尔克·米蒂的著作)。甚至在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绑赴法场杀头时，他还说出了半句他自己也不解其意的戏曲中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

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鲁迅这篇故事中，看出了对中国在国际上屈辱地位的讽喻，并领悟到，除非他们能动员无知的农民起来革命，中国绝对不能复兴。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鲁迅是这样说的。“而民国以后，我们则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你们已经进行了第二次革命或者说国民革命了，难道你觉得现在仍然有过去那么多的阿 Q吗？”我问鲁迅。

鲁迅大笑道：“更糟了，他们现在还在管理国家哩”。

“你是否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适合于中国？”

“我一点也不了解苏维埃俄国，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的俄国的书，它和中国有相似之处。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向俄国学习。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能有一种形式的革命——中国革命。我们还有我们的历史可作借鉴。

正是通过鲁迅(还有孙夫人)，我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青年作家和编辑。尽管他们大多数不为外国人所知，但是，我发现他们在思想较为严肃的年轻人中间，是极有威望和影响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和鲁迅一样四下避难，他们办的刊物和出的书遭到查禁。就我所知，当时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思想上是社会主义者，想要获得宣传西方早已实现的改革的自由，并且在他们的一些文章中涉及了被国民党认为是危

险思想的一些问题。

姚和我合作翻译刚开了个头，他就因故回上海了。他走后，我在我的私人教师和几位中国学生的帮助下继续研究白话文小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并不十分值得，但它使我深刻地领悟了知识分子的不满。它使我从多方面了解了与我年纪相仿的中国人的思想，也使我知道了作家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写作的——经常担惊受怕，失望与希望交织，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赛珍珠和她的丈夫、《亚细亚》杂志的主笔狄克·沃尔什刊登了许多篇我的译作，使我受到了鼓励。约翰·戴把它们汇集成册，题名为《活的中国》。这本小书的文学价值并不大，但是，它是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也是要求最广泛的社会公平的证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认“平民百姓”的重要性。

在编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尼姆和我发现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已在中国产生了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所料想不到的巨大影响。他们的作品已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联系。俄国的思潮来到中国比欧洲和美国的思潮都要晚，主要是在国民革命时期，通过知识分子传入中国。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果戈里和契诃夫的作品都是在那个时期里首次译成中文。在三十年代中期，苏联的作品译成中文的为数极少；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即使在红色根据地，也没有列宁全集。

一九二八年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作品都遭到官方查禁。许多学生甚至因藏有《战争与和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而被

捕。后来，国民党的禁书“目录”扩大到了德莱塞、萧伯纳、厄斯金·考德威尔、辛克莱·刘易斯、约翰·史坦培克等人及一长串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藏有危险书籍的人，可能被投入监狱或者比这更坏的遭遇。我自己所藏的秘密书刊的数量日益增多。不久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常来借阅。他们渴望读到难得看到的书刊或禁书。燕京大学是一所上层阶级的大学，学生照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加上阶级矛盾和日本侵占华北，激进的浪潮便开始波及那里。到了一九三五年，燕京大学出人意外地成了学生运动的发祥地，触发了全国性的一二·九运动。

“法西斯主义和 共产主义之间”

日本此刻已在满洲和内蒙古占领了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不久以后就要深入华北。与此同时，日本外交官怂恿蒋介石与他们签订条约结成反苏(反共产国际)同盟，以“巩固远东和平”。这样，就可以使日本在中国得到合法地位，就象美国战后在福摩萨充当保护国一样。东京方面认为，中国人只是因为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才反日；只要蒋介石接受日本人帮忙，共产党很快就会被击溃。但是，蒋介石业已镇压所有的抗日团体，因此他声称很快就可以打垮“赤色分子”，取得最后胜利，他们已经躲了他七年时间。他担心，国民党和日本人结盟会在政治上加强共产党的地位；情况确实也会如此。

然而，要不是贪婪的日本迫不及待要掠夺中国领土，国民

党和日本是会找到共同点的。从思想上看，两个政权的差别不大。无论是法西斯意大利还是希特勒德国都给国民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介石选择德国军官训练他的陆军，请了意大利人（在陈纳德将军来华以前）训练他的空军。德国人以“盖世太保”为模子帮他组织了政治宪兵队“蓝衣社”。国民党军校教育其学员要象法西斯分子对待“元首”一样，绝对忠于“领袖”蒋介石，而这一方针很快就通过三青团在公立学校贯彻。

在国民党“训政时期”，始终是一党专制；任何反对党派都是非法的。尽管这种专政效率既低又不全面，但要反对它，只有借助于尚未被国民党完全同化的军阀势力，不然，就得象共产党那样公开领导起义进行反抗。没有民权法案，成千上万的人未经审讯就被投入监狱。每天都有人被处决，这方面情况公布甚少，因此要了解究竟有多少人被杀是不可能的。

尽管“赤色分子”已被赶到西部，但仍然有人认为国民党政权有来自内部的威胁，因而有必要公开采取严厉的措施。难道共产党人真比国民党独裁或日本人侵占还要坏吗？我当时并不了解，但仍然雄心勃勃地想要掌握第一手材料解答这一问题。当时，还没有任何记者到过红区，但是我们很清楚，中国农村的死亡人数远比外界知道的要多。按照冯·塞克特将军^①的建议，在南方“受影响地区”的周围，有相当大的一个地带被杀光、烧光、抢光。根据国民党官方的几次估计，长江流域在早期建立

^① 汉斯·冯·塞克特(1866—1936)，德国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组德国陆军的中心人物。1920—1926年任国防军总司令。1934年来华访问，次年受聘为蒋介石政府军事顾问，不到一年因病辞职回家。——译注

的苏维埃政权被彻底摧毁之前，死亡的人数在二百万至六百万之间。在其它地区，国民党自己早期的“土地改革”的口号（最初是提“平均地权”），先是被抛弃，继而成了“颠覆性”的口号，国民党公然恢复官僚阶级和农村地主豪绅阶级的传统联盟。地主阶级雇用的“民团”，此时由国民党加以武装和训练，用以对抗“赤匪”。

当这种情况在发展的时候，在上海和其它通商口岸“绿洲”中的许多外国人却仍在享福。他们对中国农村混乱解体，正孕育着一场激烈革命的情况一无所知。魏德迈^①数年前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时反映了他们目光的短浅。魏德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替史迪威将军之前，从未到过中国，但是，他却在美国参议员们的面前，把三十年代的中国描绘成田园生活的乐土。他说“许多在远东住了多年的观察家，在和我交谈时，都认为那是黄金的年代——请注意，那是蒋介石的政府，当时的领导人物大致同现在一样。”

在一小撮外国商人和当地的买办看来，三十年代也许是光彩夺目的。但是，在那个时期里，年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水灾、时疫和其它一些本可以预防的灾难，年年都有数百万农民失去土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老是宣布补救计划，但总是不付诸实施，而大量的国家预算都被他用于持续不断的战争之上，以便把军阀统归于他的指挥。请看从我保存的“灾害”旧卡片中检出一则关于三十年代中期的典型报道吧：

^① 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美国军人。1944年10月来华，继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总长。1947年再度来华，调查中国情况后向美国政府报告。——译注

上海(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电——长江流域有一千二百万人目前正受到饥荒的煎熬之中，面临死亡。(中国华洋义赈会)特派调查员约翰·厄尔·贝克，在灾区作了长期视察，今天刚归来就披露了此事。……在首都(南京)附近的饥民用漂土似的東西熬粥填腹，死亡人数甚众。

关于“黄金时代”，我只记得这些——此外就是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越来越恐慌，越来越反动，他们决定要用更严厉的手段镇压日益蔓延的反抗。

在城市里，“蓝衣社”扩大了白色恐怖的范围，迫害的对象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扩大到了所有批评国民党政权的人——无党派爱国人士、作家、教师、编辑、记者，乃至商人。在中学里和在那些有鼓吹法西斯主义和鼓吹对领袖绝对忠诚的教授的大学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然而，燕京大学还是反对法西斯的，只有个别人例外。当然，在中国这些话的含义都是有限度的。而且，我也不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蒋介石不是东方的墨索里尼或者希特勒，不管他自己想当那一个。中国不可能产生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欧洲和中国的问题大不相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末进行深刻的改革，要末就灭亡，必须当机立断。综观中国的历史，就象在基督诞生前两年的秦始皇时代，中国为了求得生存，需要有革命的政权一样，中国现在也必须要有革命的领导。然而，不论蒋介石在其它方面怎么样，他反正不是革命者。

在蒋介石政府治下，曾试图用宪法和法律巩固统治，修筑过几条公路，开设了几家现代银行，在防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鼓励，教育机构有所改进，妇女

也开始要求在法律上与男人平等。在这些方面，现代化的速度无疑要比以前的朝代快；倘若没有日本人的侵略，蒋介石或许会依靠右翼专政，统一中国。但是，整个改革的步伐远远不能克服中国社会内部深刻的危机。蒋介石变本加厉地实行独裁，以压制要求采取革命措施的浪潮。

然而，仅仅把蒋介石叫做“暴君”，而不往下深究是不公平的。马基雅弗里^①说过，“谁想要建立古人称之为暴政那样的绝对权力，就必须改革一切。”蒋介石想要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并不真的想改革一切。他取名“介石”，倒也名副其实。在极端混乱的时代里，他却把清规戒律系心头，打心眼里想要阻止改革；他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凯撒式的人物，也不因为他杀人过多，而是因为该杀的人，他杀得太少。他从来不懂得，他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自于他自己的营垒。蒋介石并不坚决，而是顽固；并不聪明，只是陈腐；并非严守纪律，而是受到抑制；并无创见，只知厚古；并非残酷，只是爱虚荣——对这些，没有人能比那些围绕在他周围，而且最终使他灭亡的贪婪的寄生虫更清楚。

“是说蒋介石么？”刘·查·阿林顿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笑着说。“他的日子长不了。他这儿不结实，”他指指自己的秃脑门说。“他不善于竖蜻蜓，而且，即使倒立了，他也只会往下想，而不知道往上想！”

然而，蒋介石是有可能把中国拉入轴心国的，只是日本人

^① 马基雅弗里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98—1512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要职，主张不择手段地结束意大利政治分裂，建立统一、强大的君主国。——译注

入侵改变了局面。甚至对蒋介石抱有希望的司徒雷登也觉得存在这种危险，因而鼓励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展开讨论，帮助师生认识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他要我负责在一个系里组织这个问题的辩论。为了做好准备，我第一次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正是帕累托^①之类的法西斯辩护士的著作，特别是墨索里尼本人关于“总体国家”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及希特勒的胡言乱语，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敌人的报道，使我成了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至少我现在了解了 I 反对的是什么，而他们就大致可以代表了这些货色。后来，我发现我的态度和尼赫鲁当时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自传中作了这样的概括：

“这些篇章可以说明，我决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不喜欢教条主义，不喜欢把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看作不容置疑的启示录，而严密的控制和追求异端似乎是现代共产主义的特点。我对俄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也不喜欢……”

当时，我和尼赫鲁一样拿定主意，无论俄国最终会怎样，“在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我同情共产主义”，倒不是出于喜欢共产主义的朋友，而是出于讨厌共产主义的敌人。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敌人。不是俄国，而正是希特勒，否定了甚至人类的兄弟情谊原则，颂扬野蛮的行径和血腥的迫害。

这一时期，我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材和欧亚的共产主义史。尼姆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包括一门黑格尔理

^①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意大利庸伪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洛桑学派主要代表人之一。认为阶级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是永恒地存在的，因而反对平等、自由和自治。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多采自他的著作。——译注

论，虽然课堂上全用中文讲课，她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俩都越来越深信，不久以后，国共之间的战争将比中日间的战争更为重要。然而，给我以社会主义逻辑的影响的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也不是毛泽东。

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中，我购得一本萧伯纳全集，我第一次把每篇前言和每个剧本，都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正是萧伯纳使我相信，人类的进步能够超越相互掠夺的阶段，符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统一规划的合作可以取代现存的弱肉强食的经济制制度。这些都是可能达到的良好目标，而且也是人类继续生存的必由之路。虽则我一心一意接受费边的温和缓进的历史观，我对社会主义的观念还要随岁月的推移和阅历的增长而逐渐形成。到后来，我也接受了一种普遍的观点：现今的历史乃是人类在通往世界大同的道路上的最后的疯狂的即兴作品，只有世界大同，文明方能开始。

煽风点火

一九三五年底，燕京大学的学生自发在北京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从而触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也许正是它使华北免于陷入日本之手。这次爱国示威就是在我们的起居室里酝酿和筹划的。

在这过程中，我对尼姆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象威廉·亨利·端纳、普特南·韦尔、汤姆·密勒等报人过去都介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当你所爱的姑娘遭蹂躏时，你不能袖手旁观。而北京确实是一位可爱的姑娘。”

十一月间，日本人提出的要求，是数月来他们对华北渗透的高潮。那时，我们称之为“华北”的地方是指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它们位于长城以南。日本人在占领满洲和内蒙古后，蒋介石指令他的总参谋长何应钦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华北的新地位，日本暂时停止了武装推进。根据这个协定，要建立一个以北京为首府包括这两个北方大省的“自治”或缓冲地区。但是，甚至在这一地区内，日本军队还在北京和长城之间，划出了一个“非军事地带”，并设置了傀儡。日本人从这里向华北地区派遣了大批朝鲜和日本特务，他们收买国民党官员，接收他们所需要的房产，开设了大批商店，出售廉价商品、海洛因、吗啡和鸦片，这些毒品都是从满洲国公然走私进来的。

老资格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有人不断对他施加压力，他常常被迫根据日本人的要求撤换官员和改变政策。这样一来就乱了套了。例如，原先颁布的政策要求吸鸦片者必须出示特许证。数百名违禁者被带到北京城外砍头，“以儆效尤”。这是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一项措施。但事隔不久，数百名“阿Q”光顾了朝鲜人开设的鸦片馆，同样触犯了条例，只因为这些鸦片馆是受到京津警察当局的格外保护，却得到了从轻发落。

后来，日本人决定要结束这场滑稽戏，要把华北割出去，使它与国民党政权完全脱离。他们尚未作好开战的准备，就召来了他们的阴谋专家“沈阳事件”的主谋土肥原。据说，土肥原把一千万元崭新的中国钞票放在桌上，要求宋将军宣布脱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据宋哲元的一位年轻秘书马云汉告诉我，土肥原还拿出了

几份文件，证明如果日方坚持，蒋介石已原则上同意撤换宋哲元。

诸如此类事情，外国记者多少有所了解；我们曾设法向国外发了一些这方面的消息。但是国民党实施新闻检查，不允许中国报纸披露日本的要求。土肥原向天津和北京的使馆区增派了军队。接着，他又雇用了一批职业哭丧人、龟鸪、鸦片鬼和清朝的遗老，擎着要求华北“独立”的标语牌分别在天津和北京的街上游行。日本报纸报道说，“广大民众支持宋将军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事实上，宋哲元毫无此意，但也不敢加以制止。

一天晚上，那位姓马的朋友从宋哲元的司令部直接来找我。他激动得快要掉眼泪了。他告诉我，老宋已准备向土肥原屈服了。他曾一再致电南京，提出如果他起来抵抗日本，望予支援。但是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辞地作了答复。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宋哲元独力难支，他又不愿意让这里的事情由无能的国联出面处理。为防止日军入侵，他就要宣布成立华北“独立”政府了。

“真遗憾，”我说，“土肥原只是吓唬人而已。我在满洲和日本呆了两个月刚回来，我相信，日本人还没有作好开战的准备。只要一摊牌，土肥原就会缩回去。”

“可不是，”马回答说，“不过，宋哲元不能独自冒这个险。现在木已成舟。我们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另一个满洲国了——只是缺日本军队而已。”

第二天，我的一位读新闻的学生张兆麟打听宋哲元倒向日本的传闻。他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尽管学生组织不断遭查禁，燕大的学生会还是秘密地恢复了活动。他是东北人，身材高大，为人坦率，象许许多多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准备起

来反对压制爱国热情的政府了。

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哭了起来。

“哭有什么用，”我低声说道：“我们要行动起来。”

“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他怀着希望地问道。

“可不，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我们应当是守中立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中立的！”尼姆插话说。“为什么要假装呢？埃德是说我们要尽力帮助你们。这里的其他许多美国朋友都和我们一样感到愤慨极了。”

“那好，”他说。“要是这样，你们也许能帮助我们把这个发表出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文稿来，于是，我们坐下来把它译成英文。这是一份致蒋介石的请愿书，措词哀婉动人，要求有结社和言论的自由，要求“停止拘捕爱国人士”。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制订民权法案。

“现在发表这种东西为时过早——也许已经太晚了，”我说。“它救不了华北。首先，大多数外国报纸只会把它当做宣传品，而中国报纸连提都不敢提它。”

“你们可以把它寄到国外去发表么。”

“那有什么好处呢？日本人会弄到这份东西，他们当中有些签了名的人将因此而被捕。仅此而已。”

“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不知道，”我疑虑地说。“就这几个学生……”

“一九一九年就是少数学生在北京掀起了学生运动，挽救了中国，”尼姆说。“全国人民目前正在等待着，只要他们一看到青年依然生气勃勃的迹象，就会起来支持你们。”

但我却不那么有把握。十七年前在北京掀起的“五四”运动，

确实导致了大规模的抵制运动，终于迫使日本放弃对特权和领土的要求，否则，中国在那时候就已经成为日本的附庸了。可是，现在情况怎样？

张于是决定推迟发表这一“宣言”。他离开了我们，决定再次召开学生会会议，试图建立一个全北京的学生联合会。北京有十多所学院和大学，几十所中小学，仍然是全国学生、知识分子的中心和民族良知所在，各地都企望它来领导。

当张和王汝梅^①、陈翰伯等再来和我们商量时，尼姆说“我们应该到街上举行模拟性出殡——装扮日本官员和中国官员去埋葬象征华北的尸体。”

这些严肃的青年认为尼姆的建议没有用处，他们慷慨激昂，相信中国的命运要由他们来决定。令人吃惊的是，暂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因为在中国，学生的作用很不寻常。多少世纪以来，应科举求功名的秀才们总是享有很高的威望，如今现代的学生也有这种威望，甚至连白发苍苍最聪明的老农也往往愿意洗耳恭听他们的见解。再说，大多数学生都有有权势的亲戚，官员们对待他们须比对待苦力要谨慎些。那年月，没有武装的政党无法存在；只有在大中学校里，依然可以组织非暴力的政治性抗议活动——二十年后的波兰和匈牙利也是如此。

“如果认为举行这种出殡不妥，尼姆建议的这种形式的示威还是可取的，”我说。“手无寸铁的学生站出来反对假独立运动，可能真会产生影响。”

“我们一旦暴露，就会被打成赤匪而被抓起来。”王汝梅若

^① 即黄华。——译注

有所思地说。“他们决不会让我们上街的。”

“要是全北京的学生都参加，”我说，“而且要叫警察——还有日本人——猝不及防，那他们就没办法了。”

“可是怎样才能使人人知道举行示威的事情呢？中国报纸是不敢报道的呀。”

“如果人人都参加，支持你们，而不是反对你们，那它们就不得不报道了。”

我答应发动其他记者去现场采访，并予以详细报道。至于他们能在国外赢得多大的同情，那就将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和他们提出的口号了。

参加当时和后来几次会议的学生领袖的姓名，对西方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后来，他们都成了中国的著名人物。这些青年多数是基督徒，或是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他们代表了当时华北学生的精粹。当时，他们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但在几年后爆发的爱国抗日战争中，他们几乎全部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反复设想救国的方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是第一次切实地思考了与日本作战将意味着什么。思考结果，他们向宋哲元和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拒绝土肥原的最后通牒，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着手“训练和动员民众”，让人民知道真相并作好准备。他们宣称：中国必须自救。

十二月九日被选定为全市学生罢课示威的日子，这比宋哲元预备宣布华北“独立”的时间早一天。司徒雷登博士只知道他的燕大学生在“忙什么事”，但他并未意识到，他们是在联络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领袖，那些学校里的学生团体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活动。没有几天工夫，传单、标语和旗子就全都准备好

了。组织了急救队，选定了联络人员，并给他们布置了任务。新成立的北京市学联指挥部拟定了游行的路线。

在华北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的前夕，我和尼姆连夜抄写学生们所提“要求”的译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国报纸发表。

行 动

十二月九日，学生们先聚集在城内十多个城门和牌楼下，然后开始游行。游行队伍通过各主要街道，到一个大路口汇合，奔赴中南海国民党某高级将领的行署，向当局递交请愿书。

这是我和尼姆第一次看到大批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当时仍被人看不起的普通士兵也表现了这种气概。这一情景，令参加者和旁观者都感到振奋。成千上万身穿蓝色制服的青年学生不把警察放在眼里，不听他们保守的父母的劝阻，高歌阔步向紫禁城迈进。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这种景象八年来还是第一次。我和尼姆通常是不看游行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却为能和游行的组织者站在一起感到自豪。别的记者，尤其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美联社的吉米·怀特，合众国际社的麦克·菲希尔和《时报》的C·M·麦克唐纳德，都和我们有同感。

示威游行来得很突然，加上又有外国同情者在场，警察感到很窘困。他们只是偶尔半心半意地对游行队伍干涉一下。警察不管在那里企图逮捕学生，总有大批穿蓝制服的学生围上来，向他们塞传单，并高呼爱国口号。警察往往无言以对，觉得很尴尬，苦笑着退走了。难道他们不也是爱国者吗？后来，城内

的消防队倾巢出动，用水龙向示威者喷射。青年们蜂拥而上，虽然浑身湿透，但是胜利了。

突然，身穿黑色皮夹克的政治宪兵，在蒋介石的侄子率领下，骑着架起了机枪的摩托车和单轮侧车，向游行队伍的主体开了过来，他们胡乱地抓了数十人。但是，示威的人那么多，他们毕竟抓不过来；游行队伍继续前进。一度气氛十分紧张，宪兵们把枪口对准了示威者，摆出准备射击的架势。有几个宪兵朝天开了几枪，游行队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外国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都围拢来，希望能制止一场悲剧。此举果然奏效，只见一个军官扬了扬手，示意他的部下把枪放低。

“防暴警察站到学生一边来了，”尼姆兴奋地喊了起来。

商店老板、家庭主妇、手艺人、和尚、教员和穿着缎袍的商人都站在街旁向游行的学生喝采，或走出去捡传单看。甚至人力车夫也喊起了被禁止的口号：“打倒伪独立运动！逮捕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国！”最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集会，宽阔的广场人山人海，有些警察公开和学生一起高呼口号。

北京发生的第一次示威游行成了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中国各地的报纸也不顾新闻检查的禁令，刊登了报道示威游行的消息。中国正在苏醒。几天之内，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许多大城市，最后，甚至南京的青年团体纷纷起来响应。示威游行开始席卷全国。不久，许多教师也参加了学生的行动。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和天津举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数万学生进一步行动了起来。虽然有许多人受伤、近二百名学生被捕，但一周以后，又举行了第三次示威，示威者首次喊出了

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

南京政府徒然向各校校长发出指示，要求加强纪律和控制，而在华南，各学校四周的卫兵增加了一倍到两倍。然而，到那时，爱国热情和同情心已感染了警察、官员和士兵，他们对南京的命令只是敷衍了事，因此受害的学生不多。在舆论的支持下，爱国人士恢复了长期受压制的救国会，再次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甚至连一些保守分子也出了力。

不出我们所料，日本人对此毫无准备。第一次示威游行后的第二天，宋将军便通知土肥原说，他不能违反民意宣布“独立”。东京方面对土肥原的阴谋流产感到震惊，就把他召回国了。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都发表和解声明，否认有武力并吞华北的意图。从此以后，宋哲元对日本的要求，不是采取拖延战术，就是托词去老家“扫墓”——一种儒家的习俗，予以应付。宋哲元这一次扫墓，费时之久异乎寻常，以致使日本人相信想要在中国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非得大举入侵不可。但是，到了那时，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国民党除了进行全面抗战之外，已无其他选择了。

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间发生的学生运动，是中国结束不抵抗政策的开端，而受其直接影响最大的是流亡北京的东北人。在把城市的示威扩展到农村的行动中，最积极的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假日里大批学生深入乡村，揭露日本人霸占他们的家园，并呼吁人们备战。另一部分学生则去西安府，流亡在那里的张学良少帅就是在那里担任蒋介石的“剿共”总部副司令。张少帅对他们表示了欢迎，让他们在他的部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不久，整个东北大学就迁到西安去了。这里不久就发生了

兵变，最终迫使蒋介石参加了反轴心国的阵营。

这一经历使我懂得，引起革命有种种原因，而知识青年对现政权完全失去信心，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恰恰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学究式的历史学家最容易忽视的。

在这危急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而且，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把大批最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基督教徒学生。

“无为而无不为”

有几位朋友鼓励我向古根海姆学会申请一笔研究金，以便就中国的土地危机问题进行为期两年的实地研究，特别是，因为这一问题和“赤匪活动”密切相关。就我所知，古根海姆学会是唯一在中国吸收研究人员的团体，每年限定一个名额。最热心支持我的人之一是晏阳初(吉米)。他是定县农业试验的负责人。晏力图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就肯定会迅速地通过革命，来实行这种改革。他是对的；但是，很少人倾听他的意见。我的其他支持者各式各样，他们是：司徒雷登博士、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葛利普^①、林语堂、鲁迅，还有J·P·马昆德。马昆德当时正在北京写莫托

^① 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美国地质学家。——译注

先生轶事。

然而，古根海姆学会理事会却不予理会。当年的研究人员名额给了一位心理学者，他的研究课题是“根据中国人的脸部表情研究他们的种族和心理特征”。这位心理学家终于在北京露面，一连几个星期非常起劲地对不可思议的中国人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雇了一个我认识的中国人，叫他给人们讲故事，使他们表露出痛苦、欣喜、愤怒、怜悯、欲望等各种表情，而他则在一旁拍照片。

大约在那个时候，伦敦《每日先驱报》任命了一位新编辑，他认定该报在中国扩大业务的时机已到。我给《每日先驱报》写稿已有几年了；这时，他们提出让我担任他们的特约记者，许以更优厚的报酬。由于我向古根海姆学会的申请碰了壁，我乐意离开学术界，回到“热气腾腾的现实”中去，或者说再次过追逐头条新闻的生活。我们离开了我们在海淀的乐园，搬回了城里。我们再次只出少量的房租找到了很好的住处，住进了一幢奇趣的老宅第。在燕京大学迁到郊外以前，司徒雷登就住在这里。院子大而杂乱无章，墙上爬满紫藤，院内有座可爱的小花园，有网球场和马厩。中国式的花房冬暖夏凉，是很好的工作室。

《每日先驱报》虽说是英国工党的机关报，所有权却归奥德哈姆出版公司所有，它是一家拥有数百万美元资金的出版公司。它的出版物中，有一份《禽鸟世界》，那是英国最富于爱国心的家禽饲养者的杂志。我们搬回城里不久，《禽鸟世界》主编就委托我给他们拍一张中国母鸡在粪堆上下蛋的照片。由于当时中国的脱水蛋正威胁着英国母鸡的安全，因此奥德哈姆公司带

头掀起讨伐运动，禁止外国蛋白进入王国市场。我的妻子替我作了答复。她在信中说，我们无法拍到这样的照片，原因有两个：其一，只要母鸡下蛋咯咯一叫，准会有小孩跑过来把蛋捡走；其二，中国珍惜粪便，从不会闲置成堆，而会马上扫去当肥料施用。

《每日先驱报》本身却从没有向我提过类似的古怪要求，也没有要我写过带有偏见的报道。我常常把我给纽约《太阳报》的稿子复写一份寄给《每日先驱报》，虽然两家报纸的编辑方针大相径庭。《太阳报》对我的稿件从不改动一个字，而《每日先驱报》总要加以编辑，甚至改写。双方对我这种安排似乎都还满意。

在美国，有些麦考密克上校之类的人，他们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洗衣工，有些心理学家胡思乱想，认为同样是饥饿，中国人脸部的表情却“与众不同”；但美国也有一些优秀的教师和学者，在他们所在的大学的支持下，经过刻苦钻研，成了精通中国艺术、语言、历史、地理和一般文化的权威。在北京，他们可以和中国杰出的学者共事，自由地翻阅档案，参观博物馆，考察周围的现实社会。十余年后，美国外交使团就在这里罗致了一批出色的通晓语言的年轻官员。

美国驻华外交使团是根据一九二四年通过的驻外法案而建立的。这一有远见的法案旨在使驻外人员的任命不受派系政治的影响，即摆脱英国驻外人员任命的路线。它力图取消“政党分赃制”，这种做法是南北战争时期沿袭下来的，它通过政治上任命的方式，把驻外人员的肥缺用来酬答那些曾给予执政党财政支持的人。而在驻外法案还在实施期间，驻华外交使团的候

选人员均须经过竞争性很强的考试，根据他们的特长、资质和能力录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训练有素、了解所在国的情况，知道如何在外交事务中维护美国长远的根本利益的新一代，来取代原先根据政治任命派驻世界各地的外交人员，包括公使和大使。

中国和日本的语言都很难学，社会政治问题又很复杂，因此，如果要使我国的政策不致陷于虚幻的绝境，就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对这些问题作深刻持久的研究。这种任命驻外人员的新办法很快就显示出了它的正确性，我们驻外代表的水平和他们的集体精神明显地好起来了。一九四一年以后，美国的通晓中文的官员们证明他们显然比那些根据政治标准任命的官员强得多，后者甚至连中国高级政府官员的姓名都不会念。

埃德蒙·柯乐博、埃德温·斯坦顿、罗伯特·史密斯、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亚特·谢伟思、雷蒙德·卢登、爱德华·赖斯、罗伯特·斯本塞·沃德、菲利浦·石博恩、劳伦斯·索尔兹伯里、亚瑟·林沃尔特以及另外几个人不久就成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专家团。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由于对一些涉及战争岁月和革命的问题所作的判断与那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议员们的看法大相径庭而引人注目，因此这个专家团注定要解散。二十年后，麦卡锡和院外援华集团对他们造谣中伤，作为对他们辛勤工作的报答。到最后，在制定美国的亚洲政策和决定的议事室里，会讲中国话的老驻华外交官竟然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只有极为强大富有的国家才经受得起这种“惊人的浪费”，即使美国也经受不了多久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人从不感到探究中国的真实情况有

什么危险。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在北京的大使对所有这样做的人都予以鼓励。纳尔逊·特拉斯勒·詹森^①是美国第一位能讲中国话的驻华公使。他在任多年。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我们的前任公使麦克默里鼓吹西方各国联盟进行干涉，而詹森是我们中间极少数的反对者之一。他仍然把蒋介石看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中国潜在的救星。但是，他尤其赞成“中立”。他甚至不赞成美国人站在抗日者的一边，因而对我支持学生的活动也斜着眼睛，大不以为然。然而，詹森先生却真心相信，一切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的认识的工作都是有价值的，虽然他本人更偏爱研究产生殷人甲骨文的朝代和史前时代。尽管如此，当我出版了《活的中国》一书时，他却写信称赞了我所作的努力，鼓励我继续钻研当代中国文学。这本书收入了许多位反对国民党的作家的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家中，有几位已被蒋介石雇用的凶手所暗杀。

詹森先生的摆设中有一幅书写精美的条幅，每次换办公室，总要带上它。条幅上写的是道家的名言：“无为而无不为。”美国处于大火欲燃的世界之中，却顽固地坚持孤立主义。对美国来说，这一格言是切合时世的。我也十分希望我们不要卷入中国的事务。但是我不同意詹森先生的观点：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同时又可以超然物外；换句话说，我们既可以死抓住我们在中国的特权不放，而为了维护西方殖民统治的一整套制度，又无须对日本或中国作战，或者同时对中、日作战。

^① 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 1887—1954)美国外交官。1929—1935年任驻华公使。1935年升格为大使，任职到1941年。——译注

我由于抱有这些信念，使我与詹森先生在对中立的美国人应如何举止的看法上分歧日益加深。然而，詹森这位“无为而无不为”的信仰者，并未干预过我的行动。甚至在不久以后我为毛泽东作传时，他也不干预。

跨 越 雷 池

在我前往红区并第一次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不理解，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为什么别人不明白。我认为，我们即将卷入亚洲的战争，要避免它首先要看到这一点。

我对日本人在中国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行动作了研究和观察，我深信，日本侵占中国的目的并非为了向俄国开战，而是想以中国为根据地，向整个欧洲的殖民体系发起总攻。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而我个人反对这样做。我此时也明白，即使我们打赢那场战争，我们也不能够决定中国的未来。想要避免冲突的方法之一是象德国和俄国一样，放弃我们在中国的特权，与中国谈判签订一项新的平等条约，并把我们的军队和军舰从东亚撤走。这样就要求欧洲列强武装殖民地人民，使其具有大规模自卫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证民族自由，使人民感到值得去保卫。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难道这与我们美国人所信仰的自决权不相一致吗？

今天看来显得奇怪，我的那些观点受到了《星期六晚邮报》的热情支持。这家报纸很早就刊登了我关于中日将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预言和我对这场战争的结局的预测。一九三六年六月，

我在题为《远东即将发生的冲突》一文中写道：“日本在竭力占有中国市场和内地财富的过程中，必将折断帝国的颈骨。这一灾难之将发生，并非由于日本经济会自动崩溃，而是因为日本必然要强加于中国的宗主权将令人不堪忍受，并将很快引起震撼世界的抵抗。”

但是，尽管当时的美国国会主张实行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然而，美国毕竟不是瑞士。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向中国提供什么帮助，但长远来看，我不相信，我们会眼看着殖民国家在亚洲垮台。俄国人也不相信。我接着写道：

他们（俄国人）相信，惩罚日本的责任不可避免地要落在社会主义苏联的肩上，但是，在这之前也许会先落到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头上……布尔什维克们深信，东方（跟西方）的战争将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掌权。他们的预言，即使将其中一厢情愿的成分扣除之后，也还是充满历史的必然性的。

今天看来，这两种预料是相当合理的，但当时西方国家的决策人却加以讥笑。他们说，中国决不会共产主义化。他们的解释是：“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太严重。”其二，“中国人决不会投入战争。他们基本上是和平主义者。谁也不能把苦力训练成士兵。”他们期望日本在与中国的争端中迅速取得全面胜利，——然后，转而进攻俄国。在外国军事专家中，对战前那些陈词滥调提出异议的寥寥无几。约瑟夫·史迪威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当时的军阶是上校，是我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中国人的素质并无问题，”他一再说，“但是腐败的领导却大有问题。如果有德才兼备的军官指挥，中国人就能成为很好的战斗人员，堪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军队相媲美。”

中国红军抗击蒋介石的战绩，给史迪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中看到，中国人民如大规模起来抵抗外国侵略者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多年以来，红军得不到外援，并缺少现代化的工业基地。他们依靠的只是农民经济。在几次重大战役中，他们在农村的小小根据地曾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敌人的火力比他们的强十倍乃至二十倍。

“蒋称红军是土匪，也许是的，”史迪威有一天冲口而出对我说，“但是，是土匪也罢，不是土匪也罢，反正他们是游击战的能手。我不知道他们宣传些什么，但是，我看，他们似乎已经有了能克敌制胜的指挥官了。我是指那些不是对士兵说，“你们打呀！”而是说，“跟我来！”的指挥官。如果情况真是如此，而且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官，那就够日本人受的了，就可以把日本人送上西天了。”

但是，那时我们俩都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子。我们甚至不敢肯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九年内战使“红色中国”更是成了“未知之地”。我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让我突破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周围的封锁，进入红区。两家报纸都赞成我的计划。《每日先驱报》答应负担我此行的全部费用，并且如获成功，还将付我一笔可观的奖金。当时在兰登姆出版社的哈里森·史密斯也向我约稿，并预付了少量稿费。由于得到了这些支持，我便到上海去，再次去拜访孙逸仙夫人。我请她帮助我，以便红军起码把我作为一个中立者来接待，而不把我当作间谍。一九三六年春，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宋庆龄为我作了安排。通过她，我与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还告诉我同西安府的地下工作

者接头的办法。

一九三六年六月，正当蒋介石宣布准备第六次对北方的红军进行“围剿”的时候，我登上了这一非凡的旅程，此行将对我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我登上开往西安府的快车时，我意识到，我是在跨越雷池：瞻望前景，我兴奋异常。

这一回，我是绝对正确的。

冲破封锁

一到西安，我便径直去旅馆租了一个房间，等待一位来访者。来客作了自我介绍，只说他是“王牧师”^①。我把介绍信给了他。这位基督教徒(或者以前是基督徒)讲一口英语，身材肥胖，很有趣。他来看我并秘密地帮我与地下共产党人接上了关系。东北军及其司令官张学良知道我秘密进入红区的计划，并给予了帮助，因此我此刻对形势的变化是有所预感的。六个月后，形势已发展到了蒋介石在西安被他自己的部属拘禁起来的田地。

张学良是前东北的统治者。一九三一年，他奉蒋介石不得抵抗日本侵略、而要依靠国联的命令，把他的装备精良的军队撤出了东北。蒋介石后来调张学良十五万东北军去打红军。但流落异乡的东北军感到真正的敌人是日本人。红军在战场上的宣传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我们联合起来，打回老家去！”这些口号对他们的士气很快就产生了影响。每当共产党打

^① 王牧师的真名是董健吾——译注

了大胜仗，或者在伏击中俘获了东北军将领时，他们总是以贵宾之礼相待。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们长谈数日，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人真诚希望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其后，周恩来还陪送这些将领和绝大多数被俘士兵回他们自己的战线。

这些做法产生了神奇的效果。这些“改造了的”东北军将领把他们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向张学良元帅作了汇报。于是，张学良亲自邀请红军派人来西安商议。虽然张学良是蒋介石军队的副总司令，对他与共产党人的最初几次会晤，南京方面毫无所闻。张学良秘密地和红军达成了停火协议，并考虑要说服蒋介石听取共产党的建议，这时，张学良也已确信这些建议是符合全国的利益的。

张学良后来遭到种种诽谤和歪曲。但是，他仍不失为极少数始终以“纯洁”的动机行事的中国高级官员之一。要判断他的性格，不能看他年轻时代曾是一个鸦片鬼，而是要看他后来不仅成功地戒了烟，而且洗心革面。张学良是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被日本特务暗杀后，满洲的统治权便落到了他的身上。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他从一开始就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把满洲广阔富饶的疆土和平地归到南京政府的治下。日本人侵略满洲时，他和他的大部分军队正在长城以南，帮助蒋介石控制华北——这也是日本人入侵的原因之一。后来，他曾两次挽救蒋介石政府，帮助它摆脱危机。然而，此刻在西北，他渐渐明白了总司令的企图是与日本妥协，甚至还有可能加入轴心国。为了结束中国的内战，张学良必须选择谁也料想不到的、最富于戏剧性的方式——也许是唯一的和平方式——其代价是可能葬送自己的前程，甚至还可能丧失后半生的人身自由。

在我抵达西安时，少帅的家里正住着几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才发生不久。初期领导这场运动的东北学生，已有一部分从北京来到西安。他们开始在张学良的部队中宣传他们发动学生运动的目的。他们中间有两位是我的学生，即张兆麟和陈翰伯，他俩是一张军报的编辑。

共产党人在西安和保安之间建立了有限的联系。当时，保安是红军在陕北的小“都城”。一天早晨，我在他们的帮助下，乘上东北军的卡车，向伟大的未知之地进发。

我们的北行之路，能唤起每个中国人对他们民族丰富多彩的历史的回忆。经过一小时行车，我们进入了渭河盆地。最初来到这里的开拓者孔子的祖先，最早形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凝聚的基础是古已有之的传统稻米栽培和历数千年而不衰的伦理制度。中午时分，我们经过骊山，相传古代最伟大的改革家秦始皇就葬于此山。两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在这里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现在，共产党人也要在这里为中国安排一种命运，其目标同样是进行彻底改革。这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但却是很合适的。这一点又一次提醒人们，中国今日的革命是深深地植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我们的现实大不相同的现实之中的。整个下午，我们行驶在已成熟的罌粟地里。夜幕降临时，我们到了洛川。在那里士兵簇拥着我，从边门进了一家肮脏的客栈。我的房间与驴栏和猪圈相邻。耗子和臭虫太多，我整夜都没睡好。第二天黎明前，我很高兴又继续上路，卡车在壮观的西北黄土高原上行进。

多少世纪以来，有机物质从中亚广阔的沙漠地带随风吹到这里，形成了黄土地带，它是深达数十英尺的肥沃的地表土层，

然而是一片光秃秃的，而且易受突如其来的暴雨的侵蚀。这里长时间干旱，有时骤然下一场暴雨，因而，景色颇为壮观。小山象巨大的城堡耸立在丘陵之间，而丘陵就象是被一个愤怒者用双手撕裂似的，呈锯齿状，布满裂纹——仿佛是在超现实美的天地里呈现出来的古怪、难以置信和可怖的景象。

在种上了庄稼的田野上，我们难得见到一座房子。我问护送我的东北军战士：“人们都住在哪里呢？”

“看哪！窑房”，他说着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看到了黄土坡间的村落和纵横交错的道路。这里树木稀少，人们住在窑洞里。就是有钱的地主也是建造窑洞为家；窑洞冬暖夏凉，而且相对来说一年四季都较安全。

那天晚上，我在延安投宿。群山环抱，有城墙围绕的延安城后来成了著名的红都，历时十年。不过这时它仍在国民党的手中。出了城，就是红区了——北面离长城一百多英里，西边离宁夏平原二百英里。第二天日出时，我出了延安城门，只有一位东北军军官护送我过了他们最后的一道岗哨。我们握了握手，他向我敬礼告别。我一时间成了孤家寡人。奉命来陪我的是一个不带武器的驴伕，他的任务是带我到红军游击队的前哨。骨瘦如柴的驴子驮着我仅有的少许物品——铺盖卷、少量食物、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我不知道此人是个赤匪还是个白匪。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在峭壁之间走了两个钟头，一路上阒无人迹。

我想，我当时的感觉或许应当与麦尔维尔^①的《泰比》一书

^① 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71)美国作家。——译注

中的水手们在弃船进入食人的禁地时的心情一样。但是，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支持或反对共产党人的义务。果然，我在别的统治制度中已看到了弊病，在他们的身上，我个人还没有发现。同样，你也不能说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搞“阴谋”。这只是一场公开的武装斗争，双方都只能聚集武力来取得权力——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权都得凭借武力。我真心想了解共产党人究竟是好些呢，还是更坏些——作为记者，我的任务是了解情况写报道。

我的驴伕忠实地把我送到了一个小村庄，这是我们进入红区后遇到的第一个村庄。贫协主席起初对我起疑心，但是，在知道了我的任务之后，他殷勤地为我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宿夜。第二天早上，他很早就把我喊醒了。

“你最好现在离开这儿，”他告诫我说。“白匪离这儿不远，你应该快点去安塞，到那里你和我们的红军在一起就安全了。”我狼吞虎咽地呷了几口茶，吃了一碗饭，就立刻出发了，贫协给我另派了一位向导和骡伕。不到一小时，我们到了一个可爱的池塘边上。在那里，我终于见到了第一位穿军装的红军战士，一匹白马正在溪边吃草。他头戴有颗红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支毛瑟枪。

“那个外国人是谁？”他神情严肃地问骡伕。

“我叫斯诺，我去见毛泽东，”我回答说。“他知道我要去见他。”

他确实弄清楚我没有带武器，并且也不是带人搞伏击的之后，就微笑着对我说：“跟我到区政府那里去吧。”

走了两小时之后，我们绕过了一个山头，眼前出现了一个

相当大的村庄。就在此时，我听到了一阵仿佛是从多孔的黄土层中冒出来似的呼喊声。抬头一望，我看到在岩壁的突出处站着十多个农民。他们挥舞着长矛和陈旧的大口径短枪——全都对着我。

周 恩 来

想必是我脸上流露出惊愕的表情，因为陪我来的那位红军战士大笑了起来说，“不怕！”他指着那些咄咄逼人的长矛手说。“别害怕。他们只是些农民游击队，在操练呢！这里有一所训练游击队的学校。”

我们进了一条短巷时，十多个身穿褪了色的灰色或蓝色棉军装的人迎了上来，他们除了在衣领两边各有一小红布条外，没带任何徽章。

“欢迎”，其中一人用中国话说道。“进去喝茶吧。”他们都作了自我介绍。我发觉他们都是军官。所谓“茶”只是开水——清贫的共产党人管它叫“白茶”。真茶在这一地区是一种罕有的奢侈品。片刻之后，一位身材瘦削的人来了，他颇有军人的风度，两只脚跟一并，用手碰了一下头上褪了色的红星帽为礼，他浓眉底下的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把我端详了一番。接着他绽开了友好的笑脸，甚至还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蓄着一把中国人少有的浓密的大胡子。

“哈嘞，”他用英语说。“你找哪一位？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他接着说，“我叫周恩来。”

就是这个人，蒋介石曾悬赏八万元买他的首级。这时，他

是东线红军的司令，十三年后，他将出任“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中国的首任总理。此刻，他邀我到他的住所去。我见到一间小屋，半是窑洞，半是房子，室内只有一、两张凳子和几只铁皮文件箱。周的文件就散放在土炕上。——在这个地方，土炕既当睡觉的床，又是取暖的设备。

“我们接到了报告，说你是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友好，相信你会如实报道，”他用不熟练的英语说。“我们只要求你真实地把你的见闻报道出去。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了解情况。”

我和周恩来谈到深夜，他坦率地回答了我的大部分问题。有一段时间，红军通讯部长、独眼的李克农和周的参谋长叶剑英也在场。李克农后来成了北京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叶剑英在最后击败国民党时成了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周给我画了当时红军占领区的草图，并给我讲了近期的军事和政治计划。这两个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结束内战，同其他军队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这么说来，你们放弃革命了？”我问。

“决不是的，我们在促进革命，而不是放弃它。也许革命会通过抗日取得政权。”蒋介石又如何呢？他预言说，“抗战开始之日，就是蒋介石开始灭亡之时。”

周说，共产党人将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组织和武装农民去进行爱国战争，而蒋介石不懂。“在战争的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部分将抛弃蒋介石而跟我们走。”如果南京政府不抗日，一味求和怎么办？共产党人将北上和日军直接较量，周说。“我们在华南，仅仅靠农民的支持就成功地开展了对蒋介石的游击战。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对日本的游击战会更成功。”

周接着分析了蒋介石作为军人和政客的实力和弱点。他很了解蒋介石，他曾在蒋介石手下当了三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校长。那是在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高潮时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前。

此后，我还要多次会见周，并为他和他的出色的夫人邓颖超写传略^①，但奇怪的是，在我想要把和他的第一次关于蒋介石的谈话内容在书中发表时，周把他删去了。当时，事态发展出人意料，周带信给我要求收回他的坦率的意见，因为他得再次承认蒋是全国的领袖，并与其合作。只是到了最近，那次谈话才终于得以发表。^②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周恩来在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此期间，他给西方人留下的良好印象，极少中国人能超过。他是清朝显官的孙子，美国人办的天津南开大学的优秀生。他也曾在欧洲学习，懂得法语和德语。我见到他时，尽管他已三十八岁，留着大胡子，却依然有些稚气，风度翩翩，才思敏捷。

会见结束时，周在他手画的草图上给我指出了一条路线，标出了每个地方我要访问的人名和机构的名称。行程（步行和骑马）一共要九十二天——事实上，我后来花费的时间比预计的长。周恩来接着为我送行。我和一队士兵结伴而行去保安见毛泽东，路上走了三天。

① 见1954年3月27日《星期六晚邮报》。——原注

② 《红色中国漫记》，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1957年。——原注

与毛一起吃点心

当我们这一小队人来到俯瞰保安的一座山顶时，号角吹响了，我看到下面一条短短的大街道上，人群和马匹匆匆来去。经过连年的战事和饥荒，使陕北的人口和耕地减少了。保安本身就曾是一座颇具规模的边防要塞。离城门老远，就可以看见被成吉思汗所毁的古代堡垒的遗迹。

好奇的人们列队站在数十间东倒西歪的草屋和铺子前，高举着标语，上面用英文和中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街道尽头，有一批人站在那里迎接，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当时在保安的几乎全部政治局委员。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对我表示了欢迎。

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那时候，他颇为清瘦，身材比一般中国人高，稍显佝偻，他目光炯炯，嘴唇宽厚，眉毛高耸，结实的下巴上长着一颗明显的黑痣，匀称的脑袋上留着长长、浓密的黑发——蒋介石曾为这个脑袋悬赏二十五万元，死的活的都成。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过话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清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在这个尘土飞扬，条件艰苦的小城里，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国家机构，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防部、教育部，部署有关工作。一所红军大学，设在一排窑

洞内，大约有八百名学员住在里面。“窑洞出版社”则出版各种教科书、报纸和杂志。许多书报是利用国民党散发的传单，在背面油印而成的——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僧侣在异教徒的刊物上书写他们的圣灵的传记一样。食物主要是小米、卷心菜和河边种植的瓜类，而猪肉、羊肉和鸡则是少有的奢侈品。

“外交部招待所”是一个有四间小砖房的院子，其中一间就是我的临时宿舍。我经常在这里和政治局委员及他们的夫人们一进起餐，我还教夫人们打扑克。过去不远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单间窑洞，只有一扇窗和一道通向一条小巷的门，仅有一个哨兵警戒。不久，我就常去那里谈话，不是早上，就在夜晚。毛定期邀我去吃辣椒馒头——或者吃毛夫人用当地的酸梅做成的甜食。接着，我们就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黎明。我记录的谈话有两万多字；此外，他还给我讲了几十个故事，我没有记下来。到后来，他讲了他的经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为什么他成了一个革命者，红军是怎样壮大起来的，以及红军称之为“长征”的始末。

当时，无论是战事或政治斗争上都处于暂息状态，毛因而稍有余暇。也许是我浓厚的兴趣和提问引起了他的反应，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跟我交谈。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毛后来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成了一位向美

国的亚洲政策进行强烈挑战的人。有趣的是，对后来发生的大多数事情，毛在二十年前和我谈话时就已作了预言了。他要求停止内战，成立包括一切“爱国力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说很快就能实现。他详尽而精确地叙述了他将要领导的抗日“持久战”（后来，他也确实这样领导了这一场战争），以及这场持久战将会以何种方式使革命取得政权。他也预言，日本不久就会进攻欧洲殖民地，进攻美国。他确信，俄国将最终被卷入一场打败日本的大战——并结束在亚洲的殖民主义。

毫无疑问，在毛的这些预言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的一切观点的依据，也有主观臆想的成份。然而，我必须指出，他并不指望速胜。他对我说，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到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他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十年，战争结束时，“中国革命队伍”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更有经验，更得民心，并将成为亚洲东部的力量。

毛并不掩饰这些目的，我对此也着重进行了报道。他从不隐讳，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抗日战争只不过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他沉着和充满信心，相信日本会给中国带来“机会”——事实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无论是毛或者其他红色领导人没有对我说过，他们是“土地改革者”或“资本主义改革者”——后来有人把这种说法归咎于我，实在奇怪极了。我很快就要找出其中的原因来。

“共产党，”毛一再说，“永远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目标。”

我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红星照耀中国》^①中载有他的纲领，任何人只要对它作过研究，就不会不看到，共产党多么希望奔赴辽阔广大的内地，把农民发动起来。当日本人把国民党和西方列强从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内地很快就要成为政治真空地带。

我暗地里常常为毛的奢求感到好笑，当时他的要求似乎比甘地想要以“爱的力量”征服英国人更为幼稚。他坐在那里，穿着两条布裤子，他的军队只是少数装备很差的年轻人，他们在最穷困的地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然而他那说话的神态就象是他的党对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有了毋庸置疑的权威。他显得很相信这一点，而且告诉西方列强说，将来自由中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和它们合作，什么情况下“不能”合作。爱默生说过：“每个人在出生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毛是千真万确的人，但他依然是一种未知数。因为爱默生的下一句警句就是“在我们看到成功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而当时看起来，毛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他古怪，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之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他的王牌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他那循序渐进的论证渐渐使我相信了它是“可能的现实”。随着他深思熟虑，有

^① 即《西行漫记》——译注

有条不紊地给我讲述他的富于戏剧性的经历，我开始看到，这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反映在一个对其意义作过深刻分析和研究的人的生活经历之中。因此这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了解未来事件的重要指南。我在一九三六年写道，在这个人的身上“你会觉得有一种天赋的力量，一种强大的自然活力”。中国的需求“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也许是不明确、难以言状的。但是，如果社会革命可以提供“能够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一极其富于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虽然，我因此对毛本人产生了比对当时的论战更大的兴趣，但是，要想收集他个人的历史却不容易。一连好几天，我们象是在捉迷藏，我感觉到，他在判断：能不能把他本人的真情告诉我；我会不会滥用他的信任来歪曲或误传他的话。共产党人回避谈论个人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在理论上，个人除非是一种历史力量，否则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还因为死刑时刻威胁着每个共产党人。不用真名是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

“但是，如果你想要结束内战，并且和其他军队在一个统一战线中共事，”我与毛争辩说：“首先得让全国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多年来的宣传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了解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他再次避开回答我的问题。

有一天晚上，在回答了所有其他问题之后，毛转向我开列的“个人历史”问题的清单，听到翻译念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时就笑了。我发现，原来这个问题被误译为“你有几个妻

子?”了。

“我们实施男女平等的法律，废除一夫多妻制就是其中一项带根本性的改革，”他说。当我说明了翻译的错误后，他平静了下来，但依然拿不定主意，是否值得为澄清“对个人的流言蜚语”而浪费时间。

“你不是说过你曾受到乔治·华盛顿的为人和卡莱尔^①的《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鼓舞吗？”

他拿起我的问题单，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终于提议说，“让我概括地把我的经历讲给你听好吗？我想，那样更好理解些，而且最后你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只不过不按这个顺序罢了。”

在此后连续几个晚上的会见中，毛带来了他本人写的提纲。他给我的不是需要我花很大工夫去整理和连缀在一起的素材，而是一份大致完整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代革命者的叙述。

这部传记出版后在中国拥有数百万的读者，它还被翻译介绍到所有殖民地国家。

毛对传记作者的影响被作为我的部分经历写入书中。

窑洞里的预言家

毛泽东那时候四十三岁，只比我大十四岁，但他的阅历却比我丰富得多。他可以给我许多教益。他是个能干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如果中国没有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

^①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译注

民，如果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肯定能从土地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穷人，而且如果城乡的有产阶级的人数不是那样少，他们的利益不是与中国落后的经济那样息息相关，中国就不会发生这场革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而毛泽东就是他们的预言人。他和他的政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绕过有产阶级，在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仍然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广大农民之间建立了联盟。

毛对中国大地和在这个大地上生息的人民的了解远胜于同时代的任何政敌。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农村，行程万里。作为一个旅行者，我对此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在暑假里走家串户，靠帮工换饭吃，有时甚至行乞。有一回，他整整一个星期只吃生豆子和喝冷水以“锻炼他的肠胃”。说来也奇怪，毛嗜好这种不寻常的远足，在早期就对贫苦农民有所了解，并喜爱他们，是因为他憎恨他父亲，他父亲是富农，他想方设法要离开他。他告诉我，他父亲的严厉是造成他自幼就具有反抗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象他把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同情心归结于受了他慷慨慈祥的母亲信奉佛教的影响一样。他的一些早期的经历也许有助于说明在“理喻”和暴力之间的古怪的选择。

毛的父亲为了让儿子们绝对服从他，经常打他们。泽东九岁那年，他逃出了家庭，以此对打他的一位教师进行“精神反抗”。他的母亲进行了干预，他被转到另一所学校。然而，他父亲继续打他，毛不久又反抗了。“这一次，我得到了家里反对党的支持，”毛笑着说，“包括母亲、我弟弟和雇工。”他退到附近一个池塘边，威胁说，如果他父亲不答应“改过”，他就要投水自

尽。于是“敌人”投降了。

“就这样，我知道了，”毛回忆说，“当我用公开反抗来维护我的权利时，我父亲就会软下来；我要是逆来顺受，他就会变本加厉地打我。”

泽东十三岁时，他父亲贪财，要他娶一位比他大六岁的女子。毛再次逃跑，流浪了好几天，靠帮农民干活解决食、宿问题。母亲把他找了回来，家里也不再逼他履行婚约了。从那之后，父子停战了，但并不等于相安无事，直到泽东离开家，永远不再回来。

很多中国革命者都有过流浪的经历，只不过是毛比他们大多数人都更加坦率罢了。童年时代爱反抗无疑是毛得便秘的原因，此事在保安无人不知，因此毛每周解大便一次也成了值得庆贺的大事。我问他，在他当时担任“国家”元首那种比较安定的生活和战斗的“流浪生活”两者之间，他更喜欢哪一种，他回答说：

“我更喜欢过战斗生活。我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狄德罗^①说过：“在一切社会条件下，使肠胃保持自由地蠕动乃是生活的一个伟大目标，”——历史学家们在探索“客观性”时，对这个鄙俗的笑话，注意得实在太不够了。毛的俏皮话是其品格的有趣的反映。他说起话来简单明了，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听得懂。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或者说是位能摆好自己与人类的关系的人。

还有一次，我和毛正与林彪谈着话，窑洞里热了起来。“妈

^① 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译注

的，太热了！”毛说着，脱下裤子，又坐了下来，那神态就和甘地缠着腰布时一样自然。他很风趣，爱说也爱听各种轶事。有一回，他要我尽量把我能记得的有关卓别林主演的影片《摩登时代》的情节都讲述给他听，他听了后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毛决不完全是个农民。他是个杰出的书法家，喜欢写诗。他的性格有浪漫的一面，几次结婚是他的一部分带有启示性的逸事——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是他在北京大学当学生时遇见的一位伦理学教授的女儿，在内战期间于一九三〇年被逮捕杀害。在大学里，他在文学和社会学方面很有造诣，但作为宣传者，他是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进行讲演的大师。他跟老百姓谈话时，一般不搬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原话，而是喜欢引用连没有文化的人也熟悉的民间故事和通俗史话。他最喜欢的小说是《水浒传》，那是一部禁书，描述反抗腐败的宋王朝的农民起义。赛珍珠^①缩写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改书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部书刻画了中国人的性格，就象《卡拉玛佐夫弟兄》刻画了俄国人的性格一样。我猜想毛是把自己比作农民起义的首领。《三国演义》同样也是一部为中国百姓所熟悉的伟大的历史小说，毛和其他共产党人也常常巧妙地运用书中的情节，结合本国的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分析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换句话说，毛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不讲人家听不懂的话。然而，一旦写起严肃的“辩证法”著作来，他就象马克思一样能写，是马克思第二，他经常写有关党的理论的文章以巩固他的

^① 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美国女作家，生于传教士家庭，自幼随父母长期侨居中国，在中国大学教过书。——译注

主要理论家的地位，跟从俄国回国的留学生比高低。与留学生相比，他的优势在于他对中国的形势了如指掌，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贯彻当时莫斯科“路线”的能力。通过研究毛驾驭理论的本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切政权都受到其支配问题的制约，一切理论都需根据政权实施的情况加以修改。

马克思主义给了毛现代的剖析政治现象的方法，它比蒋介石的军阀加儒教的糊涂观念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对复杂的外部世界缺乏广博的知识，这后来成了一个不利条件，但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施展才能。对毛来说，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等于是哲学和宗教，但是，他从不声称已穷尽最终真理。

“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他有一次说，“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

我曾试图找出毛在党内的力量的源泉——仅仅作为一个人，而且象共产党人常说的那样，撇开他的“客观”作用不谈。他是个复杂的，而且似乎是充满矛盾的人。

毛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能回忆得起来多年以前与人谈话的日期，客人的姓名，谈话的确切内容和事件的细节。他领导党很有艺术，不是采取明显的方式，而是采取间接、微妙的方式。他经常同各种委员会的成员磋商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试探他们的意见，然后把人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统一起来。他先跟他们一一进行个别谈话，等到他确信意见一致时，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结论。他自信命中注定要当领导。但是，他待人接物，却是很随便，不装腔作势。他对忠于他的人开诚相见，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也宽宏大量，反对他的人会渐渐失掉影响。与毛在一起是很愉快的，

他总是可以找到谈话的题目。他非常健谈，以至很难相信他也是一个注重实际行动的人。毛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也确实有很强的分析能力。他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知识，仅限于他在紧张的行动和思考的生活中从所读的书籍里了解到的情况，按西方的观点来看，他的弱点是，他相信苏维埃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判断都受到武断的影响。但是，即使如此，他对外界还是充满了好奇心。他常常表示遗憾，他不能既在中国进行革命，同时又到他青年时代在书上读到过的那些国家去进行一番实际考察。

毛承认他对许多事物一无所知。他对美国极感兴趣。他从未离开过中国，因而对已付诸实践的立宪民主也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他在理论上知道美国的制度，而且研究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

毛从未想要我参加共产党。别人也没有这样做过。不过，毛有一次问过我是否希望美国发生革命，如果发生革命我会不会参加。我说，如果美国也象中国那样贫穷落后，如果人民也受到这样寡廉鲜耻的压迫和剥削，遭受那样残酷的杀害，如果美国儿童也被当作奴隶一样地买卖，如果美国一直是个专制国家，现在又由军阀统治而不受人民权力的制约，如果美国人没有参政权，既不能参加选举，又不能行使弹劾的权利，如果工人没有结社或者进行集体交涉的自由，如果美国的统治者假公济私利用国家银行为私人经营的企业提供资金，而又不公开帐目，如果美国最有权势的家族是最富有的投机商，如果外国人霸占我们的港口，并控制了我国大部分的经济，如果我们不放一枪就丢掉了整个美国的北部，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可循来组

织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果在美国也象在中国一样存在上述种种情况，如果除了进行武装反抗之外，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或改善国策，也无法改变或改善生活条件本身，那末，我的确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美国，”毛听完我这一番议论后笑着说，“将是最后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

“中国也会是最后实现民主的国家吗？”我反问。

“不，我们希望会是第二个实行民主的国家，”毛回答。

“你是说——俄国是第一个？”

“只有消灭了阶级，人民，而不是私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时，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实现。”

毛并不盲目相信俄国的一切。后来证明，他利用斯大林的本事并不亚于斯大林利用他的本事。在私下谈话中，毛指责共产国际的俄国代表应对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事件中遭受的灾难负责。斯大林当时领导着共产国际，而毛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的——一九三四年前，他曾几次被发现持反对意见。一直到了一九三四年，他的领导地位方在莫斯科勉强得到了承认。

毛在和我的交谈中称苏联为他的“忠实的盟友”。毛一边吃着酸梅做的甜食，一边不无嘲讽地谈到了“口惠而实不至的俄国援助”。事实上，此后九年间，俄国人也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多少重要的物资援助——九年里，尽管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援助蒋介石，共产党人的人数和力量却大大增加了。毛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和华盛顿的游击战略中汲取了重要的教训。尽管接连不断地退却和受挫，他和朱德在持久的消耗战中完好无损

地保存了他们的军队的主力，等待有利条件和“时机”。

经过二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了一种独立的民族革命传统，这一传统在同志情谊的熔炉中经受了战斗的考验，人人休戚与共，领导人之间团结一致，这一点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做不到的。有了这一传统，即便是他们的惨重的失败也被看作是中国人爱国主义在道义上的胜利而受到颂扬。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在南方失败后，被迫向西北转移，此事在人民中被誉为英雄的“长征”。毛泽东是长征的主要决策人。他为我亲笔抄下了他作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一首诗。在他的译员的帮助下，我当场用英文意译了出来，诗如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只 争 朝 夕

毛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我之后，我在收集另外几十位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时就没有什么麻烦了。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人的传记，就不难看出，中国全民族的经历决定了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除非国民党能够通过奇迹般的改造，迅速地实现深刻、激烈的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青年人最初读到马克思的激动人心的战斗号令时，他们认为它不是对一八四八年二月欧洲

的形势的分析，而是对他们周围环境的真实写照。马克思说：“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①即使在美国，相对文明的劳工法案也才颁布三十年左右。而在中国，存在童工、女包身工，十二小时的工作制、工资不足糊口，病、伤、失业和老年均无保障，也没有集体与资方交涉的可能性，人们为什么要对马克思的预言提出疑问呢？陈旧的宗族和行会制度下的保障已经崩溃，穷人不值钱，简直已经沦落到“纯粹的生产资料”的地步了。劳工陷于孤立无援的处境，自然是由于旧式农业经济在西方贸易的冲击下崩溃了，由于机械产品的涌现导致了手工业的破产。由于通过不断增加税收（比如，预征六十年的税）和收取高额的贷款利息以及官僚和军阀巧取豪夺公众收入等形式实施资本征收，到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只有少数自耕农有能力纳税了。加以饥荒和战祸，数百万破落农民家庭的“多余”子女被投入了已经膨胀了的失业劳动力市场。从我所遇到的每一位红军战士的经历中，可以了解到，他们都是这种农村大规模破产的直接产物。

这里只举两个富有戏剧性的例子。一位是朱德，他是红军总司令，毛在军队的知己；另一位是彭德怀，红军副总司令。朱德出身雇农家庭，因为贫穷，他们家有五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溺死了。幸存下来的孩子中，只有朱德受过教育；他没被溺死，而是送给了一家没有子女的亲戚，他们设法让他进了一所专为地主的儿子开办的学校。

^① 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36页。——译注

彭德怀小时候由于犯了一点所谓的不孝的过失，族中人决定处死他，幸亏他的一个叔父为他说情，才救了他一命；后来，他九岁时立约当了挖煤工。

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把《共产党宣言》当作福音书来读，这里十一、二岁的童工夜晚常常就被锁在屋里，在他们白天操作的机床旁，铺上几块破布睡觉，——我甚至在外国人治理的上海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人们对中国人为什么很容易全盘接受马克思对西方民主的虚伪性的蔑视与谴责，也用不着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看到的西方民主，只是外国巡捕维护用暴力在中国取得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这些传记作者了解到的第二点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吸引力，是因为民族主义——想要维护中国古已有之的强国地位的热情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共产党没有此等号召力。在美国，我已在前面说过，相信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蔑视“民族爱国主义”，而代之以一种宗教式的“对外国救世主的信仰”。他们必须基本上是一个神话狂——即使在脱离共产党以后，他们也往往还是如此。

然而，在中国，爱国主义、阶级斗争和亲俄这三者是较容易统一的。党的创始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俄国正在向孙逸仙提供直接援助，帮助他在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于是阶级战争的观点立即被接受了，因为中国的少数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金融家的买办或合作者。而中国人也更容易相信莫斯科的领导人，因为俄国的头号敌手正是那些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它们也是整个亚洲和非洲独立运动的直接敌人。

因此，与其国民党对手相比，中国杰出的共产党人更为西方化，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更加浓厚。他们不是手上长老茧的无产者，他们多数属于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先由我开始收集材料，后经我妻子加以充实而写出来的传记表明，在五十位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只有两、三位是真正的无产者（他们与农民和知识分子不同）出身。（一九四五年，无产阶级的代表增加了。）

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权力主义无疑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在孔夫子之前早就存在了。孔夫子只不过是把伦理观念汇集成典，用来使世界上最稳固的王朝制度和官僚政权合理化。拿社会行为来做衡量个人杰出与否的标准，个人服从于群体的利益和生存，实际上都是由鞑靼可汗们（还有其他人）输入俄国的律条，而可汗们的政治顾问及才智均来自于中国。虽然马克思关于全部历史是永恒的阶级战争的说法是一种创见，但是，他的辩证方法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却源远流长。惠施^①（公元前四世纪）派辩证论者早就提出了发展和变化的学说（无穷的矛盾中不断的对立统一），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了这一点，而黑格尔则是通过德国哲学从希腊先哲那里借鉴的。正因为如此，运用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义，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也没有异国的气息，而只是“中国旧瓶里装的新酒”而已。

这些人急急匆匆，只争朝夕。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和对欧美历史的研究，痛感中国的衰弱、落后及迫在眉睫的完全崩溃的

^① 惠施（约前370—310）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

危险。在探索如何解决个人和民族生存的复杂问题的过程中，有创见和才识的中国青年男女们都被权力主义的、革命的学说所吸引，因为其他的方法都试过而且失败了，因为时间紧迫，不容渐进，也因为中国历史一再证实革命方是生路。共产党人通常被指责为暴力的信徒和“个人自由”的破坏者，这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只有依靠武力的优势方能实现。如果要中国人对国民党的统治作一估价，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道义上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得人心，后者公开要打倒人数甚少的地主、军阀和通商口岸的银行家以及日本侵略者，为穷人夺取政权。

与美国人的看法相反，国民党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要与共产党人在道义上较短长，而只是与共产党人在使用武力方面比高低。知识青年参加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不论是解决个人的问题，还是迅速填补中国和先进国家在工业科学方面的惊人的差距，他们的办法是唯一的办法。那些早期就开始相信这一点的人们发现了一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不能解释的真理。他们发现，他们可以不经过城市起义，就能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

客观经验使毛相信农民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动力，但俄国人始终不同意这一看法。其他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相信，没有先进的工业无产者作主力，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开初，中国人也曾这样认为。在早期的城市起义(1927—1930)惨败之后，当时共产党已被摧毁殆尽，他们只有退回农村，别无选择。毛泽东和朱德在农村里建立了第一批根据地。此后，事态的发展使农民实际上成了他们人力物力的唯一支援者。他们拧成了一股力量，终于使共产党人在全国取得政权，在警察严

密防范下的城市工人阶级或俄国人对农民的帮助极少。

“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毛泽东在保安对我说。
“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反抗的背后总是有要求平等的愿望。”当然，要求平等的愿望有多种形式。任何革命热情和活力都掺杂了人类的极为复杂的需求和愿望。但是，在始终存在着饿死的危险的东方，辘辘饥肠就足以使数百万穷人起来反抗富人。

共产党人从不把土地再分配看作是目的。但是，他们看到了，只有先进行“土地改革”才能使农民参加战斗联盟，继而支持他们的主要纲领。在理论和学说上，共产党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实际上这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三分之二的更为贫穷的农民的政党，而国民党同拥护它的地主结合在一起，是无法声称代表农民的。

“我相信，”马克·吐温著的《圣女贞德回忆录》中的年轻侍从说，“总有一天，人们会发觉农民也是人。是的，是在许多方面和我一样的人。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发觉——到那时候！嘿！到那时，我想他们会起来要求承认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麻烦事会因此产生！”

共产党人实际上成了一支流动的、武装的、无处不在的宣传队伍，在亚洲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传播其主张。共产党人使亿万农民首次接触现代世界；他们为青年和妇女——他们自始至终是共产党的争取对象——开辟了前所未闻的个人自由和重要作用的新前景。他们答应给穷苦农民分土地，使他们免遭苛捐杂税、高利贷、饥饿和家破人亡之苦。他们要建立一个为

每个人提供均等机会的新国家，这个国家以共同劳动、共同享受为哲学基础，没有腐败的现象，为普通百姓谋福利。中文“共产党”字面上的意思是“共享财富的政党”。

开始的时候，这把火在中国燃得慢，但也扑灭不了，其原因是交通落后，缺少公路、铁路和桥梁。由于交通落后，就有可能在先是由外国列强控制，后来由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工业中心之间的广阔地带建立起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在内地，共产党能够指出农村怨声载道的症结所在，进行领导，激发起新的愿望，并建立起一支为他们的目标而战斗的军队。他们切实分配了土地，消除了一些最不平等的现象，推翻了乡村中豪绅的统治体系，而不为自己谋利，这时，农民就接受了共产党，并且最终同他们联合了起来。

农民过去从来不知“政党”为何物，而共产党却真的希望他们成为“党员”，这对农民们来说也是新奇而又有号召力的。因此，他们开始把共产党看作是“我们的”党，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尽管分得土地的农民后来不仅要承担其作为一个阶级要解体的重负，还要担负起革命战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担；尽管父辈分到的土地后来又并入了儿辈的集体农庄，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已发现“农民是人民”而且是和党联结在一起的。农民曾经从宗族制度那里得到保护，这个制度由于工业经济的冲击被粉碎了，他们因而失去了保护，如今是由党取代宗族制度保护他们。

二千二百年前，著名哲学家荀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①

^① 见荀子《王制篇》。——译注

“我们是鱼，”荀子的后裔，现代共产党人说，“人民是水，我们的生命离不开水。我们不骑在他们头上，我们和他们鱼水相依。”他们把这作为口号提了出来，而这些口号农民是能接受的。

出 路

我来到了边远的甘肃和宁夏，见到了正在进行训练和战斗的红军。这正是朱德将军领导的南方部队于冬天出藏东，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领导的西北先头部队会师的时候。时值史诗般的长征结束，红军从南方的大撤退，保存了力量，又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

红军跟我过去见到过的任何别的军事组织大不一样：军官廉洁，官兵生活待遇平等，十分注重政治训练，军队在每个村庄组织穷人参加革命委员会。简而言之，共产党人尽量要让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积极参加一个组织。

尤其引人注意的一点是，有许多少年儿童跟随着红军——他们是逃出来的奴隶、孤儿、学徒或士兵的儿子，要是在别的地方见到他们，你会把他们当作小叫化子哩。但是，他们在这儿却做饭、送茶水、演戏、宣传、吹号、侦察、甚至还当看护。他们备受爱护。我从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挨打，所以我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管红军这个队伍叫“父母”，而且热爱这里的生活。从这些被昵称为“小鬼”的红军追随者中，已经涌现了一批军官和党的干部。

鸦片是禁止的，贩卖儿童和妇女同样受禁止。权利平等

如男女平等已初步实现。妇女也可以分享一份土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普遍实行免费教育。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薪给，同红军官兵一样，每月五元，另由政府供给伙食、衣着、住房及其他补助。这里的“机关”不是发财致富之所，人们在机关服务并不是为了钱。不过，我不必对此作进一步介绍，它后来成了全国的革命的楷模，或者说是样板，许多人，反对的也好，赞成的也好，都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我在重读我和红军相处的日子所做的笔记时，我看到其中没有关于镇压手段、半夜敲门和集中营的记载——后来，我在俄国了解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我在红区到处走动，十分自由地向许多农民询问了情况。我同几十位共产党员作了交谈，一谈就是几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他们多数二十或三十多岁，少数四十多岁，有两、三位五十多岁。他们都是红军的指挥官和他们的下级以及党和政府的官员。我记下了共产党、红军、共青团、妇女组织和公安部队的发展史的概况，记下了他们的宣传方法和出版等的情况。我请党的理论家们谈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政策和实践。我观察研究了政治和军事训练、使解放区布尔什维克化的方法、对待俘虏政策及战斗情况。我将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写成了另外两本书。^①

事实是，凡我在西北所见到的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恐怖”，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恐怖”。我必须再一次强调，在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政策已从全力夺取政权和不妥协的阶级斗

^① 见《红星照耀中国》和《红色中国散记》。——原注

争过渡到统一战线的策略，统一战线力求团结除最顽固不化的旧统治阶级分子以外的全部力量。在动员穷苦农民参加土地和政治改革时，共产党人采取了说服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我相信，共产党人早期在南方采取过较为激烈和不让步的方式。

当时，在西北的共产党员总数只不过四万名。在被从长江流域赶出之前，共产党员的人数曾多达四十万。至江西苏区的最后一年及随后撤退到西北期间，共产党的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九十，而红军在战斗中和在长征中的减员超过了十八万，即他们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就在我到西北以前，共产党人处于五年里最为困难的境地。

党的书记洛甫告诉我，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五十多万共产党员遭杀害。他估计，蒋介石在长江流域发起的五次围剿中，三百万人丧生。而当共产党政权还在南方的时候，洛甫坚持说，经审判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不超过一千人。这个数字不包括战争伤亡人数，无疑也不包括早期的农民战争中，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被农民处决的地主、高利贷者及其他阶级敌人。^①

应该说，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

^① 我曾就中国两次内战期间双方伤亡总数询问过路易·艾黎，他是一位新西兰汉学家，（也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热爱者），在这些冲突期间一直在中国。他于1956年5月19日从北京给我回信说：“我本人也作过估计，从1927年反革命政变到1949年间，由于政治原因被处死，和在国民党在江西和福建等地进行“清剿”，湖南、河南等地人为的饥荒，各种“事件”（1948年内战重新爆发前的武装冲突及“边区战争”），直至国共停战谈判破裂后的全面内战中，死亡者的总数约为五千万。——原注

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如果我刚从美国来，我也许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兴许，我会认为共产党人是美国信条的对头，或者会从他们对现状的攻击中，看到某种将来对美国的威胁，但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衰弱的、濒临沦亡的国家，它和我们之间隔着万里海洋——而且在时间上有时看起来也象隔了一万年似的。我从没想过，毛泽东会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这儿不是密苏里，到处是贫困、无知、污秽、残暴、冷漠、混乱和普遍的绝望，七年来，我在东亚看到和感受到的就是这些。至今这一情景仍在我脑海里萦回。我所知道的“当政”的寡头和少数贪婪的占有集团，不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是腐败堕落的，共产党人却与他们形成了对照，他们都是些正直、无私的人。相比之下，他们的同胞，虽然也鄙视日本人和国民党，却忍气吞声过着受压迫的生活，而共产党人则随时准备为他们的理想而献身，他们把这一理想看得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

他们热情提倡科学，主张男女平等友爱，坚持民族平等，对未来抱积极的态度，因此我感到我与他们有共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种情况跟旧中国无所作为的宿命论大不相同，都是良好的一面。他们实行或提倡的改革绝非是田园俱乐部式的政治自由的理想。他们确实满足了人们对食、住的基本要求和对某种民主平等的要求。现在我懂得了这些都是亚洲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对我这个西方人来说，他们最能吸引我之处就是他们

断然否定神秘主义和使穷人失望的神仙，而相信人的力量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

他们主张团结抗日的“外交”政策，在我看来也是正确的。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否和莫斯科要求建立“反法西斯主义和侵略”的“统一战线”的路线相符，无关紧要。他们是否从中看到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也无关紧要。日本只须停止侵略中国，就可以阻止这种目标的实现。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自相残杀并不能保卫国家。虽然共产党和国民党将依然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如果想要使中国不至于沦亡，它们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共存。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策比反对者的种种论据都更有道理——无论在当时或者后来，它都较少受到存在于斯大林专制主义和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客观要求之间的令人痛苦的矛盾的损害。这种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陷于瘫痪。

我碰巧成了把共产党人关于实现国内和平和团结的建议传达给中国公众的人。在我就要离开保安的时候，毛把我叫到他那里，对我说了国共再次合作的“条件”。他说，简而言之，在全国动员起来抗日的时候，如果“别的党派”可以有代表参加国家机器，有合法存在的权利，那末，共产党将停止进行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任何活动，放弃“红军”的名称，把军队置于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之下，甚至同意国民党在共产党的区域进行督察。

我还要补充说一点，我通过封锁线到达西北才几个星期，我就感到我新认识的朋友们是可信赖的，于是我捎信给在北京的

妻子，让她也设法来西北相会。在这以前，她曾应我的要求，给我派来了燕京大学的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学生，叫王汝梅^①。他到保安时，恰值我对红区访问的后期。他陪我访问，给我当译员。尼姆毅然作了尝试，可惜运气不佳，未能走出西安。当时，秘密警察已从蒋介石的大本营来到这里，加紧对红区周围的封锁，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除了经他们亲自检查后认为无嫌疑的车辆可以放行之外，其他任何车辆一律不许通过西安—延安公路。尼姆和西安地下共产党的联系突然中断，她无可奈何，没精打采地回北京等我。翌年，她到延安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此刻当我听到她没有能够冲破封锁线时，我决定尽快回家去。

我们不得不绕一个大圈走出去。我早年日记中的一些片断可以反映出中国这一最古老地区的生活风貌，它注定要成为历史上最新型、也许是最有争议的社会的发祥地。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

今晨九时，离开保安，沿公路去西安。毛泽东还在睡觉，但是别人都出来送行了。他们陪我出了城门，一直走到红军大学。林彪将军正在露天讲课。他和学员们站起来高呼：“一路平安，斯诺同志！”我听了他们的祝福，联想到这些年轻人中间没有多少人可以活很久，心里不免感到难受。

我骑的马经过许多天的跋涉，加的草料是定量配给的，显得瘦了。它轻快地走在五、六个警卫员的前面。带路的是一位

^① 王留了下来，后来十多名燕京的学生也随他到了延安。王现在是外交部的秘书长。——原注

叫傅锦魁的青年。我们沿狭窄的保安河走了一整天。傍晚时分，到了一座大沙石山脚下的一家农舍，山顶上有一座古庙。唯一的山路旁的山坡上，石洞层层叠叠，就象一个硕大的蜂窝。

十月十三日

我们沿途每到一处歇脚，都受到贫协的接待，这里也一样。时值十月，村里一片节日气氛，到处悬挂着一串串红绿相间的辣椒，地里的绿油油的蔬菜和金色的南瓜也已成熟。

这些日子，我们吃的大多是“饸饹”，可是今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炒蔬菜，土豆（我执意要把它炒得焦糊！）油炸鸡，馒头和萝卜。中国士兵多么容易心满意足啊！

“好！真好吃！”大家齐声赞道。

“苦吗？”一位青年战士开玩笑地问我，“你在美国吃得比这好吧？”

“我难得吃到比这更可口的饭菜，”我真心实意说。我问他怎么才算得上“真苦”。

“没有米饭，我们就吃馒头，”他回答说。“没有馒头，就吃小米；没有小米，就吃玉米；没有玉米，就吃土豆，没有土豆，就吃蔬菜，没有蔬菜，就喝开水；没有开水，就喝冷水。要是连冷水也没有，那就是真苦了！”

十月十四日

我们在高坡上的一间茅舍里歇宿，从这里望下去，可以看到绿色的山谷和自离开延安后第一次见到的稻田。这间破茅舍的主人是一位四川人，迁居此地已有二十年了。我问他有多

少地。他说有“二十亩坡地”，因为他的耕地都在山坡上。他说，“本地人才能有平地可耕。陕西人只把坡田给外地人。你们国家里情况怎么样？”他指着下面峡谷里一片美丽的稻田，羡慕地说，“有人能有一百亩这样的好地，而我姓张的只是贫协里的一个穷汉罢了。”

然而，穷老张还是弄了几只鸡、一些蛋、土豆和卷心菜来招待我。我们又美美地吃了一顿，老张又端来了用乌豆、小米、花生油和辣椒做的汤，我们吃得更有味了。当我还要添一点时，他得意了，面露喜色地给我加了些。

张告诉我，他有三个儿子当兵：一个是正规部队里的骑兵；第二个在赤卫队；第三个在连部当马夫。他还有两个小儿子。他的独生女儿挨着他妻子和妹妹蹲坐在炕上。

十月十五日

今天，我们在荒野里走了二十英里的路，一整天也没有见到一座房子。这一带山深林茂。眼下是秋天，到处是一片赤褐色。我们看见了野鸡、几只鹿、野山羊和野猪。远在射程外的对面山坡上，两只老虎在草丛中乱窜。我们都放了枪，但没打中。我们都责备自己浪费子弹。这一天映入眼帘的尽是美丽的景色。几个月来我们看到的都是荒山野谷，今天可是大饱眼福了。

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在这里待了四天，我学到了一些新词汇。在这次红区之行，大部分时间没有会讲英语的人作伴，我学到的中国话比以前两年不连贯的学习中学到的还要多。

年轻的游击队长告诉我，他在这个地区已打了五年的游击。他依然两袖清风——除了妻子和一个孩子，他没有任何“财产”，他们也都和我们同住一间草屋。他没有冬衣，又很羡慕部队发给我的羊皮袄，我想把它送给他。他拒绝了。有一天，我和他坐在炕上谈了三个钟头。他对我说，“白”军士兵的态度愈来愈友好了。几天前，他带领一批男女到了“白”军营房的边缘，唱红色歌曲给他们听，由一个男子弹乐器伴奏。他说，白军士兵三三两两地逐渐走了拢来，和他们攀谈，称兄道弟。过了一会当官的来了，他们隔老远听到他大声嚷嚷：“打死他们！开枪！”。说到这里，他哈哈地笑了起来。

“他们开枪了吗？”

“开了枪，”他说。“他们朝天开枪。第二天，他们全被调走了。”

十月十九日 在东北军防线

今晨由一军官护送至此，他是我进入红区时见到的第一位军官。他此刻带领我走过无人地带，来到平原上，一批东北军士兵正等候着。一位衣着整洁的年轻军官前来迎接我们，他身佩一柄金色剑，戴着白手套，提着一只热水瓶。我们互相致意。我和陪我来的军官握手言别。当他转身大步越过平原往回走时，我向红区最后看了一眼。

“白军”军官领我去见他的团长。我和团长一起吃了饭。第二天早上，我钻进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在另一位带白手套的军官的陪同下登程。他送我到西安市中心，经过鼓楼，进了一座房子——根据张学良元帅的命令，我被安排住在这里。

我的红区之行结束了。但是临了发生了一桩意外之事，差点儿使我枉此一行。我下车时，发现我的提包不见了——里面装有我所有的访问记录、日记、笔记和第一次在苏区拍摄的照片。事情是这样的，我乘的那辆卡车装着一些麻袋，里面塞满东北军送去修理的破枪支；为了避免受到检查，把我的提包也塞入其中一个麻袋。黑夜里，所有的麻袋被扔在离西安二十英里的一个军火库了。

我费了好多口舌才说服了司机和那位军官立即回去找回那些贵重物品。我一夜不曾合眼，心想万一我那提包被军火库的国民党宪兵发现没收，不知会有什么后果。第二天一大早，我的朋友们踉踉跄跄地进了屋，带回了我的提包，提包原封未动。使我倍感幸运的是，他们回来不久，城门关闭了，通往西安的所有公路旁都布满了蒋介石的卫兵，交通全部断绝。蒋介石突然飞来西安视察。要是稍晚，我们的卡车就别想要通过紧挨着重兵把守的机场的公路了。

在蒋介石的那次视察期间，保护他的警戒是森严的，但它却不足以使他免遭逮捕。几星期以后，他要回南京时，把他抓起来的，正是被派去保护他的部队。

那时，我已经回到了北京，而关于我的红区之行的消息，报刊上已有很多报道。

从西安事变到抗战

我秘密回到北京两天后，我们家的电话铃响了。尼姆拿起话筒。吉米·怀特小心翼翼地打电话来打听我的消息。我离开

这许久时间里，尼姆对人说，我去内蒙古旅行去了。吉米问她最后一次听到我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噢，就是今天，”她如实回答说，“他很好”。

“你能肯定吗？”

“绝对肯定。怎么啦？”

“我们接到来自西安的消息，说是他被共产党处死了。美联社已在美国发了电讯了。你听说了吗？”

我原来希望在北京公开露面之前，把红区纪行的大部分写好，供连载用，（为避免新闻检查，稿件先送到大连再用电报发出）。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能拖延时间不作说明了。于是，我拿起电话同吉米进行了交谈。不久之后，英国和美国的报纸编辑纷纷来电询问我的神秘之死。几小时以后，我到了美国使馆，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 my 红区之行的主要事实。我的同行们及我本人写的报道，在国外发表之后，迅速传回了中国，并在远东所有报纸上登了出来。我还把和毛的长篇谈话的全文，连同苏区情况的综述，交《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它在学生和国民党官员中拥有广泛的读者。

这一切引起了轰动，震惊了南京。自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我在南京并不受欢迎。在我离开期间，尼姆也没能博得南京方面的好感。她在西安时，为我代行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的记者职务，曾设法采访了张学良少帅，他向她发表了富于刺激性的谈话。我一回来，尼姆得意地让我看了她写的报道，其中的要点是，张少帅赞成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声明。她还报道了关于张本人“正准备与红军结盟”的“谣传”。

消息发表后，东京方面要求对此作出解释，南京外交部匆忙予以否认。但张本人不置评论。

“他说的远远不止这些，只是不让发表而已，”尼姆说。“他要求蒋介石释放被捕学生，承认救国会为合法团体。他要求成立有各方面军队的代表参加的国防政府。他坚决反对重新发动反共战争。我在西安听说，他甚至已要求蒋介石解除他的负责与共军作战的职务。”

至于我的报道，南京最初说是招摇撞骗，断言我从未与共产党人接触。当我发表了一些照片加以证实时，新闻局就威胁要取消我的新闻记者的特权。然而，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派了特务来找我，企图打听我是如何越过封锁线的。据日本人提的问题来看，他们认为我此行得到南京方面的赞助。而国民党的情报官员则似乎认为我是由俄国人的飞机送入红区的。我对他们说，我只是从蒙古徒步进去的。人人都办得到。他们干吗不试一试？

就这样，毛的建议的详细内容在全中国和日本传开了，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赞同。甚至在南京，一些高级官员私下也承认张少帅的话有道理，他说，十年内战未能统一中国，现在只有实行全国抗战，国家才能统一。十一月，日本人又在绥远挑起事端，人们对蒋介石继续执行绥靖政策十分反感。张学良请求派他带领东北军去绥远加强对日本的抵抗，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学生们纷纷起来示威，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救国会不顾政府禁令发起了抵制活动，以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在早已没有共产党活动的城市里居然也发生了公开的群众性政治活动，这使国民党手足无措。蒋介石对此作出的回答是，武装镇压上

海和青岛的工人罢工，逮捕更多的爱国者。

我自西北回来六星期之后，全国的局势就是如此。而在西安，蒋介石与少帅之间的斗争则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在城内，蒋介石亲信的宪兵已接替了东北军，后者奉命撤至城郊。蒋介石此时已风闻，东北军中有共产党人渗入。奉蒋之命，西安的许多共产党嫌疑犯被捕，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十二月七日，蒋介石带领他的幕僚和卫队来到西安，坐镇指挥第六次对红军的围剿。有几支他的一线部队正进军陕西，以替换张学良的前线部队。他们已把张学良的许多年轻军官列为“左翼同情者”，计划在换防完毕，即把他们交军事法庭处置。

蒋介石回西安四天后，张少帅的部队重新进城，于深夜发动兵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幕僚。翌日，张少帅通电全国，阐明此举是一种“爱国行动”，目的在于规劝蒋介石执行孙逸仙博士的遗嘱——召开国民大会，选举临时代议政府，结束内战，全面抗日，承认一切“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保障集会和言论自由，进行拖延已久的土地改革。

张学良的纲领实际上同毛泽东对我说的建议是一样的，而且与共产党在十二月一日，即蒋介石被扣留前十天，发表的七点声明如出一辙。还有一个事实进一步表明共产党和少帅是密切配合的：十二月十一日，在东北军南撤的同时，红军开进延安，南下至西安城郊，东进至黄河。

我想在这里对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命运西安事变的“内幕”作一番新的记述。对张少帅采取这一极端步骤，与红军结盟，成立西北自卫政府的动机，许多人已著书作了解释。但是，他为什么决定取消联盟，在拘禁蒋介石两周之后，又释放了他，

并随他回南京接受审讯——而且至今尚被囚禁在台湾！——其原因从未完全披露过。就我来说，我在写西安事变时，对其了解的程度比一般人要多，因为无论在事变前，或事变期间，我同共产党和东北军都有秘密的接触。尽管如此，我了解的也不尽全面。

直至不久以前，我才得以提供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多少改变了历史学家对其作出的解释；但是，对一般读者，我就不必在这里重复那些详情细节了。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透露，他害怕会受到共产党人的“公审”，也许还会被处决——因为他杀害了那么多人。实际上，人家只是对他实行中国人所说的“兵谏”。作为一个不情愿的客人，他不得不听取他的东北军下属和共产党对他的政策的看法——他的违法罪和失职罪，以及他们认为为拯救全民族所必须作出的改革。西安，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等待着这一独特的政治实验的结果。

不管蒋介石在被释放之前，对“救国人士”允诺了什么或拒绝了什么，西安事变实际的结果是内战的结束。少帅于圣诞节护送蒋介石安然无恙地回到南京。蒋介石悄悄地取消了对红军的围剿，亲自授权与共产党谈判。现在，国民党正式宣布，全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而以前蒋介石是一直坚持要“先安内”，即消灭共产党。过了不久，双方达成了默契：共产党可以保留组织，但须放弃“红军”的名称，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停止以暴力推翻南京政府，将“苏区”改为“特别行政区”，国民党将根据孙逸仙博士的遗志召开拖延日久的“国民大会”，所有党派均可有代表权。

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的谈判，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即陷于僵局。据与张少帅的东北军部属达成的协议，东北军和平地撤出陕西。共产党人再次受到包围和封锁。国民党通知毛泽东和朱德，他们的军队也得“改组”，并分别并入其他部队——这是取消红军的捷径。七月下旬，我收到毛泽东的一封密信，他在信中表示对不祥的事态发展趋势表示“焦虑和不满”。他们似乎又面临着新的选择：要么灭亡，要么北上。

张学良曾“拯救”过共产党人。此刻，他们又一次幸运地得到了良机。七月，日本大规模地进犯中国，使共产党人摆脱了困境。蒋介石不得不搁下他消灭红军的又一次企图。蒋介石当然只是暂时停止了反共攻势，但已激怒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加以蒋介石又拒绝了与他们结盟，他们于是宣布：“让中国人恢复理智”的任务已刻不容缓。他们本能地误解了蒋介石的真正意图，兼以他们在政治上有一种错误估计的天才，日本人发起攻势，要“把中国从共产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东亚新秩序”。这一回，没有人能制止日本不可一世的气焰，直至亚洲的局面由于它的侵略而发生了变化，日本在这一过程中粉身碎骨为止。

我在北京城外的南苑目睹了八年中日战争的开端。在这之前数日我写完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最后一章。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作了一番预言，摘录于此看来是合适的：

“因此，只有一场（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十之八九将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才能把各种力量解放出来，这些力量能够向亚洲民众提供武装、训练、政治经验。使他们得以自由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国内的警察力量削弱到致命的程度，

这一切都是革命取得政权的必要的条件……”

我听到的幕后的响声确实是帝国崩溃的先兆。倘若说，我还能正确地理解日本在摧毁欧洲殖民体系的作用的话，我却还根本理解不到，这一切对我“中立”的故土会产生什么样的长远影响。

出 北 京 记

日本占领北京之后，以及日本人进攻中国的初期，北京已经失去了作为新闻中心的作用。《先驱报》要我转移到中国一方的前线去采访。我很乐意去，但是在没有得到长期失去联系的妻子的音讯之前，我不能去。

我当时正在写一本书，而我的妻子尼姆已经到了西安，打算第二次进入红区，准备收集资料写书。她所住的旅社戒备森严。午夜时分，她冒着被枪击毙的危险，翻过围墙出去。据我所知，她是得到一位很有胆量的美国商人的帮助，才得以脱险的。已经过了三个月，她最后的一次来信说是正要返回。战时交通阻断，我每日每时都盼望着见到她，盼望得到她的来信。

我当时不能立刻动身去，也有着其他的原因。北京战役之后，我家住满了政治难民，他们大多数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大学教授和学生，其中有东北大学的，或者东北大学的校长。他们觉得和我住在一起安全有保障，因为那时日本人还没有开始干犯外国人。我帮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出北京，另外一些人则趁黑夜翻越我住家后面的城墙出去。

他们当中有几个是我以前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逃出去后

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很快就在北京四郊发展起来。在他们的要求下，我同意让几个东北人在我的住家设置了一部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样一来，我这儿就暂时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

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有一天，一位已经逃到城外的教授的夫人托人捎信来，请我去吃饭。我到了她的家，她把我介绍给一位戴着墨镜短发齐耳的妇女。开初我没有在意。她却突然大笑起来。她大声说：“斯诺同志，你不认识我了嘛！”她边说边摘下眼镜。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那里见到她。她就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中国共产党的妇女部长、中共中央委员！

我上一次见到她是在陕西，那时她正患肺病，身体虚弱。此刻她告诉我，她是几个月前化装来到北京的。她一直在西山一座孤零零的庙里静养。北方的春天气候干燥，在西山有丰富的食物和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她的病渐渐好了。她对日本人入侵的情况事先一无所知，直到日军来到了她居住的村庄，她才挽起发髻乔扮成农妇，赤着脚匆匆越过田野，逃到朋友家里隐藏起来，直到这次同我见面。

“你不会在这儿住下去吧？日本人……”

是的，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危险，必须设法离开北京。我又可以助她一臂之力了。

从北京到滨海地区的铁路交通刚刚恢复，每天开出一列火车，十二个小时行驶不了一百英里。日本人对所有旅客都搜查。在天津终点站，凡是脸上流露出点政治思想的人，他们都一律逮捕。不过那时他们还没有干犯外国人或外国人的佣人。因此，

我同意让邓颖超装扮成我家的保姆，由我护送她去天津，到了天津后就商请吉姆·伯特伦帮忙她安全越过战线。伯特伦是新西兰记者，我的一位好朋友。

几天以后，我们乘车出发了，车厢里挤满了愁眉苦脸闷不作声的难民。颖超很快就在他们中间消失了。她看起来十足象个保姆，齐耳的短发奇迹般地改了样。车厢里很拥挤，人们无法走动。我们来到天津时天已黑了。我们等着走出围了铁丝网的场地时，我足足紧张了一个小时。在车站月台上，有十几个中国青年被人拽出行列，赶着上了等在那里的军用卡车。他们白净娇嫩的双手和他们身上的农民装束很不相称，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颖超于是把双手缩进袖子里面。“我是美国人，”我对日本检查员说，“美国新闻记者。”我接着车转身来对着颖超说：“她是保姆。”她张着嘴望着日本人傻笑。日本人草率地挥手示意我往前走，不检查我的行李，但是却轻蔑地把颖超草编行李袋的东西全倒出来，连看也不看一眼就撵她往前走。

小小的英租界里拥挤着五十万难民，他们等待着搭乘开往“自由”南方的客船。客船只有少数几艘，船票很难搞到。但是，坐头等和二等舱的外国人，却可以安排一两个佣人坐统舱。通过一个朋友的关系，我安排颖超给她从未见过面的一位绅士当“保姆”，我亲自在挤满人的舱板上为颖超找到一块仅堪容身的地方。

在分手的时候，她含着眼泪对我说，“斯诺，别回北京啦！在那里呆久了不安全的。”

“不用担心，颖超，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如果你比我先见到我的妻子，请你费心照顾她。”

回到北京后，我烦躁地等着尼姆的音信。

一个阴雨的早上，游击队联络员吴挺(音译)兴奋地来见我。他说，他们刚刚在郊区痛打了日本人，把日本人从一座古帝王的坟墓(我猜是恭亲王的陵墓)里挖到的大量钻石、红宝石、珍珠、黄金、翡翠和古玩夺了回来。吴提出要把这些宝物带来，让我代他们变卖掉。他可以打扮成牵骆驼的人进出有士兵把守的城门。中国人不是把超龄的骆驼牵去牧场吃草，而是用这些骆驼到附近的煤矿运煤。吴说可以把那些东西藏在煤袋里偷运到我家里来。

“那些东西值多少钱?”我问。

“我们那里有一个金饰匠的儿子。他说光珠宝一项就值一百多万美元。这些东西只能在天津和上海卖给外国人，中国人谁也不敢冒风险购买。”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在那儿可以脱手?如何开价?卖的价钱太低了怎么办?丢了又怎么办?”

“卖多少钱都不要紧，你是我们唯一可信赖的外国朋友，这事只能求你办。”他想想又加了一句，“当然，你可以扣除一成的佣金。”

我摇了摇头，吴的朴实的麻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那么，百分之十五怎么样?”他犹豫了一下说。

一百万美元的百分之十五可不是小数目，但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贿赂，现在更不能破例要义勇军的钱。他们为了祖国的事业迫切需要这笔钱。对这些财物不大光明正大的来路我倒可以不用管，那是一批盗墓人和另一批盗墓人互相争夺的事，本地人应当比日本人有优先占有这些财富的权利。

我在思考时，吴还是对我有误会。“好吧，”他最后低声地说，“不管卖得多少钱，你都可以留下二成半。这是我们所能同意的最高限额了。”

“我一分钱也不要，”我说。他看来很失望。“但是我要向你们另外提一个建议，你们把那些天主教徒放了，我替你们的珠宝找主顾，”我接着说。

我知道吴的游击队最近在西山一个修道院里扣留了几名意大利修道士，认为他们是日本的“法西斯同盟者”。由于缺钱缺武器，他们向天主教徒索取赎金。我曾经对他们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中国的事业。

“你这样喜欢天主教徒吗？”吴有点纳闷地问。

“我是在为中国着想，”我说。“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过多。”

“好！很好！”吴说。我们就这样谈妥了。修道士们很快获释了。我找到了一位肯帮忙卖珠宝的人。此人终于把这些珠宝卖出去了。我一直没有听说卖了多少钱。现在手头拮据，我不禁为自己不是绿林好汉出身，而感到十分遗憾，我放弃了本来可以劫夺一百万美元巨款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是，令人高兴的是，我很快就发现，有时写强盗的故事和当强盗一样可以弄到钱。开始时我写的关于中国红军的报道受到冷遇，使我感到泄气。我当时是《纽约太阳报》和北美报业联盟的兼职记者，但是我连续写了三十篇报道，他们一篇也没有采用。他们把我的报道压了几个星期而不向我作任何交代，我很不高兴，辞去了我在它们那里的兼职。我当时误以为它们决定不采用这些报道了。其实不然，《纽约太阳报》和《时代报》

(北美报业联盟在纽约办的报纸)都想把我的报道据为独家新闻，谁也不肯妥协。当我知道这个情况时，我已经把我的稿件全部要回来，交给别的杂志社发表了。

《星期六晚邮报》率先发表了我写的报道。接着亨利·卢斯把两篇附有图片的长篇报道发表在创刊不久的《生活》杂志上。此后来索要文章的报刊很多，使我应接不暇。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在头版连载我的报道，并提升我为该报远东的首席记者。不久之后，《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了，它立刻轰动了英国，在数星期内就销售了十万册以上。纽约兰多姆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的销售量，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写远东的非小说作品都大。后来我又出版了几本畅销的书，但是这部书的成功使我喜出望外。《红星照耀中国》会在国外“大受欢迎”是我始料不及的。

这些好消息大部分是在我离开北京好几个月以后才知道的。我在北京等候尼姆的音信时，为了解决一屋子政治难民的吃饭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我不止一次地盘算过好不好从吴的战利品中拿一两枚钻石去卖，换点钱应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终于从我们自己的电台收到了尼姆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这姗姗来迟的电报很长，电文脱漏不少，其中有句完整的话就是：“我很好，你最好还是到这里来。”

有了这个信息我就够满足了。我把在家里暂住的客人一一打发走，把电台包好交给了一时还不走的吉姆·怀特。几天之后，我就启程经由海路和陆路，兜了个大圈子，终于到了西安和尼姆会合。然后我们搭乘开往滨海城市青岛的火车，火车沿着弹坑累累的铁路行驶，速度很慢。到了青岛，那里的恬静的魅力使我们暂时留了下来。在这个季节里，在这茫茫一片令人

神往的白地毯似的沙滩上，通常总是熙熙攘攘，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渡假者，如今好象成了我们私人的海滩，三天里竟没有看到有别的人来这里海浴。白天经常下阵雨，映着阳光的雨丝是金黄色的，晚上海风习习，从附近的低矮山头飘来了松柏的清香，带来了沁人心脾的凉爽。这个当年由德国人修建的古老海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可爱。但是，在那些门口紧闭的房舍上空，以及一片寂寥的半死不活的市区，都弥漫着紧张的空气，预示着将要发生一场不祥的事件，我们随时都可能看到日军追逐汹涌澎湃的碧浪滚滚登陆。

我没有来得及看到日军的登陆；一星期后，这里来了一艘不速之船，是开往上海的。我们搭船离开青岛，短短的假期就这样结束了。

战争的实质

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

我惊异地发现，一个人的文章和言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唤起人们，甚至陌生的外国人，使他们行动起来，视死如归。我个人感到，有许多中国人是受了我有意或无意的影响而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的。当我听到我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在战场上牺牲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写作是有政治行动的性质。

一个美国人要为中国多做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不象美国商人为日本效劳那么方便。我对上海战争（代价很高、枉费心机，

是1932年事件的重演)的中期和后期都进行了采访报道。接着我沿着日军在中国奸淫烧杀的路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且再一次去延安,然后又折回上海。我写了不少有关战争的报道,但是我知道,一个不参加战斗的观察家,随时可以离开战场,万一被俘,也不象被俘的士兵那样是个真正的战俘。我这时候感到的,以及后来我在欧洲更加强烈地感到的是,一个战地记者,即使感到内疚,良心驱使他冒险去干了一般有头脑的士兵都不会去干的蠢事,只不过是摆摆“雅虎”的架势,虚张声势,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战争的旁观者而已。

我自己在中日战争时期的“历险记”,绝大部分已收集在一本书^①里了,我在书中描写了珍珠港事件前中国的境遇。在这本书中我只想探讨一下这场战争的政治实质,这场战争后来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大革命。

早在日本侵华满一年之后,就出现了十分奇异的现象。打了败仗的中国人民没有向敌人屈服。那里没有人象法国的贝当,或者匈牙利的霍尔蒂那样,打了败仗就向敌人屈膝投降。一九三九年,日军几乎占领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所有现代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甚至在国民党政府撤退到重庆之前,日本人就打垮了蒋介石嫡系正规部队的战斗力。蒋介石从此消极地待在日本人决定保持的一条不活动战线的附近。但是,奇怪的是,尽管日本人在各次大战役中打了胜仗,但是决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决不可能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

这种局面与拿破仑一八一二年在俄国的遭遇相似,他尽管

^① 《为亚洲而战》,1941年在纽约出版。——原注

打败了所有俄国将领，就是征服不了俄国，而且在那里沉陷困境。列夫·托尔斯泰曾在他的一本著作中^①写道：“法国人自从在鲍罗季诺打了胜仗之后，就再没有什么重要的战斗了，可是法军却完蛋了。”沙皇和库图佐夫及其参谋人员都知道，他们当中任何人只要认输了，人民就不会再听他那一套，就会唾弃他。中国当时的情况也是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出卖祖国，在南京当了日本傀儡政府的头目时，人民就唾弃他，他的影响也随之而消失了。如果蒋介石公开投降，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蒋完全懂得这个道理，史迪威将军也完全了解这种国情。除了他，懂得这个道理的美国人就寥寥无几了。

我们曾以为在物质上满足了蒋委员长自己提出的条件，他就会使“中国继续抗战”，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抗战决不是蒋的本意。这道理很简单，蒋根本没有使中国不抗战的能力。

托尔斯泰写道：“从焚烧斯摩棱斯克开始，在俄国的战争就具有了一种迄今未见过的战争艺术形式。他们焚毁城镇和乡村，一打完仗就迅速撤退。法国人在鲍罗季诺打了胜仗后，俄国人就撤退，焚烧莫斯科，追击侵略者，封存粮食，打游击战争——这一切都是不合常规兵法的，法国人埋怨俄国人打仗不地道，但是又有什么用呢……俄国农民举起棍棒威力不凡，那管合不合你的口味，合不合常规兵法，办法虽然有点笨，但是简单有效，本能地打在敌人身上，而且打个不停。”

^① 《战争的生理学》列夫·托尔斯泰著，1882年在纽约出版。
——原注

从一九三八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中国的大西方和南方，日本人从未受到被打败的国民党将军们和政客们的严重袭扰。而在日本人的战线后方打击日本人的是那些“举起棍棒”的农民。游击队来无踪，去无影，他们不屈不挠，搞得占领军日夜不安宁，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他们的打法是非正统和非常规的，搞得日本人的战线一直很不平静，尽管没有把敌人打败，农民游击队也的确没有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中国的政治前途要由他们来决定。只有共产党人懂得这个道理。共产党领导农民，训练他们用棍棒去偷袭敌人，夺取武器，把革命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使他们有一个誓死为之奋斗的目标。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人懂得怎样去组织农民。而国民党却不懂得，因此，到了一九四五年，他们的力量增强了十倍，而国民党则削弱了十倍。

一九三八年，除史迪威外，埃文斯·卡尔森，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认识到日本人战线后方游击队这种惊人发展的重要意义的美国军官。埃文斯·卡尔森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校。我们曾经在一起目睹上海战争的许多战斗情况。有一天夜里，我们坐在旅馆房间里聊天，心情异常沉重。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作出了一项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卡尔森对未来的一瞥

卡尔森和我刚刚看到了一名记者遭到无谓的牺牲。当时日军正在袭击上海租界四周中国抗日军队据守的最后一个地区。那个地方叫做南桃。我和卡尔森以及《每日电讯》的彭布罗克·

斯蒂芬斯在法租界内的水塔观战，说观战，真的是观战。上海战争是很古怪的，人们站在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就可以看到战斗横断面的全貌了，一边是中国军队阵地毫无掩蔽的侧翼，另一边是日军的阵地。

我们隐蔽在一堵砖墙后面，流弹和弹片纷纷落在我们周围，斯蒂芬斯为了写好他的上海战争目击记，想找一个更加有利的观战位置。他于是爬到水塔上去，待在那里观战，我们和战场之间隔着一条小溪。在小溪的对岸准是有人发现了他。突然，一排子弹向水塔上端射来，无法谴责任何一方的士兵，因为不知道无形的战线在那里。接着血和水滴到我们身上来。战斗暂告一段落后，我跟着卡尔森沿着水塔的梯子攀登上去，把斯蒂芬斯抬下来，这时他已经死了。

当时，宋庆龄就要离开她在法租界的住宅了。在一星期之前，她派人给我送了一瓶拿破仑牌的白兰地酒，附来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这是我父亲酒窖里仅存的一瓶了，一滴酒也不能留给日军。”看来今晚是把她的愿望付诸实施的好时机，我们打开了那瓶白兰地酒，我斟了一杯来祭奠斯蒂芬斯的亡灵。

“一个勇敢的人。”

“不错，他是勇敢的。”卡尔森皱起眉头说，“不过，依我看，他准是有什么非常不愉快的遭遇。”

“你是这样想的吗？”

“一个人不顾一切去冒生命的危险时，他的内心是会有一些斗争的，这我知道，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历。”

勇敢是一回事，而存心自我毁灭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这

番话出自一位早已有了名气的英雄，特别是几年之后又在太平洋海军中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之口，我是常记心头的。

“这不仅是斯蒂芬斯生命的结束，也是上海战争的结束，也可能是整个战争的结束，”卡尔森若有所思地说。

“那么说，你认为日本已经胜利了？”

“中国现在已经丧失了她的所有工业基地，没有工业，要同日本的那种现代化军队作战是不可能的。但是，是不是说日本就已经胜利了呢？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可能是想对了。我知道你会说毛泽东已作了回答，那就是游击战争。”

“你不相信游击战争吗？”

“在尼加拉瓜，我到处追击桑地诺^①领导的游击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低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的可能性。但是关键要有好领导，要有好领导和有士气。我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象你谈到的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将领那样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们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象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如果……如果……那么就会相信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

“你为什么不亲自看看呢？”

卡尔森眯缝起那双蓝色的眼睛，拉了拉高高的鼻子，然后咧了咧嘴说：“我也想到了这点。可是如果我出现在朱德的司令部时，他们会怎样对我呢？会把我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吗？”

① 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地诺曾领导反占领军的游击战争。——译注

“我想不会，”我说，“让我打听打听看。”

“亚内尔海军上将是我的上司，当然啰，他即使同意了，也还得向华盛顿请示，你不妨先行动起来，我这方面也着手去做。”

八路军在上海有代表，我知道他们同延安保持着无线电联系。我请他们帮我发一封电报给毛泽东。回电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欢迎卡尔森赴延安。

几天之后，卡尔森带着一封信去南京见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是八路军驻蒋委员长总部的联络负责人。费了一些口舌才说服了亚内尔，为了说服蒋介石更是费了不少工夫。卡尔森终于被批准去延安了。有一天，当其他的人都撤离南京，乘飞机逃往汉口时，周指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协助美国大兵偷越日本人的战线，进入游击队活动的地区。他就这样成了几年来第一个证实了看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的外国军事观察家。这就是：日军推进的速度很快，与此同时，红军也神速地深入敌占区开展消耗战，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后来，卡尔森上校会见朱德将军和其他将领，同他们一道步行或骑马走了数百英里的路途。他们打了许多场小规模的战斗，他都在场，他亲眼看到他们组织农民，训练农民，并用缴获来的武器武装农民。经过三个月的时间，他看到了不少东西，因此他离开游击区时感觉到有必要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来唤醒美国人，但是他的上司不同意。卡尔森是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为了能够自由地写作和发表言论，他暂时辞去了军职。

共产党人并没有减弱卡尔森对于美国原则的信仰，但是，共产党军队的训练教育方法、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指挥官高尚

的道德品质和精明能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的其他美国军事观察家都讥笑他的这种热情。特别使他们受不了的是，他认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长处。可是在上面，他却有一位对他的言论极感兴趣的人。他写了机密的报告专送白宫供那位很有兴致的总统参阅。三年之后，罗斯福支持卡尔森提出的计划：建立海军陆战队近战兵这样一种独特组织。卡尔森在计划中把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制度同他在八路军中体验到的官兵一致的战友关系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开创一项事业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美国人一直在奢谈中国是“世界民主阵线”的一部分，说什么中国要实现“全国团结”。这些措词主要是同盟国商定的神话。我们已经看到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和如何出于无奈不得不容忍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存在；但是，在其他地方共产党组织则是非法的。规定对共产党员判处死刑的法律从来没有废除。只有负有得到认可的战事任务的少数共产党员可以自由往来。八路军被允许在首都设立办事处，在首都办一份报纸。

同日本作战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两个中国，一个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边区政府(开始时很小)，另一个是由国民党统治的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其他地区。当时，各种无党派爱国人士都深信在抗战过程中将会产生一个能代表各方面意见、无愧于人民的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进步政府。由于有这种信念，“统一战线”时期最富于独创性和最有希望的试验——中国

工业合作化组织诞生了。它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和教育的机会，并且证明它的确是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国外称为工合，它的创始人是路易·艾黎、尼姆·韦尔斯和我。但是，如果没有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一克尔爵士(后来称为英弗查佩尔勋爵)这两位十分热心人士的发起赞助，工合是永远办不起来的。如果到1938年时，所谓的“自由中国”不是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农牧业的国家，我们也根本不会想到要创办工合。当时日本控制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地区，占有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机器厂、百分之九十的化学、橡胶和水泥工业，大部分矿山和铁路以及那些“现代”城市。中国半数以上的熟练工人集中在上海一地。战争爆发后，数以千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成了到处流浪的难民，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官员们和大多数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很难办，或者说根本没有办法。中国缺乏基础工业，没有基础工业就不能制造机器，而没有机器，就不可能进行生产。我和路易·艾黎以及尼姆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确信他们所抱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委托办理此事的第一批人中，有一位是英国大使馆的青年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我们事前就知道他是一个办合作社的热心人。他很快就把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一克尔爵士的兴致激发起来了。

“好哇，年青人”，约翰带我到大使的办公室时，大使对我说，“上次我见到你时，你是一位新闻记者，听说现在你要做工业家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呵？”我交给他一份我和路易共同起草

的“计划书”。计划书对中国的生产问题作了概括的研究，提出了在中国各前线地区、中间地区和后方地区建立工业的总战略，即工合，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此刻我已知道这位刚到任几个月的大使，在英国外交官中，是个有独立政见，一向自行其是的人。他一到中国就约见了我们，他当然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外交官。

趁阿奇博尔德浏览我们的计划书的时候，我一面端详他的面部表情，一面心里在琢磨：他真有这种兴趣吗？他不象他的前任们那样势利眼，一味谄上欺下。他喜欢旅行，喜欢交朋友，他要亲自了解一切情况。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当时内维尔·张伯伦仍然当着英国首相，阿奇博尔德爵士却公开反对轴心国，反对佛朗哥，反对日本。在非正式场合，他甚至对美国记者也表示了这种看法。而历任英国大使往往对美国记者冷淡、疏远和傲慢。有一天，我和他谈话，称呼他“爵士”，他不让我这样称呼他。他说，“我的朋友们都叫我阿奇”。他甚至没有一点架子。他的鼻梁弯，颧骨高，皮肤红，只要在头上插上一根羽毛，就俨然是一个印第安人的首领了。如果用一块小黑布罩住一只眼睛，人家就会把他误认为是一个海盗。他的老祖宗里确实有一个做过海盗的。他常常坚持说：那个海盗在阿盖尔留了六千英亩土地的祖业给他。克拉克·克尔在埃及得到艾仑比勋爵的栽培，官运亨通，超越了二十个职位比他高的人，很快就担任了第一个部长级的职务。如今他五十来岁，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前程远大。

大使放下了我们的工合计划书，点燃一支邓希尔牌的香烟，审视地望着我。

“请你谈谈，让我们听听”，他说。

“这个计划很简单，”我说，“这里有一个真空，因此我们打算趁早用好的东西去填补它，别让坏东西把它占据了。”

“别这样拐弯抹角了，开门见山谈谈你们的计划吧！”

“这个真空就是中国市场，我们想在日本货充斥中国市场之前，抢先用中国商品填补它。”

“好啊，可是你们从哪儿去弄到中国商品呢？”

“问题就在这里。工厂没有了，工人走散了，机器不是被破坏就是被抢走了。但是，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有的是原料。中国的幅员和美国差不多大，它是能够做到在粮食上自给自足的。中国有着无限的劳动力——有三亿人民的劳动力来源。”

“是吗”？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保护性的市场，它同根据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切断了联系，除了日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外国的竞争。机器不多，但是按我们的方式创业还是够用的。我们想把逃难的人——有的是有钱又有劳动力，有的只有劳动力——分小组组织起来办合作社。我们要把他们都组织起来，使人人都有工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各尽其能。我们的计划就是可以解决难民问题、日常消费品问题和战时生产的问题，等等。我们的“工厂”在开办之初可能纯粹是手工业的，但是，我们可以组织一支私运队，偷运进越来越多的机器。这些东西是可以弄到手的，我们短缺的是钱。”

“可是，为什么要办合作社呢？据我所知，中国人试过多次，屡试屡败。”

“合作社可以给人民在战争时期和将来一种支援。不错，销

售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过去全都失败了，但那些合作社都不是工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还从来没有试过。上述合作社之所以失败，并非由于它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是由于领导方面腐败无能，由于当地地主、商人和军阀的大力破坏。但是，也有两个例外的情况。由晏阳初领导在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实验，证明合作社是可行的。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在他保护下的县内的合作社办得很出色，日本人一来就不让他再办下去了。”

“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红区。事实上，红区的整个经济基本上是把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结合在一起的。你感到吃惊吗？”

“一点也不吃惊，那也是我自己的结论。不过，合作社并不是共产党垄断独有的。如果认为是共产党独有的话，那么英国早就布尔什维克化了，斯堪的纳维亚也同样布尔什维克化了。”

“说得对，合作社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工业民主化。但是，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行得通。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为统一战线合理的经济基础，原因就在这里……”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你们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合作社国家，使它逃避阶级战争，是这样吗？”

“从长远来看，要想不实行共产主义，办合作社企业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它可能也是国民党的最后一个机会。”

“假定我们外国人同意这样办，会得到哪些中国人的支持呢？”

“我们已经得到这种支持了。孙逸仙夫人是百分之百地支持的，他的弟弟宋子文也是百分之百地支持的。我把这事全盘

和宋子文讲了，他答应作为一个私人银行家尽力相助。但是，孙夫人和宋子文目前都不愿公开出面支持这项事业。其中的原因你是知道的——是家族内部的宿怨和嫉妒作怪。凡事必须首先征得蒋委员长的同意，也就是说要先征得蒋夫人和孔夫人的同意，由她们把主意端出来。”

“我明白了，”阿奇的一双蓝眼睛在他那苏格兰人固有的高鼻梁的两侧不断眨着，“你是不是选中我作为兜售你们的计划的推销员了？”

我点点头咧着嘴笑了。

“假定我同意，你是不是已经给我物色到了一位我可以随时请他出来主持这事的领导人呢？他有没有请到我们所需要的中国职员？”

“我真高兴听到你说‘我们’一词，阿奇博尔德爵士。不错，我以为我们已经物色好了一个主持这事的领导人了，他叫路易·艾黎。”

“我们到哪里才找得到他呢？”

“他就在这个租界当工部局的工厂视察。他对这个国家的劳工和劳动条件的了解大概不比在世的任何外国人少。更重要的是，尽管他明知这个国家落后，他还是爱她。他收养了两个没饭吃的孤儿，供他们在这里的学校读书。他是爱尔兰—英格兰血统的新西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他在战争年代的弟兄们给他在这里谋了个职位。路易·特·马尼波托是新西兰著名的毛利人的首领，曾用游击战的方式同英国军队作过战。他的父亲由于景仰这位英雄，也给儿子命名路易·特·马尼波托。由此可以想见他的一些家庭背景情况。但是，主要的是他

信赖中国，中国对他来说，是一种宗教信仰。他讲中国话，喜欢中国老百姓。他的头发火红，大脑袋，鹰钩鼻，身材魁梧，象一台压路机，双腿粗壮得象两棵挺拔的树木。他性格开朗豁达，既能吃苦耐劳，又有才智。

“嗯，我们怎样才能把他请来呢？”

“你可以协助他解除他同上海英国工部局的合同。”

“他能够组织起一个中国职员班子么？”

“他已经招募了一个核心班子，是由在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工程师和合作社专家组成的。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他们这样干，明天他们就会跟艾黎一道到内地去。艾黎的确是一个关键人物。

“我冒昧问一句，你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工作，也许是写篇报道。我和妻子准备尽量腾出时间来不仅把这个主张传遍全中国，而且还要传到同情中国的任何地方去。只要有钱和有机器，我们就可以着手办起来，我们将在各地组织委员会来执行这项计划。美国给日本运送的是废铜烂铁和枪炮，它不能给中国也运这样的东西，但是可以给中国提供救济——生产性的救济，帮助中国自救。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阿奇浏览着我们的计划书，一边翻，一边问。他最后说：“你认为共产党也将支持这项计划吗？我们可不愿意人家把它说成是英帝国主义接管中国的阴谋。”

“在这方面，宋庆龄是我们的保证人，共产党人不会攻击她。有必要的話，我也可以亲自去延安征得毛的同意。”

“一言为定，”阿奇高兴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我当尽力协助，但是别向任何人透露我参与此事。请你约艾黎来见我。”

我们在一起喝了酒，把这事确定了。我这样和这位全无正统观念但极有远见的英国外交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我们从此交上了朋友，情谊很深，终生不渝。

过了一星期左右，这位大使设法让艾黎摆脱了市工部局的职务，并且领到了一笔预付的年金。他们立刻去汉口。阿奇遵守诺言，在汉口向蒋委员长、蒋夫人和孔祥熙博士（他当时是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推销”艾黎。艾黎被任命为首席技术顾问。他很快就物色了一批可靠有为的青年，搭起了一个实干班子。他根据我们起草的章程和经过修订的合作社原则建立了一个机构。合作社的章程和原则规定，向第一批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和私人信贷，合作社的工人有权买下他们的股份，一俟他们受过这方面的技术训练以后，合作社就可以完全交由他们负责管理。

令人惊奇的是这项计划还真行得通！到了一九四〇年，我们在国外筹措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宋子文私人贷款二百万美元给艾黎和我，孔祥熙博士也从国库拨款资助，于是工合办起了几百家小工厂、工场、电力厂以及运输站和矿井。我们办起了技术培训学校、退伍军人和孤儿的职业培训中心、印刷厂、出版社、餐厅、门诊所和幼儿园，以及为文盲工人及其子女办了识字学校。工合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合理而健全的民主合作社会的样板，生产着种类繁多的军需品。我们还在华北日军的大后方办起了一些流动性的合作社。

合作社发展很快，政府除了提供资金之外，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工合的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差不多全是无党派的爱国的士。在那些志愿前来帮助工作的人中，有受过西方教育，

才能出众的男女，有不少是基督教徒，他们的收入很少，除了食宿之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这个组织里没有贪污舞弊和任人唯亲的现象，因此，有一段时间相对地来说没有受到官僚政治的控制。这是一个偶然出现的历史情况，正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工合很快就成了国民党政权中的极端反动分子的扼杀对象，而工合本来是可能帮助挽救这个政权的。

我成了一名传教士

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艾黎的任命，并答应提供行政经费和贷款。可是，我们在着手工作之前就听说过，诺言归诺言，兑现诺言又是另一回事了。孔博士最初给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后来就停止拨款。在此期间，艾黎和他的工作人员不仅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用，还要拿出他们个人的积蓄资助第一批试办的合作社。

艾黎到了汉口不久，就给我发来了一份急电，要求我立即赶到他那里，“否则婴儿就要夭折了”。我当时正在香港协助宋庆龄处理她领导的中国保卫同盟的工作，并试图在香港成立一个独立的“工合”委员会。我把艾黎来电的事对宋庆龄说了，商量的结果认为我应当去汉口了解一下情况。每天只有两班飞机飞汉口。在宋子文的帮助下，我订到了第二天的飞机票。但在最后一分钟，又因某个要人要搭乘这班飞机，把我挤了出来。这架飞机真倒霉，在飞到广州附近的上空被日军击落，坠毁珠江，机上人员几乎全部罹难，其中有受人敬爱的徐新洛——上

海银行行长，同时也是我们原来的上海促进会的会员。

“发生了什麼紧急情况？”当我到了汉口路易的公寓时这样问他。路易住在古老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大楼里。

“我们无法使圣人再施舍一个铜板，”艾黎说的“圣人”是影射孔祥熙。“政府拨了一百万元专款给我们，但是他停止支付，我破产了，我的人很不高兴，都快要离开我了。”

“我听说孔曾标榜自己对杰斐逊（指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译注）十分钦佩，你为什么不提醒他汤姆的名言？汤姆说过，钱财如粪土，金钱不分出去，就没有什麼用处。”

“圣人想的是要金钱下蛋，正象你们的《禽鸟世界》的编辑所设想的一样，”路易挖苦地说。

“我知道你遇到了困难，但是没有想到情况那样糟。如果能把克拉克-克尔找回来就好办了……”

“这件事只有你可以办到。”他说。

“我？我原以为你要我不公开过问哩。”

“嗯，太迟了，美龄已经听说你参与了此事，她不乐意，她本来可以促一促圣人的，但是她不会这样干。”

“那我又能做点什麼呢？难道你要我去向她叩头吗？”

“我的想法是你可以对她作些友好姿态，比方说你表示你要写文章报道她从事的工作，告诉她美国人对她为难民谋福利而制定的工合计划很感兴趣，志愿帮忙她等等。这样也许能够达到目的。端纳告诉我，由于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委员长作了那种描述，美龄决不会原谅你。”

威廉·亨利·端纳那时是蒋夫人的亲信，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和顾问。也是路易在蒋家朝廷中最好的朋友。这位很受重

视的澳大利亚报人和艾黎一样很会交友，我出生那年他就来到了中国。他身体和艾黎一样强壮结实，金黄色的头发，蓝眼睛。他也和艾黎一样正直无畏、坦率和热爱中国。不同的是，艾黎和老百姓在一起工作，相信他们，并且学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端纳则与统治者结交和帮助他们，不屑于学讲中国话。他所接触的大部分是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他常常在这些人中施加了惊人的影响。端纳在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办的《纽约先驱报》任记者时，不仅报道了辛亥革命时期起义军包围南京的事件，而且训练起义军用大炮轰开了南京城门。孙逸仙博士曾任命端纳为他的第一个寿命不长的南京政府的“外交秘书”。

端纳很早就在上海认识了“查理”宋，宋氏“朝廷”的真正“奠基人”。那时查理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排字工，由于出版了中文版本的《圣经》才开始发迹。端纳早在宋美龄还留着辫子的时候就同她建立了友谊。可是在国民党上台执政时，他并没有加入她和委员长的一伙。他当时不信任这个新政权，有他自己的道理。由于对前政府的效劳，他得到了犒赏，当局委任他掌管中国的第一个统计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新财政部长要端纳每月从拨给统计局的款项中回扣五千元给他。端纳于是辞去局长职务到满洲去投奔那里的统治者张学良元帅，那时张学良才二十几岁。

我1929年第一次在沈阳见到端纳，他介绍我认识张学良。他给我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使我能够在仓促间写出一则报道，预言日本人将于短期内找借口用武力征服东北。在东北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端纳一直跟随张少帅，为他出力和出谋划策，并帮助他戒掉了鸦片烟，以后又坚决支持他，甚至在少帅

扣留了委员长之后，还是如此，他是一个对中国忠心耿耿的正直的人。然而，在蒋夫人的劝说之下，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张学良，投到委员长的阵营中去。善于做对外联络工作的人，蒋夫人只要见一面就能赏识。他无私地不知疲倦地为她和为中国工作着，没有什么个人的企图。他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宣传家，当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一克尔爵士来争取他支持工合和艾黎的时候，他马上就看出工合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可以当作一种手段，用来为中国的事业和为他的老板赢得同情。

而此刻在汉口，艾黎对我说，端纳坚持，如果我们想得到蒋夫人对工合运动的全力支持的话，我就得有所表示，向蒋夫人“道歉”。

“你知道啦，我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还是尽量公正地记述蒋和美龄的，”我对路易说，“我说他们两人在西安都表现得很勇敢。”

“蒋在政治上的表现你怎么写美龄都不在乎，但你挖苦蒋在被俘时丢失了假牙，因此要士兵在黑暗中四处寻找，可把她气得跳了起来。

“真遗憾，我觉得这在当时似乎还是很有人情味的情节嘛！”那时为了挽救工合，我差不多到了卖掉母亲也在所不惜的地步。于是我对艾黎说我要去见蒋夫人，去恭维她在战时的工作（她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我要为英美读者写文章赞扬她对工合的支持。

在我快要动身去见蒋夫人时，路易急急匆匆地跑来找我，显得十分焦躁不安。

“看在上帝的面上”，他说，“千万别向她谈起工合的事！我

刚刚同端纳商量过。他说美龄连半点忙也不会帮你的，她刚听说你在香港和孙夫人一起工作，她此刻疑神疑鬼，认为你到这儿来不怀好意，准是要干某一种‘勾当’。端纳说，如果你提起工合，非但无益，反而会使我们的工合寿终正寝，别提一个字，一个字也别提！”

太迟了，约见的事来不及取消了。那天蒋夫人一见面就大发脾气。她唠叨了半个小时，指桑骂槐地谴责“诋毁他人的批评家”攻击她的丈夫、她本人和孔氏一家。她说他们正在为中国不惜牺牲一切云云。她谴责那些“诋毁和挖苦他人的批评家”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然而当我问她是否指我。她却说不是。不是我，那又是谁呢？也许是指她的姐姐孙夫人吧？究竟指谁我始终猜不透。我也不敢问任何重要的问题，她情绪激动，举止失常，但是，为了工合的利益，我只得一言不发，坐在那里听她讲。她大发雷霆，如果逐字记录下来，会是一篇有声有色的报道。但是，她要求我不要报道她的谈话，一句话也不要报道。我也的确从未报道此事。她在发火时也很有魅力哩。

当时，我的老朋友董显光(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也在场。他是战时宣传处的处长。在整个“接见”过程中，但见他双手发抖，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过去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使用的字眼“诚惶诚恐”，对当今朝廷的侍从们依然完全适用。第二天我们去晋见委员长，董显光颤抖得更加厉害。其实我们谈得津津有味，蒋一直对我们很客气。这次谈话是供发表的。根据我的观察，他对上次和我见面后，我曾写过一本多少有点争议的关于中国的书丝毫没有表示。我想他未必读过那本书。

这段小小的插曲预示了艾黎要使蒋宋孔家族维持统一战线的局面来支持他的“帮助中国自助”的计划困难不少。宋氏三姐妹最后都成了工合运动的名誉主席，孔博士和宋博士都是这一运动的赞助人，不过方式不同，一个是公开赞助，另一个是暗中赞助，而蒋委员长的领袖像则挂在工合车间里。这些情况在局外人看来是一大奇迹。其实，并不是什么神助，而是由于克拉克-克尔运用了外交手段和做了推动工作，使孔拿出了一些他的已经贬值了的货币。

但是这一次我们必须采取另一种策略。“只需做一件事，”我说。“我们得设法把子文拨给我们存在中国银行的二百万元拿到手。”

“在工合运动没有真正顺利发展之前，我们还不宜走这一步，”艾黎说，“如果现在圣人听到这件事，他会暴跳如雷的。你知道，他对宋子文又是恨之入骨的。”

“不一定要让他知道这钱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可以说是上海—香港促进会提供的一笔贷款，是从外国筹集的。孔作为工合的头头可能会很高兴，会勉强把他自己的钱拿点出来。”

“考虑到不会有什么损失，艾黎决定同意这样做。这个办法还真行！我和他签署了文件。回到香港后，我让银行过户二十万元中国钱（约合四万美元）给我们的委员会，然后把钱汇给艾黎。这笔钱帮助艾黎度过了难关。等到孔听到这事时，工合所属的一些单位由于得到这笔款的资助已开工生产了。果然，孔氏由于有了这个“外界帮助”的印象，很快就提供了一些贷款。

后来我对孔宋两家的恩怨又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此刻我意识到孔蒋同为工合的发起人使工合具有了“注册的地位”，

而大量宣传孔蒋创办工合，则是使工合可以坚持办下去的主要原因，克拉克一克尔对此也感到满意。我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是向国外大力宣传工合来支持艾黎，并且利用这种宣传来为他筹集独立的基金。这个运动在香港得到了许多有影响的人士的支持。由于这个海岛殖民地暂时还安全，于是我们决定以香港作为我们开展工作的基地。

由于得到庆龄的提议和帮助，又有子文作后盾，我们此时根据英国法律组织了中国工合国际协会。协会受权接受借款、赠款、物资和技术援助，并开始管理周转性借贷基金，主要是宋的贷款。克拉克一克尔争取到了香港总督的支持，我们还动员香港主教罗纳德·霍尔(他是一个虔诚慈善而且特别能干的人)出来担任协会的主席，他在百忙中抽出很多时间来为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和慈善家纷纷参加或支持董事会，人丁兴旺，资金也随之源源而来。

所有这一切，对于我和我妻子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活动领域，我们象传教士那样十分热情地工作。到了一九三八年年底，在英美两国就已经开展捐献活动，后来汇来了数百万美元。在国外，首先响应的是菲律宾华侨，他们的情绪最热烈，捐献也最慷慨。这个岛国人数众多的富有的华人社会一再邀请孙夫人或者我前往菲律宾为工合筹款，顺便帮助“唤醒”菲律宾人，使他们认识到日本侵略的危险。

一天傍晚，正当夕阳西落，我和尼姆坐在浅水湾的海滩上远眺，舢板船上点点渔火，渔夫们准备撒网夜间捕鱼。尼姆看样子很疲劳，我也感到很疲劳。简直疲劳极了。我由于十分专注认真地“推动”工合运动，致使我的本职工作受到了影响，于

是我只好把我在《先驱报》的那份工作交给鲍威尔做。为了扶掖工合，我也经常掏自己的腰包，不久我的手头也紧了。我想我得恢复写作，我有一本书可写，我还答应替《星期六晚邮报》撰写几篇文章。我坐在海滩上遐想，菲律宾在我想象中仿佛是人间乐园，也是暂时摆脱工合国际协会的工作的一个好去处。

“这些年头你都在研究欧洲的殖民主义，却从来没有亲眼看看我们美国人是怎样治理菲律宾的，岂不是咄咄怪事吗？”尼姆说。“干嘛不接受菲律宾华侨的邀请去那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回来的时候，中国还会在这儿的。”

在吕宋的插曲

从中国到菲律宾乘当时的“飞剪式”客机只需飞行两三个小时。菲律宾北境在台湾南面，距日本岛屿五十英里不到。但是，当时没有多少菲律宾人相信，在中国发生的灾难，将是他们要面临的灾难的前奏，只有十多万华人，几乎不需要对他们做什么说服工作，他们就相信菲律宾是日军侵略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令人惊异的是，菲律宾华侨的同种同族的感情很浓厚。他们一般地说比菲律宾人富裕。华侨领袖是一批具有爱国心和公益心的富有的华侨。这种情况同我在别的地方华侨社会中见到的情况没有两样。他们主要来自福建省（福建人也在台湾定居）。他们是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来到马尼拉的。这些移民来时身无分文，现在他们中有些人已成为百万富翁。如迪·庄，阿尔方索和阿尔邦诺·西塞普以及于启泰等，由于勤劳节俭和

做生意精明，已在当地的银行和工商业界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我们一到马尼拉，他们就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通过同他们的接触，我们体会到，华人对真心帮助他们祖国的任何美国人，都十分感谢和友好。

迪·庄是菲律宾籍华人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之一，是华人公认的领袖。迪告诉我，他原来是一个连鞋子都穿不起的孤儿，后来一个没有子女的商人收养了他，给了他一个发迹的机会。如今，他已成了这个岛国最有钱的华人。他对雇佣人员公平是有口皆碑的，当时据说在他的许多企业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劳工纠纷。有一天在宴会上，他问起红军的事情和我访问红军的情况。

“我们在菲律宾的华人”，他说，“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是不介入的。我们认为孙逸仙的纲领是好的，我们一贯信赖他，敬重他的遗孀。国民党政府没有贯彻他的遗志，我们感到遗憾，我们也知道它的缺点。但是我们指望出现一个战时的觉醒。至于共产党，如果他们为穷人谋幸福，实现人人机会均等，这正是孙逸仙要做的事。对毛泽东所说的话我并不是全都同意，但是我们尊敬他和他的属下，因为他们是爱国者。既然他们也抗日，我们就该帮助他们。我们反对打内战，支持通过民主和平的办法解决争端。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受全世界尊重的国家。我们喜欢工业合作社，并准备帮助它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对中国有利的正确主张”。

迪实践了他的诺言，是工合的最坚定的朋友之一。他慷慨捐输，并募集贷款，在中国境内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控制区帮助创办工业合作社。

我们到达马尼拉后不久，迪和其他华人商业界的头面人物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来宾中有美国和菲律宾的高级官员。美、菲官员提出来的问题，一方面表明他们普遍对情况缺乏了解，另一方面表明他们对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怀着同情友好的感情，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使我感到惊讶。当时还没有建立起中美菲战时联合救济组织，因此工合看来是适应了这方面需要的理想机构，它还可以激发人民起来，同仇敌忾，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

就这样，由于我们对中国事业所承担的义务，我和尼姆义不容辞地肩负起组织中国工合菲律宾促进会的任务。这个促进会的教育宣传和筹集资金的活动在效果上自然是反对日本的，因此很快就激怒了日本驻马尼拉总领事。由于日本人对奎松总统的办公室，特别是对他的秘书乔斯·瓦尔加斯有很大的影响（此人后来死心塌地为日方效劳），以致日本总领事得以使菲律宾警察局撤销了在马尼拉国家剧院举行大规模集会的许可证，而我是原定要在会上发表讲话的。美国高级专员保罗·麦克纳特立即进行交涉，使当局收回成命。他后来告诉我，他去见了奎松，通知他“只要美国国旗还在菲律宾上空飘扬，新闻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就要受到充分的保护”。

麦克纳特夫人出任工合菲律宾促进会名誉主席，进一步反映了这位高级官员对日本的蔑视，这使日本人更加恼火。后来麦克纳特的继任者弗朗西斯·塞尔的夫人也当了名誉主席。有了这种公开的支持，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纷纷志愿参加这项工作。其中有马尼拉的社会名流沃尔特·弗利牧师，他是促进会的主席，后来在马尼拉战争期间遇害；还有威廉·巴布科克和他的

夫人。巴布科克是一位公开反对弗朗哥的美国商人。在夏都碧瑶，由克劳特先生和夫人领导的促进会分会工作很出色，引起了矿业界美国工程师的兴趣。七十名工程师和其他数百名菲律宾籍美国人一道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愿，要求今后从美国援华计划中拨一批贷款资助工业合作社的发展。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了，而克劳特夫妇则在日本人的拘留营关了三年。

一九四〇年，埃利诺·罗斯福、赛珍珠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沃尔什发起组织了“中国工合美国促进会”。在菲律宾大张旗鼓地宣传工合运动，效果良好，中国官方在这方面的宣传则未免相形见绌。

在菲律宾逗留期间，我并不是全部时间都从事促进工合运动发展的工作。在吕宋北部云雾缭绕的群山中，我和尼姆发现并爱上了山城碧瑶。这个城镇四周长满苍松翠柏，有着天然的空调，气候宜人，有些松柏树上爬满美丽的野兰花，在美国人看来，不啻是一座热带天堂。我们决定暂时在这里安家，因为我既要抽时间写书，在菲律宾搞新闻报道，又要回到中国去为《星期六晚邮报》撰稿。

我们在菲律宾的那个时期，美国人的确是受欢迎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是很愉快的。虽然废除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与其说是由于美国人民要求取消我们对菲律宾的监护，倒不如说是由于商业界想取消菲律宾货物免税输入美国的规定，但是在效果上，却博得了亚洲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极大好感。奎松总统领导的自治政府开始执政以及一九四六年菲律宾取得完全独立后，大多数菲律宾人很容易看到在美国统治时期的所有好的方

面，而忽略了大部分阴暗面。

菲律宾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接着到来的那场战争中始终对美国 and 美国的民主思想忠心耿耿。成千上万的人加入游击队，同日军顽强地战斗了四年。但是，甚至我还在那里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出，身居要职的少数机会主义者已在准备，一旦敌人入侵，就出卖祖国，为日本和轴心国的胜利效劳。

如果说美国在训练菲律宾人如何维护政治独立方面有什么严重失职的话，那么，没有为主权国家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就是严重得多的失职。东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比这个人口稀少和十分富饶的岛国，更适合于通过实现本国工农业现代化来让人民过富裕的生活。可是我们的统治，却造成了他们的消费品实际上完全依靠从美国进口，而这些消费品菲律宾是可以自己制造或者可以不要的。与此同时，建立基本工业和培训技术干部，对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本来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的工作却一点也没有着手进行。

要了解殖民地自由放任的无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恶果，最好是在星期六下午去碧瑶看看，再没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更典型了。伊哥洛人光着脚丫子从矿井上来度周末，接触美国文明。他们不穿衣服，只在腰间围块缠腰布，挤进黄色的出租汽车，从矿区来到大街上。这些割敌人的头作为战利品的人的孩子们，赤身裸体在那里购买大批的画脸涂料、巧克力和可口可乐。这些商品都是免税输入这个食糖过剩的国家的。他们也买些便宜的装饰品和玩具。他们接着就排队等着看乔治·拉弗蒂殴打醉汉或与匪帮枪战的电影。暴力和罪恶的花花世界通过向菲律宾出口这种影片来熏染天真而未开化的人。伊哥洛人起码还在纺织

他们美丽的缠腰布，而居住在低地的菲律宾人吃穿用方面的制成品几乎全是免税进口的美国货。

一九三九年，我收到了路易·艾黎和为工合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寄来的报告，他们谈到了工合遭到破坏和政治诽谤的情况。作为工合的宣传者和争取外国支持的发言人我感到忧虑。我毕竟只看到了汉口沦陷之前、统一战线情况最佳时期工合创办时那种充满希望的情景。可是现在听到的情况是，在那个被赶到重庆的政府的统治下，反动、压迫和腐败的现象很普遍。庆龄催促我回中国看看出了什么事。于是我放下要写的书，回到了中国，在内地访问了几个月。这次尼姆留在碧瑶，没有同来。

蒋家王朝的内争

我再次见到孙逸仙夫人时，她对我说：“我们的朋友路易·艾黎好象又遇到麻烦了。”庆龄准备尽可能在香港多呆一些时间，而不愿在重庆过着经常受人监视的生活，不过她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使她能够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向了如指掌。

“现在遇到的是什么麻烦呢？”我问。

“你可以把它叫做政治上的小麻烦，有一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

大跳蚤背上有小跳蚤，小跳蚤咬大跳蚤，

小跳蚤背上又有更小的跳蚤，更小的跳蚤咬小跳蚤，照此类推，没完没了。

路易在国民党头子们陈立夫兄弟的心目中是只大跳蚤。他

们把他叫做红毛大鼻头的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工合越办越有成绩，反动派想把它吞掉！”

“这事我知道。孟云诚(译音)曾写信告诉我，陈立夫坚持工合总部要重新改组。每一次改组都意味着安排更多的国民党游手好闲者在总部里任职领薪。”

“哼”，她挖苦说，“他们会说那是他们的钱，他们不需要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告诉他们如何使用这些钱”。

“我们此刻为办工合所筹集的经费比国民党政府捐助的要多。如果工合成了国民党党棍们的又一个敲诈对象，外国就不会继续提供援助了。创办之初曾得到保证：工合运动的发展可以不受国民党官僚政治的支配。”

“也许真正的麻烦就出在你对艾黎作了过多的宣传”，庆龄说，“你不好写篇文章宣扬一下孔博士吗？”她说话时狡黠地向我笑了笑。

“难道你要我连中国都诋毁么？你知道，我去见过孔，的确曾打算捧捧他，把他树成我们工合的守护神。”“哦，是呵，我完全支持工合，”他说，“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是的，真是这样。”他接着说：“我和太太决不愿意看到我们纯洁的农村姑娘跑到大城市的工厂去做工，因为那会断送她们的贞洁。圣雄甘地的主张是对的，他认为：纺织合作社正是可以使姑娘们呆在家里做活，避免受坏影响的一种组织形式，我们可不能因为战争就降低我们的道德水准。”

“孔夫人曾想使艾黎离开工合，让他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替她经营一家纺织工厂，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庆龄机灵地问道。

“不知道哇，也许我应该就这件事写篇文章吧？或者写篇文章，描写孔发现工合不仅制造工具、机器，甚至制造手榴弹，并且还赚了钱而不胜惊讶的情况。不仅如此，姑娘们还保住了贞洁！”

“想象一下我们那位身上围着一块缠腰布的行政院长的形象吧！”庆龄呷着茶，想起姐夫这位大人物时呛了一下。

我说：“请相信我，孔要说的就是这些，这也是他对整个事情的看法。”“我是把这些写下来呢？还是写他的太太在外汇上搞投机的事？要不就写英国银行的代表西里尔·罗杰斯告诉我的事情。他说，英国商人都向他诉苦，说孔祥熙办公室在向他们订购武器时索取过高的佣金。”

“不，你不要写这些，至少现在不要写，”她郑重其事地回答。“尽管如此，还是因为有了孔博士和蒋夫人以及你们争取到的外国援助我们工合才得以独立自主地办下去。”

说得对。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曾去过重庆，后来又到内地，沿着“建有工合的路线”走了几百英里，有时我一个人行动，有时和艾黎一起活动。我在这期间的所见所闻，证明她的看法是对的。

到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初，我们办的小型工厂已超过二千三百个，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七十多个分部给予技术指导。从敌后游击区到中国的大西部，从蒙古高原到云南高地，都建立了这种小工厂。首先建立起来的是手工业、纺织、印刷和运输合作社，后来又办起了小型铁矿、铸造厂、煤矿、金矿和初级的金工车间，面粉厂、造纸厂、制糖厂、炼油厂、化工厂、玻璃厂、印刷厂、电器厂以及制造药品、军服、手榴弹、畜力车和

帐篷的小工厂。已有二十五万人依靠在工合做工为生。此外，还有四万名家庭工业的纺织工，接受工合的定货，为中国士兵制造军毯。

所有这些活动，都由一千名左右受过教育的非党青年工作人员负责管理。这些人中有工程师、经济学家、科学家、会计和各种技术人员和组织者，而路易·艾黎则是他们的首席技术顾问。他们的工资很低，生活条件很苦，但是他们感到自豪，情绪很高。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振兴中国进步的前途贡献力量。

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至少他们的这种理想是注定很快就要破灭的。

我们有必要再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蒋介石及其同伙是攫取了政权，而不是经过选举上台的。国民党的秘书长陈立夫于一九三八年宣称，国民党有二百万名党员，但是积极分子不超过二十万人，也就是说每五千名党员中连两名积极分子都不到。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识字，很少财产或者一无所有。国民党认为他们甚至还没有具备实行地方自治的条件。在全国人口中读过中学的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五，在一千人中上过大学的还不到一个。蒋夫人说一口带韦尔斯利口音的漂亮英语，宋子文博士具有哈佛大学的风度，凡是见过他们的外国客人往往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们就是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典型人物，这简直是大错特错。

就农民来说，“政府”无非是国民党任命的地方行政官员，他们同只占居民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土豪劣绅及其保安队沆瀣一气，实行往昔一样的统治。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其军队正是通过这些地方官员来维护以蒋委员长为国家元首所把持的中央

集权。这个政权一旦被日本人从沿海赶跑，一旦同大城市的半工业化基地断绝联系，一旦它的现代化小城市的许多中产阶级人士留在沦陷区或者破产后流落内地当难民，国民党要保住自己就必须实行大规模改革。在新的背景下，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农民，或者靠农民经济生活。他们大多数人都很穷或者一贫如洗，照旧维持开支大、铺张浪费、腐败和机构臃肿的官僚政治制度及其军队，就意味着强加给农民他们无法负荷的重担。

“我在哪里，政府就在那里”蒋介石这样对我说，他确实也是这样认为的。其结论必然是：“我不在哪里，那里就没有我的政府。”蒋的命令甚至在他自己家中或者在最依赖他的人们中，也不见得就能执行。他掌权依靠的是分裂，而不是团结。只有使他的下属分裂，削弱他们的地位，他自己才能显得强大。

国民党政府主要由下列的成分组成：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即官僚机构；军事特权阶级和军队，同政府有关系，但不归政府指挥；另外还有“宫廷集团”，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宋家王朝”。

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受CC派即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的控制。他们是一个军阀和秘密帮会头目的侄子。此人先是在党内给蒋介石撑腰。蒋与中共分裂后，陈氏兄弟交替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和秘书长。陈氏兄弟通过他们挑选的地方官员和党部头目（这些人同城乡秘密社团，实际上是帮会紧密勾结在一起）封官许愿，向绅商勒索款项或“捐献”。

但是，陈氏兄弟没有掌握军队。军队控制在他们的对手即委员长总部的黄埔派及其下面一些集团的手里。黄埔派是一批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将领。当时的黄埔军校由蒋

介石任校长，俄国专家当顾问。这些将领中没有几个打过胜仗的。只是由于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期间效忠蒋介石，因此以后他们就可以有恃无恐了。黄埔派和CC派常常为了分肥不均而发生冲突，而蒋则居间斡旋，不让任何一方变得过于强大或闹独立。

宫廷派的主要人物包括蒋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他们的姐夫孔祥熙；孙逸仙博士的独子孙科，他的年龄比他继母还大；蒋夫人的弟弟宋子文；蒋夫人的姐姐宋霭龄，即孔夫人。有人认为孔夫人比蒋夫人更有势力，因为她不仅有左右她丈夫的能力，而且有左右她的妹妹美龄的能力，她经常通过她的妹妹对蒋委员长施加影响。她的几个长大成人的孩子，也和宋家的几个弟弟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享有王室特权。宫廷派的每一个成员，都拉了一帮子自己的兄弟叔侄、七姑八大姨、朋友以及形形色色的亲信和食客，组织自己的“小朝廷”。他们在同CC派和黄埔派抗衡中，争差事、恩宠和赏赐，在这种场合下委员长又出来扮演慈父般的调停人的角色，来使各方保持脆弱的均衡，便于他操纵控制。

蒋也利用发行纸币的国家银行或半官方银行来使各派都从属于他。陈氏兄弟只从事银行的外围业务活动，银行的要职全由他的姻兄弟占据。财政部长通常由孔博士或宋博士担任。蒋显然比较喜欢孔博士，因为他在党内没有声望，而且从来不公开拒绝蒋的要求；但是孔博士对于现代银行的业务一窍不通。“他的智力只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西里尔·罗杰斯曾经以厌恶的口吻对我说，“如果我把他同我讨论银行业务的谈话录下来拿到国外去播发，就再也不会有人认真地看待蒋的政府了。”

蒋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宋子文找去解决财政上出现的混乱局面。

“子文”诚然是这个家庭中受过最良好的教育的人，他精通现代银行的业务；他也隐隐约约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而这正是蒋所憎恶的。吉米·希恩在《人物传》中，同情地描述了子文这个年轻人，说他既以社会主义为理想，但在实际中却又倾向于温和折衷、舒适和体面，心情十分矛盾。虽然他终于站到了反革命一边，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继续存在。在感情上他同情他喜爱的姐姐孙逸仙夫人，他们是他们家中唯一的革命者。由于拥有万贯家财，他无疑会昧着良心干些事，为了减轻内疚，他不时帮助庆龄，甚至通过她暗中帮助左派的事业。但是他这个哈佛大学出身的“讲究实际的商人”不得不容忍蒋介石，尽管他鄙视蒋的办事方法。

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有时把宋子文看成是“自由党”的潜在领袖，认为他可能接替蒋的职务。这一梦想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子文要取代蒋，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办到，但是，那样一来，他当然就不成其为自由主义者了。他缺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气质，也当不了献身的改革家。自由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中国仍处在半封建主义的阶段，甚至工合这样的事物，在国民党政治阴湿寒冷的空气中和死寂的夜幕笼罩下，也注定会逐渐枯萎。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外国人真正理解国民党那套错综复杂的银行制度，但是，蒋、孔、宋三家实际上管理着四家政府银行，其中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硬通货。私人银行和半官方银行都靠国家银行提供货币贷款和信用贷款。

但这要拉上“关系”才行，私人银行家深谙世故，他们向蒋家朝廷派及其至亲盟友奉送股息作为酬谢，于是，那些国家财政方针的决策人物就不仅因为自己是私人大银行的大股东而直接获利，而且由于参与半官方企业而得到好处。

宋子文清楚地认识到促进各种有益的生产和公用事业的必要性。战争时期，他的中国银行完全是根据这种观点而资助了许多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更愿意从某种实际生产中赚钱，他遵循的道德标准是不接受贿赂。而孔博士却具有乡下商人那种精明的眼力，为了尽快捞到钱财而去搞副业，他和他的妻子就是因此而臭名远扬的。

我在重庆的时候，工合秘书长、受过美国教育的工程师K·P·刘告诉我，孔又把政府拨给工合的活动经费扣下不发了。已经有三个月没有给职工发薪水了。有一天孔院长派私人秘书来开口索取五万美元的贿赂或回扣，否则今后就不再拨款。为此，克拉克-克尔再次出面调停。但是，后来由于贪污腐败成风，要求给予回扣已成为普遍现象。这点并不使我感到惊奇，因为罗杰斯曾经对我说过，中国向英国购买飞机，每架都要加算五千美元作为回扣。自从孔开始在美国购买飞机之后，中国购买的每架马丁式轰炸机都要加价一万六千美元作为给他私人的“回扣”。这是美国前驻华使馆少校武官（后升为将军）弗兰克·罗伯茨亲口对我说的。

在那几年，国民党政府声嘶力竭地哀求西方民主国家支持中国货币“元”的价值。英、美两国拿出了数百万英镑和美元来建立所谓的“币值稳定基金”，想以此来维持中国元在上海、香港和世界市场的兑换价格。只有精心选定的几家中国和外国银

行获准处理有限数量的外汇。当然日本人是用各种手段来扰乱中国的外汇储备的。但是他们受到了孔夫人及其代理人的激烈竞争。孔夫人不仅经常通过她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大陆银行，而且还通过美国的斯旺-卡尔伯特森-弗里茨经纪公司进行外汇投机；她有内部情报可以利用。

关于孔夫人更加明目张胆进行外汇投机的传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马丁·尼科尔森给我举了几个事例，证明的确有此事。尼科尔森有机会查阅上海大陆银行的帐本，看到了这方面交易的记载。

“破坏中国‘元’的是孔太太，而不是日本人，”他厌恶地说。

不仅是中国“元”遭殃；这笔款项本来是可以用来养活战时数以千计的难民，并使他们有工可做的。一九四一年我终于决定写一篇文章，报道孔家这些活动的事实，在向《先驱论坛报》发电稿前，我拿给尼科尔森看。他说“这些情况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你把这电稿发出去，就可能使中国失去继续从美国获得贷款的机会，这样做除了对日本人有利之外，对谁都不利。我一直在向亨利·摩根索报告情况，我们很快就可以制止这种现象”。

我没有发这篇报道，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担心发了之后会损害工合。

孔家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官场的毒害的确比任何一家都深，使整个官场都贪污腐化，孔家自私行为的腐蚀性，随着战争继续拖下去，而变得更加厉害。他们之所以更加引人注目，只是因为他们是身居要职。上行下效，地方上的官府衙门，几乎没有不贪污的官吏，贪污的数目虽然比较小，但是手法却更加恶

劣。

应当承认，是有中国人在发战争财，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美国就道德高尚可以沾沾自喜。我国有些商人也在国内大发战争财。这些情况，是后来我临时中断写作这本书，而给《星期六晚邮报》撰写一篇有关通用动力公司的文章时想起来的。这家公司是我国制造“威慑武器”的大企业之一。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该公司创办人的股本已获利十六倍，今天它的资本已比原来的投资增加二十九倍。远比在战争时期经营政府造船坞的十九个公司获得的利润还多。十九个公司投资二千二百万美元，获利三亿五千六百万美元。不过，美国发战争财的人至少还是生产了战争武器。同中国相比，美国人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如果他们的财富被掠夺，而他们又在意的话，就可能会起来采取某种行动。

我以上谈的只是中国的一个最肮脏的角落而已，但是，这已经足以揭穿支持台湾的院外集团最近几年精心编造的神话是何等荒谬，他们说什么蒋政权直到垮台时还没有开始腐化。当然，如果同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官员们从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的大批美援中所捞到的巨额财富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的。但是，就道德败坏的程度而论则是大大超过了。这种乌烟瘴气不仅危害了工合，而且在几年之后也把史迪威将军搞下了台。

史迪威的命令是“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量”。为此他不得不对美援实行最起码的控制，以便建立一支可靠的、爱国的营养充足和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而当时的中国军队是蒋介石用抑彼扶此、保持均势的办法操纵的封建军阀的军队。史迪威由

于有这种抱负，使他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改革家”，这就是蒋家王朝和坐地分赃的将军们以及从上到下那些贪婪的寄生虫官僚们不能容忍他的根本原因。史迪威的故事已在别处作了充分的宣传，传播他的故事的人很多，其中有西奥多·怀特和安娜李·雅各比，杰克·贝尔登，布鲁克·阿特金森和蒂尔曼·德丁等，还有史迪威本人以及美国军方。

言归正传，我还是回过头来接着讲我自己的历险记吧。

幻想的破灭

一天孙逸仙夫人和孔祥熙夫人访问了重庆，她们和蒋介石夫人一起视察了附近的一些工合车间，摆好姿势让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师拍了照片，她们表示要共同为“生产自救”作出贡献，这是令人鼓舞的一天。这样一来，日本人散布的统一战线正在崩溃的谣言(传得有根有据)暂时平息了下来。

“表现不错，”路易说，“但是，没有能够制止陈氏兄弟继续进行破坏。从他们的立场看，我们对他们是一个威胁。他们最初认为我们是逢场作戏，成不了气候，现在一下子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工会。他们把我们称作赤色分子，说我们在中央总部安插了赤色分子，因此让孔硬把他们所谓的簿记员和会计员塞给我们。现在他们正在设法把他们的爪牙安插到各分部里。我们在各处的工合马上就要有两套人马了，一部分职员是干工作的，另一部分是吃吃喝喝和在政治上造谣中伤，向陈立夫和戴笠打报告的。”

“有一个安全阀，”我说，“他们无法控制国际协会的资金，这是我们的既定政策，只有你有权决定我们的款项的用途。”

“正因为这个，他们才那么恼火，因此他们骂我是帝国主义者和赤色分子，我能两者得兼吗？”

“你比这更坏，你是个传教士。”

“是啊，是啊，这点当初你要我干这事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早在华洋义赈会工作时，就发现这种情况了。好吧，他们爱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吧，只要他们不阻止我们就行了。看到年青人有了工作时的脸部表情我就感到了宽慰。他们原来都是些误入迷途和绝望的流浪汉、乞丐和被遗弃的人，我们给他们安排工作，传授技能，使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有了归宿，有了学习的地方，有了家，不用在丛林露宿了，有了体面的共同生活和工作的观念！把牲畜改造成了人！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个；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他们说中国人不能互相合作，这是错误的。他们是天生的合作者！问题是过去从来没有人试办过合作事业。”

“可是我听到还有人说合作社行不通。他们说中国人个人主义的思想太严重。当我请我们的大使纳尔森·特拉斯勒·约翰逊替我们在蒋委员长面前说句话时，他对我说：斯诺，还是自扫门前雪吧。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什么也不用做着，一切事情也就办成了。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你我最好还是继续吃咱们的熏肉吧，莫管别人的事，他们自己爱怎样干就怎样干。你是说工合吗？他们再过一百年也搞不起来的！”

“胡说八道！”路易轻蔑地说，“事实的真相是，如果我们失败了，倒也没事了。可是我们现在越干越欢，成绩卓著，该死

的，这就使他们受不了啦。庆龄说得对：那就是孙逸仙先生所摸索追求的，是他的民生主义的具体实施。也是他们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唯一希望。”

国民党的大官们不喜欢路易，但路易在从南到北广大农村的工合的工场里却有数以千计的朋友。他带着信件、款项和机器往返于这些农村的工合工场，每当回想起在一次旅途中看到的一幕情景时，他的一双蓝眼睛就不禁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说：“这是自从我们开始工作以来最令人心情激动的场面。”

“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刚要离开位于蒙古边界上的一个小村子时，我们先是听到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接着就看到长长的骆驼运输队出现在晨雾中，它们呼出来的气遇到严寒的空气凝结成霜。骆驼队在我们面前走过时，我们看到带头的骆驼背上挂着一面丝绸做的大旗——我们工合的旗帜，所有骆驼背上驮载的大货箱上面都饰有三角形标章和‘工合’的标记。

“那是骆驼运输合作社的运输队给游击队运送制成品。天啊！我还真不知道有这种合作社哩！跟我在一起的那些来自气候暖和的南方人蓦地里意识到他们是遍布全国的重要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艾黎接着说，正是这种激动人心的事情，使我们的最出色的工程师和组织者弗兰克·利姆、K·P·刘、C·F·吴和卢光勉等人不顾各种挫折继续坚持工作。

“现在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路易接着说，“去把我们优秀的技术人员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他愁眉苦脸地说：“奇怪的是，我们竟然无法安排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控制区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需要把他们的所有技术人员都留在他们控制的

地区工作。他们着眼于华北，着眼于敌后，而不是这里的后方。”

“这样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我说，“不过只要蒋夫人和孔家在国外仍然贪天功为己功，把‘工合’发展的功劳和荣誉归于自己，陈立夫和他手下的人就不会公开破坏工合了。”

“不会，”路易回答说，“但是他们会慢慢地窒息它，这就是他们要设立这个所谓的合作社管制局的原因之一。”

如果合作社管制局真正起到推动合作社的作用，那倒是一件大好事，可惜它只是另一个有名无实的实例，而有名无实是国民党官僚政治的特色。这就意味着一切都由它“管”，一切都归“局”，就是没有合作社。

陈立夫著文鼓吹成立什么“农民合作社”，并且想破坏工合的同类型组织。理论上；这种农民合作社是要把农民联合在信用销售合作社里。

“这种合作社的设想是，”路易解释说，“陈氏集团向地方党部提供信用贷款或贷款充作合作社的基金，国民党的忠实党徒、和地方官员纠合地主组成合作社，这事实上是一个放债机构，充其量是按稍低于高利贷通常的利息向贫苦农民贷款，比方说，通常高利贷的利息是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他们贷款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他们自己用这笔资金囤积粮食和布匹来操纵地方市场，私运日本货和倒卖外汇，使长期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加剧发展。”

同合作社管制局的斗争发展到紧急关头的时候，宋子文在美国。我给他发了一封航空信，把情况详详细细告诉他，请他进行调解，理由是一旦工合转到了陈氏兄弟手里，我们就会失

去美国舆论的同情，失去美国的支持。好在他很重视这件事，给蒋委员长和蒋夫人打了电报，谈了这方面的意见，使工合有一段时间顶住了合作社管制局要“合并”它的企图。后来不利的因素就更多了。在国家资源委员会领导下，大规模有组织地购买日货，拿中国原料去交换。这种买卖是由一个被认为是对侵略者作殊死战斗的政府去做的。

到了一九四〇年，中国战场的西线和南线大部分已经没有什么战事，日本人已经可以长驱直入，他们企图通过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权，在政治上加紧对中国的控制。汪精卫以前是蒋介石手下的副总裁。他在汉口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国民党官僚和几名国民党的司令官带着军队追随他。由于汪氏傀儡分子此时随同日本人行动，因此他们又在许多“战区”同过去的一些国民党同僚恢复了公事上的来往。这些“战区”变得很平静，农民又开始犁地耕作了，那些所谓的无人区，往往成了出卖敌人商品的兴旺市场。

重庆政府非但不去查禁这种非法买卖以鼓励生产，反而主持这种买卖，并且利用它对某些原料的垄断来助长这种交易。这样日本就能够向“自由中国”的市场倾销消费品，换取桐油、钨、锰铁矿砂、锡和其他稀有金属。

这种竞争对于工合和其他新建工业的影响，虽然还不是灾难性的，但起到了削弱的作用。然而，在政府逐步冻结信贷和活动资金的同时，日益增多的政治干涉，使许多生产单位一关门就是好几天，通货膨胀有如脱缰之马，很快就使得工合无法发展，只好依靠外国的紧急援助勉强维持生存。在国民党统治区，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并非完全不可避免。这种通货膨胀是

政府造成的，因为政府对生产不关心，几乎完全没有实行定额配给制度，党员、官吏、军官、受贿、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现象十分普遍，制止不住，上行下效，各阶级也很快染上了这种歪风。

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陈氏兄弟对中国农民银行的控制。他们对孔宋两家垄断银行业啧有烦言，蒋介石为了安抚他们，把农民银行交给他们经营。陈氏兄弟接管后，在农村经济中大肆舞弊。一九四〇年开始时，他们就将四亿中国元（当时还算是钱）存放他们的农民合作社，由乡绅们掌管，过了一二年，这些农民合作社简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开动印刷机，滥印纸币（无担保品），使他们的追随者得以中饱私囊。那些人不事生产，先是抢购别人生产出来的数量很少的东西，后来又抢购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囤积居奇。陈氏兄弟在战争结束时通过中国农民银行和其他银行提供“贷款”，使他们能够攫取政府在东部沿海没收的巨额敌伪财产。陈氏兄弟的财产加上蒋孔宋家族集团以“私人企业”和“严格的不干涉主义”的名义用同样方法所攫取的财产，大概就占了大部分的中国工业资产。

一九四〇年，我想当改革家的希望还未幻灭，当时情况已经很明朗，美国很快就要宣布对日作战^①。我相信到时候我们会帮助中国“在战争时期走向进步”的道路。索尔·贝洛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人民获得自由，就会感到应对每件事情负起责任来，他们认为要由他们来负责。”也许我希望由我来“负责”安排

^① 我在《在太平洋的摊牌》一文中预言，1941年将是日本向西方列强发动进攻的一年。（参见1941年7月的《星期六晚邮报》）——原注

使用我国向中国提供的金钱、物资和武器援助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只是比从整个来说昏昏沉沉的美国稍早一些意识到（美国将来也会明白）经济援助意味着政治干预。经济干预往往意味着要末维持现状，要末改变现状，重要的是要了解情况，制定计划加以指导。

例如，我曾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份《亚洲》杂志上，撰文主张“美国最少有责任取得有效地执行其援助计划所必不可少的保障。”我曾告诫，如果美国无条件地给予现政权以巨大的帮助，其结果只能使它更加气焰嚣张和腐化，使它感到更无须依靠国内人民的支持，更无须重视生产和自立，满脑子想的是，很快就要同美国人“打交道”，可以通过贪污受贿和投机活动来实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

这真使人感到左右为难。这也证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全部援助是个矛盾的怪现象。

我没有料想到的是，它跟美国人民和国会的初衷竟是背道而驰，他们是真诚希望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政治前途负起责任的。

这位由老实人变成的改革者是多么真诚地要求即将“负起责任”的美国进行全面考虑呵！我于一九四一年写道：

“由共产党取代国民党似乎是不可取的……共产党一定会网罗许多现任的政府官员们去组织一个新政府。如果他们不满足于给旧官僚政治换上一个新名称，他们就会被迫采取在国外易为人误会的无情和恐怖的手段去打破国民党同绅士们的反革命联盟。资本主义强国可能采取积极步骤完全关闭中国这个资本市场，于是这个政权将只得依靠苏联一家的援助……”

但是，必须向“彻底的民主”过渡，而且还要迅速地实现这个过渡，否则国民党就有可能在使全世界痛苦的情况下丧失它的统治权……在我看来，只有实施建立一个合作国家的纲领，才能不重开内战，为在中国顺利地实行民主奠定经济基础。这项计划是以真正的农村合作运动为基础，同真正的合作工业化紧密结合，同国家计划协调一致。我想，也只有在这样的中国，外国才会发现将来有发展为一个市场的可能性。

我不过是在梦想而已，就象许多中国人那样梦想有一个“外国的救世主”——而我所梦想的救世主就是美国。只有象我这样一个长期脱离美国生活实际的人，才会认为美国具备这种始终不渝的干预哲学。美国没有向世界推行它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没有完善的改革或革命的方法可输出。只有感情用事的人，才会想象我国人民、我国国会和我国政府会乐意赞助在中国实行民治和民享的合作社经济，作为唯一可以代替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在那里取胜的途径。

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共产党人看到了办合作社的好处，他们在巩固革命政权的伟大过渡时期，用这种方法把人民组织起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土地改革者”的神话

“中国的坏消息对日本来说就是好消息”，许多比较正直的新闻记者在战争期间都有这种想法，因此他们不揭露国民党政权最丑恶的事情。虽然当时实行新闻检查，但是，真要揭露的话还是可以躲过新闻检查的。

根据我在中国战场后方亲眼看到的情况，我了解到，中国士兵死于营养不良，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和轻伤的人数，跟在前线战死的人数的比例，是二十比一，无怪乎他们抢劫了东西就跑。国民党军队有一半的人赤脚，没有大衣穿，生了病没有药物治疗，而所有这些必需品，中国自己都是会制造的。将军们不但什么都有，而且还做买卖。这些情况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作过报道。

官员和有钱人家的子弟，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免服兵役，他们在茶楼酒肆混日子，或者做生意；农民却遭到毒打，被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去当兵。在四川城镇的大街上，往往可以看到阔人们从豪华饭店的大门和窗口把残羹剩饭倒出去，看身上长满疥癣的穷孩子们象狗一样争食取乐。这种报道写多了，就等于“帮助日本”。

人们希望外国记者避免报道，而且事实上长期没有报道的问题之一是国共关系不断倒退。到了一九三九年，两党及其军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同盟者了，而只是两个敌对的中国在对侵略者作战。

根据一九三七年九月国共“和解”的条款，共产党人同意将他们的苏维埃改为“特别行政区”。他们的确取消了苏维埃，按蒋介石的要求把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并且停止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因此，他们是遵守了协议的规定，不过就是不按蒋介石理解的精神办就是了。因为他们在“特区”实行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他们在敌后广泛推行的一种统一战线制度，这也是蒋委员长所憎恶的。然而它有法律依据：若干年前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当某省省长判定本省人民已经“准备好”行使公

民选举权和结束一党专政时,就可以在该省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省长发现人民已经“准备好”这样做。共产党人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这样做了。他们作为事实上的省当局,只是根据国民党颁布的法律,把“权力移交”给“由人民选出来的”地方政权。

不曾亲眼看到过这种事情的人,没有几个会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建立起这种机构。但是,他们的确建立了。我在一九三九年就看到过这种机构在工作。我自己就写过这方面的报道^①,欧美许多著名的观察家提供的证据证实我报道的是事实。在这些入中有传教士、牧师、新闻记者和教师。

根据共产党自己的规定,共产党员在村、县、省政府的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一般地说,他们是遵守这个规定的。国民党员也可以参加,但是由于共产党是组织得最好的政治团体,他们很容易取得支配地位。他们是通过说服、规劝,以身作则遵守纪律和热爱国家,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使用压制手段和武力取得这种地位的,这点是有案可查的。^②

在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权领导下所实行的战时改革受到普遍好评,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是如此。在国统区有许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也主张实施这种纲领。减租(最高额为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削弱或剥夺地主乡绅统治的权力,禁止放高利贷,闲置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交由集体耕作,青年和妇女被发动起来参加政治,失业人员被组织起来,参加工农业

① 《为亚洲而战》,第251—259页。——原注

② 见美国国务院的《对华关系白皮书》,1949年,在华盛顿出版。——原注

合作社，取缔地主的民团，组织由农民自愿参加的自卫队，办群众教育和开展战时宣传工作的结果，在非地主阶级中涌现了一些新的领导人。军民打成一片。由于采取集体管制、严厉惩办、驱逐和批斗等措施，贪污腐化的现象减少到了最小的限度。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我国的文职外交人员和武官曾在红区生活和到红区很多地方参观过。

他们证实那里并没有实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只是奉行均摊战争负担。用战后的希望激励组织起来的人民的一种体制。这种循序渐进的实验阶段约持续了十年之长。这有助于推动过渡时期的工作，使之进展得比较迅速和顺利，共产党后来领导这个国家从“联合政府”逐步发展成今天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俄国，共产党是先“夺取”中央政府的权力，然后用高压手段在内地行使权力。中国人则是采取长期、缓慢和迂回的道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用农村对城市实行层层包围，直到农民怀着感激的心情给他们拿着鞋拔，让他们很容易就把双脚穿进这片国土的毡底鞋，“唾手而得政权”。

有些一厢情愿的外国观察家，根本不了解情况，仅凭共产党在战时进行的“民主实验”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了”。据说他们已经“永远放弃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信仰”。持这种观点最出名的当推弗丽达·厄特莉，她曾经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她在美国写文章和到处讲演，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搞的是“一种土地改良运动”，“不再是革命的共产党，而是一个社会改良者

和爱国者的党”。^①

厄特莉女士，生于英国，现在入了美国籍，她曾当过小共产国际在日本的代理人。她是脱党分子，对俄国人非常刻薄，而把她的反共愿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她深信中共已经不革命。她认定“中国共产党早已放弃了建立自己的专政的梦想。它的目的已经真正变成了沿着资本主义路线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

厄特莉女士后来完全改变了她原来的看法，当上了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主要的中国问题顾问。那个时期，是麦卡锡主义分子的蛊惑宣传暂时得逞的时期。他们使一大批人轻信“国务院内的赤党内奸已经把中国出卖给俄国人”。其时厄特莉女士在国民党驻华盛顿大使馆里当雇员。她已完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资本主义改良者”了，她狂热地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院外援华集团是由一批美国人包括一些议员组成的，他们同蒋介石、孔祥熙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紧密配合，推动美国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可笑的是，这位“土地改良者”神话的辩护士竟然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里当上了“中国共产主义问题专家”。这个骗人的机构花了数月的工夫举行意见听取会，企图证明“美国内奸”——包括国务院和太平洋关系研究所——“阴谋”欺骗政府和国家，使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参议员麦卡锡和参议员帕特·麦卡伦领导下花了很大的代价进行调查审讯，整了十五大册的材料，使许多正直的人断了生路，

^① 见《战时中国》费丽达·厄特莉著，1939年在伦敦出版，第73、74页；第253—254页。——原注

使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实质产生了极其错误的印象，但是他们连一个内奸或“卖国贼”也没有查出来。

使麦卡锡感到愤怒的是，“十分正直的”马歇尔将军也感到不得不出来揭穿院外援台集团的另一个骗人的鬼话：是苏联人进行了干预并把中国共产党扶上台的。

“在整个华北、长江流域和东北，到处都有很多我手下的官员，我总觉得我收到的报告比委员长收到的可信得多，”马歇尔将军说，“他一再受骗（他收到的报告说国民党是败在苏联的坦克和俄国军队手里的）……一直试图找到一些有根据说明是苏联的影响或苏联的帮助的事物，但是，除了我称之为精神的影响或者类似的东西之外，我一无所获，至于说到苏联的援助，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据我的顾问和情报人员的看法，他们（苏联人）并不支持他们”。^①

在美国掀起这场风波整整十年之前，毛泽东在接见外国记者时（在那之后他有好几年没有接见外国记者）就曾以讥笑的口吻向我谈起，有人认为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和革命。

他说：“我们始终是社会革命家，我们从来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斯诺按：即反帝反封建）。另一个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后者必须实现，而且要彻底实现。目前革命的目标是民族民主

^① 《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意见听取会》第1653——1654页，1951年在华盛顿出版——原注

性质的但是在一个阶段以后，它将变为社会主义革命。”^①

在这一讲话被广泛引用之后，中国记者中很少有人相信“土地改革”的神话了。荒谬的是，国民党政府仍然把这种提法作为它的官方宣传路线，国民党官员继续设法使外交官和记者们相信中国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个党已不复存在”，他们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先生告诉我，蒋介石声称共产党员已经“投降”，把八路军的领导人说成共产党员是错误的。

蒋介石当时的对美宣传顾问厄尔·利夫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上说：“在你的报道中请勿再使用‘共产党员’一词”。他坚持说这样做就是“帮日本的忙”。他希望“作者和记者停止称八路军为共产党军队，停止称朱德、毛泽东等人为共产党人（斯诺按：原文如此）。”

稍后，我在重庆，蒋介石的通讯社重印了蒋介石过去接见德国新闻记者时发表的谈话。蒋在那次谈话中断然说：“在中国没有共产党员了。”于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员遵命把许多消息中的“共产党”字样删掉。当时美国有一些过分热情的传教士为了“争取对中国的同情”，公开帮助散布这种印象，来消除基督教保守派拥护者的恐惧心理。至于当时的美国共产党是否也巧妙地利用这条“路线”进行口头宣传，就象美共的一些叛徒所断言的那样，我就不得而知了。显然，他们这样说时不会不知道那些话是欺骗人的。

^① 全文见《中国周报》（1940年，1月13日）和《为亚洲而战》第289—291页，1941年在纽约出版。——原注

战争中的战争

不管蒋委员长是怎样对外国人说的，他对共产党“存在”这一现实是不会有错觉的。他从远处注视着共产党人源源不断进入他的“正规军”弃守后被日军占领的地区。

从理论上说，在组织和领导敌后抗战方面，国民党没有理由不能超过共产党。蒋介石为此曾经作过多次尝试，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够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游击队伍。根本的原因是，蒋不愿意也不可能替老百姓做点事或者做些动员工作，调动老百姓甘洒热血为国效忠的积极性，而这正是组织游击战争十分必要的。

我记得宋子文曾私下对我说过：蒋简直认为人民是无足轻重的。他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只依靠军事力量。“在战败和贪污腐化成风的时期，最好的武器莫过于使用武器的人。可是蒋依靠的是他的步枪，后来又依靠他从美国那里得到的飞机和坦克，而他本来是应当依靠人的。

蒋先是不在改革方面同共产党展开竞赛，到了一九三九年又重新对他们进行了封锁。他把他的第一军从对日作战的前线撤下来，部署在“特区”的西面和南面，只给共产党留下一条进入“沦陷区”的“自由”通道。三十多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就这样处于消极抗日的状态达六年之久。

一九三九年年底，我在去延安的路上，途经西安时，才第一次认识到蒋实行封锁的严重性。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使我相信，当时除了实行社会革命之外，别无其他途径能使中国复

兴。这里只需举一、二件事就可以说明。

在西安时，我了解到关于国民党重新设立集中营的传闻完全属实。在那些集中营里关了数百名青年人，他们的罪名是“搞颠覆活动”，有“危险思想”或“企图潜入特区”。在那些被关进集中营的人中，有几个是西安和宝鸡工合的人员，而这些工合实际上是给国民党军队加工定货的。其中有一个是路易·艾黎的养子迈克，是路易把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带到这里的工合来当技术员的。经孔博士亲自出面交涉，迈克才获释。

每周只有一二辆经过仔细检查的卡车获准从西安开往延安。我要是没有带着宋子文给委员长西北行营司令长官蒋鼎文将军和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将军的信，也不会获准去延安。我这次不仅是作为记者，而且是以工合国际协会代表的身份去的，任务是视察原来由孔院长亲自批准在延安建立的军需厂。

我此行是外国记者获准去延安的最后一个了，在其后的五年时间里再没有别的外国记者获准前往。

正如过去那样，在这次旅行中，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也和普通人一样屁股上不长尾巴，头上不长角；他们也不是没有缺点错误。在一个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国度里，他们对那里占绝大多数的穷人是较少危害的。时代在变化，人也在变化。就我所知，他们今天相对说来也许糟糕一些。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犯错误的，尤其是那些负有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的人更是如此。只要杜勒斯先生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在中国工作，我们就很难真正对中国的情况有很多的了解。我所报道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是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了解到的，是真实的，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没有人驳倒过这些事实，今天

也无须为此表示道歉，或感到后悔。

我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告诉那些对历史有兴趣的人们，合作化生产（我在中国见到的最接近民主经济组织的生产形式）怎样和为什么在共产党地区会比在国统区办得更加成功和有生气，尽管国统区的物质条件优越得多。

这里我只需要再举一段个人的经历就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多么“欢迎”同盟国能够援助他们抗日，而美国却在延安政府亟需外国援助而俄国又什么也不给的七年期间错过了这一机会。

虽然陈立夫集团攻击工合是共产党授意办起来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开始是怀疑，甚至敌视工合的。孙逸仙夫人由于参与发起工合而受到共产党的严厉批评，他们告诉她，那是“政治上异端的资产阶级”的组织，他们对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给与“争取战争胜利毫不相干”的运动拨款感到不满。

一九三八年我写信给毛泽东，对工合作了全面介绍，谈到工合是怎样办起来的，它的宗旨是什么，用哪些方法办工合，以及工合怎样帮助游击战争，并把一份工合组织章程附寄给他。我说，鉴于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可以接受“混合经济”，他们应当全力支持工合。这时共产党仍在支持“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实际上是国营工业的一种形式。我极力主张他们正式修改他们的合作社方针使之与工合的原则一致起来。

一九三九年他们把我的建议提交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会议决定摒弃生产合作社的特点，全盘采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组织章程。人们希望这一变化会“促进工合在全国的发

展，同时表明共产党对任何统一战线组织的衷心欢迎”。^①

一九三九年年底，我回到延安，那里的工合正面临危机。在国民党的压力下，重庆停止给工合提供经费。同时，生产合作社正在按工合原则改组。由于设在重庆的工合总会不再提供援助，延安的工合组织濒于破产。在这紧急时刻，边区政府出面帮助，筹措贷款使工合得以生存下来。华侨也开始汇款来帮助工合事业。尽管困难重重，工合的生产一年之内仍增加了四倍。

为了推动国际上向“前线合作社”提供重要的援助，我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政策声明。由于工合后来成了八路军在对日作战和最后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要经济武器之一，因此在此援引毛的声明是值得的。毛说：

“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地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几层目的：1)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的渗透；2)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对之掠夺；3)创立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4)培训失业人员和不熟练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反对我们；5)供应农民以所需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

珍珠港事变之前，菲律宾和南洋华侨筹集了一百多万元(中国货币)来支持边区的“国际工合中心”。一九四〇年，实际上，在

^① 《为亚洲而战》第331—332页。——原注

游击区的工合的全部工作，在北方是由八路军保护，在南方则由新四军保护，所有工合都是由华侨和美国商人资助的，他们向工合提供特别赠款和私人贷款。后来海军上将哈里·亚内尔和社会名流亨利·卢斯和阿瑟·厄珀姆·波普等人领导的美国工合促进会，以及斯塔福德爵士和克里普斯在英国组织的其他委员会，经过一番努力，为工合运动筹措了基金和赢得了同情。

陕甘宁边区的工合资金很少，即使这样，到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工合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有了铁矿、煤矿、铁工厂、小机器制造厂、制药厂、运输站和两个小油井。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拥有的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和。

当时和以后几年，对小机器厂和小工业的投资只有几百万美元(在西北窑洞城市里是安全的)，却给在华北的日军增加了极大的困难。用少量资本就可以把当地的原料和技术力量按合作方式组织起来，生产基本的必需品，增强人民的信心，使游击队的辅助性武器如手榴弹、步枪、机枪和炸药等的供应实际上做到自给自足。因此后来日本在进行太平洋战争时，也不得不扩充很多的兵力来压制中国。私人的援助在供应武器方面起了一些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实行封锁，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来自“自由中国”的供应，游击区的工合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沦陷区夺取(或购买和偷运)废弃的器械和机器。

在我访问期间，毛泽东对美国技术人员表示欢迎，并请工合国际协会提供组织工作者，并派检查员来边区视察。当我们正式作为一个盟国和中国一道对日作战时，他一再要求美国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美国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对蒋委员长的

封锁提出异议。当时经罗斯福的坚决要求，才有几名美国政治观察员和军事观察员获准到游击区去旅行。我们和中国一道长期对日作战，但是在此期间，我们从来没有给过边区政府一个手榴弹、一枝步枪或一台普通的缝纫机。我们的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全部交给了蒋委员长。因此，毛泽东从美国战时援华方面看到了美国人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即，外国一再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但是，也不是说，美国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虽然根据我们奉行的政策，我们一贯不援助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但是，美国舆论早些时候确实做了一些防止重开内战的事情。一九三九年恢复实行封锁，就预示着有重开内战的危险。蒋委员长同年在西安设立了战区司令部，目的是消灭被宣布为“非法的”边区政府，内战的危险就逼在眉睫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开到共产党人的后方，遭到了抵抗，在沦陷区内外，游击区的边缘地区，不时发生战斗。

根据中国的新闻检查政策，不许对自相残杀的内战进行报道。我没有试图违反这种政策。其他不愿“损害中国事业”的新闻记者也没有报道这方面的消息。直到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这种在日本战线后方和周围发生的战争中的严重性，终于向外界透露了。

大 屠 杀

新四军的核心力量是一九三四年老红军主力向西北转移时，在江西的几个“袋状地区”幸存下来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当

日本军队侵占长江下游时，蒋介石命令这些残余部队整编成一支国军，归统一战线指挥。领导新四军的是老共产党员项英将军和非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出身的叶挺将军。他们的战斗部队大部分驻扎在长江以北的敌后。他们在长江南岸未被占领的地区设有一个根据地总部，并在那里办了几所学校、一座医院和一些小工场。根据地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军队。

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新四军突然接到战区司令部国民党司令官的命令，要他们撤离他们唯一安全的根据地，开到江北日军占领的安徽省去。屡经抗议无效，新四军的一些部队在夜幕掩护下乘船渡江。留下的约有二千五百人。国民党司令官坚持这部分人也得转移，并发出了最后通牒。于是，这支后卫部队开拔去江边。这支部队里有许多人是教师、学生、护士、护理员和数百名伤员以及许多工匠。他们大部分没有武装。

这支人马蜿蜒向长江进发，走到黄昏时分必须通过一个峡谷。当他们走到峡谷中间时，隐蔽在附近山头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机枪向新四军扫射。这是一次有充分准备的伏击，没有几个人幸免于死，项英将军本人遇难，叶挺将军身受重伤。

对于这次屠杀事件的详细情况，我比别的记者知道得早，是新四军的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告诉我的。特别使我难过的是，我曾经协助在国外筹款，给新四军建立了一个“国际工合中心”，训练徒工开办了几个小工场，给游击队制造装备。现在许多生命和宝贵的设备都丧失了。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属实之后，我决定把它报道出去，不管这样做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中国”。这件事很可能意味着国共战事全面恢复，中国的抗日力量全面崩溃。

新四军惨遭杀害的事件确实是一个严重打击，从此中国的全国团结始终没有再恢复。

我写的消息绝对不可能通过重庆的新闻检查，因为重庆的官员矢口否认我的报道有任何根据。但是，我还是能够通过香港发出多则电讯。我还第一次报道了国民党封锁的真相以及我在西北亲眼看到的事态发展，那里已经发展成小规模的内战。由于我的报道，我在重庆的同行全都受到查问，伦敦和华盛顿则要求它们的使节立刻作出报告。重庆政府再度断然否认曾发生任何事件，而且再次取消我的记者特权。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华盛顿坚持要《先驱论坛报》在显著地位刊登他的一则谈话，诬蔑我的报道纯属捏造。他竟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共产党”军队。他还要求我的编辑表示道歉，但遭到了拒绝。

几天以后，英国外交官证实新四军事件是真实的。他们还向伦敦报告，国民党即将对延安大举进攻。这时委员长才勉强作了部分的承认，但他声称是新四军袭击了他的部队。后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对当局扣压他们也曾试图发出的报道一事纷纷提出抗议，国民党才不得不暂时把新闻检查放宽一些。过了不久，长期以来一直被掩盖起来的关于统一战线濒于瓦解的全部真相才被抖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华盛顿对这些电讯极感兴趣，以致于它中断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贷款的谈判。摩根索先生(美国当时的财长——译注)甚至明确表示，如果重开内战，重庆就别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

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是否向蒋介石提供战时支援要看他是不是能够在联合抗日方面保持某种统一。

然而，如果认为光是英、美两国对新四军事事件采取批评态度这一因素就阻止了蒋委员长对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也是不正确的。对于这样做的后果，蒋肯定比他那些头脑发热的部下看得更清楚。因为共产党军队几乎全部在日军战线的后方。蒋如不联合日本人就不可能有效地打击他们。可是，如果这样做很快就会把重庆政府推到轴心国阵营和汪精卫同流合污，而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就会只剩下共产党一家站在“民主阵营”方面对日本作战了。很难想象美国可以一面在太平洋对日作战，一面又帮助蒋和日本在中国打共产党。如果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无疑会得到美国的援助，正如第二次大战中的其他反轴心力量一样。现在来设想，那会怎样影响我们以后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其结果决不会比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情况更糟，反而可能会好得多。

美国政府当时没有认识到，而且显然以后也一直没有认识到，甚至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中国抗战中的政治主动权就已经转移了。能看出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格雷厄姆·佩克似乎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美国政府援华会的“战时情报处”工作了四年之后，于一九五〇年写道：

“我认为关于中国现代史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也就是从日本开始侵华到发生珍珠港事件这几年是关键的时刻。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表明了他们能够利用遭受侵略的危急时刻来扩大自己的力量，而国民党则不能，或者不愿意进行调整去适应战时出现的问题，从而开始丧失力量。在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国时，国共力量对比颠倒过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我们只用我们当时在中国拥有的势力和智慧已经

不足以对之施加影响了……等到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已经变得如此虚弱，共产党已经变得如此强大，只有美国进行全面干涉，也就是实际上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才能击败共产党。”^①

工合终于在中国国统区被完全窒息了。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不仅生存下来和得到稳步发展，而且成为他们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一九五三年，北京政府工业计划小组的一位负责人邓洁在《人民中国》上撰文，承认了这一点：

“中国工合是在一九三八年创办的，它赢得了国内外有民主思想的人的同情和支持。但它只是在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才得到发展。通过它我们获得了大规模组织手工业的丰富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组织，肩负解放全中国并把它引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重任的军队才得以维持自己”。

经验教训：帮助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合作社的生产方式，本来也可能帮助国民党保住中国。也许资本主义并不象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到处为自己挖掘坟墓，但凯恩斯的下列结论肯定是对的：从历史上看，每一个社会都是用自己的手摧毁自己的。哪里有死尸，那里就有老鹰聚集。

惜 别

生也有时，死也有日，
何时播种，何时收获……
万物各有时节……

^① 格雷厄姆·佩克著《两种时间》，霍顿·朱弗林公司1950年出版，第700页。——原注

重庆对新四军事件的迟迟承认，证明了我是一个诚实的观察家，但是，这只是一种空洞的满足，然而这件事倒使我矫正了自己对中国的强烈的责任感。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一个更加顽固的“传教士”W·H·端纳终于也认输了。端纳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提醒蒋夫人注意，她那些近亲，由于贪污渎职和投机倒把，劣迹昭著，道德败坏，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他呼吁蒋夫人加以抑制。蒋夫人却对他大发雷霆，她说：“端纳，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是连你也不能批评的！”端纳听了火冒三丈，比她还生气，悻悻然不辞而别，搭乘下一班飞机到香港去了，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一段彪炳的生涯。

现在我懂得了，青年的热情、理想和老年人的腐化和世故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贫富之间，右派专政者和左派专政者之间，也是水火不相容，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日本的侵略非但没有使同胞自相残杀的战火停下来，反而是火上加油，使火势蔓延开来。它还会继续燃烧许多年，比抗日战争本身持续得更久。这就是当时对中国的本质所作的判断，这个说法后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反复地说，也没有能够使美国人理解，或者使他们在火山终于爆发时不致于感到吃惊和恼火。更有甚者，由于我们过早地说出了这一冷酷的真理，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永远也不会宽恕我们的。

我将仍然支持中国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基本上是在真理、公道和正义的一边。凡是有助于中国人民自救的措施我都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对于置穷人饿死于不顾而继续大摆宴席的富人政府，我反对无节制地给予施舍。

这只能助长权贵的专横，并延长不可避免的清算痛苦的过程。但是，我再也不去想象我个人还能对中国起什么作用，我只不过是历史沧海的一粟，这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我既无力去改变它，也没有评说它的天赋权利。

然而，尽管我没有资格向中国索取什么东西，中国却占有了我身心的一部分。我年轻时不懂语言和统计数字的含义，后来见识了各种真实的场面，接触了各种人物，充实了我的认识。现在我才知道，饥荒意味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胸前却悬着一对似乎是一百万岁的老太婆的干瘪乳房；恐怖意味着一大群老鼠在一片焦土的战场上伏在无人照管、奄奄一息的伤兵身上大口啖着化脓的血肉；反抗意味着愤怒，这是我看到一个孩子被迫充当驮畜在地上爬行时的感受；“共产主义”意味着我所认识的一个年轻农民为报仇而参军。在他的族内由于有三个子弟当了红军，当局认为全族对此都负有责任而杀害了其中的五十六口人；战争意味着被扔在闸北街头的一具被奸污后，开了膛的赤条条的女尸；屠杀意味着被扔在卫生部附近一条弄堂里垃圾堆上的一具蜡黄的弃婴尸体；日本的所谓在“亚洲的反共领导地位”意味着就在我眼前的一座被炸毁的孤儿院瓦砾堆里露出来的女孩子的断臂残腿；残酷无情意味着四川街头一群身披绫罗绸缎的游手好闲之辈看着两个乞丐为了一口剩饭互相掐脖子争夺而发出的笑声。我现在才看到自己内心隐藏着冷漠的恐惧和怯懦，而那些我一度幼稚地认为低我一等的人们身上却显示了勇敢和决心。

是的，我将是上述种种事物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中国的黄土岗上，留在碧绿的梯田中间，留在晨雾中隐约

可见的孤岛似的庙宇里，留给那些曾经信任过和爱护过我的中华儿女，留给那些曾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却怡然自得的文明的农民，留给那些衣衫褴褛，皮肤黝黑却有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的孩子们，留给那些与我地位相等的熟人和恋人们，特别是留给那些满身虱子、领不到军饷、忍饥受辱的农民士兵们，他们难以思议的自我牺牲使一切生活具有价值，并赋予这个伟大民族为争取生存和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以崇高的含义。

是的，我感到自豪，自己曾和这些人相识，失败时曾和他们一起辗转大陆各地，和他们一起伤心流泪，并至今仍和他们具有共同的信仰。但是，我不曾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劳伦斯在他的《七根柱子》一书中说，一个完全献身异国的人，过的是“粗野人”的生活，而我对过“粗野人”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我对自己说，我是一个美国人，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什么人了，我其实是一个流落他乡的伊实玛利^①。于是我退却了，以免深陷下去。

《先驱论坛报》给了我一个到暹罗、缅甸和印度去巡回采访的任务，我决定接受这项工作，并准备取道欧洲回国。一九四一年二月初，我在一家荷兰航空公司订了去新加坡的飞机票。《先驱论坛报》在乔·巴恩斯的主持下，在当时美国各报中，可能是国外新闻办得最出色的一家报纸。我为能参与其事而感到荣幸。但是，后来我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中断了同这家报纸的关系，猝然取消了这个可能改变我的前途的旅行计划，因为当时有一种紧迫感突然袭上心头：我感到自己对家庭生活太不关心，

① 《圣经》中人物，被其父亚伯拉罕摒弃。——译注

夫妻关系有可能破裂。我妻子在菲律宾住了两年之后，现在已经回到了美国。如果此时我立刻回国，我们爱情和信任的老根子也许能够在故土上经过培育再度滋生。我匆促间电告乔·巴恩斯，我将乘下一班飞剪式飞机回国——我原来只准备在中国逗留“六个星期”，不想一呆就是十三年。

庆龄在我们最后一次会晤时劝我留下来，她说：“你会回来的。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

飞机飞离香港的时候，我凭窗俯瞰，但见舢板和帆船星星点点，恰似在碧波上漂浮的片片黄叶。这时我想起了庆龄说那些话时的容貌，她的脸孔，还是那样年轻美丽，我再度为她的诚挚情谊所感动。我不知她说的是否有道理，我既害怕又希望，但愿她是对的。亚洲确实象是我真正的家乡，美国反而是一片茫茫。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却依然留在中国。

贫穷是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在西方势力正在没落的东方世界里，没有哪一个白人是真正穷的。但是在美国一个人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美元数字，当我离开美国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真后悔自己太乏远见了。我已把自己的积蓄先后花在“战时工作”、一本不赚钱的书和维持两地分居的家庭用度上。我这时的“财产”甚至比一九二八年我初到上海时更少了，而我在美国赖以生活的价值是无法折成黄金计算的，究竟我能带些什么回故土呢？离家这么些年，我没有什么光荣可以炫耀，甚至连一个可资纪念的光荣伤疤都没有，只有一副得过疟疾、痢疾和患有肾炎的病体。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当你能侥幸活到回顾前尘影事的年纪时，你就知道生命的长度并不是按年头计算的，而是按你经历过的各种生活的数目来衡量的。只有在回顾往事时，你才能觉察出一种生活在何处悄然结束，另一种生活又已经开始。我无精打采地坐在“中国飞剪式”飞机上，心情抑郁，全然没有意识到一种全新的激动人心的生活就在前头。我完全沉浸于忧伤和孤独、对陌生的生活感到厌倦的情绪中。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精神萎靡和倦怠还有另一种原因：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几个月来我渐渐患了维生素缺乏症。我主要是需要新鲜和有营养的食品。我的体重已从正常的一百六十五磅下降到一百二十五磅。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之后，一个月内我的体重就增加了三十磅。接着我到亚利桑那州一个牧场去休养，在那里我把中国和战争的事情完全置诸脑后，除了吃饭、睡觉和骑马，什么事也不干。一天早晨，我醒来时，又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第三种生活”真正开始了。

第三篇 大河彼岸

法律正义竟以河为界，多么可笑！还有
什么事情比这更加可笑呢：一个人
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
河的彼岸……

——巴斯卡尔

老实人的归来

我回到美国，正赶上读到共和党先生在一九四一年圣瓦伦丁节的告民众书。“如果认为会发生日本攻击美国的危险，那简直是奇谈怪论，”罗伯特·塔夫脱这样说。赫伯特·胡佛也认为这种假设是荒诞无稽的。就在这一年他宣称：“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今天对美国的威胁比任何时候都少。”^①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认为：“只有神经病才会想到德国、日本或者意大利打算向我们开战。”^②

不光是共和党人有这种错觉，在共产党里也有人高兴地随声附和。罗斯福先生断言：“《工人日报》用整

① 1941年9月17日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说。——原注

② 1939年3月。——原注

版篇幅刊登共和党在各地的拥护者的宣传广告时，我国正在发生不幸的事情。”^①塔夫脱、杜勒斯、胡佛和美国的其它头面人物以及美国共产党人和以著名议员惠勒和范登堡等人为首的国会议员们，不仅常常破坏罗斯福为提醒美国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保持警惕而做的努力，而且还跟道道地地的纳粹辩护士默温·哈特、库格林神父、弗里茨·库恩和约翰·弗林等同流合污。罗斯福先生认为这是极端反动分子和极端激进分子的一种不祥的结合”。

在中国时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纳粹—苏联协定的分裂作用，它充分说明我们对亚洲和欧洲政策的摇摆不定。直到在好莱坞的播音室里与西奥多·德莱塞邂逅后，我才对这种令人疑惑的问题有所领悟。我在那里，是因为有一个广播节目要求我回答一些问题。德莱塞只比我早到一步。

“有些人说，尽管英帝国不是十全十美，可是英国的民主仍然比德国的纳粹主义好到不知那里去”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温和地这样说。

“天啊！我的天啊！”德莱塞高声嚷道：“这是胡扯！你们读了我的新著《美国是值得挽救的》之后，就会明白事实真相。究竟是德国还是英国在奴役五亿亚非人民？德国不是在对我们作战，而是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罗斯福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为什么不去问问英国的奴隶们：哪一个国家的威胁性更大？”

当听到《嘉丽妹妹》和《美国的悲剧》的作者谴责英国是“魔鬼”，而对希特勒却无半句贬词时，我感到十分惊讶。我真不

^① 罗伯特·舍伍德著《罗斯福和霍普舍斯》1948年在纽约出版，第193页。

明白，这样一位富有同情心和嫉恶如仇的作家怎么会这样低估希特勒的罪恶的呢？

他准是年老体衰了(他已经是七十高龄了!)，我对自己说，我看着他跳上跳下对那些要援助美国的美国“极端分子”大发雷霆，“不”！他最后说：“这次美国人不会去帮助了！让他们见鬼去吧！”这时节目的主持人匆匆地进来低声对我说：“照这样下去，再多一秒钟我们的营业特许证就会被吊销了”。说完之后，他就宣布：“时间到了”。

德莱塞把我带到他家里。我们争论了几个晚上，要不然我会完全误解他，也决不会去读《美国是值得挽救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比他的广播讲话更易为人理解)。他曾经投票赞成罗斯福和新政，但现在他却激烈反对他，反对征兵，反对帮助英国，反对阻止希特勒的侵略。

“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都是自讨苦吃，凭上帝起誓，我说让他们自作自受！”德莱塞争论说。“他们什么时候为本国人民享有民主方面做过一点工作？他们在援救西班牙、阿比西尼亚和中国方面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是谁在武装日本？是英、美帝国主义！当初是谁支持希特勒的？是张伯伦！是达拉第！为什么？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曾以为希特勒会向俄国开战，没有料到会向他们自己开战。现在他们来向我们求援，要我们去为他们作战，挽救他们的殖民地。就算斯大林‘出卖了他们’，同希特勒做了一笔交易吧。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他不正是以张伯伦之道还治张伯伦之身吗？”

“你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千真万确的”，我同意地说。“但是现

在毕竟是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战胜了欧洲。英帝国可能会垮台，这个我管不着，但是不能让它落在希特勒手里呀！此刻只有英国一家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一旦英国灭亡了，下一个该轮到哪一个国家呢？俄国。俄国灭亡之后呢？”

那天的激烈论战无须深究。我当时觉得自己论据高明，大获全胜，并且有点自鸣得意。其实，同这么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辩论我怎么可能占上风呢？我对他的才智和真诚素来是深信不疑的啊。因此，他说话的声音越高，我就越不相信他口头说的是他真实的思想。

“只要你相信莫斯科完全没有错误，你所说的才有道理！”我最后非难地说。

“当然是这样！”他说，“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只有一个国家值得伸手去援救。这就是俄国！斯诺，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你是吗？”

“不是，但是，说真的并不是我没有争取！”他答道。“他们不接纳我，我还不够资格做共产党员。”

完全够资格！象他这样的人，是我们这个国家产生的一位最合格的美国无产阶级作家。可是他却告诉我他不配。做共产党员的条件是严格的，非常严格的，他接着说。“这几年来，他们分配我做的事情我样样都做了，但是现在他们仍然说我的个人主义太严重，太感情用事，太不守纪律。不过我还是有希望的。你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我象你一样，一度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离开后，就对所有主教都不相信了。斯大林并不是一个超人，我可不能他一改

曲子就跟着变调子。在纳粹—苏联协定签订之前，我就反对纳粹主义了。如果共产党人现在想把这场战争称之为帝国主义战争，我也不会改变对纳粹主义的看法。”

我们越是争论，我就越不能说服他。当然我的立场本身也有矛盾。我希望我们大家去帮助中国和英国，但是又不希望美国参战。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我知道而德莱塞未必认识到的，即不管我们是不是帮助别人，日本都要把我们拖入战争中去。

我在东方待了这么多年使我认识到了这点，但是对美国或者对德莱塞这样一个人我却毫无了解。在当时跟着共产主义路线走的左翼知识分子中，他仍然是我心目中一个不可思议的主要人物。左翼知识分子反对罗斯福组织防务和帮助英国，但是却为德苏协定和俄德瓜分波兰辩护。

德莱塞可不是这样，他终于被认为够资格了，于一九四五年，临死前不久加入了党。我最近偶而看到莱斯特·科恩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吸收德莱塞入党是对德莱塞一生追求的信仰的最后认可。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仍然困惑不解。德莱塞是在发现他所熟悉的现实世界里的人们找不到出路之后，才不得不相信在世界某个地方确实存在绝对美好的社会。他和许多知识远不如他渊博的人，由于信赖俄国，于是也就相信国外有个救世主。

在这方面，德莱塞和我的另两个朋友一样。他们是我偶然结识的另一位北美的著名艺术家和数年之后我在墨西哥认识的迪哥·里维拉。这三人都是人中俊杰，他们是以艺术和生活的原料为手段进行战斗的热情战士，他们的作品远比他们的政见更有生命力，因为那些作品是呕心沥血写成的，他们的心脏的

跳动是健康而真诚的。

一九四一年，德莱塞是真心想到中国的，因为至少当时克里姆林宫还没有禁令不让他这样做。尽管当时日本是希特勒的盟国，莫斯科对中国的抗战还是赞许的。德莱塞对中国游击区的工合十分关心，他帮助组成了好莱坞演员和创作人员委员会为工合筹款。他还把我介绍给美国作家联盟。由于德莱塞是作家联盟一位重要的头面人物，一九四一年六月我被邀请作为主要讲演人出席在纽约举行的作家代表大会。

埃默森说过：“我们的生活微不足道，我们不愿谈到它”。我现在回忆的这件事似乎也是微不足道的，而它对我们在本书中这几页里所探讨的“人物”与其他许多人的生活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这些人的生活组成社会和约束政府，反过来又相互影响。

这次代表大会是美国作家的最后一次集会，是为动员作家在今后多年采取政治行动而召开的。著名作家出席会议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使我忧虑的是，我发现他们赞成给罗斯福扣上“法西斯分子”帽子和拥护斯大林分子的每一项机会主义行动的纲领。他们并不比塔夫脱或杜勒斯更有理智。我拒绝在有上述提法的宣言上签字，他们便对我说这一宣言“并不是一件拘束人的紧身衣”。他们还坚持要我谈谈关于远东的情况。由于那时美国人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问题上，因此我很乐意利用一切机会来唤起人们注意来自东方的危险。

他们终于没有让我在会上发言。在开会的头一天，他们要我先把发言稿先交上去。我在讲稿中把中国的抗战同英国为自身的生存而进行的战斗连系起来，我认为这两处的战争将汇合成

一个反对纳粹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斗争，俄国不久也会卷进去，因此要求向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这个时候唯一正确的立场是“帮助所有为争取自由而同轴心国作战的人民。”

大会执行秘书富兰克林·福尔索姆看了我的发言稿后，派一个委员会来找我三次，劝我把发言稿中的那些话删掉。福尔索姆在公函中说，那些话“同大会的基本信念相抵触”。我反问道：为“辩论和讨论知识分子在国家危急时刻所面临的问题”而召开的大会，怎么可以在会前就决定了它的基本信念呢？

报纸大肆攻击，断言大会是在共产党人绝对控制下进行的，对此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认识很多与会的作家都不是共产党人。现在我明白了，共产党人只不过利用他们天然的孤立主义反战情绪，在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加以渲染来讨好莫斯科。我拒绝修改发言稿，他们于是取消了要我发言的邀请。我的确参加了很多“辩论和讨论”，可是，我也看到，有几个人在对外政策上发表独立的见解或反对的意见时，他们的讲话声简直就被控制着整个会场的、组织得很好的啦啦队的声音淹没了。这些人是专为共产党捧场的。共产党员提出的各项决议草案都被宣布为“一致”通过。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的大会就在这种大吹大擂的喧闹声中结束了。大会谴责英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嘲笑罗斯福是一个“战争贩子”，赞扬俄国“爱好和平”。

那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的事情。十二天以后，“发生了同作家会议基本信念完全相反的事件，”希特勒邪恶的坦克开进了乌克兰，使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大吃一惊。美国共产党经过几天紧张的检讨反省之后，从迷雾中出来宣称这场战争已变成“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反对历史上最凶残专制的国家的斗争。英国

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结束了，美国作家联盟也结束了，这二者简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不知道那些由于不会独立思考、盲从别人因而有这次不光彩经历的作家中，到底有多少人从中得出结论：美国共产党完全屈从于克里姆林宫，使他们失去了在美国领导有组织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进步的资格。我猜想大多数作家在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这次和他们相聚的时间很短，但已足以使我看出这里的共产党员最终将会由于他们没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制订出明确的独立自主的方针路线而分裂。

实际的情况是，在一个根本没有革命形势的国家组织一个革命政党，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上的时代错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乞灵于暴力的社会革命，除非旧的秩序已经日暮途穷，无计可施。美国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还多得很。人们只要回顾一下造成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各种条件，就不难看出这些条件在美国实际上都不存在。而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使变革成为历史上的唯一抉择。马克思-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是以设想为依据的，即认为俄国经验可能适用于许多国家的落后的十九世纪经济。把这些教条生搬硬套地运用于美国先进的工业民主中就不合适了。因此，建立在相信国外有一个革命救世主基础的政党，就象一支军队总想打一场在国外已经打过的战争，而不是准备参加今后的实际斗争。

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我就不再认为各国共产党都会永远处于当年美国共产党的那种不利地位。同样，我对俄国人民争取或为维护他们的独立和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规律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也寄予同情。

不久之后我目击了这场斗争，也许这是本世纪的一场决定性政治战斗。

会 见 军 队

我国那些“主张干涉者”中的智囊和最令人敬佩的爱国者都对主张把注意力“转向”远东的人感到不耐烦。争取自由委员会及其强大的联盟要求立即全力进行反希特勒的战争，全然不顾或低估日本的力量。没有几个人能够认识到拥有一个洲的实力的日本，现在完全有力量对所有西方国家进行长期的战争。实际上大家习惯地小看日本，认为日本“在中国陷于困境”，或者说日本的征战“效果日微”，或者贬低日本，轻蔑地称之为东方的意大利。

在美国军事权威中，几乎只有埃文斯·卡尔森一人公开告诫我们，可能发生日本突然袭击美国的危险。我没有看到过麦克阿瑟将军一九四一年的情报报告，但是我确实知道在我即将离开马尼拉回国之前见到他的时候，他相信“只要美国国旗仍在菲律宾上空飘扬”，日本就不会去碰菲律宾。

罗伯特·舍伍德说：“邱吉尔实际上象当时所有的当权人物一样，认为只有强有力的希特勒才能决定在什么时候袭击美国。有人认为日本人有可能干出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蠢事（给日本人‘留面子’曾经是华盛顿十分关心的事），其实这种可能性是不值得考虑的”。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在首都见到了许多官员，会见了许多军官，他们的确都是这样看问题的。

我回国不久，就开始专给《星期六晚邮报》写稿。我花了几

个月的工夫去参观训练营地，并且和美国的新兵一起行动。新入伍的士兵士气很低，这反映出我国怀疑心很重，完全不相信我们面临着现实的危险。我们的物质条件好，我们部队下士的下级军官领的薪金比日本的将军还要高，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士兵也不如美国兵住得好吃得更好。但是他们缺乏为一项事业团结起来的精神，而是把自己看成战争贩子总统和拙劣骗局的受害者。如果说这是因为“国家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中，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扮演士兵”，用扫帚当步枪，烟囱筒当大炮，用吉普当坦克，用爆竹当炮火？

军队十分害怕孤立主义国会议员中的警戒会成员，他们甚至连战争的情况也不同“特别委员会成员”讨论。能说出什么是四大自由的人寥寥无几。军官们对租借法很反感。租借法的实施，“剥夺治军的手段”。他们将此事归咎于罗斯福。可是他们甚至更恨孤立主义国会议员，他们绝大部分是共和党人。这些人使军队根本无法拧成一股绳。我记得，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的那几天，我坐在乔治·巴顿将军的第二装甲师的一辆坦克里，听了将军谈了许多这方面的事情。在分手时，他预言：

“斯诺，我什么都对你说了。我他妈的谈得太多了，你可以毁了我。如果我不说错话，我在这支军队里就很有前途。这个军队里的官兵如果同国会闹纠纷，很快就会被毁掉，再没有比这更快的了。因此你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要引述我的话。”

L·J·麦克奈尔将军，当时掌管野战训练。在九月份的某一天他对我说，我们只有两个师作好了战斗准备。

八月十四日我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八时四十五分访问步校司令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

我和他在交谈时，一位军官进来报告无线电正在广播罗斯福和邱吉尔会晤的消息。我们进入内室听埃德·默罗从伦敦广播，他说英国人对这消息并不很激动，他们希望的是宣战。

“不，不是宣战，而只是使战争变成不可避免，”我说。

“昨天就延长征兵制问题的投票结果是，二百零五票赞成，二百零四票反对，我认为这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布雷德利冷冰冰地说。“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情况，领导人意见分歧。如果政府和国会能够同心同德，或者至少在我们需要一支军队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我们军营里的士气低落的问题就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了。”

到了十二月，美国舆论界在这方面的僵硬的看法还没有丝毫变化。在纳粹进攻俄国后，主张干涉者得到了劳工方面的一些支持，但是他们的影响又被哈里·杜鲁门等参议员抵消了，这些参议员现在希望奉行一种新政策，鼓励两个妖魔相争，而我们隔山观虎斗。虽然赫尔与日本特使野村将军已在磋商，但是我们对第三个妖魔仍然采取“根本不值得考虑”的态度。美国政要们从国会那里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支持。林德伯格上校发表的姑息主义讲演，引起了麦考密克上校等报纸大王的强烈共鸣。这些人对罗斯福的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国家危险的责任感。

尽管那帮人甚嚣尘上，总统却在十二月就已经清醒地警觉到，日本人很可能扩大他们的侵略范围。这是有案可查的。罗斯福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感到最棘手的，是怎样使不齐心的国会及时认识到危险，帮助国家避免一场浩劫。没有迹象表明，

他的顾问们敢于提出，日本人会我行我素，从而使总统的难题得到解决。

日本人通过采用不断消耗的战略，可以有好多种办法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种唯一十分肯定会使他们遭到最后失败的方法呢？即使把下列因素，诸如日本最高领导人的军事情报不灵，和估计错误，例如指望俄国很快就会被打垮，相信英国会被打败而退出战争，在坚不可摧的轴心国控制的欧亚世界里，美国很快就会被孤立起来等等，都考虑进去，用邱吉尔的话说，偷袭珍珠港仍然是极大的“蠢举”。只有那些由于感情冲动而完全看不到下面两个决定性因素的人才会采取这种行动。这两个因素是：美国拥有进行战争的雄厚潜力；如果有人入侵美国无端滥杀百姓，我国人民就一定会站起来团结一致决心抵抗，入侵者什么也捞不到。

如果说珍珠港事件是一桩国家规模的愚蠢行动，那么应该说不光是一方愚蠢。如果说日本不了解我们的民族的性格，其实我们也不了解他们民族的性格，珍珠港事件是我们多年来政治上失策的集中表现；也是英美奉行愚蠢政策武装日本帝国主义，让它去欺凌弱小邻国的结果。

此外，英、法、荷的伪善向日本灌输了无耻的殖民主义意识，同时他们在亚洲统治了两个世纪，竟“不合理”到未能引导亚洲人民走向强大、自由与平等，实际上表明白人只懂得武力，只会依靠武力。

几十年来，西方对亚洲急剧高涨的义愤填膺的革命情绪一直估计不足，而改变这种局面的要求便化成了内心的激愤，驱使日本走上帝国自杀的道路。

我现在听到罗斯福总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

武装部队总司令

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十二月的一个星期日之后不久，我被召到华盛顿让我在空军情报部门任职。在这前后《星期六晚邮报》向我提出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让我担任它的第一个战地记者，迅速前往印度和中国，然后到俄国，或其他国家。

在必须作出决定的最后一天，我左右为难。这时，总司令亲自发了一道“命令”，由于他的仁慈，我的问题迎刃而解了。我去白宫报到参加每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当我正在同总统的特别助理韦恩·科伊谈话时，电话铃响了，是史蒂夫·厄尔利打来的，他通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要见我。

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是不许发表的。他谈论的一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在报刊上见过他在别处议论过。总统满脸笑容向我表示欢迎，并同我热情地握手。他示意让我坐下，他掏出了一支香烟，并欠身给我点火。他说他是通过阅读《红星照耀中国》认识我的，他想向我“采访”。

“中国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中国人认为我们好吗？”

我告诉他，中国人知道他本人常常设法帮助中国。我竖起大拇指，用中国话对他说：“罗斯福，顶好！意思是说罗斯福非常好。我在中国内地采访时，那里的人们一听说我是美国人，就用这句话来向我表示问候，甚至在我们还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时也是这样”。

他表示欣赏地咧着嘴笑。“给我说说，你对蒋介石就印度问

题发表的谈话有什么看法？”蒋委员长刚刚访问过德里，他呼吁英国人让印度实行完全自治，以便印度人民能够以同盟和平等的地位加入战争。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这样会有什么好处吗？“邱吉尔不是把印度称之为我们帝国皇冠上一颗最灿烂的明珠吗？”

罗斯福说他认为印度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问题”。“我实在不知道邱吉尔现在对整个事情怎么看。当我在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同他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想为印度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我说，我不明白，我们只为争取在欧洲实现四大自由而打一场战争，怎么能指望亚洲殖民地人民感到振奋。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太平洋宪章。如果同盟国的成员保证，在战争胜利之后，给遭受日本蹂躏的殖民地定出同意它们独立的具体日期，我们就可能指望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民给我们提供一些真正的军事援助。我刚刚给《星期六晚邮报》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他执意要我向他扼要介绍这篇未发表的文章的内容。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全世界最忙碌的人竟会这样耐心地听我说话。

“文章中有些看法对我们有用，”他说，“给我一份底稿，我要立刻交给比尔·多诺万去处理。”如果说当时我没有感到飘飘然那是假的。

“斯诺，你准备怎么办，”他慢条斯理地问，好象他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似的，“如果要在现有条件下在印度组织一个新政府的话？这里有穆斯林和印度教的问题，还有不可接触的贱民、王子王孙和少数民族等问题。英国人说他们必须保护所有这些人，以免他们互相侵害，他们不能交权，因为一旦

交权肯定有些人要吃苦头。这就是邱吉尔的论点。你说说看，你会试图建立一个保证各种宗教集团、社会等级和王子王孙等等都享有各种权力和特权的政府吗？或者只搞民主立宪，有点象我们邦联初期那样规定人人平等，这样能行得通吗？”

对我来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谈的只是一孔之见：印度长期以来停滞落后，英国是一大障碍，它象一道大坝，阻断了印度的自然演化和国家政治演变的河道。印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革除已经发展得不合时宜的封建组织机构及制度，而不是如何煞费苦心制定一些宪法条文来保证它们得以永远存在下去。

“任何新的印度政府都应建立在民主宪法的基础上”，我自以为是地作出这个结论。“将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它们应由印度人自己去解决。当然，假定日本不去侵略的话，英国掌权越久，印度人的阶级和宗教分歧，很可能越难在不遭到灾难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这恰恰是我的想法！我再给你讲点别的事情，”总统说。“我认为，我们不仅要铲除印度宗教的固执偏见和落后的社会影响，我们也要铲除我国的最反动的宗教势力。我们很快就要着手完全消灭教会控制教育的现象。教会控制教育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在所有学校都应该由世俗管理。”

我提醒他，他的前任之一却曾在处理菲律宾的问题上开历史的倒车。当菲律宾人自己同梵蒂冈决裂，建立了一座独立自主的基督教教堂——阿格利帕耶恩斯教堂时，正是塔夫脱总统到罗马去访问，解决了菲律宾人同教皇的争端，让菲律宾国民党把它没收的教堂财产归还天主教。

“这个，菲律宾人将来获得独立时，可以再改变过来，”总统说，“我们把日本人赶走之后，我们会信守这个诺言的。现在所有亚洲人都在看着菲律宾，他们期待其他的列强也照这样做。我们一定得告诉我们同盟国朋友们，他们要对东方人有信心，相信他们有自治的能力。不仅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是如此，爪哇和马来亚，甚至新几内亚也都如此。”

我直了直腰身全神贯注地听着。

“现在，荷兰人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让爪哇实施自治和民主，他们即将给予人民以真正的权力。”他接着说：“但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要的是一种从现在起欧洲人仍然可以当一百年太上皇的自治。”

“他们在作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场战争都意味着殖民主义制度在亚洲的解体。”

“斯诺，日本人简直象是一个为粉碎老殖民主义制度、推动势在必行的改革所不可或缺的妖魔了。当然，这种角色竟然要由日本人来扮演，也实在太不象话了。”他咧咧嘴笑着说：“因为欧洲人看不到这不祥之兆。我看我对日本人是有点偏见，这是受了祖父德拉诺影响的缘故。祖父曾坐快帆去中国，他很了解和喜欢中国人，但是十分讨厌日本人。我很高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我们一样。他们和我们相处要比和英国人相处得好吧？”

我对他说，我认为他们对我们不信任的程度也许要比他们对英国人不信任的程度要少些（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确实是这样！）。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也没有占领他们的领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治外法权；我们继续分享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承担义务。

他挥动一下手臂说：“我们早就应该把所有这些取消了。一九三三年我就曾给国务卿赫尔写过一张条子，告诉他说，我认为我们该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了。赫尔赞成我的意见，但是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不同意。他接着挖苦地说：“当然，我对情况还不够了解，不能驳倒国务院的所有人！”

然后他又一个接一个地谈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问我是不是认为中国人最后会把日本人“同化”，溶为一个种族？他们是不是真正通婚？“日本人”和中国人结婚所生的孩子是否更象中国人？他津津有味地谈了几分钟夏威夷的情况，他认为那里的种族熔炉很起作用。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那里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人和欧洲人通婚生的孩子最好看，也是最奉公守法的公民。他猜想朝鲜人一定是多少有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通婚的结果。他要我解释为什么日本一直未能把朝鲜人同化？或者为什么已经把他们同化了？朝鲜人在目前这场战争中会不会支持日本人？

“不会，如果我们现在就宣布无条件地保证朝鲜的独立的话，”我说：“朝鲜是我们能解放的一个殖民地，我们应当及时这样做，以免我们的盟国染指。”

“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日本迟早都得放弃其殖民地，这是它起码要做的事。他们必须另想办法来维持他们过剩的人口。人口过剩的问题驱使日本人进行战争，但是战争之后问题将仍然存在，到了那时我们就将面临这个问题，也就是对这个人口过剩的问题怎么办。”

他从容不迫地在考虑这类问题，包括计划生育问题的解决办法。我用眼角瞟了一下手表，我发现自己已经在这里待了半

个多小时了，我想一定还有很多重大的事情等着他去作出决定。罗斯福先后把要来见他的海军上将莱希、他的随侍医生以及秘书利汉德小姐都支走了。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在左近等着求见他。我两次三番站起身来要走，他都示意要我坐下，他问起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他們作战的情况，我把我所知的情况向他作了简单的介绍。他似乎感到满意。他说我所谈的和他的朋友埃文斯·卡尔森给他描述的情况大致相同。罗斯福说，他听了之后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他问我，我们怎样帮助中国最有效。

我舍不得放过这个好机会苦口婆心地为中国工合的事业作一番宣传。富兰克林·罗斯福听我讲述工合的历史，工合的成就和艰辛，其中有些情况他过去已经听说过了。于是我提出了我的看法，建议罗斯福要求蒋介石从我们给他的信贷中，拨出一部分来作为给工合的贷款和活动资金。他认为他不能直接这样做，他一向生怕自己会象“野蛮的酋长”那样给蒋下达命令。但是，他说他会设法“让蒋知道我们愿意看到这种事物在那里出现，我会要求蒋随时向我通报这方面的进展情况。难道这样他还会不知道要支持这项事业么？”

我本想告诉他，对蒋光是暗示是不行的，需要有人推动。但是，我感到自己该做的都做了，不便再多说。我向他表示感谢。我起身告辞的时候，总统再次问我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我把我的问题告诉他。

“你想到国外去是吗？”

“我没有去过俄国。我有一个打算，我可以给《星期六晚邮报》写些有价值的文章，这家报纸的读者对俄国的了解可能比

我还少。但是如果空军那份差事更加重要的话，我不会拒绝接受。

他眨了眨眼睛说：“哦，他们忙得过来，没有你也不碍事，”他说。“你还是接受《星期六晚邮报》给你的工作吧。出色地完成那项工作后再回来。战争要打很长时间。”

“我可以把您现在说的话当做命令么，先生？”

“这就是命令！”他加重语气地说。

“谢谢，您有什么事情要我在国外替你办的么？”

“嗯，让我想想，你是先去印度，是吧？你到了那里，见到尼赫鲁时替我向他问好。我希望你要求尼赫鲁给我写封信，说清楚他要我为印度做些什么事。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外交信使把信寄给我！”他笑眯眯地补充说。

他终于伸出手来欢送我。他说：“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请随时来信。”他摇着大脑袋，那双碧蓝的大眼里闪烁着喜欢旅行的人的那种羡慕的眼神。“你只要通过外交信使把信带给我的秘书利汉德小姐，我就可以看到了。你回来后给我个人写一份报告。”

同罗斯福的谈话确实使我获益不浅，帮助我提高了作为记者的水平。他思想敏捷，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为了获得情报和特殊知识不耻下问，他的这些品质都是非凡的。你会感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及时了解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形势；也许他的身体有缺陷跟他下决心不落伍有关。他心胸开阔，平易近人，他对新思想没有抵触，他的思想，在尼安德特^①政治界中是难

^① 尼安德特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分布在欧洲、非洲和西亚一带。——译注

能可贵的例外，是一种彻底的现代思想。

在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分手时，我深深地被他光辉的智慧和信心所感染，相信在国会和人民的合作下，他将领导我们走向胜利，走向明智的和平。

结 束 与 开 始

在这以后的十年生活中，我所从事的工作与当时的整个历史多少有点联系。如果我当时不是这样，而是安下心来过惬意的夫妻生活，那么，我那十年的情况可能就会太不相同了。首先，我就不会那么急着想立刻再到海外去，也不会在国外待那么长的时间，以致于使我第二次“失去了美国”。

人们常说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个成语用来描述我和尼姆·威尔斯的婚姻生活的开始和结束的感情是十分恰切的。我同尼姆在美国重逢时，爱情的影子已经从我们的眼睛里消失了。互相违约而不是互相信任，是问题的焦点；我们见面时不再是情投意合，而是反目相眦，重温旧好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如果说结婚开始的时候双方是愚蠢的，那么结束时往往是比较理智的。我们开始时是愚蠢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比较明智了。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弄懂的，这就是生活本身比任何学校都重要。一旦看清楚了婚姻生活的创造性已经枯竭，其结局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这种婚姻就不可能，也不应当继续保持下去。在我准备动身去非洲的时候，我们两人心中都有数了。但我还是犯了一个最后的错误：双方议妥正式分居，“象未婚的单身男女那样分开生活”——这种推迟离婚的

做法把我们各自另组家庭的事耽搁了好多年，真是令人不堪回首。

三月底我在费城接到了《星期六晚邮报》新主编本·希布斯给我的聘请书，他在信中称我为他的“世界记者”，因为当时敌人在各个战场推进那么迅速，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可能打哪条路回国。

本·希布斯是在《星期六晚邮报》快要办不下去的时候接任主编的。这时订户纷纷取消订阅，广告大批转到别的报纸上去刊登。在韦斯利·斯托特任主编时，《星期六晚邮报》仍然是中立主义和反干涉主义的最后一道战壕。斯托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主编，他有胆识，有主见，但是，在他决心不受同盟国的战时宣传及其国内工具的骗时，他犯了一个大错误，断送了前程。他批准刊登了三篇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连载文章。这些文章试图剖析排犹的事实根据和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偏执狂。虽然这些文章的作者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内容总的说来也是客观的，但是当时国内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听凡是在观点上对纳粹种族主义有点同情的人说的话。这些文章引起的反映在杂志历史上是最迅速和最惨的一次。斯托特在几天之内就被辞退了，由本·希布斯接替他的工作。

希布斯生于堪萨斯，身材修长，性格文静，才能出众，他只用了几年工夫就使这家报纸重振旗鼓，再次成为发行份数最多的报纸之一。但是几年来他从未发表一篇涉及犹太人问题的文章。

原来下聘书请我到《星期六晚邮报》工作的是韦斯利·斯托特，如今斯托特辞职了，我想我的这份差事可能也就随之取消

了。斯托特走后留下了许多难办的事情，我不知道希布斯如何处理，于是向他核实一下他是否有意给我重下聘书。他立即签了一份合同保证要聘请我。

《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竟然会在《星期六晚邮报》担任编辑，好多年有些人感到奇怪。但是，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直系后裔的关系是在这本书写出来之前就有的；人们忘记了《星期六晚邮报》曾经摘要刊登过这本书。从乔治·霍勒斯·洛里默任主编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同《星期六晚邮报》保持着关系，那完全是因为我写的报道一贯准确而信誉卓著的缘故，这是我常引为自豪的。我的报道有时同《星期六晚邮报》的社论有矛盾，但是这家报纸很少坚持生活中的事实要服从他们的信念。本·希布斯和马丁·萨默斯多年来一直是我任国外新闻编辑时的顶头上司，他们既是很了不起的主编，又是对人关怀备至的朋友。

一九四二年当我准备到国外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否有机会看到克里姆林宫。苏联驻美国大使马克斯·李维诺夫曾想方设法帮助我取得入境签证，但是，最后他对我说这事毫无希望；我过去所写的东西使我成了在俄国“不受欢迎的人”。他建议，作为最后一着，不妨要求白宫出面同莫洛托夫交涉。我一面等交涉的结果，一面动身先去印度、缅甸和中国采访。

哈里·霍布金斯出面交涉的结果使我终于获准到俄国去访问，但是，我是在国外好几个月之后才得到入境签证的。从纳税人的观点来看，我们实施租借法，帮了人家很大的忙，而如今我要去俄国却要霍布金斯亲自出马才行，对方也未免太薄情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这倒不错，我到了俄国就不必为我

个人受到的欢迎表示谢意，不必为我受到的极少有的盛情款待表示感激。

在非洲上空迷失方向

本·罗伯逊在等待搭飞机到开罗去见邱吉尔首相。我告诉他罗斯福给我的“命令”是接受《星期六晚邮报》给我的工作，不到军队任职。他好象没有很好地理解我讲话的意思。

“我从来不怀疑，埃德加，”他说，“一个出色的军事记者任何时候都比两个将军强。”

自那之后，他不喜欢我称呼他为罗伯逊将军。我从来还没有见过象他这样鲜明地尊重新闻事业的人。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跟我第一次在密苏里大学校园里见到他时一模一样。当时老校长瓦尔特·威廉姆给我们讲解新闻记者的十诫。罗伯逊崇奉这些准则，要求他的编辑和出版人也坚持这些准则，一直到一年后他乘坐飞机在里斯本郊外失事，但是收效甚微。幸亏就在那次飞行之前不久，他终于完成了他那部描写自己童年生活的著作《红山与棉花》。

罗伯逊远远不如我有办法，我实际上只是略施小计就享受了将军的待遇，优先买到了飞机票动身经由非洲去印度，而罗伯逊却未能成行。空运指挥部当时主要还只是停留在纸上的东西。我们担负两大洋空运任务的只有九架特快客机，平均一百名旅客等一个座位。甚至在非洲，我们的大部分飞机和人员都是由泛美航空公司或其他民航驾驶员运送的。横越大西洋的飞行仍然是一种冒险；飞机上没有在遇险时用于降落水面的装备，

也没有降落伞。我们怀着先驱探险者的激动心情，飞越加勒比海，飞过宽阔得惊人的亚马孙河口到巴西，再从那儿经过长时间而紧张的飞行，越过海洋，来到利比里亚。

在再次回到美国之前，我曾四次飞越非洲上空，但是，同这第一次飞行比起来，其他各次都是愉快的旅行。这次飞行机组人员只靠一组狭长的无线电射束导航；有的驾驶员只靠一张普通的非洲旅游地图辨别方位，一到天黑，无线电射束一失灵，飞机只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上空盲目飞行。飞机往往超载，坠毁事件时有发生。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骄阳似火，一架从拉各斯起飞的轰炸机，就在我们搭乘的洛克希德式飞机前头不远的上空突然爆炸了。

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我们飞过渔人湖上空，沿象牙海岸边界(当时是法国的属地)飞到达荷美，进入英属尼日利亚。第二天清晨，我们启程飞往卡诺，那架满载不幸旅客的轰炸机就在我们前头。在飞行途中，我们飞机的螺旋桨发生障碍，飞机被迫在明纳村附近紧急着陆。村里有许多茅屋，飞行员找到了一部电话，用它来呼救。前来援救的是道格拉斯 C-47式飞机。这架飞机直到近黄昏时才找到我们。我们再次匆匆起飞时天色已渐渐黑了。由于有风，我们的飞机飞得很顺利。副驾驶员出来伸懒腰时告诉我们，再有几分钟就可以到卡诺了。但是，就在这时发生问题了，给飞机导航的无线电射束不见了，过了一小时，我们在飞机上的每一个人人都知道，我们的飞机在非洲上空迷失了方向，大家感到很不安。

卡诺距法属西非的边境很近，当时由勒夫特-瓦菲执政。卡诺人见到同盟国的飞机就乱开火射击。我们知道，这样越飞越

远，漫无目的在空中盘旋，我们很可能就会飘到撒哈拉沙漠上空。一小时又过去了。我们凭窗俯瞰非洲景色尽收眼底，白天这里似乎毫无生机，而现在却突然冒出了数以千计的部落营火堆，使人眼花缭乱，有的营火堆隔得很近，常常使我们发生错觉，以为是城市的万家灯火，天空微暗，而地面上却是黄色的营火星罗棋布。我们的飞机作低空飞行，借着降落信号灯的灯光观察地形，发现到处都是巉岩或矮灌木丛，竟然找不到一处勉强可以降落过夜的地方。

在这之后我曾多次搭乘军用飞机，每次心情都很紧张，为此我不禁要向所有飞行员致敬，但是没有一回象这次这样老是提心吊胆，怕遭到不测。飞机上没有降落伞。我们的飞机如果不能同无线电射束恢复联系，那就恰似一个盲人想在桌面大小的地球仪上指出明尼苏达州斯利普艾的位置，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等待飞机坠毁。由于飞行的距离这样短，驾驶员没有把油箱加满，很快他就得动用备急油筒里的油了，我们只要能找到一处平坦的开阔地就准备降落。

又过了三小时。这时不论在什么地方降落都是一种宽慰。我们飞机上的十五位乘客都越来越心神不定。我们当中没有几个是常出门的人。机组人员全是年轻人，这是他们第二次在生疏的非洲上空飞行，他们的脸上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情。乘客中有几名工程师，他们是去伊朗敷设一条通往俄国的补给线的；有几名技术专家；几名奉命去执行特殊任务的美国兵；美国对外服务机构的视察员乔治·韦林；还有一个海军上校米尔顿·“乐天派”迈尔斯，他是去中国帮助组织游击队的情报和破坏工作的。此人后来成了有名的海军上将。

“在飞机失事中，还有什么比精神犹存更好的吗？”有人在开玩笑说。我猜，说话的人是韦林。

看到没有人搭茬，他又接着说，“形骸消失”。但是在两三个小时之后，大家开不起玩笑了，心情烦躁难熬。几个年轻的士兵掏出妻子或情人的像片，不声不响，目不转睛地瞅着。一个英俊的下士，头发金黄、柔软、稀疏，他给女友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边写边掉泪，张张信笺尽泪痕。他过去未乘过飞机，他现在认定从此不会再有机会搭乘飞机了。一位工程师不停地咽着唾液，他那大喉结极其频繁地上下移动着。另一位是民用事业的工程师，结了婚，做了父亲。他老是隔一段时间就说：“要镇静，要镇静”。后来他解开了安全带，从座位上站起来，在过道走来走去，兜售他那贵重的金表，只要求卖五美元。

“我现在不需要这块表啦”，他说，“我现在不需要这块表啦”。

由于气流下降，天空中出现了许多“空中陷阱”，偏巧给我们全遇上了，飞机颠簸使许多人感到恶心，一位和蔼的中年上校呕吐得很厉害，把裤子都弄脏了。

“哎唷！我们的飞机还在原地转圈子哩”，乐天派迈尔斯在飞机下沉后又急剧上升时说。

“你怎么知道？”我认真地问。

“这是我们第三次遇到那种‘空中陷阱’了，”他答道。“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深水炸弹在潜艇周围爆炸时的感觉，要等到潜艇往上升时才能判断它是否中了弹。”

迈尔斯喜欢恶作剧，脸上常常露着顽皮幽默的表情，因此人家都叫他“乐天派”。他接着给我讲述了他在中国南海指挥一

艘驱逐舰的故事。当时日本人的舰队正在攻打海南岛。迈尔斯的驱逐舰驶近时，日本人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不准他的驱逐舰进入港口。迈尔斯不听那一套，径直把驱逐舰驶入港口，同时扯起了一面他自己发明的三角信号旗。在这面“鬼晓得”的信号旗上画着三颗星、三个问号和三个惊叹号。日本舰队司令们翻遍信号旗标帜手册也弄不懂那些符号是什么意思。于是他们便去问东京，东京问华盛顿，华盛顿问迈尔斯。等到迈尔斯答复华盛顿，华盛顿再把他的答复转告在海南岛的日军时，乐天派已经收集齐了他所要的全部情报，他的驱逐舰已经启碇驶往别的海域了。就这样，日本的整个舰队有好几天被他搞得“乱七八糟”。

我一面在听乐天派讲故事，一面在沉思我自己对当前这个处境的反应，我虽然不象他那样若无其事，但总算勉强做到了中国人所说的“保住面子”。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意识到活命的希望很渺茫了。但是，有趣的是，我这时觉得如果非死不可的话，这种死法到也可以。过去我曾经同死的念头作过痛苦的斗争，但是此刻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形影相吊，孤身一人，我没有家属，我的死不会给任何人造成痛苦。我虽然还年轻，但是，我比大多数人生活得充实和自由，我曾经到过世界上一些经常发生动乱的地方，见过世面，结交了一、两个知心朋友，我很高兴我经常做的都是我感兴趣的工作。

虽然如此，我还是有理性的，我精心地选定了我认为一旦飞机坠毁时“最安全”的座位。

“我发现无线电射束了！我又找到它了！”我们大家都听到那个红头发的报务员激动地从开着的门向座舱大声喊叫。“我找

到了那该死的无线电射束了！”这是午夜前一分钟的拯救，我们确实也是在午夜前一分钟得救的。我们的飞机飞近卡诺时，毫不费劲就认出了机场。地勤人员在机场四周点了一圈火，为我们的飞机着陆引路。人们原来以为我们已经迷失方向，对我们不抱希望了。

飞机着陆了。驾驶员走出机舱，量了一下最后一个油箱里的汽油，说：“四加仑”。他准是个美国佬，因为我记得他咧了咧嘴后又说：“大概只有那么多了。”

经过沙漠上空飞往新德里

谁要是不能理解阿斯旺大水坝工程对埃及有什么意义，不能理解为什么说任何政客要是从修建这个工程的贷款中营私舞弊的话，那他就是作恶而绝非聪明，他就应当从苏丹沿着尼罗河谷旅行一次受受启发。那末，他将看到，正如我这次飞往印度途中所第一次看到的那样，埃及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竟是如此狭窄。经过灌溉的沃土，象一条狭长的绿色缎带。从喀土穆延伸到海边，共有一千英里长。只有在这些干旱的平原上人类才得以生存。在大部分地段，生命线只有几英里宽；从天空往下看，它更象是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的一条大路。从尼罗河伸展开去，四通八达的灌溉渠所及之处，人烟稠密的河谷土地是丰饶多产的，但是离开潮润的地方一箭之遥，就突然开始呈现出一片白茫茫发亮光的、死一般沉寂的荒地，埃及地表上几乎到处都是如此！

人们除非知道埃及的可耕地几乎不到全国面积的百分之

二，否则就会被有关埃及的各种略图所迷惑。

在位于富饶的三角洲地区顶端的开罗，你不会认为埃及是一个沙漠国度。在战争时期，你也根本不会认真地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尽管当时它名义上是个独立国家。就在我到达前不久，英国人向年迈的福阿德国王发出了最后通牒，把一辆坦克开到他的宫殿台阶上，命令他任命纳哈斯帕夏为总理。我所记得的另外两件事情说明了当时开罗的脉搏。一件是，在谢泼德旅馆，他们仍然在每间房间里安装了三个召唤仆役的电钮，上面分别写着：“女仆，侍者，当地人”。第二件是我在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为格洛斯特公爵举行的宴会上听到的事情。把最后通牒交给福阿德的就是这位大使。

大使馆四周是大片大片美丽的、经过仔细修剪的草坪。我很欣赏这些草坪，并且向一位漂亮的英国太太发表了评论。我不记得埃及人是否也象印度园丁那样用手把草尖掐掉；他们可能使用过剪刀，但是肯定没能将其发展为一种机器。

我说，“光是修剪这个草坪就够一百个人忙的了，何况还要给它浇水和剪短哩！”

这位英国太太回答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们是埃及人嘛！”

她说话的口吻太象欧洲绅士了，我不禁吃惊地望着她，因为在我心中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我发现她并无嘲弄之意。

然而我的确在开罗遇到了一位英国外交官，年轻的亚当·沃森，他使我认识到一些深思熟虑的英国人是充分觉察到战争对帝国造成的后果的。沃森后来成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英

弗查佩尔勋爵的最能干的助手之一。沃森是一个保守党人。当我第一次去开罗和沃森一起吃午饭时，他的谈话给了我生动的印象，我现记录如下：

沃森说，当他想到战后要失去印度时，他“确实感到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果你们帮助我们的话，也许我们能保住近东，当然我们不知道美国会怎样做。我们的确需要非洲。

“看来近东的主要力量将是苏联和你们。我们在人力上绝非俄国的对手。俄国将拿下波斯，如果你们不制止它的话，我们做不到。也许我能保住巴士拉、阿巴丹和巴林的石油，但是，那也要看你们的态度如何。”

当时我在谢泼德旅馆遇到的一位美国人卡尔·特威切尔，他完全同意沃森的意见。他是一位采矿工程师，伊本·沙特的老朋友，正奉政府之命要回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多年来一直使我着迷，卡尔的谈话又燃起了我想去那里看看的雄心。我可能找不到比卡尔更合适的人在宫廷上为我说情了；他虽然表面上是为伊本·沙特国王寻找黄金，但他已为国王找到了某种远为值钱的东西，阿拉伯半岛蕴藏量极大的石油。我同卡尔分手后两个月，我接到了伊本·沙特国王的个人邀请，要我在圣城利雅得会见他。这一邀请是在卡尔的鼓动下发出的。当时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但是国王的信后来使我成了一位新闻专员。

在回到开罗后的某一天，特威切尔用一架幻灯机放映了一些关于阿拉伯人的精致的彩色照片给我们看，他要把这架幻灯机作为礼物送给伊本·沙特。最后他放映了在光辉灿烂的十月份的一天里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些快照。

我说，“当你的国王看到那种秋天景色后，你就无法使他

继续呆在沙漠里了。”

卡尔说：“老天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照片放给国王看。”

“为什么不给他看呢？”

“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不老实的话。如果我给他看了这些金黄色的树并且对他说这些树叶是真的，并不是上了颜色的，他就再也不相信我了。”

一星期之后，我同本·罗伯逊和卡尔一起吃晚饭。然后我乘英国飞船“克莉奥帕特拉号”前往死海，飞越圣地和约旦的黑色帐篷，以及荒凉的伊拉克，然后我们沿着阿拉伯河到达酷热的巴士拉。在那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离水手辛巴德^①的家乡不远的地方汇合。我们在碧波粼粼的波斯湾上空飞行了一天之后，沿着干热的伊朗边沿往前飞，最后来到了卡拉奇。记得特威切尔曾对我谈起新罕布什尔州的魅力和没有出过门的伊本·沙特的事情。这时我才领会了特威切尔那番话的意义。

阿拉伯半岛不仅是一片单调的荒凉沙地。而且从我离开巴西以及它的美丽、湿润、绿色的海岸一直到我到达印度以前，似乎在我们下面除了灰色和褐色的荒地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它确实是一个完全一样的世界，就象一颗椰子与另一颗椰子一个样，而且它们的大部分都是壳。大自然在把那些湿润的地方分给某些黑皮肤的人们的时候是吝啬的，这很可以说明这些土地上的所谓“落后的”男男女女的某些情况。在我们漂亮的着色地图上，他们的土地看来是如此充满希望。

^① 辛巴德是《一千零一夜》故事中巴格的富商曾作过七次冒险的航海。——译注

我是在五月份到达新德里的，在那个干旱的时刻，整个大自然似乎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你感到身子足有一吨重，甚至疯狗和英国人都避开中午的太阳。我采访了林利思戈勋爵，他象他的巨大的、向四外延伸的、红色沙岩盖的宅邸一样不合群，人们把他的宅邸称之为“总督府”。（克雷蒙梭看到它的时候，曾惊呼，“它将变成一座宏伟的废墟！”）然后我乘火车去阿拉哈巴德见尼赫鲁，他的出版人托我带给他一封紧急信件，此外，罗斯福先生也曾托我捎口信给他。当我到那里的时候，印度国大党正在开会。国大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傲慢地拒绝和谴责了邱吉尔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交给德里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提出印度可以建立半独立的政府，代价是国大党要支持这场战争。

国大党重申要求立即获得绝对的自由，并且号召印度人民光是采取“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方式反对日本。

在孟加拉，我感到更热、更混乱，失败主义情绪更严重。我认定，要是日本人有一支最起码的军事力量可以用来对东印度入侵的话，谁也阻挡不了他们。英国人不行，印度人不行，美国肯定也不行；我们在那里，除了有些将军和只尚空谈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能离开那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几个星期是一种欣慰，当时史迪威将军的飞机驾驶员理查森少校让我搭机飞越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前往世界屋脊——气候凉爽、景色明媚的阿萨姆，那里遍地是白茶花，到处是美味的威士忌酒。从那里我乘一架运输机飞过喜马拉雅山脉，飞过缅甸北部的群山。当时我们在阿萨姆的十几架运输机开辟了我们对中国的唯一的供应线。

在重庆，我发现了“让乔治去干吧”这样一种新的、珍珠港

事件后的态度，乔治就是山姆大叔。通货膨胀、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腐化堕落和贪污受贿闹得正欢，漫无节制。在国民党官员、陆军军官和官僚政客中，战争以及为打赢战争而进行的当地生产和赚钱的机会比较起来，现在已经成为次要的问题，这些赚钱的机会包括用越来越多的美钞、租借法案提供的供应品以及美国陆军订货和捐赠进行囤积和投机。自从我上次访问以来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情况急剧恶化，令人预感不祥。

由于中国的审查制度，在重庆的记者们很少能把这些事实发出去。等我到了德里时我才非常坦率地向《星期六晚邮报》电发了消息。英国的审查人员对于没有传到印度来的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持忠实态度，他们让这个消息不加删节地通过了。因此，蒋夫人禁止我进入她的管辖区，这桩麻烦事最后不得不由乔治·马歇尔将军为维护新闻自由向她说了几句话才得到解决。

关于“我们是怎样失去”中国的问题后面还要谈到，此刻我无需进一步谈论它。

我和罗伯特·斯科特上校一起飞回印度，我们在缅甸密支那附近遇到了一架日本零式飞机，我们借助于喜马拉雅山的云层把它甩掉了，但在埃佛勒斯峰附近迷失了方向，最后在黄昏的时候在零云幕^①的情况下安然安全地降落在很小的丁詹机场，它隐藏在巨大的干城章嘉峰四周的山窝里。只是当我在六月份再次到达德里时我才充分欣赏了那些有空调设备的茶园。当我们降落时，我们被尘土包围了，尘土几乎把这个首都遮盖起来。我们在机翼下面站了一会儿，把手插在衣袋里使它们凉

① 零云幕是指幕高度在十五米以下。——译注

下来。阴凉处的温度也有一百二十五度。

在波斯南部阿巴丹的油井周围的情况更糟糕，那里的温度高达一百五十度或更高一些。当你设法了解那些不得不住在世界这块象火炉子一样的地方的人民的时候，这也是要记住的事情之一。那个夏天在德里，在雨季到来之前，大地好象着了火一样。即使是室内的椅子也象火炉一样热。古老的宫殿内部的大理石甚至到晚上也从不凉下来。那里似乎寸草不生。街上的牛看到阴凉的地方就躲进去，不再走动，看见它们的大嘴张着就足以使你立即感到渴得要死。我每天喝两加仑的水也不出一滴汗。我学会了把我的席子和床单用水浸湿，淋浴毕，身上还湿漉漉的就爬上床，把另一条湿床单盖在身上，在一个布风扇或吊扇下边躺着。不多一会儿我就醒了，又干、又热、又渴。把上述动作重复作几次之后，我发现我尚能睡上一夜。

有一桩幸事：在那酷热的时候，没有苍蝇，也没有蚊子；当雨季终于到来时，你会记起这一点。在这个火炉般的地方，下雨是件大事，必须放鞭炮。即使是在半夜一两点钟下的雨，每个人也都会醒来，高高兴兴地走到街上，感谢上苍下了第一场喜雨。街上充满了穿着各种衣服或不穿衣服的人们，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淋雨，一言不发地微笑着。在玛丽娜旅馆，下雨的那天晚上，一位留着八字胡的神情高贵的英国人走到我隔壁的阳台上，一丝不挂地站着，仰天张着嘴，高兴得吼叫起来。

在这件大事过去十天之后，我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初前往瓦尔达，以便在我动身去俄国以前最后一次拜访尼赫鲁和甘地。

同尼赫鲁辩论

一个人天生对祖国事业的热忱，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妨碍我们正确地理解在主持正义方面的更大的需要。不仅美国以及我们的欧洲和俄国盟国，甚至连我所热爱的中国——印度的近邻似乎也都受到了圣雄甘地不合适的“公开反叛”的威胁。在瓦尔达，我对尼赫鲁决定支持这种行径提出责难。

我没有忘记，我们的英国盟友对印度采取的立场，与我们共同提出的要在“世界各地”为实现四大自由而战的声明，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甘地不时耿耿于怀地谈起英国人曾利用他招募印度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事后他们却背弃了同意印度自由的诺言，因此甘地已不再对英国抱有幻想了。一九三九年，英国未同印度方面的任何代表人物磋商，就专断地使印度参加对德作战。甘地于是领导印度国大党要求英国履行它对一桩道义事业作出的诺言，宣布印度的独立是既定的“战争目的”。在日本人进攻之前，邱吉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接着又是甘地再次使克里普斯的使命遭到失败。

甘地说：“克里普斯的建议是向一家破产的银行开出一张过期支票。”的确，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英国的力量不可能在战后在亚洲任何地方保存下来，而圣雄甘地还不知道如何估价这一点。他仅仅是直觉地知道，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因此，就在日本站在印度东大门的时候，他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

我不怀疑印度人有权采取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国家最高利益

的行动，但是我同尼赫鲁争论说，这一行动将不会给印度带来自由，而只会有助于轴心国家。我争论说，通过掌握克里普斯所提供的部分权力，他们仍然能够组织人民，使人民参加军队，训练他们，并且准备“在适当的时刻”为争取全面自由而斗争。

我没有象尼赫鲁和其他印度人那样充分认识到的是，邱吉尔竟然会固执地试图保住这个帝国，尽管在其他任何人看来，不管谁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帝国都将不可避免很快就会瓦解。我没有认识到，在这过晚的时期，要聪明的印度人考虑拿他们对英王的忠心来换取太上皇的礼物——太上皇用武力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主权，是多么令人厌恶(如果不是确实缺德的话)。

一旦日本攻入欧洲人在亚洲的殖民牧场，对于所有的臣民来说，它就变成了一种得到他们感情上的——如果说不是他们精神上的——同情的斗争。甚至连尼赫鲁也不例外。为什么仅仅假定黄种人帝国主义比白人帝国主义还坏，印度人就必须帮助英国人去击败日本呢？甘地站在印度传统的“压迫者”一边同白人的敌人作战又能为印度取得何种尊严呢？

尼赫鲁从来没有这样赤裸裸地对我说起这些。但是在我同他和甘地在瓦尔达相处的日子里，我了解了他们的看法，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即他们真的认为，要从日本人手中把印度挽救过来，唯一的办法是，起来反抗英国人。我当时在日记中详尽地记下了我们私下的一些谈话。

有一天，我对尼赫鲁说，“我对局势的看法是，整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纳粹同苏联的斗争。如果俄国垮了，下一个就要轮到印度。你毕竟不但是是一位印度爱国者，同时也是一位反法西

斯主义者，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在希特勒从西面进攻，日本从东面进攻的情况下，如果你发现自己是他们打英国人的盟友，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尼赫鲁大喊道：“这是一个古怪的问题！”

我说：“也许是，但是这是历史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尼赫鲁两眼望着我，似乎望了很久。我们坐在一所小屋子里铺着席子的地板上交谈。这是国大党在瓦尔达的工作委员会总部。他们在这里开会，因为这里离甘地较近，甘地用来进行沉思冥想的乡间小舍就在附近的塞瓦格提姆村。屋子里有用作靠垫的大枕头。外面在下雨。丝毫没有举行政治会议时所特有的那种喧闹、激动和忙乱的气氛。没有香烟，没有威士忌苏打，没有显眼的打字员，屋外也没有汽车。我们已吃过午饭，午饭是切成小块的蔬菜加淡黄色的甜米饭，盛在锡制的小盘里。然而，在这座空空荡荡的小房子里的男人们和一位妇女萨罗吉妮·奈都却掌握着能够把一个伟大的国家发动起来向总督造反的大权，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和总督分手时，总督正坐在新德里那座像王宫般豪华的有空调设备的房间里。

尼赫鲁耐心地说：

“我告诉你原因何在。过去三年里我们并没有想到那么迫切需要独立，但是现在灾难迫在眉睫，获得完全自由就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有保卫自己的自由，你难道不明白吗？在这种时刻我们不可能在英国领导下取得胜利。除非我们果断地坚持自己的权利，否则印度就会步缅甸和马来亚的后尘。在我们人民当中，滋长着一种肯定对日本有利的情绪。如果日本进攻，我们预料英国人要吃败仗——他们在这里没有一支称职的

军队——而经过一两次战斗之后我国人民就会消极地屈服。”

我说：“可是我不只是听总督说，而且还听一些印度人说，只要甘地发出支持战争的号召，他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国家的态度。”

尼赫鲁回答说，“你别相信。甘地的全部力量在于他从心理上了解群众的感情。他知道只有首先给我们民族自由，人民才会支持战争。”

“但是似乎你们并不是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以保卫嘛，”我接着说这话时已踩上了危险的地段。“你们有言论自由，出版和结社的自由，适当的程序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个人自由。至少，盟国打胜仗总要比轴心国打胜仗对印度民族主义更有好处嘛。此刻提出绝对独立的要求切合实际吗？你怎么能够不顾现在世界其余地区发生的事情而在真空中行动呢？这岂不是太脱离现实了吗？”

尼赫鲁生气了，立刻打断了我的话说，“好个脱离现实！”印度的民族主义并不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脱离现实。我们的社会纲领、我们的社会意识比许多国家都先进。我们比中国先进。我本人认为绝对的独立已经过时了；我们大家都越来越互相倚赖。但是人民应享有自决权。他们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民族利益。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全部内容。”

哪一个美国人能否认这一点呢？我不得不后退。我的下一个论点是现实的：尽管英国人也许不能打败日本人，但是他们仍然能粉碎印度平民的任何不服从运动。没想到，尼赫鲁立即对此表示同意。

“但是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是怎样沉沦下去或者

站起来的。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将不会永远受压迫。在这里树立抵抗精神的唯一办法是组织起来反对英国人，然后这些组织就可以转过来反对日本人。”

国大党“内部”的情报说，甘地现在认为日本和轴心国将获胜。他认为，英、美在印度的驻军将招致日本的进攻，要是没有这些驻军的话，这种进攻是可以避免的。尼赫鲁从来没有对我承认这一点，他显然从来不相信轴心国会胜利。在阿拉哈巴德，他曾激烈反对甘地在珍珠港事件后的政策，认为那是同“我们对盟国采取的同情态度”不一致的，那种政策将使印度成为“轴心国的消极伙伴”。但是在瓦尔达，他最后改变了主意。

然而，直到最后，尼赫鲁一直希望罗斯福对邱吉尔施加压力，要邱吉尔就一项大大充实了的克里普斯建议重开谈判。他十分明确地向美国总统驻德里的特别代表路易斯·约翰逊陈述了这个意见。甚至在七月十四日他同意通过的一项关于要英、美“离开印度”的决议中，他仍然设法使这项决议具有最后一分钟呼吁美国干涉的特点。国大党的决议一方面要求立即给予自由和成立临时政府权利，一方面保证自由印度将同盟国军队合作，援助中国和抵抗轴心国。

尼赫鲁非常不满的是，伦敦和华盛顿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保证，或者为印度的独立是战争目的这一主张说一句话。在这一时刻，“自由世界”没有一个政治家出来支持他，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认为，如果把印度当作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看待，印度是能够转过来积极支持盟国的。在尼赫鲁看来，无容置疑的经验已经证实，采取一种“不结盟”或“中立主义”的对外政策是明智的。这一政策在战后的年月里深深地使西方政治家们感到纳

闷和失望，他们原期望印度会接受他们提出的关于一个致力于进行冷战的世界的两极概念。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在瓦尔达的总督的发言人——甚至也没有一个非官方的观察家——在这一命运攸关的时刻顺着印度人的思路考虑问题。没有一个人试图重新谋求妥协。后来我认识到，总督对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不高兴的。他能越快地把印度的领导人关起来，英国人就将能越快放手拯救印度而不受印度人的干扰。

当我回到新德里时，林利思戈总督对我说：“我说这话时感到难过，但是印度人没有政治感。我们一走，这个国家就会分裂。印度要实行民主还得再等一百年。今天唯一能够使这个国家不致分裂的因素是英国人的统治和军队。”

副领事和军人们，即使他们当中的非常敏感的人，也很少能够对在他们眼皮底下成长的革命领袖作出正确的判断（不妨想一下本丢·彼拉多^①的情况）。乔治·奥威尔绝非一个迟钝的观察家，但他持有同林利思戈相似的看法。他根据他在印度工作的经历，于一九四一年在《狮子与独角兽》刊物上撰文，他认为：“如果印度干脆‘解放’了那就是说，脱离了英国的军事保护，第一个后果是重新遭到外国的征服，第二个后果是接连发生大饥荒，几年之内就会有数百万人饿死。”然而，正是在林利思戈日趋没落的统治时期，印度发生了一次最不该发生的饥荒。在这次饥荒中，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外国入侵，印度却死了一百多万人。

^① 本丢·彼拉多是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由他判决钉死在十字架上。——译注

国大党最高指挥部在瓦尔达作出重大决定的那一天，我到塞瓦格拉姆去和甘地话别。甘地曾经号召，而现在他要亲自领导一场他称之为“公开反叛”的斗争了。

“爆竹，开始响起来吧！”

不管你是在多么排场的场合中看到甘地，不管他是在新德里的比拉大厦里作客，在孟买的德赛大厦作客，或者是在英王陛下某个臣民、被压迫的印度百万富翁家里作客，他始终是自己挤山羊奶喝，用手纺车纺线做衣服，过着苦行主义的生活。然而，这种既复杂又简单的日常生活，通常要由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细致的安排才能做到。他最聪明的门徒萨罗吉妮·奈都有一次对我说：“甘地先生不知道，为了使他保持贫穷的状态，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是，在中部省份腹地的瓦尔达，甘地有他自己的一套长期设备。在那里，他的用来进行沉思冥想的乡间小舍总部塞瓦格拉姆，是成千上万个尘土飞扬的村庄的老百姓过着艰苦生活的典型，这些村庄是圣雄的力量和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的源泉。

瓦尔达本身是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初看上去没有什么迷人之处。我们住在破旧的招待所里，那里的水受到污染，必须加进高锰酸盐消毒，使水的颜色变紫后才能饮用。镇上禁酒。霍乱流行，疟疾很普遍。遍地是黄沙，景致平淡无奇。一个苦行者所穿的粗花布衬衣同瓦尔达的唯一不同之处是前者是可以脱下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甘地选择它作为他的“模范村”的地点。但是也许我对瓦尔达有偏见；我

在那里得了登革热。^①

我的印度朋友是好客的。但是温文尔雅并且具有幽默感的圣雄的确是一个我刚刚开始认识的“伟大人物”。那天，当我和当时担任《纽约时报》的记者、我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阿奇·斯蒂尔一起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特别好。按照惯例，接送我们的是那种叫做“东加”的印度双轮马车。甘地有一辆非常特别的马车，它的两旁漆有国大党领导人的头面像。甘地自己的头面像却挂在马尾巴后面。

塞瓦格拉姆是一个作为游览区来经营的三等牧场和难民营的混合物，村子里尽是一间间茅草屋顶的小土房，并有仙人掌夹杂其间。在这些小土房中间，有一条肮脏的小道通往一座茅屋。这间茅屋看上去同其他小房子一样，只是它周围有一圈干枝篱笆，泥墙上有一幅粗糙的手纺车图样的浅浮雕。一头母牛无精打彩地到处游荡，一群干瘦的鸡高视阔步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在小屋里，有一个人光着脚坐在铺着席子的地上，印度全国都在等待这位牙齿全掉光了的老救世主发话。当时他已经七十四高龄。

就在这蝎子和毒蛇出没的地方，在这一片简陋的房屋和养着鸡和牛的村子里，在善心的纺织工人和苦力中间，甘地即将向邱吉尔发出最后通牒。这些纺织工人和苦力实行他的信条，在做祷告的间歇期间一面纺织一面施舍泻药以缓解他的医院里的病人的病痛。在他们医院里，只靠祷告和土药治疗疾病。甘地不相信科学和外科手术，就像他不相信邱吉尔一样。不论是

① 一种头部和关节疼痛的急性热带传染病——译注

谁拿他们自己做的土药丸来为他治疗高血压，他都欢迎。在这里，他还主编《贱民》杂志，既向姑娘们提供实用的指导，告诉她们如何避免被敌人的士兵强奸，又向盟国和轴心国提供明智的意见，告诉它们如何结束战争。

现在，当他在这个背景下温和地谈话时，他的话是如此自相矛盾，我们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坐在那里，靠在一个大白枕头上，他的褐色身躯赤裸着，只是在腰部缠了几码长的粗布（他在这种炎热炙人的天气里毫不嫌热，真令人嫉妒！）他的目光从一副大金边眼镜里透射出来，时而很和善，时而有点怒气。他解释说，他将领导平民进行一场最广泛的、大规模的不服从运动。那将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但是他将全力使之成为非暴力的行动。

我问道，“你真的希望英国人撤走吗？”

他心不在焉地搔了搔鼻孔说：“如果英国人撤走的话，那将是他们值得夸耀的一件事。但是我想强调这一点：在建议中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坚定地摇了摇他的秃脑袋说：“要么他们承认印度的独立，要么他们不承认。在这之后，可能发生许多事情。一旦承认了印度的独立，英国人就将使整个形势改观。”

甘地希望英国人真正撤走。他说：“下一步将是由谁来接管的问题，是上帝还是无政府主义。”

甘地的话往往令人难以捉摸。

我问道：“你是不是希望印度获得独立，然后退出战争，不是这样啊？”

“自由印度将同盟国进行共同的事业。我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能够使印度转向非暴力，那将是一个伟大的

成就。如果我能影响四亿人，使他们进行非暴力斗争……”

我坚持追问下去。我说：“但是你会反对自由印度的政府使用军事力量同日本作战吗？”

“是的，那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也许仍然有可能达成某种谅解吧？”

甘地坚定地说：“噢，不成，这一次不是再(给英国人)一个机会的问题。”

“但是这在战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动，那是背叛。”

这位温和的老战士心不在焉地掰掰他的大脚趾，象个小孩一样地看着我们，他现在要开重炮了。

他说：“噢，是的，”他第一次使用了不久将席卷全国和世界的那个词句：“那是公开的反叛！”

然后他沉默不语了。他把他的赤裸的褐色身躯靠在枕头上。他看上去非常疲倦。他的面颊陷了下去，眼镜滑到鼻子上。在他身后有两个摆满了宗教书籍的书橱，书的封面已破旧，其中有一本书，它明亮的护封上印着《现代军备》的字样。在他身旁放着我的著作《为亚洲而战》。一位年轻的印度姑娘悄悄地走进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医院需要他去。他拿起了我的那本著作，当他离开房间时转身对我说道：

“你们当记者的是爆竹。开始响起来吧！”

尼赫鲁曾经对我说，甘地一直在读我写的那本书。他说：“你在最后一章所陈述的观点和他的看法正相同，甘地先生希望你谈谈这个问题。”当其他人鱼贯而出时，我留在后面，目不转睛看着一头褐色的母牛和一只山羊。我不知道我能对这样一位勇敢的老先生说些什么。当时我无法不对他感到失望，因为

在我看来，他是在给一项比他自己的事业更伟大的事业拆台。

我突然打定了主意，来个不辞而别，迅速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走了。

这次反叛活动是在八月二日开始的。当时甘地、尼赫鲁和其他所有高级领导人都很快就被逮捕了。到处都在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所有活动全遭到了武力的镇压，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甘地一被关入监狱，这场运动就采取了暴力形式。随后，在十二月份，有六万印度人被监禁，当局向印度人群开枪四百七十次，出动军队六十八次。只是在甘地进行长期绝食的时候，他的同胞才闷闷不乐地停下来，等待他的下一道命令。

我仍然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过来，这一切都是尼赫鲁曾向我描述的一个进程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他说：“印度有了甘地才直起了腰板。他教导我们，要团结起来采取政治行动才能有作用。在这一时期，除了他的办法外，大概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够奏效。”

我记得，有一天尼赫鲁曾对我说过，甘地“完全同意”《为亚洲而战》的最后一章的结论。于是我自己又重读了一遍。我看到我在珍珠港事件一年多以前就主张作为我们向英国提供军事支持的交换条件，美国应要求让印度独立。我的结论说：

“有人会说，印度的解放将意味着英国‘统一’的告终。其实不然，这样做反而可能是英国恢复统一的唯一办法。今天，与民主的英国关系最密切的盟国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果加拿大没有得到她南面的某个前殖民地的帮助，她可能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一个自由的印度可能成为英国的宝贵的财产，正如一个自由的美国是英国的宝贵的财产一样。”

啊，圣雄甘地说得真对！由于我的过分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作祟，其实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就在烈火熊熊燃烧的印度平原上，而我却认不出来！

当我乘飞机从印度飞往俄国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六年以后我会站在甘地身边接受他的祝福，而就在这之后几小时他就惨遭刺客杀害了。

乌克兰交响乐团

一九四四年冬天，经向莫洛托夫反复请求以后，我终于获准以“个人”身份到已收复的乌克兰地区走一趟。当我的新秘书安娜·叶尔莫拉耶娃和我到达基辅的时候，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地区仍在德军占领之下。基辅这时半是瓦砾，半是空城，然而它高高地耸立在第聂伯河上，依旧景色如画。乌克兰一向是苏联最发达的地区，它的工业产值几乎占苏联全国的一半。它在战争中遭受的惨重损失，超过了苏联任何其他地区，也超过欧洲任何一国。

苏联死于战争的大量军人和平民，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乌克兰人。看了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新的苏联人口统计数字，美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原先公布的苏联战时死亡人数的估计数字，是经苏联政府打了很大折扣的。战争期间，俄国可能死了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人。基辅的一位官员告诉我，单在乌克兰就“失踪”了大约一千万人。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妇女、儿童以及德国俘虏的劳动重新建设起来的。

在断垣残壁之间，我见到了一位乌克兰女提琴家，她介绍

我去拜访了基辅交响乐团。她是听说当地来了一个“美国官员”以后，到旅馆找到我的。她请求我捎话给她一位住在美国的姐姐，说她还活着，可是她的住在列宁格勒的所有亲人全都饿死了。她的姐姐是一位演员，名叫科里乌斯，不久前在好莱坞的电影片《大华尔兹舞》中扮演过角色，这部影片在俄国许多地方放映过。我答应给她捎信。然后，她邀请我去会见了基辅交响乐团的团长。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

团长说，“对乌克兰人来说，音乐就是面包。”

在德国人被赶出基辅以后的第一天，这个乐团就重新建立起来。当城里有许多地方还在冒烟，还在排除地雷时，乐团就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频繁的爆炸声就像是大鼓在伴奏。听到他们安排的下一次演出日期以后，我表示很遗憾：我来不及听他们的演奏了。第二天上午，团长邀请我当天下午去听他们的排练。我到了音乐厅，才听说他们已集合在那里，要举行一次正式音乐会，并为我们演奏我们想听的任何乐曲，我在俄国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热忱对待一个美国人的情形，我以为他们不过是作作姿态，未必当真。但是这位乐团领导人说，我要是谢却他们的盛情，他们会感到难过的。

“美国人在乌克兰是受欢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你们用粮食帮助我们度过了饥荒。美国的工程师曾帮助我们建设工业。现在，美国又给我们送来食物和衣服。你们送来武器帮助我们打希特勒。你们的小伙子和我们的小伙子正在为了共同的事业流血牺牲。现在你来了，你是我们解放后看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我们要为你举行一场音乐会，来表达对美国的感谢！”

哪还能拒绝呢！于是我和安娜坐了下来。偌大的音乐厅里，

只有我们两个听众，我们庄严地听着由我们当场选定的节目。我们选的乐曲，都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作曲家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格里格，^①他们当然很高兴，演奏得非常出色。

演奏完毕，乐团的人围了上来，提出了许多问题，想了解美国的音乐、乐团、剧团的情况，战争形势，以及美国人对俄国的看法。我向他们表示歉意，我对国内的情况太不了解了。这些人差不多都有亲戚朋友在美国；他们觉得对美国人很亲近。许多人说，他们盼望有一天能访问美国。

最后我问，我怎样才能报答他们的一片盛情。

当我重复了我的问题以后，团长若有所思地回答说，“有一个办法。我们非常需要弦。你能从贵国给我们弄一点弦来嘛？”

“弦？”

“小提琴的弦，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弦，竖琴的弦。还有簧片。管乐器的簧片。战争期间我们停止了这些东西的生产。但是在美国，或许……”

这些东西容易买到，我想：问题是怎样把它们带过来。我想了一下，想起了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目前正在华盛顿，他不久就要返回莫斯科。我答应回莫斯科后给哈里曼发电报。团长显得很感激，表示在收到这些东西以后，要去莫斯科为我们再演奏一次。后来他果真这样做了！

在乌克兰，甚至官员们也似乎比莫斯科的官僚要诚恳热情和通情达理。我离开乌克兰的时候，确实相信乌克兰人对我们很有好感。当然，我估计乐团的演出是经过党的宣传部门安排

^① 格里格(1843—1907)著名挪威作曲家。——译注

的，但是谁会介意呢？人们真诚友好，这才是重要的。因此，我回到莫斯科后大吃一惊：首席新闻检查官彼得罗夫先生竟然拒绝签发我给哈里曼的电报，他通过我的信使把电报退了回来。我马上跑去找他。

“为什么你要扣压这么简单的一项要求？”我问他。

“这里不需要琴弦和簧片，”他冷淡地回答说。“苏联的产品很充足。我们不希望用这些无谓的小事去麻烦哈里曼大使。”

“但是，我的老天爷，不是你们麻烦他，而是我个人求他办点事呀。我知道他会乐意帮忙的。他要做的事不过是打一个电话，一定会有人捐献这些东西的。如果没有，我付款。这点东西在他的专机上也不占什么地方。”

“不行，”他再次表示拒绝。“即使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这也会成为对敌人有用的消息。我不能签发。”

“这真是愚蠢可笑。”

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情报？”

“请问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关于琴弦的错误情报是谁给你提供的？”

我当即决定暂且把这个问题搁下。

“啊，是我在火车上听到的，”我说。

“你可不要随便听信一个陌生人告诉你的事情，”他假笑一声说。

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我的一个印象：俄国革命的伟大精神力量和创造力量，正随着它流入古老僵直的官僚渠道，而逐渐减退了。

青 年

奥丽加·米沙科娃是共青团副书记。有一天晚上，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她干了几杯伏特加酒以后，向我保证说，“只要是为了严肃的目的”，我完全可以会见我希望会见的所有青年人，而用不着通过新闻司。第二天上午，我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干革命的是青年，干反革命的也是青年。假如没有唤起和动员青年人的理想主义，那就什么革命也搞不起来，什么反革命也不会成功。

我告诉奥丽加·米沙科娃，我希望了解十几岁的苏联青年，因为他们可能是美国人在世界上最需要了解的人。她重新深谋熟虑地对我作了一番估量。她是一个派头十足的漂亮女人，长着太妃糖颜色的头发，一双大大的蓝眼睛，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双眼睛显得冷漠、严厉和精明。据说，一九三八年维辛斯基清洗她的上司时，她曾出庭作证，后来她就取代了这个上司在共青团的领导职务。无论如何，她是斯大林宠信的人。她答应给我帮助，还真做到了。

在她的安排下，我会见了一些中学、大学和工厂的青年领导人，在这些采访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向导，就是薇拉·安德列耶夫娜·斯米尔诺娃。

薇拉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又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她有着悦耳的低嗓音，软软的波浪式的头发，刚劲的眉毛和能干的双手。她文静而又严肃，丝毫没有俄国人的那种狂暴。她

从来不用胭脂口红，可是她是那种为数很少的不用化妆反而更好看的妇女中的一个。她的乳白色的皮肤很有光泽。她的衣着简单朴素：棉袄，棉布连衣裙，棉纱袜子，平跟的结实的鞋子。她实际上不算很美，但是，身上的某些素质很有吸引力，她不论走到哪里，年轻男人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而她自己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遇到薇拉的时候，她二十一岁，可是已经经历过艰苦的学徒生活，学习机工。那是在她念技校的时候。她当时学工程，课余时间在地铁工地做工。在一个地铁车站，她曾经自豪地把她“建设”的瓷砖镶嵌图案指给我看。到了德国人逼近莫斯科的时候，她已经有能力领导地铁的一个土建工程队。现在，她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攻读工程学硕士的学位，放假期间，她在米沙科娃领导下参加组织“青年劳动后备队”，暂时担任了我的向导。

薇拉是我遇见过的第一位真正信仰纯洁而又心灵纯真的第二代俄国共产党人。作为列宁教导下成长的模范孩子，她也许由于太认真而显得不那么典型了，可是象她这样的人肯定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在薇拉这样的人以及党内外很大一部分俄国青年身上，都可以发现一种品质，就是认真学习和努力工作，我所记得的美国大学生一般说来就远远不如他们。在俄国，受教育仍然是一件新鲜的事，人们珍惜这个机会。他们与其说是把受教育看作一种权利，还不如说是把它看作一种特权。

有些美国朋友看见我和薇拉在一起，就取笑说：“你在哪里找到了灰姑娘^①呀？”他们不明白，薇拉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新闻。

^① 灰姑娘是童话《水晶鞋》中的人物，先受继母虐待，后得仙姑帮助，成为王子的爱人。——译注

她使我懂得了从报纸上永远了解不到的一些事情，不过不是他们所想的事情。米沙科娃告诉她，我希望见见共青团员们。好吧，她就带我去见他们——俄国年轻的未来的精华，包括各行各业的。

在我的参观访问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中等技术学校。过去，我曾盼望新闻司的“傻瓜”给我安排参观技校，但一直未能如愿。这种学校象是我们美国的中学同职业学校或技术科学预备学校的某种结合。但是在我国的教育制度中，没有与苏联的技校完全相当的学校。在这种技校，我看出了一种新的教育制度是怎样付诸实施的：从幼儿园开始，就有计划地造就必要数量的工人、技术人员、教员和科学家，以满足国家工业化和文化规划的需要，这种规划是为今后三十年制定的。

逐渐地，我对苏联的教育制度的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印象，这种教育尽管不如我们的教育自由，但却较有条理，目的性比较明确。这也是贝拉米^①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向后看》一书中所描述过的那种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至少它的结果是会叫他高兴的。在别的一些方面，社会主义计划制度可能是强加于俄国人民的；但是，让人人都可享受大大扩大的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保证毕业后有工作可做，在这一点上，谁也没有怨言。苏联的教育样板是有一些值得其他许多国家学习的地方的。

尽管存在着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苏联的教育仍然坚持执行它的计划，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它迅速改变着俄国国民的整个构成，从居绝大多数的半文盲的农民中培养了大批受过

^① 贝拉米(1850—1898)，美国作家。——译注

良好教育或具有科学知识的男女。对人实行的这种改造，已经开始在几乎一切可以想见的方面改变着俄国的历史面貌，正象薇拉和她的朋友们对我说的那样。我一面听他们介绍一面观察，明白了苏维埃制度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并大大超过它以往的成就，根本不需要一百年，而是只要一二十年就够了。俄国有可能在战后十年内达到“比欧洲或亚洲任何国家都高的生活水平”。^①

因此，我对下述情况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一九五五年，在冷战的刺激之下，俄国大学培养了比美国多一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且保持仅次于美国的生产水平。

薇拉性格愉快，但是严肃认真，有时对我近乎粗暴。她毫无轻浮举止。在跟我一起工作了半天以后，她往往还要再工作八至十个小时。她得到的食品比我少，但是她一直拒绝我提出的一起吃饭或赠她食品的建议。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公事公办，所以我开始想，她一定是个完全禁欲的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有一天下午打电话给我，说她晚上有空，问我是否愿意请她一起吃晚饭。她来吃了晚饭，喝了一瓶葡萄酒，心情轻松了。然后我们谈话，她头一次谈了她自己的情况，直谈到莫斯科初夏的黎明。

薇拉告诉我，她的父母是工人，勉强识几个字，他们是第一代离开土地的人。她的曾祖父一代是农奴。她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假如在从前，对于她这个阶级的人来说，这大概就意味着，她和她的姐姐将会受人收养，或者沦为娼妓。但是，

^① 见《苏联力量的格局》一书，纽约1945年版，第212页。

她和她的姐姐都依靠国家的补助上学念书，直到上大学和念完大学。她们姐妹俩都是优秀生，赢得了奖学金。薇拉至今还是完全靠助学金生活。她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确是为人民利益办事的，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只要考虑到她的经历，就不难明白她为什么这样想了。她生活中的最大财富就是受到的教育，这使得她比她家里人从前的地位高得多，她认为，她这一切都是国家给她的。

“凡是学习的人，”她说，“都可以受到我们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在沙皇时代有这种可能吗？我的父母是穷人。象我这样身无分文的孩子，在从前最多能念一两年书。在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中，九十多个学工程的大学生，竟没有一个人是书香子弟。现在，凡是男人能学习的，女人也能学。我的班上就有二十七位女同学。

“我觉得苏维埃制度是最民主的。确实，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制度，我希望去看看。我非常想去看看美国，去了解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我可以做到。只要我学习，我总有一天会到美国去的。”

学习就是她心目中的整个自由的通货而且她认为可以由她任意取用。在她的家里，没有一个人吃过清洗的苦头。

清洗？是的，俄国仍然有“坏人”。她不能说每一个被捕的人都是罪有应得。错误是有的。但是，她不能想象她会去反对当局，或者有什么人会妨碍她的前程。

她问：“请告诉我，美国象我这样的家庭的孩子能当上工程师吗？他们上学能得到国家支持吗？黑人真的没有这样的权利吗？他们毕业以后真的找不到工作吗？”我尽力解释什么是

“选择的自由”，她听了以后又问：

“但是，如果你们的国家没有经济规划，青年人怎么知道他们该学什么，或者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呢？谁去告诉他们？公司吗？但是公司的老板会不会根据个人的好恶而决定让谁工作和不让谁工作？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就拥有一切吧？工作最艰苦的人倒可能一无所有？”我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问她：

“你认为你们在苏联享有完全均等的机会吗？”

“啊，没有。那要等到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候。现在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时期。人们是‘按劳分配’。只有不劳动的人才会感到吃饭难。在从前，根本不劳动的人反而是往往吃得最好，生活得最舒服。你们国家里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无所事事的富人？是的，我们有一些这样的人。美国的普通工人阶级家庭日子过得比苏联的普通家庭好得多。他们比俄国除了高级官僚以外的所有别的人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我让薇拉看《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那上面的一些广告图片显示了各种家用器具和设备：现代化的浴室和盥洗室，真空吸尘器，小汽车，以及各式各样的普通的东西。我承认，这是一种不高明的手法，但是我很想看看她有何反应。她张大眼睛一页一页地翻阅这些杂志。

“美国有多少人能享受所有这些东西，这样的生活？”她问。

“我们大部分上等和中等收入的人都办得到，”我说。“可以说，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吧。”

“假如没有战争，我们苏联的所有家庭和厨房在几年之后

就都会是这样的了，”她自信地说。“现在花的时间要长一点就是了。”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就象有些人对灵魂超度深信不疑一样。

我谈到党的领导集团是俄国的一个特权阶级。她宽容地笑了。怎么能是那样呢？她本人不就是一个党员吗？难道党员得到的食品和住房不是同其他工人一样吗？当然，国家的重要负责人不一样，这是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给予他们的报酬，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党员。党员根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并不是依靠财富或继承下来的权力而享受好处。她本人的经历不就可以证明任何人都可以上升到深受信任和负责的地位吗？

至于缺乏个人自由？薇拉根本不理解，或者说她的理解只是很不全面的。这自由是指生活、学习、工作、从事一种职业、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和为国效劳的自由吗？她不是享有这种种自由吗？发表意见的自由？啊。人人都有义务完全自由地讨论和理解国家的各种决策。

薇拉的回答正是党的路线，我早就已经听过了，但是我觉得她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她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全盘接受了自己信念的成年共产党人。她对资本主义以及所有制造成的特权没有切身的体会；她反对资本主义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怨恨。她这一代人，就是今天承担着最重要的生产任务的一代人，对另一种生活方式毫无记忆。对于俄国现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来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的事情，甚至最后一次大清洗以前的事情，简直成了史前史了。

薇拉属于阿瑟·凯斯特勒所说的“洪水之后 诞生的一代”。你怎么能说服象薇拉这样的人，让他们相信私有制比公有制更

民主或更“理想主义”呢？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经承认，他没有能够说服他战时的朋友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这位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在美国，“一个人愿意挣什么就挣什么，愿意攒什么就攒什么，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现在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相信一亿七千万自由人民形成的可以说是一体化的力量，是拥有维护美好事物的威力的。但是他〔共产党人——朱可夫〕却说：‘我们告诉人们：你们不能有那些东西，你们必须把它们交给国家。’他们认为这是理想主义的，因为他们要求人民相信，人生最大的满足就是为国家作牺牲，为国家作贡献……所以，你们要是碰见那种事情，要当心……我想，你们可能会碰见这样的人：要他们相信太阳是热的和地球是圆的，那都是很难的。”^①

苏俄的公民，有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在俄国，共产党员是受尊敬的，就象在波士顿当一名教会执事或者在苏城当一名扶轮社员一样。在俄国当一名中央委员，就象在纽约的股票交易所或者大学生俱乐部中占有一个席位一样，受人羡慕。

苏维埃国家可能会有深刻变化，但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永远不会恢复的。国家所有制和国家计划是现代俄国的大厦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石。只有实际消灭苏联本身，才能把这种基石毁掉。但是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付出这么可怕的代价，把这座大厦化成灰烬。

^① 见《纽约时报》，1957年7月17日。——原注

亲爱的总统先生

俄国诚然是一个警察国家，但它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国家之一，同时，它大概也是一个最令人激动而又重要的，尽管也是最叫人难以捉摸的国家。对这个国家，我往往感到愤怒，但是从来没有感到厌烦。单单是生活在那里的实际感受，就绰绰有余地弥补了种种不便和烦恼：严寒的空气叫人头脑清新，仿佛能尝到和嗅到它的味道；深沉的冬季闪现光彩，明亮的白昼如此短促，而漫长的寒夜却另有一番风味；孩子们的小脸庞冻得象红苹果，老太太们则裹在大围巾和棉大衣里面；建筑物的墙上结了一层薄冰，而当它们蒙上厚厚的白雪的时候，一上街就似乎走进了冻雪的隧道；站在宽广、空旷而又多风的红场上，站在圣巴西尔教堂那些棒棒糖似的彩色的圆顶周围，人们禁不住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墨绿的莫斯科河在克里姆林宫墙下静静地流淌，而墙里的那些多窗的白色宫殿如今则是笼罩在夜幕之中；人们时时刻刻都能意识到自己是在直抵太平洋之滨的辽阔国土的一端，自己周围是浩瀚如海的莽莽草原，而隔断草原千里碧波的，只是一处一处的白桦树林和一丛一丛的圆木棚屋；在这些棚屋中，以及在城市公寓中，居住着永远热诚、充满活力的俄国人民；他们怀着一种动乱感、方向感和使命感，感觉到在这里进行着大自然与人的决战，感觉到自然的湍流正被强制纳入控制之下，感觉到样样事物都被弯着，扭着，改变形状，使之符合那仍然变幻不定的新规格。

假如罗斯福总统有我这样的机会，来亲眼看看俄国人民及

其辽阔无垠的谜一般的世界，他该会多么高兴！他渴望旅行，却由于身有残疾而未能遂愿，他只能在自己的心目中漫游全球，借阅读别人写的书和寄给他的信而神游异国。

我同他分别的时候，他说过：给我来信。我照办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我从莫斯科发了一封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回到这里已近两个月了，差不多到了谈谈新的印象的时限了，也就是把此地的现状与我上次来访时的情形加以对比，谈谈自己有何‘感受’。

“上次，我离开俄国的时候，这里还是冬天，寒冷萧索，薄暗微明，到处覆盖于一片白雪之中。在莫斯科真是难见天日。如今却是夏季，人们面孔上的表情也明朗起来了。建筑物上的伪装已经抹掉，而冬季里人人冷漠阴沉、紧锁愁眉的神情似乎也大都抹去了。诚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夏天温暖而又明亮；俄国人的性格总是随着季节而变化的。但是，这也是因为人们感到了胜利的欣慰，知道最严峻的时刻已经过去，对未来有了信心……

“现在，俄国人已攻入波兰，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在逼近巴黎，因而俄国人正在更多地考虑战后的问题，虽然在公开场合还没有什么谈论。无名百姓则是更殷切地盼望着能有一双鞋子，一套衣服，修缮漏雨的房顶，缩短一点上班时间而享受一点闲暇，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希望能吃饱。他们多么渴望和平！现在和平看来不远了，艰苦的日子却变得更难熬。人人都疲劳不堪；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现在谈论疲劳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

人，不休息地工作了三年，显得老了十岁或十五岁：牙齿松脱，关节炎，视力减退，一系列的老年疾病折磨着他们，半饥半饱加班加点的日子更是加速了他们的衰老。

“莫斯科战前就拥挤不堪，现在人口更多了，有四百多万。找一间住房，几乎比进克里姆林宫还难。我知道有的夫妻离婚了，可是仍不得不多年住在一起，就因为两个人谁也找不到别的住处。病人很多，医院病床有限，应接不暇。昨天，我去过莫斯科河畔的高尔基公园，在那里看见了好几十个残废军人睡在露天的帆布床上，他们是从医院里被挤出来的。许多人拄着新拐杖，用假肢练习走路。在那个地方，缺胳膊少腿的人似乎比四肢齐全的人还多。

“很难找到一个不曾失去亲人的俄国人。我的教员失去了两个儿子，这次我回来，又获悉她的丈夫也死了；她刚刚三十四岁，已经头发灰白。我的秘书一直听不到她丈夫的音信，也许他死去有两年了。帮我打扫房间的两个女佣人都是不久前成了寡妇的。她们各有一个儿子，也都死了。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去看望电影演员卓娅·费奥多罗夫娜和她的妹妹。她们的父亲在一九四一年牺牲了；不久以后，她们唯一的哥哥也死了。我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她们姐妹俩又都听到了自己丈夫去世的消息。

“卓娅和她的妹妹正抓紧业余时间发奋学英语。她们告诉我，英语现在是中学的必修课，在大专院校里，英语也是最受受欢迎的。

“我发现，俄国的老百姓现在愿意承认美国援助的重要意义，甚至加以夸大。他们看到美国的商品陈列在商店里，美国

的小汽车和大卡车行驶在街道上，从战区逃来的难民穿着美国的衣服，到处发放美国的救济食品。我遇见过的一些俄国人对我说，他们认为红军的补给品百分之八九十是从美国来的——对这种印象，我都不想费心加以纠正！

“我预言，俄国人将会拿出他们为了打赢战争而发挥的干劲来完成他们和平时期的任务。不止一个俄国人告诉我：‘我们在这次战争期间已经学会了怎样工作。我们掌握了机器。我们决不会走老路！’

“战前曾加入过法国内阁的皮埃尔·科特，到俄国收复的地区作了四个月的旅行，研究他们恢复经济的方法。俄国人让他参观的地方之多，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外国人。他告诉我，他深信俄国人用五年时间就能恢复战前的工业产值水平。他说，他们的重建工程普遍纳入了长远规划，因此，把所有毁掉了的城市实际上都重新建设起来，可能要用十五年时间。

“他说，‘十五年后，俄国发展的速度将会比假如不曾发生这场战争所能达到的速度更快！’

“现在综述如下：

“一、公众希望和平。大家都疲劳了。公众感觉到不得不再打一场俄日战争，许多人认为这是俄国为了得到美援而非付不可的一部分代价。对美援，俄国人是感谢的。

“二、战争本身的进程，红军的挺进，以及希特勒同情者的逃跑，将在东欧造成一种政治上的真空，从而出现一种新型的政府，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政府，也不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前的政府。

“三、俄国人正在制订一些着眼于苏美长期合作的根本性计划。但是丝毫看不出这个国家打算放弃它自己的制度。他们又重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党的控制都毫无减弱的迹象。

“四、与过去不同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是，反犹太主义情绪有了蔓延。就在一年以前，还很少听到有人发表反犹太言论，我也不曾听说过犹太人抱怨种族歧视。现在这样的现象却比比皆是。有的人担心，在大学、科学界和各种专业中正在恢复沙皇时代那种老的限额制之类的东西。我听到一些俄罗斯人说，犹太人总是找种种借口逃避上前线，当俄罗斯人在前方打仗的时候，犹太人却留在后方搞投机，说犹太人奸诈狡猾，等等。他们居然对一个外国人说这些话，这说明了他们是多么地当真。人们认为这是希特勒在俄国沦陷区所进行的宣传的影响，还有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使得俄国人的种族意识比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写这封信以后不出三个月，我就不得不急剧纠正我对于俄国人“着眼于苏美长期合作的根本性计划”的乐观看法，听到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警告，它说明俄国的官员们正在更多地考虑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这一警告来得及时，我正好要回国，可以面告罗斯福先生了。来源呢？相当出人意外的是，竟是俄国外交部里面的一位和平友人！

李维诺夫的警告

马克斯·李维诺夫是向我承认过苏联新闻政策过分愚蠢的

唯一高级官员。从他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他了。在莫斯科，我甚至可以偶尔给他直接打电话约见。通常，象别的官员对记者谈话时一样，总有一个秘书在那里作详细记录。但是，有一天，一九四四年十月六日，他竟独自接见了。我。我们之间的谈话是说好了不得公开引用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次谈话的内容。我把“李维诺夫的警告”向总统作了汇报。今天再来引用，已经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了。

我一向认为李维诺夫体现了一种希望，即战后也许还可以找到一种办法，使“绝对”真理、一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真理与西方达致某种可行的妥协。李维诺夫不是当过十年的外交部长吗？他的“集体安全”理论不是在苏德条约之前对世界产生过真正的影响吗？他仍然是副外交人民委员，这一事实肯定是有意义的。这必然意味着，在克里姆林宫的某个地方仍然有足够的常识来指导我们的关系，争取按照真诚合作的公式来解决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

然而，我反复查看我的笔记，确实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李维诺夫本人也期待出现这种情况。他过去努力提高苏联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并且给布尔什维主义赢得了一定的好名声，在这方面，他的贡献比谁都大。在莫斯科，他的成就不为人所了解，并且还受到接替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的忌恨和轻蔑，而莫洛托夫在各方面都不如他。李维诺夫曾长期住在英国（他的妻子是英国人），是唯一还活着的曾透彻吸收西欧文化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又矮又胖，满头白发，一双近视眼很大，面容慈祥，生性热情，感情丰富。他真正热爱人类，痛恨战争造成的浪费；他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拯救”人类，并

不是非要进行战争不可。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些感情而丧失理智。他看出今后我们大家都会陷于深重的困境。

他预言，战后危机的根源仍将是德国。对于怎样处置德国，我们将无法达成协议，而德国人最后却会使我们分裂。他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英国人只会从传统的均势体制的角度看待欧洲，现在，他们将设法让美国人来恢复那种老的均势。

他说，事态的发展显然正在使俄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英美希望把波兰或德国重新建成“反对俄国的跳板”，但那将是白费气力。能把俄国“排除出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他认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将会再次企图这样做。

我问他：“你认为这场战争能不能做到以消灭法西斯主义而告终？或者说，会不会仍然存在法西斯主义的温床？我看，在东欧或德国都不会有这样的温床。剩下的唯一可能性是法国，但是法国是不会充当那种角色的。”

“我对法国可没有信心，”他干脆地说。“戴高乐和其余的那些人将会重演三十年代的历史。此外还有一个佛朗哥，英国还剩下大量的法西斯分子〔同情者〕……戴高乐手下的法国人装模作样说要铲除法西斯分子〔法奸〕，但是那些最坏的家伙却安然无恙。那些老家伙会活下来，因而贪污腐化、阴谋诡计和尔虞我诈这一套东西也会留下来。法国需要一次彻底的清洗，舍此无以救法国。可是法国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在戴高乐治下做不到。”

但是，我坚持说，佛朗哥肯定得下台。战后，除了梵蒂冈

以外，谁也不会支持他，他怎么还能维持下去呢。

“谁能把他赶下台？西班牙人民处于无权地位。法国人连一个指头也不愿动一下……你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人或美国人对佛朗哥不满吗？不，他不会下台的。”

“这么说来，西欧将会重新组成一个反俄集团？”

“鉴于双方的实际情况，恐怕会是这样。请看看波兰问题。英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甚至不想把那里的老家伙们赶出去！”

当时，从任何一个俄国人嘴里都难以听到这样坦率的悲观言论，象李维诺夫这样一位消息灵通而又聪明博学的人物发出这样的言论，就更是异常的了。他说，迄今为止，盟国几乎是完全回避讨论欧洲的根本解决办法。他预言，当我们最终坐下来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彼此间的畏惧、无知和猜疑将会构成无法克服的障碍。

“许多人认为你和迈斯基都是被浪费了，”我说。“你们在俄国是最了解美国和英国的人，可是你们却没有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似乎是奇怪的。或者，如果我说错了就请原谅——也许有许多事情是正在幕后进行着……”

“不，”他笑道。“你说得对。我们是被搁置在一边……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管事的只有三个人，而他们三个人谁也不了解、不理解美国和英国。”

“三个人？莫洛托夫，维辛斯基——？”

“还有杰基纳索夫。”

“杰基纳索夫？”

“苏德条约期间，他是驻柏林的大使。他坐在里宾特洛甫身旁，有一年时间。他对欧洲的了解就这么多。”

于是我懂得了，李维诺夫自己在战前所主张的与英美法合作的政策——即集体安全政策——仍然是基本上被否定的。只要莫洛托夫继续领导外交部，那就意味着，克里姆林宫认为纳粹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为了把这一推论说明白，我说：“在外界看来，这个政府好象认为，已经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证明，它一九三九年同希特勒签订条约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导致走这一步的一切则是失败的。换句话说，它并没有认识到，主要是由于你在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政策，我们今天才有可能结成同盟——尽管签订过那个条约？”

“是那样。他们就是那么看的。”李维诺夫所说的“他们”，首先是指斯大林。

然而，不论他是多么不赞同莫洛托夫的方法，他却坚定地认为俄国必须在波兰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把那些老家伙搞掉”。他说，邱吉尔答应让“伦敦的波兰人”回华沙掌权，是“荒谬的诺言”，如果硬要兑现这一诺言而重新引起俄国的疑惧，那是幻想，是危险而又不切实际的。他说，“贝克那些老家伙完蛋了。”

“波兰必须对俄国友好，必须放弃那种想法，就是以为它还可以充当反对我们的跳板，从而恢复它在十六世纪建立过的帝国。战前，贝克之流和索申科夫斯基之流就在这方面为德国效劳。现在他们又要投靠英美。我们是不会答应的。”

我说，即使我们在波兰问题上能达成协议，德国这个真正的绊脚石依然存在。他是否认为战后有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

“为什么你对统一的德国这么感兴趣？”他苦笑了一下。

“我不过是想知道，贵国政府是否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重新连成一片的、由一个政府治理的德国？”

“如果，如果盟国能够就重新教育德国人和使他们成为和平无害的人的办法达成协议，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小的然而统一的德国。”

“你强调的语气表明，你认为我们是做不到那一点的。”

“是做不到，”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将无法就一个共同的对德纲领达成协议。”

“所以，另一条出路就是德国分裂成一些小邦？”

“我认为是这样。”

“这是不是说要把俾斯麦时代以前的所有小邦都恢复起来？”

“倒不会是全部三十五个邦！但是大概会有最重要的国家划分。也许，到时候每一个邦会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

“没有任何一个中心嘛？”

“没有任何一个中心——至少在一段长时间之内是如此。”

肯定地说，这种前景并没有使他不安。过去，李维诺夫曾经希望战时的英俄联盟能够转变成一项全欧防御公约。那种希望正在迅速渺茫下去。

“英国从来不愿意看到大陆上有一个强国，”他说。“为了和平而与一个强国合作，这种主张与英国的想法格格不入。它已经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活动，要破坏我们的联盟。”

“但是你们不是也在东欧做同样的事情？”

“是的。”他苦笑了一下。他想他们是在那样做。“我们在漂

向同样的方向。假如我们彼此曾经把我们的目标讲清楚，把我们的需要的限度讲清楚，那么通过良好的外交本来是可以防止冲突的。现在为时已晚，猜疑太深了。”

突然，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叫我大吃一惊：

“假如要在战争中作出选择，假如美国要在支持英国还是支持俄国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你们是否非得支持英国不可？你是不是认为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可能站在英国人一边？”

他面无表情。我很少在一个问题上了解到如此之多的东西。

请记住，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国的崩溃还是半年之后的事情。可是，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即外交部），他们已经在为下一次战争操心！我说，我设想，从长远来看，不论哪一个党执政，美国的外交政策都会是大体相同的。但是我看不出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认为美国将会同俄国开战。至少，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利害冲突。很难想见俄国会在不久以后对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我们也肯定没有任何直接边界争端。另一方面，我们与英国人的经济竞争却一直在加剧；尤其是在殖民地中，我们与英国人有利害冲突。但是，强有力的感情上和传统上的纽带把我们同英国人联系在一起，英国人很懂得怎样利用这一点。

我得出结论说：“今天，不论是向英国或者向它的自治领开战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除非英国人犯下粗暴的、不可思议的大错误；可是在过去四十年当中，在操纵美国舆论这一门精致的艺术上，谁的手腕也比不过英国人。”

“换句话说，”李维诺夫说，“假如英国的外交官跟我们的外

交官一样糟糕，那么美国就可能要打英国，而不是打俄国啦！”他说到这里笑了起来。然而他说的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李维诺夫对德国的看法也就是大多数俄国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只有使德国陷于分裂，欧洲的和平才有保证。从这时候起我就认定了，俄国是决不会对东德松手的。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松手，除非它有绝对的保证而且有可靠的军事力量作为这一保证的后盾，确信德国人永远再也不会支持一个反俄的或好战的力量组合。

我觉得李维诺夫关于苏联对德态度的一些谈话非常重要，我希望把它们立即转告我们的哈里曼大使，因为据我所知，哈里曼大使的观点要乐观得多。我要求李维诺夫允许我这样做。这在今天听起来也许是奇怪的，任何别的苏联官员都会认为，外国记者把他的谈话一五一十地立即报告给记者本国的大使，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李维诺夫不是这样；他很了解美国的记者，相信他们会履行保密的诺言。

“不，我请你一定不要在俄国向任何人说起我们的谈话。

“几天之后你就要回华盛顿。如果有机会见到总统，你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他。他是唯一的，”他慢吞吞地说着，“唯一能在现在改善关系的人。”

我明白了，原来正是为了这一点，他才提着自己的脑袋冒风险，如此坦率地向我发表谈话。

几天以后，我回到美国，忠实地向总统送去了一份长达十二页的备忘录，其中包括这次谈话的全部记录。罗斯福总统在他启程前往克里米亚开会之前不久，写信告诉我他对这个备忘录“极感兴趣”。

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象那次谈话时那样自由自在地同李维诺夫交谈了。我重返莫斯科以后，曾在一两次招待会上见到他，但是他一直没有约见我，直到日本投降以后才见了一次，但是这一次有“秘书”在场做记录。当时我们关心的是原子弹问题。

他说：“原子弹不会改变常规的外交或军事思想。人们还是会按照强权政治、势力范围和均势的老轨道办事。它不会改变你们的外交官的思想方法或者按任何新的方式加以运用。而且，美国垄断原子弹不会很久。我们很快也会有原子弹，用于自卫。别的国家也会有的。大家都有，就谁也不能使用它了。这就象毒气和细菌战一样。”

他是我听到的发表这种意见的第一个人。

我在上一次采访中曾经向李维诺夫问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俄国人民是否作好了“准备”而在战后行使某些个人的自由权。既然人民已经证明了自己对制度的忠诚，党会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因而可以容忍真正的言论自由，甚至是在党内？

“我是这样想的，”李维诺夫耸耸肩膀说。“但是我的想法不算数。他们并不这样想。不，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重大改善，直到其他大国放弃了以武力摧毁我们的希望为止。”

“你是指摧毁共产主义？”

“我是指摧毁共产主义。”

我们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原处，还是那种由来已久的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我明白了，甚至李维诺夫也认为，为暴政辩解的一条最老的论据，即“必要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可以拿这一条作理由来严厉压制自由。

“和平革命”

在战争结束以前就已经看出，红军不会让东欧恢复到希特勒入侵以前的情况，而是会在这整个地区促进“和平的”、警察操纵的革命。

我访问了红军新近占领的罗马尼亚和波兰部分地区，回莫斯科后，我给我的主编发电报说：“历史的嘲讽是，纳粹主义决心要推翻共产主义，结果却是摧毁了自由资本主义。东欧决不会再是原样了。这里，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了。”^①

在一九四四年需要经过苏联新闻检查官审核的一条电讯里，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希特勒给资本主义掘好了坟墓，而俄国人正在热心地埋葬尸体。决定这一进程的基本事实，在俄国人民看来是简单明了的。不仅共产党人，而且几乎是所有俄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享有道义上的权利，去“纠正”不仅是德国的，而且还有毗邻盟国的弊端的根源。是德国人进攻了俄国，而不是俄国人进攻了德国。是德国人把俄国人拖进了欧洲，而不是俄国人侵略了德国。

俄国死的人，比其他盟国死亡人数加在一起还要多，比例超过了十比一。

温斯顿·邱吉尔在参观了俄国一些遭破坏的地区以后感叹说：“人世间还不曾有过一个政府在遭受象希特勒给俄国造成的如此严重、残酷的伤害之后，还能生存下来！”然而，在大多数

^① 见《星期六晚邮报》，1947年11月11日。——原注

俄国人看来，比“政府”所受的伤害更加重要的是军民伤亡累累，尸骨成山，国家最富庶的地方变成了荒芜的原野。战争期间应征入伍的苏联人有二千八百万到三千万，其中伤亡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另外还有五百万人当了俘虏。军民死亡人数加在一起超过两千万。纳粹分子把苏联的一半煤炭和钢铁工业变成了废墟，破坏了整个俄国一半的电力工业、炼钢工业和机械工业。被炸毁的建筑物达六百万座，被毁掉的住房和办公室面积相当于阿肯色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佛蒙特州和华盛顿州战前住房和办公室面积的总和。

不论俄国人对斯大林主义有多大怨恨，在他们憎恶纳粹分子的时候，就暂时把这种怨恨忘记了。他们期待俄国的军队惩罚犯罪分子，使他们受到报应，并且改造整个东欧，防止东欧再一次变成疯狂的侵略者的跳板。尽管在战争结束时，俄国确实已经筋疲力竭，正在舔自己身上的伤口，但它显然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如今只有美国才能与它在军事上相匹敌。由于这一可畏的事实，指望俄国在东欧恢复私有制就成了妄想，因为共产党认为，那个差一点把俄国毁灭的妖怪就是由私有制产生的。

纳粹倒台后留下的政治真空，红军是非要用一些东西去填补不可的。可以论证，红军除了把自己牌号的意识形态货色硬塞进去以外，没有别的选择。红军的胜利，同产生了红军的政治制度的胜利是分不开的。不论是这支军队还是这个党，都不懂得或不理解任何别的制度。

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很快就会忘记或者忽略的：在战争过程

中，英美实际上从来不曾要求俄国人禁止在他们占领的国家中宣传、传播和组织共产主义思想。后来有些人硬说俄国违背了大意如此的“诺言”。其实，俄国接受“自决”和“自由选举”的词句，这丝毫没有要求它在那些国家中否定共产主义，也没有不允许它帮助那些主张共产主义的人。正象加莉娅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过是陶醉于我们自己优美的词藻，而忽视了盟国代表在莫斯科所签署的种种停战协议的严峻事实。那些协议明明白白地授权俄国“消灭”一切“与红军为敌”的势力。既然红军享有这些词句的解释权，它本身又是同共产党不可分割，那么，显而易见，消灭“与红军为敌”的势力就只能意味着同时消灭“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势力。

除了俄国人以外，其他一些国家的人们也不会感到这种报应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卐”字旗所到之处野蛮的倒行逆施，其目的仅仅是要实现所谓日耳曼人至高无上的神话，而代价则是要把希腊和罗马、朱迪亚和埃及、印度斯坦和莫斯科公国的所有子孙都斩尽杀绝，或者把他们变成奴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我们应不惜任何手段，实现日耳曼人征服世界。”自从铁石心肠的古波斯人以来，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象希特勒这样的人都会令人笑掉大牙，无地自容。可是在德国，那些拥护希特勒的人——当然决不是所有的德国人——却全然缺乏幽默。

希特勒说，“如果我们决心建立大日耳曼帝国，我们首先必须驱逐和消灭各斯拉夫民族，即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需要的不过是秩序和组织，一步一步地走：第

一步是杀戮“劣等种族”，首先就是犹太人；然后轮到亚洲的“低能民族”，最后再清洗混血儿的美洲。在欧洲各地，他们真的这样干了，把大约六百万非作战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送到纳粹的效率很高的杀人工厂内屠杀，在那里，“任何东西都不会浪费”。

在波兰的马伊达内克，我完全理解了，为什么俄国决不允许在东欧再次出现一个普鲁士国家。在那里，我头一回见到一个企业，它的唯一宗旨是要把男女老幼从直立行走的生物变成多少多少公斤的肥田粉，供纳粹菜园使用。后来，我又在西德参观了达豪和茅特豪森的集中营，不过它们屠杀的人数都没有超过马伊达内克。这种恐怖屠场的高效率，来自德意志农民节俭、做事有条理与服从的美德同普鲁士式种族傲慢与卑鄙自私性格的一种奇怪的结合，它正体现了纳粹哲学的“灵魂”。

“非政治”关系

罗斯福总统亲自同报界人士以及几十位其他的消息灵通人士保持接触，通过这种办法不断地核对他从官方来源得到的消息。据我所知，参议员们很少有效仿这种做法的。然而，我原先以为这些参议员们根本不关心记者的活动，这却是错了。有些参议员后来对我们战时在莫斯科的私生活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承蒙参议员詹姆斯·O·伊斯特兰恩允，我读到了参议院调查约翰·佩顿·戴维斯是否“忠诚”的全部记录，才发现了一点。

我最初认识约翰·戴维斯，还是多年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以后在中国各地我多次见到他，同他一起有过几次小小的历险。我当时已看出了他作为外交官的才能。战争期间，我们又多次相遇：在开罗，印度，华盛顿，最后是在俄国，他是一九四五年年初到俄国的。由于麦卡锡对他提出指控，他的前程被毁掉了。

约翰·戴维斯本来是很有可能升任大使的，但是，专栏作家乔·艾尔索普在一九五〇年写了一系列文章，言过其实地指责他以及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和史迪威将军，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咎于他们，似乎他们的行动违反了艾尔索普和陈纳德将军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愿望。麦卡锡参议员拣起了艾尔索普的指责；由于史迪威将军已经去世，麦卡锡就把戴维斯添进了他认为不切实际的国务院中那些应当对于“把中国出卖给俄国”负主要责任的人员的名单。艾尔索普后来改变了看法，落落大方地承认戴维斯和谢伟思也许当时竟是正确的；可是这已为时过晚，救不了他们两个人了。谢伟思被非法地撤职解雇，后来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复职，但是这时他已经不能再工作了。戴维斯受到旷日持久的反复调查，当事人希望找出理由来说明把他撤职不只是为了抚慰麦卡锡。可是这一努力毫无结果，对戴维斯不忠诚的指控终于只好撤销。然而，他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头痛的人，杜勒斯利用职权给戴维斯加上了一个含糊的不称职的罪名，把他撤职，还不给他发任何养老金。这是在麦卡锡主义在耀眼的电视上遭到谴责而开始瓦解以前不久的事情。

关于戴维斯问题的听证会，本来是秘密的，但是，后来，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还是把他的证词公布了出来。过了不久，在伊斯特兰参议员领导的这个委员会给诽谤者提供豁免

权的情况下，另一个证人说了我的一些坏话。这个证人名叫哈维·马图索，他后来在另一个案子中被判了伪证罪，关进了监狱。我写信给伊斯特兰参议员，要求让我看看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调查的全部记录时，马图索已经收回了他杜撰的诽谤我和男一些人的谎言，我发现戴维斯的证词编入了这一记录中。这部记录长达十五卷，是东拉西扯的艺术的杰作，我查阅它的索引时，就发现有多处提到我。

看来，约翰·戴维斯一度向他的上司、当时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长的乔治·凯南提出过建议，想让我参加他们拟议中的代号为“黄褐田云雀”的一项行动。多亏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的干预，戴维斯才得以免于向参议员们泄露根据“黄褐田云雀”计划我需要完成什么任务。史密斯将军对调查人员说，这项计划的性质非常机密——或者说非常“敏感”——假如一定要戴维斯加以说明，就会对我国的安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这件事现在仍然保密，我只能猜测戴维斯的想法。然而我了解他的性格，他把幽默感和想象力结合在一起，这在国务院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因此，似乎有理由可以推测，“黄褐田云雀”的一个特点，即“在飞行中高声鸣唱”，就包含着猜透秘密的线索。我是一个积极活动的记者，人们认为我对冷战的敌人有些特殊的了解，所以可能希望利用我来激起大河彼岸的反响，从而帮助国务院分析共产党情报局的宣传与情报目标及其手法。

“黄褐田云雀”被放弃了，从来也没有飞过，但是它却给参议员们提供了一条理由，来长时间地离开正题，探听我在莫斯

科的私人情感，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些事情会受到威严的美国参议院的注意。这些参议员们在热情维护我们的国内安全的时候，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外，在一九五一年八月的大热天里，把自己关在参议院第424号房间，来听取约翰·戴维斯的回忆，这种热心的劲头至少是值得钦佩的。请看看下面几段对话：

索瓦因(参议院法律顾问)：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曾经给斯诺先生写过信？

戴维斯：是的，我想，我写过。

索瓦因：那次通信内容广泛吗？

戴维斯：很有限。他在莫斯科有一个女朋友。我记得，他问了她的情况，我回信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没有察觉她，她没有问题。

莫里斯(另一个法律顾问)：戴维斯先生，你能说出这个姑娘的姓名吗？

戴维斯：我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她同英国大使馆的人员有联系。她是——我们都认定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企图用来对付我们的一个人。她是个漂亮的姑娘。

索瓦因：你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内有人企图利用她？

戴维斯：我们推测是那样。

索瓦因：你是说你们都认定她是那样？

戴维斯：“认定”这词用得恰当。我们是推测……

后来，索瓦因又问：“你见过她吗？”

戴维斯回答说：“我只是在社交场合见过她。”

索瓦因：你说她是斯诺先生的女朋友？

戴维斯：我认为不——我认为是那——

索瓦因：你刚才不是说过是他的女朋友吗？

戴维斯：我认为那是一种非政治关系。

索瓦因：非政治关系是什么意思？

戴维斯：就是没有任何政治涵义的关系。

(以下的对话未作记录。)

在这个节骨眼上，不作记录，是很吊人胃口的，但是话说回来，那毕竟是八月的一个大热天。我们无权了解，戴维斯对索瓦因先生的开导是不是准确地符合于金赛博士^①关于美国男人非政治活动的报告。它一定是挺诱人的，因为当他们重新作记录时，已经强烈要求戴维斯尽快把“她的”姓名说出来。这时，“女朋友”已变成了“年轻的女士”：

索瓦因：既然你推测那位年轻的女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特务，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斯诺先生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没有察觉她？

戴维斯：你知道，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会给自己拆台的。

然而，这个回答并没有解决索瓦因指出的矛盾。参议员们

^① 金赛(1894—1956)，美国动物学家及生理学家，写过美国人性生活的调查报告。——译注

也许至今仍然对我们的国内安全的这一威胁感到忧心忡忡，请允许我把她的情况介绍一下。她名叫伊莲娜·谢尔盖耶夫娜·雅斯诺娃；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当她常常陪伴我的时候，记者同人和使馆周围的朋友们只知道她叫另一个名字。既然所有的事实，连同没有根据的结论，都记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案卷中，如今已积满灰尘，就没有理由不让我们自己的调查人员了解这一科学情报。

是的，她姿色动人。可是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吗？恐怕不能那样说，除非你把每一个与外国人有任何一种公开友谊的俄国公民都叫做“特务”。这样的人还会包括相当多的“女朋友”，她们嫁给了美国人，后来成了美国的好公民。当然，所有的俄国人都有可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突然叫到卢比扬卡^①去接受关于各种可能的后果的警告，被要求回答问题，其实，同苏维埃俄国人有关系的美国人，在国内也可能被联邦调查局请去，要求合作，这两者并不是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去俄国访问的美国人也可以有另一种做法，就是避免同当地人的一切非官方接触，这根本不是办法！这样做的人，什么也了解不到，还不如留在国内。

对我来说，我认为，并没有任何危险。我是一个合法的记者兼编辑，不是间谍。我没有什么秘密要瞒住“青年会”（这是住在莫斯科的美国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习惯叫法）。倒霉的是别人。如果说我和伊莲娜的友谊后来给我在怪诞的弱肉强食的美国引起了无法预见的株连坐罪的危险，那么对她来说则

① 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所在地。——译注

是另一种情况。正象她母亲后来告诉我的那样，她是在当时就有危险。

的确，伊莲娜是坚决不问政治的。当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人问她一个与政治沾点边的问题，她就会回答说：“人人都不知道我不懂政治。我太笨了。这也许是由于我的眼睛的缘故吧，不是吗？让我们谈谈美术或者音乐吧！”

我们是由塔尼娅介绍认识的，那是在戴维斯见到她的三年以前。塔尼娅是《每日先驱报》记者罗纳德·马修斯的夫人兼秘书，脾气暴躁、头发黄褐色。她可不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塔尼娅当过外语教员，伊莲娜是她教过的学生。关于我和伊莲娜的第一次见面，我只记得她非常漂亮，热情洋溢，一双天蓝色的眼睛无比动人。

几个月以后，我才第二次见到伊莲娜，当时我在克里姆林公园散步，见到她坐在一条凳子上读书。我学过一点俄语，就壮着胆子上前试着讲几句。她很友好地鼓励我讲俄语。她没有讲英语，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她的法语要比我的俄语和法语好得多。

伊莲娜当时二十一岁，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她挣到了一份奖学金用来付学费，每月还有几百卢布的补助金。她的专业，正象大家能想象到的一样，是远离政治、战争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美术的历史、理论、原则和实践。她还须在大学耽上一年，完成研究生课程，取得硕士学位，可以有一笔好收入。那样，她就有资格到苏联的一家国立博物馆工作。伊莲娜梦想成为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的馆长，然后摆脱那里令人厌倦的布鲁洛夫、列别杰夫和列宾等俄国画家的作品，到法国去当藏画

家，收藏毕加索的所有近作。我们比较熟悉以后，我了解到她还用心学习斯基亚帕列利和迪奥尔这样一些画家的作品。

伊莲娜在家里是独女，她的母亲是一个正统、忠诚的党员干部，是一家国立实验室的生物化学专家。她想在女儿身上多花一点时间，但是，工作很忙，做不到，为了弥补这一点，她（自己担心）在某些方面把伊莲娜宠坏了；伊莲娜的头脑就“缺乏政治修养”。伊莲娜的继父也是一个科学家，成天忙自己的业务，没有怎么管她。她不记得她的生父（一个军官）是什么模样。她还很小，父亲就抛弃了家庭，只给妻子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已跟她离婚。现在，经过多年以后，伊莲娜的继父也受了一个比他年轻的同志的诱惑，提出要离婚，但是伊莲娜的母亲一直没有同意。写一张明信片就离婚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要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而且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取得苏联法庭的离婚判决。在这期间，伊莲娜跟她外祖母住在一起。

我在俄国的第一年期间，对伊莲娜家庭情况还一无所知。她在学校里学习很忙，课余时间都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到医院看护伤病员，到郊区树林捡柴火等等。我在两次战区采访的间歇期间，有一次请伊莲娜共进晚餐，我的秘书也在座，那次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想要向她打听苏联战时的教育情况——大学生和中技生是怎样区分的，课时多少，课程怎样，与社会的关系怎样，如此等等。后来我离开了苏联，去了中东和西欧。

当我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和伊莲娜就常常见面了，因为她在课余时间给我当信使。莫斯科的这种信使，是秘书的助手，可以为秘书节省时间，跑腿送信，排队买配给物资，或者把电

讯稿送到新闻检查机关，等候他们的审查删剔。即使这种相当低下的差事，在当时也是令人羡慕的（而且要经过外交部批准）；日子太艰难了，给外国人工作就意味着能得到所需要的好食品。伊莲娜得到了这个差事，我的秘书吩咐她做这做那，有时候，我几天也见不到她。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常常用俄语同她谈话，愈来愈熟练。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她讲了英语，虽然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很好懂，嗓音相当轻快悦耳。她说英语，似乎使她成了一个同我自己的世界相联系的人。

正当我还在为掌握俄语的假设语气大伤脑筋，讲得结结巴巴，感到自己没有希望能学会很有抒情味但令人恼火的俄罗斯语言时，伊莲娜却学会了英语。我惊讶地问她是怎么学会的，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学的。她解释说，她不过是改变了自己的外语“专业”，从法语改为英语。现在，经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已经说得近乎流利了。

在发现这一点以后不久，有一天，我让她站到窗口，仔细端详她那双眼睛，它们恰似闪烁着光芒的星星，眼睛蓝绿色，正是克什米尔蓝宝石的颜色，恰到好处的椭圆，椭圆得恰到好处。

“嗨，你是一只暹罗猫！”

“你不喜欢我的眼睛吗？”她问道，面色非常严肃。“但是，这双眼睛可是挺好的——我的视力非常好。它们难看吗？”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在一种意想不到的颤抖的声音中，滚滚而出，仿佛是我欣赏的一位画中人魔术般地变活了。

“什么难看！这是我见过的最不寻常的眼睛！美得很！它们美，美极了！”

它们确实是美。但是我却无能为力。尼姆和我正式分居了，但是她没有同我离婚。我特别希望在莫斯科避免发生任何严重的纠葛。

我撤回到中立观察员的地位，保持了几个星期。然后，渐渐地，我开始带她去看芭蕾舞、话剧和歌剧，她在这方面很内行，是我所能希望得到的最懂行的“非政治”的伴侣。正因为这样，她受到英国大使馆一些年轻单身汉热切的追求。

失去的时间

我在亚洲有十年多的时间欣赏不到音乐。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假嗓子的唱戏和如泣如诉的中国胡琴是不足以代替音乐的。（东南亚的音乐舞蹈另当别论。）而在俄国，音乐却是第二语言，它可以使人立刻接触到这个国家的感情和文化生活。在苏联，人们爱唱歌，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民间生活中，歌曲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苏联的每个民族都为音乐的多样化做出贡献。

战争期间，苏联日日夜夜地播放音乐。共产党人十分明智地压缩了他们长篇大论的党的说教（这种说教相当于我们广播中的商业广告），依靠广播纯粹的音乐来激发爱国之心。他们广播整部整部的交响乐和歌剧，不穿插任何口号或政治广告。

巨大的扩音器悬挂在街头，令人吃惊地把海水般的音响倾泻到广阔的、冰封的、因宵禁而空荡荡的广场上，仿佛是要把这些广场塞满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和其他一些不朽的音乐家的形象。我每次听到格里格的激动人心的第一协奏曲，总要想

起一个寒冷的夜晚，那天晚上，我和伊莲娜一起走在莫斯科的“中国城”，地面的积雪松软，我们又穿着毡靴，脚步声变得很低沉。除了我们低声的谈话之外，万籁俱寂。突然之间，尼亚加拉大瀑布似的音乐泻入了宽阔的红场。钢琴的乐声似乎直冲云霄，强有力的旋律象滚滚的雷声，震动得克里姆林宫墙和圣巴西尔教堂萝卜状的圆顶仿佛也在月光下跳起舞来。

当时，让外国记者享受的一项“外交”特权是可以订到莫斯科大剧院的好票。大剧院的建筑物即使在战时也布置得富丽堂皇，它的巨大金丝绒幕布一尘不染，镶宝石的大吊灯上面有一万面彩虹色的镜子，就在这个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优雅的古典芭蕾舞。大剧院的魅力和它的演出的豪华，同莫斯科——尤其是冬季的莫斯科——永恒的单调和灰暗形成了对照。所以，从街道跨进金碧辉煌的大剧院，无异是进了俄国唯一的仙境，在这里，每一个“同志”都成了王子舞会之夜的灰姑娘。

正象伊莲娜所说的那样，“到这里来，是为了多活几天。”

邱吉尔来莫斯科访问的时候，斯大林曾请他到大剧院看芭蕾舞，那天晚上，剧院里似乎用了两三吨之多的镀金和磨光材料装饰一新。他们两人坐在从前沙皇的包厢里，头上悬挂着闪闪发亮的枝形大吊灯，身旁坐着莫洛托夫和艾登。（离他们不远，尼基塔·赫鲁晓夫半个屁股坐在自己座位的边边上，他脸上的谄媚的笑容无疑地掩盖了他的杀机，当时假若斯大林看出了他内心的想法，准会砍掉他的脑袋。）邱吉尔受到了全场观众的鼓掌欢呼，他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观众是莫斯科的精华。加莉娜·乌兰诺娃出色地主演的《吉赛尔》——这是从形式到内容

都比较严格符合传统的一出芭蕾舞剧——也得到了邱吉尔同样热情的鼓掌。当我们鱼贯出场的时候，一时间显得几乎空无一人的休息大厅里，斯大林从离我不到五英尺的地方走过去。我头一次看到他是那么矮，甚至比邱吉尔还矮。他一定是转错了向；他用迷惑不解的神情看了我一眼，仿佛是等我给他指指方向。这时，一个警卫员跟上来，走到斯大林身边，斯大林就走出去了。

斯大林和邱吉尔两个人显然都很快活，他们似乎还合得来，这在不知不觉之间使大家都感到轻松了。正象陪同邱吉尔访问的新闻发布官托姆·巴曼事后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和邱吉尔“两位先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实际上也许可以说，由于他们在《吉赛尔》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出现了托利党^①伟人们的一次完美的会晤。”

当我把这番话转告伊莲娜的时候，她笑得流出了眼泪。

由于德军撤离莫斯科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剧院和音乐厅开了门，我们也就常常欣赏音乐会，演奏的曲子总是柴可夫斯基、鲍罗亭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以及恰恰图良、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顺便说一下，俄国的作曲家和别的艺术家都可以不应征当兵，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大部分都一直留在首都。当伊莲娜和我去听普罗科菲耶夫作品演奏会的时候，普罗科菲耶夫亲自指挥了乐队。

我还记得我去过音乐学院欣赏苏联政府多年以来第一次批准举办的拉赫马尼诺夫作品演奏会。拉赫马尼诺夫在战前一直

^① 托利党是英国保守党的旧称。——译注

是同情沙皇制度的，他在美国去世前不久，才公开表态热烈支持自己的祖国。这一次，他的音乐得到了听众发自内心的欢呼，仿佛是一位长者回到自己的故乡，指挥自己家族的大合唱。

伊莲娜在莫斯科一所有名的学校念过书，我记得那是第三十四(中小学一贯制的)学校，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官员的子女也在那个学校念书。伊莲娜的同班同学中就有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伊莲娜跟她一起在克里姆林宫里面玩过。伊莲娜作为“一个老同志”的女儿，还享受过另一些“好处”，可是她有生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房间。她的母亲和继父住在一个设备简陋的单间宿舍里，只有一间狭小的卧室和一个小厨房，我去他们那里拜访过几次。伊莲娜的老得没牙的八十二岁的外祖母不知怎么搞的，居然在一幢老公寓里占有一个比较宽敞的一层房间。假如一切顺利，伊莲娜本来是可以继承这间房的。这也许就是她的最大奢望了。那位老太婆懂得这一点，所以几乎把伊莲娜当作丫头使唤，因为伊莲娜如果不听话就有失去继承权的危险。

伊莲娜的大部分朋友和同学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有许多人的居住条件还不如她哩。莫斯科的房租甚至比巴黎的房租还要低；但是在巴黎，只要给房地产经纪人送点额外的小费或者行贿，就可以弄到住房，而在莫斯科却不行，因为所有的住房都是由官僚机关分配的。住房是家庭生活的一个首要条件。有一次，我们应邀去参加一位教师和一位作家的婚礼。未婚夫本来指望未婚妻得到两间一套的住房，布置一个安乐窝，可是就在婚礼之前，他听说那位女教师已失去了这套房子，房子奖给她原先的丈夫了。新郎想摆脱自己老鼠窝似的小房间的梦想破

灭了，一气之下，宣布解除婚约。好在新娘还不太难过，虽然被新郎抛弃，还是请他留下来共享为婚礼准备的晚餐——香肠和伏特加酒大部分是我和另一位记者捐赠的。

作为伊莲娜的一个朋友，我不论跟她到什么地方，都受到客客气气的接待。即使我想到过我们的交往正在给她的生活造成复杂的问题，我也宁愿不去想它。她对 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况且我们彼此不曾表白过心事。但是，醒目的“此路不通”的路标并不妨碍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根本不把这路标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伊莲娜的母亲雅斯诺娃夫人来看我，提醒我注意时为止。

首先，她问我知道不知道伊莲娜的学习受到多大的“影响”？过两三个月，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假如 她的分数继续下降，就会失掉“奖学金”，美好的前程也会因此葬送掉。其次，伊莲娜的母亲尴尬地说，她很遗憾，她个人是喜欢我的，她完全了解情况，伊莲娜也了解。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我和伊莲娜发展关系是不合适的。她问我知道不知道伊莲娜退出了共青团？她退了出来，因为“没有时间”去开会。也许这一点与我无关。但是他们知道这一点吗？她否认她受到过官方的警告，她作为母亲替女儿操心，也可能完全是非政治性的。

的确，我近来几乎没有听伊莲娜谈起过共青团的事了。我不知道她退了团了。退团是一个严重的步骤，就象在意大利退教一样。难道我有权利改变她的生活模式，或者使她感到这一模式行不通？诚然，我从来没有试图动摇她对苏联制度的忠诚。既然我没法给她提供另一条出路，结局又会是怎样呢？但是仅仅因为我们的交往就会造成这种局面吗？

伊莲娜的母亲接着说，象伊莲娜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子，如果与党疏远，就会一辈子遇到麻烦。最麻烦的是跟一个外国人交朋友！伊莲娜虽然长大成人了，但是她母亲坚持说她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孩子。她也许过分自行其是；她很聪明，但很任性；她感情用事，不顾后果。我们现在是亲密盟国，但是战后又会有什么样子呢？谁知道？

我为伊莲娜考虑过多少？答应不再见她，行吗？

我突然听到这些问题，心里明白，在现时的条件下，只能有一个答案。我知道伊莲娜的母亲是对的。我不能让伊莲娜放弃任何无法挽回的东西，因为我提供不了任何适当的替代品作为补偿。上学，工作，事业，伊莲娜的整个前途都岌岌可危了。

伊莲娜泪眼汪汪地坐在那里。她性格倔强。她反抗，不同意我们商量的办法。她说，除了她的学习情况以外，她母亲的话都是夸张其词。假如外交部不想让她跟我工作，他们就会说的。我既没法告诉伊莲娜该怎么办，也不能收回我对雅斯诺娃夫人的诺言，她这时也是泪流满面。我们陷于这种僵持局面达一小时之久，她们母女俩又哭又吵，激烈地辩论着，我插不上嘴。伊莲娜毕竟是伊莲娜，她一下子又容光焕发，开心地笑了。母女拥抱起来，达成了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很好，她答应努力提高学习成绩，争取再次在班上名列前茅。她答应在获得学位之前暂时不再来看我。

所以，我是既赢了又输了。我和雅斯诺娃夫人心里都明白，这段插曲到此结束了。母女两人突然又流起眼泪来，各有各的原因。然后，她们母女拥抱，我们三人都拥抱，她们又抹了一些眼泪。最后，我们喝了一点俄国白兰地，庆祝我们之间达成

的协议。她们走的时候，是面带笑容的！

罗曼史——在莫斯科？罗密欧的家族和朱丽叶的家族——结局不是拼杀，而是抽泣。整个这幅情景使我觉得恍如梦境，我不断地回想着，不知不觉，在莫斯科阴郁夜空的边际已镶上苍白色。

伊莲娜不來找我，我也沒去拜訪她。莫斯科又變成了老樣子：冷若冰霜的面孔，心灰意冷的靈魂，結了冰的昏暗的街道。我高興的是，不久我就得到了去英國的機會，在那里住了幾個星期，領略了濕霧的滋味和德國飛彈的威脅。之後我又回國去了。

誰知道呢，也許，我永遠也不會再見到伊蓮娜了。

同羅斯福總統的最后一次談話

一九四四年二月^①，我又在華盛頓等候赴歐洲的飛機，這時，羅斯福總統正好從雅爾塔回國。他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作了關於雅爾塔會議的報告以後的第二天，我給他寫了封簡短的賀信，我估計，等他讀到我的信的時候，我大概已經在德國的某個地方了。可是在我動身以前，白宮就打電話把我找去了。

喬納森·丹尼爾斯把我領進了橢圓形辦公室，總統正在那里和海軍上將萊希一起看文件。他抬頭看見了我，露出了熱情的微笑，向我伸出了他的大手。“你到處旅行，比我到過的地方多得多，”他高聲說道。“我很欣賞你的那本著作《人民在我們

^① 據下文，這裡應當是1945年2月，而不是1944年2月。——譯注

一边》。那书很引人入胜，我在“昆西号”船上一直看到半夜没合眼。

我提到这一点，并不只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因为那本书的主题是建议美国战后在亚洲——最后在非洲——倡导取消一系列的殖民地，并提供财政援助。我认为这是避免发生一系列血腥的殖民战争和社会革命的唯一可靠出路。我同总统简短地谈了这一点。我明白，他希望美国战后能把帮助各殖民地人民迅速实现自由和平等作为它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他说，他在路过非洲的时候，曾经听到朗西曼勋爵描述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德，那位勋爵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当地人民的种种明显苦难都证明他的说法是错误的。罗斯福终于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既然英国已经在非洲赚了那么多的钱，似乎应该能够为非洲人民做点好事。“为什么你们不拿出一点来，用于这里的经济发展？勋爵阁下，请你说说，你认为你们在这里所投入的每一个先令，使你们赚得了多少钱汇回英国？”

他说，朗西曼迅速作了计算，然后冷冷地回答说：“我应该说，迄今为止，从每一个先令赚回了一镑。”

总统说：“我告诉他：人民肯定注意到这一点！”

当天，他和莱希海军上将办完事情以后，又把我叫了去。他让我坐下后，就到处找镇纸，即我送给他的那个甘地半身像。“甘地在哪儿？”他问他的一个助手。“请你看看能不能把我的甘地找到。”

到一九四五年的这个时候，我对未来的美苏关系一直感到很悲观。总统这时的乐观态度感染了我，使我又产生了希望。在这次谈话以后一两天，他和斯大林在解释波兰协议的问题上

的争执变得严重了，这一争执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仍然没有解决。有些评论家推测说，这件事使罗斯福“幻想破灭”，使得他对于美苏继续合作维护和平的希望破灭了。我认为这种推测是根据不足的。我相信，假如罗斯福活着，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他一定会在总统职权以及他的想象力的范围以内竭尽全力，来避免战后的军备竞赛。

罗斯福一九四四年五月同我谈话的时候，就曾经清楚表明，他真心实意地相信一种办法，就是坦率地承认俄国这个巨人是一个伟大而又可怕的邻居，我们必须学会同它共处和分享世界上的权力和权威，即使我们无法学会喜欢它，也要尽力去理解它。当时，我刚刚读完福雷斯特·戴维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连载文章，标题是《宏图》。那些文章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使我们相当透彻地看出罗斯福当时对俄国的想法：他希望消除俄国害怕被排斥于欧洲之外的历史性的疑虑；希望说服俄国，使它相信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是能够容纳通过和平手段实行的必要变革的；应当把苏联当作“大家庭的一员”，向它伸出援助之手，以换取它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合作；为两种制度之间的有益竞赛开辟广阔的天地，让它们都归依一个国际防御组织——而不是回过头去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必然”要通过暴力和战争才能实现革命变革。

总统说，戴维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当我问到戴维斯用“大赌博”一词来形容他对俄国的政策是否妥当时，他说“赌博”这个词不恰当。既然我们除了合作维持和平以外，另一条路就是立刻开始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我们为了和平而合作怎么会是“赌博”呢？

“我完全赞成在这次战争以后竭力争取持久的和平，建立一个使我们能够共存的世界，”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说话算数的。

我觉得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作为一位讲实际的政治家，罗斯福承认在缔造实际可行的和平时，有明确势力范围的必要性。甚至在一九四四年他从德黑兰回国的时候，就曾对我说过，斯大林要求“把波兰的乌克兰人居住地区重新划入俄国疆界以内”是合理的。他还认为把东普鲁士交给波兰是“合理的”。“如果斯大林的要求是得到这些贵族庄园〔指波属乌克兰地区〕，同时把东普鲁士交给波兰作为交换，那就不应该反对他，是吧？”他问道。

邱吉尔对这一安排远非热心，而且顽固地拒不承认在莫斯科成立的亲苏的波兰临时政府的最高地位。

现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罗斯福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是把三大国联结在一起的和平缔造者。他认为，邱吉尔代表右，斯大林代表左，他自己是中间派，是统一阵线的结合剂。

“我在雅尔塔跟斯大林相处得好极了，”他告诉我，几乎是带着欣喜若狂的神情。“我觉得我终于了解这个人啦！”

我想起了李维诺夫那些充满了悲观情绪的谈话，于是向罗斯福问起他表示过的疑虑，问到雅尔塔会议是否消除了那些长期争论的问题，特别是他预言的盟国在德国的合作将会破裂的问题。总统说，当然不是所有细节都解决了，但是整个说来，雅尔塔会议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俄国的那些自由德国人和被俘军官会怎样呢？”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俄国人打算利用这些人来管理他们占领的地区，

这会不会导致德国出现两种政府？”

他安详地回答说：“他们当然会利用他们手里的德国人来帮助治理和维持秩序。”

“他们的自由德国人是赤色分子，”我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无法〔同俄国人〕在德国奉行共同的政策？”

“显然，俄国人在他们占领的地区会自行其是。但是他们不会在那里另立一个政府〔不受盟国管制委员会支配的政府〕来对抗为全德国作出的安排。”

可见，他当时所期待的，只是瓜分德国方面的表面合作，而不是在占领德国方面取得政治目标的一致。实际上，关于为全德国作出的“安排”，雅尔塔会议几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是罗斯福显然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后通过相互妥协谈判解决。

“我的印象是，俄国人现在心满意足，”他说，“我们可以共同制定解决各项问题的方案。我相信我们会相处得来的。”（这句话他是用着重语气讲的。）

现在我想，“显然，俄国人在他们占领的地区会自行其是”这大概是起支配作用的一句话，也是罗斯福对那一时期俄国政策的一点主要认识。这句话不也是对德战争和对日战争之后也许还能幸存的美英苏三国协约的一个关键吗？

我以前说过，当我们签署为巴尔干国家拟订的停战协定时，我们已经朝着用法律形式使这条原则固定下来的方向走得很远了。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在那里的美国战时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R·迪安将军曾写道：“在这里的某些〔苏联占领的〕国家，特别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苏联所执行的计划

是盖有美国批准的印章的。”^①甚至在波兰问题上，尽管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向侨居英国的波兰流亡分子作了一些顾全面子的让步，但是，根据基本协议，盟国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过一段时间后俄国人将会是影响战后波兰政府的组成的主要势力。我们本来也许可以对这种影响的程度和施加影响的方式规定具体的限度，假如我们在一九四四年以前曾打算这样做的话。但是，在那以后，有人声称我们本来可以完全取代俄国或者把它排斥在外，就毫无根据了。确实毫无根据，除非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公认的一个现实——也就是作为战争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出现了新的势力范围，因而需要把和平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这肯定是雅尔塔会议“成功”的基本原因。我觉得只有这一点才能说明，为什么双方的一些非常老练的政治家在雅尔塔显然都表现了溢于言表的乐观；要知道，这些政治家曾经多年互不信任，而且他们的政治生命有赖于避免自欺欺人。

在克里米亚举行了这次会议以后，哈里·霍普金斯曾告诉罗伯特·舍伍德说：“我们绝对确信，我们赢得了和平的第一个伟大胜利，我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我们大家，即整个文明人类。俄国人已经证明他们会是通情达理和具有远见的，总统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毫不怀疑，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存，可以和平相处，直到我们中的任何人所能想象到的未来。但是我要对此作一点修正——我想，我们大家思想上都有一点保留，那就是

^① 见约翰·R·迪安著《奇怪的同盟》一书，纽约版，第321页。
——原注

假如斯大林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无法预言〔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会是怎样了。”^①

斯大林！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霍普金斯预言过可能的失败会来自斯大林的早逝，而不是罗斯福的早逝，这真是怪事。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难以相信，象某一个人与某一段时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单薄的关系的断绝，竟然会决定性地改变我们的命运。也许，罗斯福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也许，冷战是不可抗拒的，不到可以预见的结束不会罢休——目前的休战状态是深刻的相互恐惧促成的，邱吉尔本人最后称之为“依靠恐怖的均势维持的和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还是不难指出，在迅速摧毁了罗斯福的“宏图”的相互挑衅当中，我们方面犯下了半打之多的错误，倘若罗斯福在世的话，这些错误几乎可以肯定都能避免。

说到这里，我们暂时回过头来看看罗斯福是怎样谈论俄国和中国的，说说在摩洛哥摩西·泰勒夫人闺房发生的逸事。

从摩西·泰勒夫人 的城堡到延安

在摩洛哥，我在马拉喀什城外摩西·泰勒夫人著名的摩尔式城堡里住了一夜，几个月前罗斯福和邱吉尔曾在那里做客。我在那里听说，罗斯福总统曾要求把他送到这个安乐窝来。安

^① 见罗伯特·舍伍德著《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纽约版，第870页。——原注

乐窝位于闺阁区，凭窗俯瞰，可以望见一个绿松石水池，在雅致的大理石格窗后面，放着一些厚厚的坐垫。据说这个闺阁区比苏丹的宫殿还富丽堂皇。

当我向罗斯福先生谈起我的这次访问时，他说他可以给我讲讲这个城堡的故事，供我“留着写回忆录用”。下面就是这个故事。

他问我：“你以前曾见过类似那些浴室的东西吗？我根本没想到他们的浴缸是那个样子的。我差点儿在浴缸里淹死了。那种浴缸的毛病是，想要在里面游泳嘛，嫌小，可是，肥皂一掉下去，你就得潜水下去找。”

我问他：“摩西·泰勒夫人是何许人？”“我只知道她是个很有钱的美国寡妇。她在法国和摩洛哥住了很多年，而她不喜欢那个讨厌的人！”

“是吗？我原来以为她一定是作为爱国的表示把那个地方送给军队的。”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泰勒夫人认识我们的一位年轻的副领事。她显然是喜欢贝当统治下的法国的，但是当纳粹分子进来后，她着慌了，于是她去见她的朋友——那位副领事，托他照管她在马拉喀什的城堡。于是，当邱吉尔和我决定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为我们找个住的地方，那位副领事就把摩西·泰勒夫人那所奇妙的房子连同奇妙的浴室交给我们使用了。我们在那里住得舒服极了，除了那位可怜的副领事以外，人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你不会是说他在浴缸里送了命吧？”

“不，比那更糟糕。摩西·泰勒夫人听说我们去了那里，当

副领事回到卡萨布兰卡时，她正怒气冲冲地等着训他呢。她闯进领事馆，指责副领事辜负了她的信任。副领事想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错事。她说，‘你干了！你干了什么事嘛？年轻人，我把我的房子交你照管，信赖你，满以为能保护它。可你用它来干了什么呢？哼，你把它变成了普通游客的旅馆，不仅如此，你还让那个讨厌的人住在我的卧室里！你知道那个人睡在我的床上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嘛？好象这还不够，你还让邱吉尔也住进我的房子！人人都知道，在英国，除了共产党以外，没人能和他搞到一块去。马上把我的房产还给我！’那个年轻人一再道歉，可是这对她毫无裨益。就在那时我们的军队决定征用摩西·泰勒夫人的城堡当招待所。从那之后她一直气得要命！”

这次我补充了一个细节。我说，“当我在那里的时 候，人们告诉我说，根据泰勒夫人的要求，你和邱吉尔先生住过的卧室已经封起来了。我们全都以为这样做是为了纪念你们的那次访问，现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罗斯福的眉头一皱。“我还不知道有这回事，但我也不感到意外。这位老太太可能首先把那几间房间熏了一下，预防一切可能的污染呢！”

罗斯福喜欢讲些轶事，我也愿意听，因此我们的话题天南海北，漫无边际；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反复提到的话题，那就是中国，谈到中国时，我们就不那么东拉西扯了。中国当时的情况错综复杂，这使他既迷惑不解，又神魂颠倒。对中国的问题，任何人，包括我在内，都不能作出使他满意的解释。他知道我们的战时援助，实际上是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的一种形式，而且我断定，他真诚地希望这种援助能使用得当，既可以使中国

继续进行战争，又能带来社会、经济和政治进步。但是，这怎么能办得到呢？

到了一九四五年，罗斯福对蒋介石这样一个政治家和他的为人更加迷惑不解了。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刚听说由帕特·赫尔利斡旋的延安和重庆之间的谈判破裂了。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消息”，因为早些时候有消息说已经制订了一个方案。总统说，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些符合权利法案的要求，而蒋介石却对这些要求“提出了一些荒谬绝伦的反对意见。”那些要求在罗斯福看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些要求在赫尔利将军作为连署人在延安签署的一项关于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协议中是默许了的。

罗斯福问我觉得蒋这个人如何，我是否“喜欢”他。我按我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所写的意见作了简单的回答，恐怕不是太恭维他。至于我是否“喜欢”他，虽然我曾几次采访过他，可是我对他本人真的不大了解。罗斯福嗯了一声，机敏地盯着我，继续说：

“我在开罗时根本没有能对蒋形成什么看法。当我后来想到这件事时，我发现我所了解的情况全是蒋夫人告诉我的。蒋夫人谈到了她丈夫的事情和他的想法。她一直在那里斟酌各项问题的答对。我了解的反而是她，而不是蒋这个家伙。我根本不可能直接了解他。我希望帕特·赫尔利回来的时候能多告诉我一点情况。”

现在，他认识到了代表游击区高效率政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他正在考虑直接向他们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抗日，作为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他还可能认为这样做有助

于在那里占俄国人的上风；他问我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俄国人是否在操纵他们。他们的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呢还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只不过是“土地改革者”。我把自已写过多次的话又重复一遍：他们目前的纲领是土地改革，或平均地权，但他们是以共产主义作为最后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

总统就八路军(共产党)如果得到我们的援助后在华北地区能够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提出了几个问题。他接着说，当我们逼近日本时，我们将运送一些补给品和派联络官至华北沿海地区。这些谈话当然是不能见报的。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向共产党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我设想，在任何诸如此类的突击队行动中，我们也将设法取得国民党人的合作。我不知道在日军占据的公路、铁路、城市之外控制着华北绝大部分人口的共产党人对此将作出什么反应。

我问道：“情况是不是这样：只要我们承认蒋是唯一的政府，我们只有通过他才能继续运送补给品。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吧？”

总统果断地把头往后一扬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凑在一起为止。”

这最后一次谈话再次反映出总统对蒋介石的冷淡态度。蒋很顽固，不肯实行对保存他自己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改革，因此，总统对他越来越不耐烦了。五个月前，这位委员长赢得了一次他个人的胜利，迫使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而没有授权他重新组织、重新训练，或者实行最起码的改革，而这

些改革对于防止非共产党的中国军队和政府本身彻底崩溃是必要的。蒋介石一意孤行，引起了总统的警觉，他密切注视着蒋的军事和政治家族内部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和昏聩无能等令人厌恶透顶的详情末节。《史迪威的指挥问题》一书的作者精辟地指出：

“回想起来，委员长的胜利中有一个方面在当时还没有表现出来。那是他赢得的最后的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其后多年他一直没能在外交上取胜。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罗斯福担心的不只是中国，而且还有委员长个人的地位和威望。在委员长迫使史迪威应召回国后不到三个月，罗斯福与英国首相和斯大林元帅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在俄国境内的雅尔塔会晤。总统在那次会议上对中国的领土和利益采取的态度说明，委员长在一九四四年十月的胜利是导致一九四五年二月满洲被瓜分的一步。”

如果委员长没有免掉史迪威的指挥职务，就可以要他，并且通过他要美国对战后的满洲的完整负责，那么，委员长的命运本来会多么的不同啊！即使史迪威在中国承担起这个责任，可能还是要接受有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大部分条件。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

当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议关于满洲和中国的秘密条款。还记忆犹新的时候，他预料我们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那天他说：“我正在和(中国的)两个政府合作，并且打算继续这样做下去……”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否把我们在延安派驻了外交和军事观察员看作是一种事实上“承认”的形式和美国将提供物质援助的先兆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到如今还是不解之谜。

当他和我热烈握手言别时，他大声说：“别忘了来信，告诉我你看到的情况。”

一个月以后他逝世了——就象埃默森悼念华盛顿时所说的那样：“安详地躺在墓中，人类的希望在他的身上并未泯灭。”

不久之后，我们同延安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就被放弃了。因此，我们想发现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得到西方盟国的帮助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的这种机会也随之丧失了，就象铁托和南斯拉夫的情况一样。

最先进入维也纳

我回到欧洲，进入德国，刚好来得及报道希特勒军队溃败的最后阶段。《邮报》曾许诺让我进行报道。我们匆匆忙忙地从斯图加特赶到慕尼黑，再进入奥地利，这一路上，我发现，战败了的纳粹分子竟成了如此平和、顺从和巴结奉承的伪君子。正象凯塞林元帅坦率声称的那样，他们在内心无所悔恨，他们只是由于“机器上的劣势”才打了败仗。我见到的这些德国人毫无羞耻心或负罪感，也没有我几个月以后在战败的日本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种谦卑和精神上的震惊。

西边的德国人立刻全力支持美国军队对抗俄国，而东边的德国人则自愿帮助红军来整美国佬。如果说盟国现在是瓜分德国以示惩罚，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德国人已本能地感到，他们能不能得到恢复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使盟国在德国问题上始终陷于分裂。这就是我采访了从戈林到冯·龙德施泰特这样一

些高级纳粹战犯以及同几十位普通德国人谈话以后，所得出的结论。

欧洲胜利日的第二天，我正在萨尔茨堡，想找到一辆没有主人的小汽车。这时，德国人正纷纷扔掉他们所有的车辆，我希望搞一辆来用。第三师的“铁迈克”J·M·奥丹尼尔将军帮忙，给了我一个官方的执照号码，还有一张书面命令，指出我有权使用我所能够弄到的任何一辆汽车。我的要求并不高。我不想要戴姆勒斯、梅塞德斯或杜森贝格这些名牌货，我看到许多这样的车子就因为缺一个小零件而被抛弃在公路上。我爬上一些废品堆，希望找出一辆德国造的福特牌汽车。当我终于找到一辆的时候，又冒出了一个到处可见的“吉劳埃”^①式的美国兵，这是一个壮实的中士，硬说他早就蹲在这里，这汽车应归他所有。我们争辩的时候，一个负责管车库的年轻军官走过来，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我终于碰见了一位曾听说过除厄尼·派尔以外的战地记者姓名的军人。

信不信由你，他竟然说：“你就是中国的斯诺？想不到吧，我读过你写的所有的东西。我叫莱德曼。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惊喜之余，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埃德，同时亮出了奥丹尼尔给我开的条子。我请求说：“只要一辆——只要这一辆小福特。”

他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动作，说：“OK，埃德，这辆车归你啦。我叫鲍勃。嗨，我当兵跟你还有点关系呢。我想看看中国

^① 吉劳埃是当时在美军中传说的一个虚构的美国兵，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遍游世界各地，到处写上“吉劳埃到此一游”。——译注

呀！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过中文。”

“于是，军队把你派到德国来了。这有道理。”

我们握手，这时那个中士气鼓鼓地走开了。我驾着德国造的福特车，驶向克莱斯海姆宫，那是从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宫殿，现在是第三师司令部的临时驻地。我第一次开始相信我们是打赢了这场战争。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我驱车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转来转去，看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访问了因斯布鲁克和南斯拉夫边界，阿特尔泽和特劳恩泽，还帮助别人在里宾特洛甫一座宾馆里把隐藏在地窖里的香槟酒和美味葡萄酒搬出来。然后，我过了多瑙河，到了林茨，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杰克·贝尔会师了。我们是最先到达茅特豪森集中营的美国记者，在那里遇见了战略情报局的一位中尉，名叫杰克·泰勒。纳粹分子曾决定要枪毙他，但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混乱之际，他逃脱了厄运而幸存下来了。

正是泰勒第一个提醒我去访问维也纳，当时维也纳还是一个禁区。谁也说不准俄国人在那里干什么，是扶植一个红色傀儡政权呢，还是打算履行他们同盟国签订的协议，帮助奥地利成立一个自由选举的政府。当时，美国军队占领了奥地利的恩斯河以西地区；英国军队占领了布伦内罗山口和奥地利蒂罗尔；俄国人则占领了奥地利东部，包括维也纳及其以西上百英里的地区，直到恩斯河东岸。

泰勒介绍我认识了他的一位奥地利难友汉斯·贝克尔博士，这位博士曾经在多尔福斯政府里当过内阁部长，早在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就把他关进了达豪监牢。虽然贝克尔博士终于自由

了，但是他象茅特豪森集中营里关过的许多人一样，身体太虚弱了，难以行走。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无法通过俄国人的防线了。不过他了解维也纳新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的情况，因为地下组织不断地给他通消息。他恳求我设法到维也纳去，把情况报道出来，同时打听一下他多年未见的妻子的消息。

贝克尔向我介绍了维也纳的一些人，使我受到鼓舞，我决定试一试，看能不能冲过俄国人的防线。我到了恩斯河，我们的军队跟俄国人隔河相望，河上有一座小桥。驻在这个前哨的威廉·E·卡拉韦上校——莱因哈特将军手下的情报处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计划的这次旅行是不可能实现的，俄国人绝对不允许任何美国人过桥走进他们占领的地区。他肯定我是过不去的，但是他不反对让我试一试。他说，假如两个星期以后他还听不到我的任何消息，就报告我失踪了，这番话给了我一点安慰。

杰克·贝尔希望与我同行，我同意了。我们领了K号口粮和威士忌酒，不够，但总算有一点。然后我开着我那辆福特车，到了桥上，拿出了莱因哈特将军签发的通行证。那个站岗的哨兵摇了摇头，不让我的车通过，但是我用俄语高喊：“同志！鲍里斯！”他的上级鲍里斯·麦尔比亚科夫大尉就应声而出了。他认识我这个会说一点俄语的美国人。前一天，我散步的时候，跟他一起喝过几杯，为永恒的俄美友谊干过杯。

这时，我拿出了我许诺过的威士忌，我们一起走进了桥旁的小屋，去品尝品尝。一向陪着大尉先生的那个年轻俄国女人又出现了。我们彼此说些客气话，我们又是盟友了。这时，我问为什么不可以开车沿公路“再走几英里，去参观一下哈布斯堡

王朝的宫殿”。麦尔比亚科夫一下子封嘴了，说是上级的命令禁止任何人过桥。我打出我的王牌。我随身带着我的驻莫斯科记者的证件和莫斯科的居住证。我把这些证件在他眼前晃一晃，然后提到一些俄国将领是“我的朋友”，其中有一些是我采访过的，也有一些是我未曾见过的。

我用一种难过的声调说：“同志，你的意思是说，尽管我们彼此交往，我还是不能去瞧一眼你们的旧皇宫？”

他嚷嚷道：“命令哪！”但是他的态度软了下来。我们又干了一杯，又唱了一支歌。鲍里斯赞扬美国人，我赞扬俄国人，我们一起赞扬了联盟，胜利，世界和平和兄弟情谊！

“还是不让看一眼你们的宫殿？”我说。

那个女人薇拉对鲍里斯说，“为什么不让人家去呢？”

“为什么不让人家去呢？”鲍里斯也冒出了这么一句，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肯定了他自己的看法。他拿起了野战电话机的听筒，跟他的上司通了话。接着出现了很大的杂音。鲍里斯把听筒送到我耳边。我听见了喧笑、吼叫、咒骂的声音，尔后是响亮的音乐。那边街上也在举行庆祝活动。我的朋友又拿起听筒，听了几分钟，连声说“是，是”和“谢谢”，对我耸耸肩，然后挂上了电话。

“快点，”他说。“太好了！你可以去了！好，动身吧——”

杰克和我扔下了威士忌，奔向我们希望去的地方——维也纳。我们开车以后，真后悔没有多带一点汽油。我们带了两小桶汽油，共十加仑，到维也纳一个来回未必够用。

我的德国造福特车性能良好，令人称心。我们一路上遇到了五六处路障。我们停下车时，便会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大个子

女兵过来盘问。她们是红军派到欧洲来担任交通宪兵的女战士，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出示我的所有莫斯科证件和美国陆军证件，露出一副笑脸，象白痴一样地当哑巴。福特车刚刚喷了一层草绿色的漆，又有官方的车号和标志，这也帮了我们的忙，我们顺利通过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进了维也纳，按照贝克尔画的地图，沿着空荡荡的街道，找到了将要给我们安顿住处的汉斯·罗根贝格夫妇的寓所。他们是奥地利出生的加拿大人，战争爆发的时候滞留在维也纳了，后来秘密加入了奥地利地下组织，但表面上装出对希特勒忠顺的样子。他们的寓所在一幢六层楼房的顶层。这幢高层建筑在旧王宫对面，曾挨过轰炸，没有电灯。他们的屋顶有三分之一被炸坏了。他们看了贝克尔的信，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有屋顶的房间里，请我们喝了代用咖啡。然后，在奥地利人的默许下，他们帮助我们的小汽车藏在无人居住的美国大使馆内。

我们请饥饿的罗根贝格夫妇吃了一些K号配给食品，后悔没有用我们的福特车满载一车食品来。红军占领维也纳已经一个月了，这里的马、猫和狗都被宰来吃光了。面包的配给量已减到每周一条。奥地利人莫名其妙地指望红军会让他们吃得好一点。他们忘记了，有六十万奥地利人曾加入希特勒的军队作战。诚然，盟国的各种宣言和声明都在德国和奥地利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界限。奥地利将在四大国监督下“重建自由和独立”。但是俄国人肃清拥护过纳粹的人，也不象我们那样对维也纳人有感情。

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到这里，走过了艰难漫长的一千五百英

里的征途，每里路上都躺着俄国人的尸体，现在，在这里，在这洒满鲜血的征途的末端，该由红军享受胜利果实了。他们进来的时候又饥又渴，被战火狼烟烤昏了眼，见什么拿什么，那管它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有什么罪孽大小之分。奥地利人样子象德国人，又是说德语。难道他们不曾向希特勒欢呼，不曾为希特勒在俄国的胜利欢呼过吗？

红军的第一个措施是征用粮食、牲畜、交通运输工具和劳动力，首先是满足红军自己的需要。难怪我见到的每个奥地利人都提出同一个问题：“美国人什么时候才来？”他们觉得美国人的好，因为美国人自我克制，驻在战败国的时候仍然自给自足，不要人民的任何东西，甚至还给敌人集中营里关过的奴隶们提供粮食。

维也纳人记得好人赫伯特·胡佛博士^①，相信他会再次表现出慷慨大方。红军对粮食的需求，并不是造成饥馑的真正原因。德军在撤退之前就洗劫过这个城市，红军只不过是把这件事做到底而已。然而，占领军现在已减少到只剩几千人了，所以，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交通运输全盘中断，维也纳成了孤城，市场与内地失去联系。俄国人丝毫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凡是车辆和机器，一经查明是德国人的，一律运回俄国。卡尔·伦纳博士，这位在希特勒占领奥地利之前当过共和国总统的老人，感到非常担忧。他问俄国的司令官托尔布欣元帅，是不是俄国人把奥地利误认作德国了？

托尔布欣元帅回答说：“不要担心，我们跟你们奥地利人

^① 胡佛(1874—1964)，美国政治家，第一次大战后曾主持美国对欧救济，后于1929—1933年任美国总统。——译注

的事办完时，你们还会有足够的钱，可以把德国剩下的东西全买下。美国人接着就会来，他们给你们的東西会比我们拿走的还多。”

罗根贝格夫妇向我们谈到有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扣留在维也纳大学门诊部。他们带我们沿着僻静的胡同去看这些飞行员。这四个美国人是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奥地利上空被击落的。俄国人在一个路旁绷扎所里发现了他们，用卡车把他们带进城来，送到维也纳大学门诊所。然后，俄国人也把他们忘记了。俄国人曾答应给他们发特殊配给食品，但始终没有发过。这四个飞行员象别的病号一样，每天靠几盎司面包维持生命。有一个小伙子被锯掉了一条腿，仍然极端虚弱。另外三个人虽然也受了重伤和严重营养不足，但是还可以走动。

“我们把他们带回去，怎么样？”我问门诊所主任。

“不行！我得负责。没有俄国司令官亲自批准，不能把他们带走。”

我们说：“假如我们强行把他们抢走，那怎么样？你们会怎么处理呢，呃？”

他耸耸肩膀，笑了笑。他觉得，他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我们把最后的几份配给食品留给了这四个飞行员，答应一定把他们带回恩斯河以西。

我们在罗根贝格家里住了五天，在这期间，卡尔·勒纳博士的奥地利的“内阁”成员，我们差不多全都秘密会见了。我们甚至还会见和采访了内政部长弗朗茨·洪纳，他是奥地利共产党员，但是他没有把我们出卖给俄国人。

我们的汽油越来越少了，少到了回不去的程度，可是无论

出多高的价钱也买不到汽油。俄国人曾下令没收汽油，违令囤积汽油，就是触犯死刑。只有他们可以供应汽油。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请求他们帮点忙，可是，现在那四个飞行员还指望我们把他们带出去。假如托尔布欣元帅认为我们是非法入境或者搞间谍活动，而把我们投入监牢，那又怎么办呢？

最后，罗根贝格夫妇说服了瑞士红十字会驻维也纳的代表费恩先生，由他分一点汽油给我们。他藏了一些汽油，是为了一旦必要时能迅速逃出去，当初是为了准备从纳粹手下逃出去，现在则是为了准备从红军手下逃出去。他给我们灌了五加仑汽油，似乎那不是汽油，而是他身上的鲜血。假如真是鲜血，也许还好一点哩。我们不久就发现，他给我们的汽油掺了很多水。

我们离开维也纳的时候，带了不少的信：罗根贝格夫妇给英国情报部门的信，费恩先生给瑞士政府的信，贝克尔夫人给她丈夫的信，奥地利地下组织领导人给巴黎的抵抗组织和贝尔格莱德的米洛万·吉拉斯的信。我们在遭到战火破坏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偷偷拜访了英尼泽尔红衣主教，他给了我们一份呼吁书，请我们加以广播，呼吁提供食品和医疗用品。他那断垣残壁的教堂里挤满了难民。我们还把三名飞行员格林、劳森和斯金纳一起带走。他们不得不让他们的一名小伙伴留在那里，大家都极其难过。我们高速地驶过环行街，出了维也纳市，沿着我们来时的那条路线往回走。叫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这一次又没有遇到刁难，最后驶上了高速公路。

在最后的四十英里，我们相信我的福特车准会被费恩的汽油给噎死。每走五英里，我就不得不停车，把汽化器拆下来清

洗干净。我车上的残废朋友们谁也帮不了我的忙。杰克·贝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只胳膊，无法拆洗汽化器。但是，他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独臂驾驶员。但也很运气，因为刚好在天黑以前，我们终于走走停停地爬到了恩斯河桥头。我感到宽慰的是，鲍里斯不在门口。另一个俄国军官说上级的命令是不许任何人东行，但是他承认上级不曾具体命令阻止我们西行。他让我们通过了。

第二天，我们向莱因哈特将军和卡拉韦上校详细报告了我们这次维也纳之行的情况，这一报告转呈给欧洲盟军总司令，是他收到的关于红军占领下的奥地利情况的第一份报告。

我返回巴黎，把我自己写的报道发给《邮报》。我驾驶那辆德国造福特车沿着卢瓦尔河，穿过了法国南部当时一片荒凉景象的初夏的道路。我们在里维埃拉避暑胜地的卡尔顿度过了十天时光，开支由陆军报销。当我把白朗宁手枪放在一边，在戛纳晒太阳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受到胜利是我们的，但可惜我享受胜利果实不久长。回到巴黎，我就接到了命令，要我取道俄国尽快到远东去。

但是我怎么能放弃我的德国造福特车呢？鲍勃·卡帕、摩根·贝蒂、查尔斯·科林伍德、杰克·奥赖利和杰克·贝尔登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一次玩命似的扑克赌博中使我输掉了八百美元。我不得已，只好把福特车卖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凑足我的盘缠。这也算不了什么，科林伍德在同一个夜晚输掉了他的杜森贝格牌小汽车再加上他的梅塞德斯牌小汽车。奥赖利大概用他赢的钱买下了巴克斯县的一个农场。

几天以后，我在莫斯科听到了情报部的小道消息，说斯诺和贝尔的维也纳之行引起了不少余波。我们的报道在美国发表后，引起了一系列的追查，最后托尔布欣元帅下令调查，我们是怎样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袭”了他的部队的。他们的保安警察一次都不曾阻拦或盘问我们。我们两个人在自己的报道中都没有说明是谁帮助我们进出的，没有提过我们在维也纳的朋友们的姓名。所以，托尔布欣大概始终没有调查清楚。

我和杰克最先报道维也纳的消息，我们写的报道连续刊登了六个星期。

广岛在莫斯科引起的反响

当我第一次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它仍然处于半包围状态；晚秋天气寒冷刺骨，没有月亮，夜间实行全面灯火管制，街道蒙上一层薄冰，建筑物涂上了迷彩，莫斯科人也把自己掩盖起来，棉帽或皮帽下面只露出红红的鼻子和目光忧虑的眼睛，脸上露出饥色和恐惧的神情。

三年之后，我从巴黎启程，经过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由列宁格勒进俄国。这时正值初夏，天气晴朗，天空蔚蓝，饱经战乱的人们也显得安详一些了。他们不再裹在臃肿难看的棉袄里面，衣著比较象样；冬天里遮盖着的脸也露了出来，他们笑了。薄薄的棉布裙衫显出了妇女的线条，一些年轻的俄国人身段相当美。漫长的白夜使得青年们有工夫谈情说爱，在北方，黑夜只有三、四个钟头，人人都在户外活动。

列宁格勒的涅瓦河大街仍然给人以美感。从前，列宁格勒

号称“俄国的巴黎”，但是，由于多年无人操心，接着又是德军的长期围困，夺走了列宁格勒二十五万人的生命，如今，再把它称作“俄国的巴黎”，就是令人难堪的玩笑了。正象彼得大帝当年建造这座城市时所说的那样，它依然是“欧洲的橱窗”。但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它昔日的盛况。

到了莫斯科，我似乎又回到了亚洲。原子弹轰炸广岛的事件很快就要发生，一种新的强烈的恐惧情绪很快就会蔓延开来。虽然还没到那时候，互不信任和怀疑的情绪就已在毒化着盟国之间的气氛。本着彼此通融的精神举行和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我在六月到达莫斯科，不久，就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见到了马克斯·李维诺夫。我问他，自从我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最后一次同他交谈以来，形势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更坏了，”他脱口说。“为什么你们美国人要等到现在才在巴尔干和东欧反对我们？你们应该在三年前这样做。现在太晚了，你们的抱怨只能引起这里的怀疑。”

不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多少美国人认识到，俄国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就开始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求不仅就整个东欧的前途，而且象哈里·霍普金斯指出的那样，就“莱因兰、巴伐利亚和东普鲁士的前途这样一些范围极广的问题”^①达成协议。美国当时的立场是：一切问题均有待于通过和会加以解决；美国国会决不会批准秘密协议。科德尔·赫尔国务卿的延误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① 见《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401页。——原注

哈里曼大使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当他面临着红军占领巴尔干地区的既成事实时，他同意了当地各国人民提出的停战条件。从那以后，俄国人就期望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接受同样的格局。我曾经问哈里曼，我们没有事先就所有这些地区的前途达成谅解，是不是失策，哈里曼的看法是：我们当时是“受骗”了，我们的麻烦完全是由于俄国人“言而无信”造成的。我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哈里曼说(密谈)，他当初曾赞成一种总方针，即：根据租借法向俄国提供援助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也就是不要求俄国承担(具体)政治义务以作为交换条件。在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就这个问题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正是哈里曼本人首先提出了这一原则。但是，哈里曼说，当我们的供货已大大增多、租借法案已成为一个重大因素以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宁愿在东欧坚持自己提出的条件，‘在那里实行我们自己的模式’。然而，他始终保留了这一意见，没有反对科德尔·赫尔所主张的把严重的政治辩论推迟到和会去解决的方针。”

艾夫里尔说：“当然，假如我们能预见到后来的事件，我们当时也许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但是谁能预见到苏联在东欧的行为？谁也没有预见到！”

实际上，不少的人预见到了，甚至在我们签署停战协定草案之前就预见到了。哈里曼本人也不是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天真，至少不是自始至终那样天真。多少外交官在自己驻莫斯科的任期届满时，都领会了契诃夫的感慨：“假如这生活仅仅是一张草稿该有多好？假如我们能够把它完全扔掉，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写起，该有多好？”

当时的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向我私下谈了他对于杜鲁门总统在波茨坦会议上的表现：

“乍一接触，杜鲁门先生给人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他那双蓝眼让厚厚的镜片放大了，他表现出毅力和活力，说话直截了当，坦率诚恳，还有那种青年军官的决一死战的气概。但是，在旷日持久的会议期间，他的态度摇摆不定，叫人相当难堪。他可以在头一天抓住一点不放，拍桌子说‘不行！不行！’于是一切都陷于僵局。但是，他在听取了他的顾问们的意见之后，在第二天上午又可以回过头来，点一点头，就把头一天他反对过的问题放过去。很快地，人们就不再认真对待他仓促发表的意见了。”

罗斯福不幸逝世，使邱吉尔在波茨坦失去了他在战时的最亲密合作者；邱吉尔本人又在极其关键的时候竞选失败，在会议期间就下野了；杜鲁门刚刚就职，对三巨头以往的密谈缺乏深刻了解——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斯大林。

英美两国没有任何具体的协议来指导我们重建和改造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却占有无比的优势，因为它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在苏联势力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都要改变生活方式。众所周知，杜鲁门还在无意之间帮了斯大林的忙，因为他命令艾森豪威尔把美国军队从他们在战争最后几天攻占的一大片中欧地区撤出来。这一大片地区长达四百英里，宽达一百二十英里，包括根据盟国之前的一个协议曾划入红军占领区的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很大一片土地。邱吉尔曾要求杜鲁门推迟到波茨坦会议以后再撤军。他希望利用这一点作为对斯大林施加压力的手段，要斯大林依从他邱吉尔对波兰问题的

期望和放慢巴尔干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化。杜鲁门的顾问们却另有主张，于是总统的命令贯彻执行了。邱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告诉我们说，这道命令“敲响了他胸中的丧钟”。邱吉尔认为，由于过早地作出了这个代价太大的决定，使得斯大林肯定能够在波茨坦会议上，在雅尔塔会议遗留下来的各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占上风。

杜鲁门因为听信了他的顾问们的话，还犯了另一个错误。这就是在欧洲胜利日之后，总统立即取消了根据租借法案向俄国提供的援助。即使把人道主义完全撇开不谈，为了进行谈判而继续保持租借法案的援助，其好处看来也是明显的。正当俄国即将履行它对我们承担的参加对日作战的义务的时候，用这样不讲策略的方式停止这一援助，就不必要地引起了俄国的怀疑和深深的怨恨。这些错误使美国无谓地扔掉了自己在波茨坦棋赛中本来可以利用的几个最得力的棋子。

红军打败了德国而在东欧占有的新的地位，始终表明了俄国能采取一些替代办法。如果在战后的恢复中得不到美国的援助，俄国就可以重新搞老式的阶级战争和重建共产国际，给西方盟国制造最大限度的困难，使它们难以恢复欧洲战前的状态。只有瞎子才看不出，人们再也不能——用斯大林的话来说——“不受惩罚地”包围俄国了。^①

历史学家们可能提出一个问题：在波茨坦会议上与俄国讨价还价中，把原子弹完全排除在外，是不是另一个决定性的错

^① 在《斯大林需要和平》一书（1947年纽约版）第182页中，我曾指出，包围俄国的企图是“肯定要失败的”，只能导致最可怕的和徒劳无益的军备竞赛。——原注

误。无论如何，象邱吉尔和杜鲁门那样在会议不久以后宣布原子弹的秘密将为美国所垄断，是一个错误，尤其是因为科学家们当时就知道，俄国过不了多久就能掌握这一秘密。

在俄国对日本宣战之前两天，原子弹突然轰炸广岛，这样一来，我们大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彼此之间的一场新的、不同类型的战争之中。在莫斯科，随时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聪明的俄国人从此知道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可怕的力量今后将成为他们生活的主宰者。他们对真正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希望又一次注定要破灭了。

苏联报界贬低原子弹的意义，但是苏联军人懂得，很快地连每个士兵都懂得，他们必须拥有原子弹。疲惫的工人们也懂得这一点。曾经为前几个五年计划节衣缩食的一代人，全都懂得，为了击碎原子，他们还得再作出多年的牺牲。他们知道，这个东西“资本家先生们”是不会租借给他们的。科学家们懂得，教师们懂得，甚至莫斯科的孩子们都懂得，俄国在原子时代一定不能落后。可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俄国人也很快就懂得了——几乎是跟每一个有觉悟的美国人一样快地懂得了——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根本不能再打大战，也就是巨人之间的战争。

原子弹轰炸广岛以后的几天之内，我们迄今从战争中所学到的一切，就变得过时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回忆录还没有写出来就已经过时了。战时的种种教训和协议如今变得更有意义得多，或者更无意义得多。原子弹出现以前的进攻和防御、缓冲地带和均势、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等概念，都突然显得古老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知识似乎陡然之间增加了一两倍，其中大部分知识是在中年政治家们离开学校以后才为人类所掌握

的。尽管如此，我们却还得继续遵循老一套的规矩好多年，直到人们养成新的、与原子释放的可畏能量相适应的普遍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为止。

艾森豪威尔跟朱可夫元帅一起来到俄国的时候，他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他是被斯大林邀请登上红场列宁陵墓大理石检阅台两人并肩而立的第一个外国人。那一天，我恰好在他们下方，也站了五个小时，观看胜利阅兵。艾克同朱可夫一起参观一个集体农庄以后，邀请了十七名将军到美国大使馆共进便餐。到午夜过后他们即将告辞的时候，他们齐声唱起了《我在铁路上工作过》，而领唱的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将军！但是，正象艾克一天下午在莫斯科所承认的那样，在未来笼罩着巨大原子蘑菇云这一点上，谁也没有欺骗谁。

艾克在私下回答一个私下提出的问题时说：“在使用原子弹以前，我本来会说是的，我相信我们能够同俄国保持和平。现在，我不知道。我曾希望这种炸弹不要出现在这次战争之中。迄今为止，我本来会说我们三国，拥有实力雄厚的海军的英国，拥有最强大空军的美国，以及拥有大陆上最强大陆军的俄国，我们三国可以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保障世界和平。但是现在我说不好。人们全都担惊受怕，忧心忡忡。人人又感到不安全了。”

现在回忆当时的另一件事也是很有意思的，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也好，当时在莫斯科的其他美国军官也好，对当时宣布的斯大林同中国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缔结的“同盟”的条款都感到高兴。我们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团团长约翰·R·迪恩少将认为，我们已经“明确解决了中国的国内问题，决定了中国赤色分子

的命运。”他在八月中旬曾对我说，“斯大林的协议的精神和文字，都排除了苏联帮助中共的任何可能性。”他接着说：

“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的驻华美军司令)完全相信，我们能够实施我们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他应该知道这一点。斯大林得到了他想要在满洲得到的东西——旅顺港基地和中长铁路——他不会让这些在中国内战中受到损害。即使他想这样做，我们也已经大大捷足先登。魏德迈说，我们现在已经为蒋装备和训练了三十六个师，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斯大林的条约是勾销(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后一笔。在我们的支持之下，蒋将会迫使共产党人投降。或者使他们分裂成一些小股游击队和亡命之徒，不难各个击破。”

我不同意。我说：“中国红军已经太壮大了，它控制的地盘太大了，忠于它的人也太多了，连斯大林也消灭不了他们。”

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二秘约翰·戴维斯同我的看法一致。他是在那里的唯一对中国十分了解的人。从记者们由中国发出的电讯(这些电讯在莫斯科是不予发表的)的字里行间，我和戴维斯看出了另外的东西。在斯大林蒋介石的条约尚未公布之前，毛泽东和朱德从延安发出的宣言就跟这个条约的条款完全不符。正是在俄国参加对日战争以后，毛和朱谴责蒋介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们要求驻华日军向他们的红军司令官们投降，而不是向国民政府投降。显然，莫斯科没有向延安通报雅尔塔协定和它与蒋介石谈判中苏条约的情形。无论在雅尔塔协定中，还是与蒋的谈判中，俄国都丝毫没有采取公开行动来维护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利益。

当时，在我和约翰·戴维斯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曾经把

我们的看法总结如下：“这进一步证明，克里姆林宫政策的首要目的和一贯目的是推进俄国的本国利益，不可能把任何另外一个党的利益等量齐观。在中国问题上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会搞垮中国的党，而是将会增强中国党的民族主义和独立性。”

当毛泽东发现斯大林已经正式向蒋介石保证提供多么全面的支持时，为时已晚，他只好扭转延安的政策，接受我国驻重庆大使、爱自行其是的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的建议，安排同国民党和平谈判。但是，正象历史学家们现在所熟知的那样，毛在他内心里并没有接受斯大林这一次给中国同志们提出的建议，就是接受他们从蒋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好条件，而把自己的地盘重新交给蒋去管辖。

毛这时不是首先向斯大林负责，而是首先向中国自己巨大的独立的革命力量负责。甚至原子弹也阻挡不住他们去及早争取胜利。

第四篇 冷 战

为什么梅毒这么凶，竟
毁了鼻子……使人闻不见自
己的臭味？

——约翰·多恩

终 身 签 证

一九四五年秋季，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几位成员乘坐一架专机到了俄国，这架专机竟成了载我飞翔的魔毯，南达科他州的卡尔·E·蒙特是代表团的团长。团员有俄克拉荷马州的维克托·威克沙姆，华盛顿州的沃尔特·霍兰以及俄亥俄州的弗朗西斯·P·博尔顿夫人等几位众院议员。我陪他们在莫斯科逛了几天。由于我即将离开俄国去印度，他们就邀请我跟他们同行。我们乘飞机沿伏尔加河而下，飞越斯大林格勒上空，在巴库短暂停留，然后沿着蓝碗状的里海之滨，进入波斯。

一路上，蒙特先生向一位国会秘书“特克斯”·康弗斯口授他的观感，我忙着帮他们填写人名地名和拼写字母，挣回我的飞机票钱。这批议员已经在三个星

期之内旋风式地访问过六七个国家，蒙特先生决心很大，要正确记下他们遇见过的人和事。除了印度以外，他们剩下的行程还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缅甸、暹罗、中国和日本。但他们累得晕头转向，到了德里以后，就一致同意取消其他地方的访问，径直经日本回国。

事实上，这一行人早就考虑删掉原计划中的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

我听到这消息后就抗议说：“你们可以跳过任何地方，就是不要跳过沙特阿拉伯。你们将是历史上第一批进入利雅得的美国议员！简直就成了马可·波罗了！”

我说这话并不是全无私心。到当时为止，只有另一名美国记者到过利雅得。

我们到达德黑兰的时候，这个问题还在争论之中。我们的这些人确实是得了思乡病，而伊朗又是一个给他们增添几分思乡愁绪的地方。在德黑兰，有一位烦躁不安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同我们会合，要带这一行人去利雅得，据说他是一位近东问题专家，他对老国王和石油公司非常敬畏，听到有人胆敢议论取消利雅得之行的时候，他真是紧张得发抖。他解释说，一切都作了精心安排，现在要是拒绝访问，就会引起一场国际事件。

蒙特先生和别的人都同意进行这次访问以后，这位可怜的官员仍然为两件事发愁：怎样甩掉博尔顿夫人，以及怎样甩掉我。据他说，博尔顿夫人一定不能去，因为阿拉伯人对不带面纱的妇女是看不起的。国王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在后宫之外接见过一个女人。国务院这位官员说，王室秘书坚持要博尔顿夫

人取消这次访问，他没有估计到俄亥俄州的博尔顿是妇女。博尔顿夫人嘲笑了他。假如阿拉伯人没有妇女平等的概念，她正好应该去开导开导他们。代表团一行人全都坚决支持她的意见，他们坚持说要么全去，要么全不去。国务院那位官员没有办法，只好把博尔顿夫人至少先带到海湾港口城市达兰，在那里等利雅得方面的回话。我们后来听说，当这个问题最后报告给国王伊本·沙特的时侯，他以帝王的风度笑了一笑，命令他的妻妾们出面欢迎博尔顿夫人，带她参观后宫。

就这样，博尔顿夫人得到了真正的独家新闻。我们其余的人则始终没有见过一个阿拉伯妇女的面孔。

至于我自己，国务院那位官员起初是断然地禁止我跟去访问。于是，蒙特先生好心地指派我为代表团此次访问时的名誉新闻随员(不领薪金)，但是那位神经紧张的胆小先生仍然提出种种异议。他说，这样做非常不合常规；华盛顿没有批准代表团设新闻随员。特别是沙特国王如果见到有记者在场，是会生气的；他需要谈机密的问题。无论如何，没有国王的亲自邀请，任何人都不得进入那个国家。要得到这种邀请是很费时费事的；显然，代表团不能为了等我而耽搁在这里。

我说：“我想，你一分钟也不必等。”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上面盖有沙特王室的盾形纹章。我从信封里拿出了沙特王室的信件。这是我所曾得到过的唯一的终身签证，下面有“真主的仆人”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阿卜杜尔—拉赫曼·费萨尔·沙特，即伊本·沙特国王的签名。

我把这个证件捅到胆小鬼鼻子下，说“现在听听这个吧。”我把这个词藻华丽的阿拉伯文信件中的实质部分的译文念给大

家听：

“谨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感谢阁下对敝国怀有崇高的感情，欢迎阁下随时光临访问。”

这是我在国际官场上，对一个自命不凡的官员所作出的唯一的一次心满意足的回敬。

国王这一邀请信的日期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它的由来则要追溯到那一年的四月，我在开罗遇见了卡尔·特威切尔的时候。正是特威切尔第一个给沙特国王带去了愉快的消息：他的一片荒凉的沙漠下面蕴藏着多得惊人的石油，就象是地下汪洋大海，足以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富翁。我到印度以后收到了国王的信，但是一一次又一次的战地报道任务，使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访问。现在正是好机会。国务院那个官员终于收回了他反对我去访问的意见，最后只是请求我不要把我可能了解到的任何“机密”事项给报道出去，而使他或代表团为难。我没有报道那些事。

象麦加一样，利雅得也是一个不许非教徒入内的禁城。从波斯湾到那里，骑骆驼要走六天，坐飞机只要半个小时。我们乘飞机从波斯起飞，飞越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达兰的滨临波斯湾的巨大采油区中心着陆。自这个机场扩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以来，美国就独家享有这个朴素机场的使用权。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伊本·沙特国王的空军只有一架道格拉斯C-47运输机，那是罗斯福总统送给他的。

在达兰，我们发现“大街”就在沙漠之中。几百个美国人，包括二十多个美国人的妻子，舒适地住在一排排加利福尼亚农场式的小屋中，房子里有空调设备和电冰箱，房屋之间还有一

个游泳池，儿童游乐场，呈现出家乡似的宜人景色。正象这里的一个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宛如生活在一个岛上；“大街”的尽头是一口燃烧着的油井，再往前就无处可去，全是沙漠了。在海湾之滨的另一处绿洲夸蒂夫，有更多的美国人在开发热沙底下的巨大宝藏，并帮助培训一万名阿拉伯人为公司开采和提炼石油。

这里说的公司，就是阿美石油公司，全称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公司的股份由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平分秋色。它们获得了到一九九七年为止的在沙特阿拉伯四十万平方英里土地上开采黑金的特权。公司经理弗洛伊德·奥利格直率地说，整个阿拉伯半岛蕴藏着“世界上还没有开发的最富饶的石油资源。”他的提法是很有分寸的。现在，人们相信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资源至少相当于美国全部石油储藏量的三倍。

在利雅得机场，我们受到了以费萨尔王储(即现在的国王伊本·沙特二世)为首的王国内阁的成员们的迎接。围着裙子的卫士端上了必不可少的不放牛奶的咖啡，我们还闻了点燃的檀香木的香味。然后，我们坐进了装着沙漠专用轮胎的新福特牌小汽车。阿拉伯半岛也许没有公路，但是沙漠上到处可以行车，四通八达。阿拉伯司机们都还是些孩子，他们驾驶着汽车，在一英里宽的地面上，象赛车似地疾驰，加速板都踩平了，车速达到一小时八十英里，驶向那座朝四面八方不规则地延伸开的城市。

在利雅得，那一长溜矮矮的两层宫殿和高低不平、刷得白白的土砖墙，似乎就是沙漠的一部分。我们驶进了一个广场，那里站着国王的一排廷臣，他们身穿肥大的长袍，袍领连着方格

花纹和圆点花纹的头巾。然后，我们被领上了铺着地毯的台阶，来到了一个L形的大房间，仿佛是走进了土耳其挂毯和波斯挂毯的海洋，左右两边是两排用椰枣树干砍削而成的柱子。这种场面给人总的印象是一种原始粗野的华丽。在L形的底部，墙上挂着精致的绵缎和耀眼的金丝织品。

这里，在一个不高的台子上放着一把镀金座椅，上面坐着伊本·沙特，阿拉伯人的国王。

伊本·沙特国王

伊本·沙特身高六英尺四。他站起来跟我们握手的时候，比我们所有人都高大得多。他长着密密的胡须，穿着长长的线条流畅的袍服，举止端庄，的确是一位威严的人物。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可畏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目光似乎总盯着你脑后的某个遥远的地方，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原来他的左眼是斜视的。

空气里充满了香味和玫瑰水的气味，蓄着胡须的卫士们身佩摇摇晃晃的长剑，在房间周围转来转去。在阿里·阿里雷泽的帮助下，开始了会谈。他是不久前才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的一个阿拉伯人，说起英语来美国腔很重，在这个异国奇境之中显得很失调。这时，我们已不需要在此久谈：国王陛下同我们这一行人之间的种种尊称敬语，客套恭维，全都是为了能客客气气弄到一笔贷款，这笔贷款将随后提供给沙特，国王把这一点当作我们这次访问的重要原因。

谈话结束，王储把我们领到单独的一座住宅。他把自己王

府的一部分房子腾给我们住，从这些房子往下一看，可以看到国王的浴池和后宫。美国议员们，以及他们身后不远的“新闻随员”，常常透过格子窗朝那边投出希望的目光。可是这里不是塞西尔·B·德米尔^①的作品，见不到皮肤褐色的美女在懒洋洋地沐浴。我们在王府里从来没有瞧见过一个阿拉伯女人，我们在尘土飞扬的胡同里，偶尔碰见过几名妇女，她们全都蒙上面纱，身穿黑色长袍。只有她们黑色的眼睛透过沉沉面纱的隙缝，向外面射出嘲弄的目光，一看到男子凝视她们的可恶的样子，就马上把目光移开，赶快逃走。

阿里·阿里雷泽给我介绍了伊本·沙特一夫多妻的情况。他说国王的妻妾从来不超过四个。四个老婆，这是法律和道义给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规定的限度。四个，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四个。穆斯林当然可以离婚，只要男人认为离婚合适就得离。伊本·沙特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这一规定。他的后宫通常只有三个妻妾，每当他物色到一个处女作新娘时，就马上跟原有妻妾中的一个离婚。阿里告诉我，伊本·沙特国王在他有生殖能力的五十年期间，先后娶过二百多个妻子。这就是说，平均每年离婚四次。

然而，在频繁更换配偶中，政治的因素大于爱情的因素。部落酋长们把姑娘献给国王，如果遭到拒绝，就等于是受到了侮辱。这些姑娘生了孩子，就使酋长与王室有了血缘联系。通过这种婚姻，可以使政治结盟关系得到更新或巩固。国王把男孩子留在宫内，这跟从前把酋长的儿子扣作人质的老办法比较

^① 德米尔(1881—1959)，美国著名电影制片人。——译注

起来还是有所改进。国王遗弃的妻子们一般都留在宫内，侍候她们的孩子。在我见到伊本·沙特的时候，他有三十九个儿子，包括王储及最小的一个三岁的漂亮男孩。国王的一些女儿也活下来了，但是伊本·沙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女儿。谁也没有统计过她们究竟有多少。国王举了一个例子：

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子跟国王的妹妹一起来到后宫，热情地拥抱了国王。国王被弄得莫名其妙，什么也没有说，等到那个年轻女子离开以后，才问别人，她是谁。

他的妹妹笑起来了，说“怎么啦，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啦？”

国王对我们说：“原来她是我的小女儿，我早让她出嫁了，好几年没见过面。我忘记女孩们的名字是常有的事，可是这一次，我连她的模样都忘记啦！”

我不禁想，假如弗洛伊德^①在世，他会对此作何解释。在这里，父亲的形象就和圣诞老人一样，显得疏远和属于众人的，孩子们大概从孩提时期起就把基督教社会里所谓的“破裂的家庭”看作是正常的现象。然而，普通的贝都印人只养得起一个老婆，根本享受不到多妻制的乐趣。妇女是财产和奴隶，男子也是奴隶。除了直系亲属之间以外，阿拉伯人的“自由”严格局限于一个全男性社会。

伊本·沙特对他当父亲的成就是自豪的，对他的剑也是如此：暴力就是沙漠上的法律，弱肉强食，优者胜劣者败。沙特国王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当年如何攻占了利雅得，那恰好是在本

^①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译注

世纪之前，他只有四十名追随者，其中二十名还开了小差。直到一九二六年，他才征服了麦加和赫贾兹，推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盟国所支持的侯赛因国王，最后在面积相当于美国四分之一大小的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内恢复了瓦哈比教派的权力。

在星光照明的屋顶上，明亮的南十字星座装点着沙漠余辉上方的紫红色天空，国王请我们坐在一张U字形的大桌旁边，桌子上放着二十四只烤全羊，都是鲜嫩的羊羔。羊肉的周围堆放着大蜂窝似的肉饭，盛饭的碗大得象一只只小澡盆。大量的咖喱鸡、鱼、蔬菜、水果和新鲜椰枣，在火炬照射下闪闪发亮。还有未经发酵的阿拉伯面包，象烙饼似的扁平，烤的时候，面包的一头装上了一个把，可以很方便地拿起来送到嘴里，在这个禁用刀叉的国土上，这是一种有用的进餐工具。

国王亲自动手撕下一只羊羔腿，送给蒙特先生。三十位王子同我们坐在一起，每一个客人都有几个王子帮着拈菜。最后，我们象北京鸭一样被填得满满的，然后被带到一个铺着地毯的大阳台，国王在那里举行了受觐礼。穆斯林是禁止吸烟喝酒的，但是无处不有的咖啡几乎成了一种代用品。

国王的首席咖啡侍从伊本·阿卜杜勒·瓦希德象舞蹈演员似的来来回回，他的佩剑闪闪发亮，他的铜壶在咖啡杯子中间闪来闪去，象一条飞舞的金蛇。阿拉伯人喝的咖啡，差不多跟糖浆一样稠，一杯只有一点点。喝一杯咖啡，要剩下半杯渣，阿卜杜勒用一种过分戏剧性的动作不断地把咖啡渣倒在昂贵的东方地毯上。继阿卜杜勒之后出来的是国王的焚香侍从，然后是香水侍从。最后的一位侍从捧出了国王自己的一杯麦加水，

还有一个轮流饮黄油奶用的大银杯，黄油奶这种珍贵饮料是只供信徒们享用的，我们这些客人乐于不沾边。

这位阿拉伯国王谈了他从他的宝座上所看到的人类现状。尽管他是世界上的几位享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之一，是无可争议的君王，立法者和裁决者，可是这位昔日的沙漠斗士却热情赞扬“民主”，赞扬“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共同事业”（他在战时一直设法保持了中立，直到战争结束）。当然，在他的国土上恐怕找不到美国人承认的“自由企业”，当然阿美石油公司是例外。土地以及地面上和地底下的全部财富全归国王及其部落贵族所有。来麦加朝圣的贡品也归他所有，而可兰经则是他据以保护这些东西的法律：以眼还眼，以命抵命，小偷则要砍手。依靠千年不变的严厉法典，以及通过巧妙地操纵部落之间的争端，伊本·沙特把这个大约拥有六百万好斗的文盲的游牧者的国家捏在了一起，而这些游牧者的祖先当年曾经用先知穆罕默德的征服之剑一度蹂躏过基督教世界和亚洲。这些人迄今仍然几乎完全与科学和工业化世界无缘，可是后者终于即将席卷他们，其革命性后果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再过若干年，再得到若干亿万美元，若干辆凯迪拉克牌豪华卧车，让金钱给少数人带来奢侈享受和腐化堕落，古老的部落兄弟情谊就会四分五裂，面目全非。

现在，老国王谈论着“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这些都是与上帝相悖的信条，“跟我们民主国家毫不相干”。他从来没有见过上述几种人所统治的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当他谈到一九四四年在红海会见罗斯福的时候，他可是真正动了感情。作为跟他自己相仿的另一位部落酋长，罗

斯福总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两眼含泪地告诉我们，当他惊悉罗斯福噩耗的时候，他下令整个王宫哀悼一个星期。

我对这种阿拉伯感情的流露是深受感动的，可是，当他以亲切的语调说“我命令把有罗斯福亲笔签名的照片翻过去面朝墙壁，因为我一看见它就禁不住哭泣”的时候，我可不能担保当时在场的几位共和党人也充分欣赏他的这种感情。国王显然以为这些共和党人也是多少附属于总统的朝廷的。

我在道义上受到约束，不得报道国王谈话的“机密性”内容，我现在所能透露的东西确实不会引起地震。伊本·沙特“坦率谈话”的主旨是他没有钱了！由于战争，来麦加朝圣的道路切断了因而收不到朝觐费和贡物；他的油井还没有把他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

“我的处境令人难堪，”他睁大眼睛说。“属于我的东西超过了我所拥有的东西。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富的国家，但全是石油，它仍在地下。石油公司采油，付给我矿区使用费，但是产量太低了。我们需要钱，今天就要，而不是明天。”

肉和大米已涨价两倍。衣服涨价一倍多。他需要钱，不是为了奢侈享受或无谓浪费，而是为了给他的人民吃和穿。他说，他每天在自己的大门口见到两千名饥饿的贝都印人；从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来看，他并没有夸张其词。情况比麦加更糟。“假如你们不相信我，”他建议说，“请把你们的簿记员派来，我们会让他们看到钱花在什么地方。”

那一天，我们这一行人都得到一份礼物，就是一件阿拉伯长袍和饰有金线流苏的包头巾，一块金表，一把镶有宝石的佩剑。我们在镀金椅上笨手笨脚地换了衣服。伊·本沙特解释说，

国家赠送礼品，占去了王国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他摸一摸自己的金线绣花的连包头巾的外套，用两手把它撑开。

“我们以前买这个，是四十个里亚尔一件，”他对他的翻译说，“现在，一件差不多要一百个里亚尔了。”这时，博尔顿夫人从后宫出来，国王作出了一个破例的姿态，让博尔顿夫人坐在他左边。她穿上了她刚得到的阿拉伯长袍，头巾优雅地垂在两肩。突然，国王伸过手去，轻轻扯了一下这个头巾。“拿这个来说，”他说，“战前印度商人卖给我们，一件只要五十个里亚尔。今天，已涨到一百多个里亚尔。”然后，他摸一摸博尔顿夫人身穿的薄纱袍子，接着说，“或者拿这个来说，从前它的价钱大概是一百五十个里亚尔。现在强盗般的商人要价四百到五百。先生们，这就是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影响！”

国王在适时地提出了要求得到硬通货现金的愿望。美国到处大手大脚地送礼，给贷款和给租借物资，但恰恰在这里不给。为什么？难道阿拉伯的石油不是完完全全用于支持民主国家？我们有些丢脸的是，我们的这几位人民代表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带来任何贷款。他们仅仅带来了令人扫兴的安慰，说什么如果通过向国务院提出要求，将会得到同情的考虑。

身上散发着玫瑰水香味的阿里·阿里雷泽抓住我的胳膊，宣布说“国王现在要跟你谈话了。”他把我带到国王面前。议员先生们和博尔顿夫人走开了，国王请我坐在他身旁。他拉着我的手，我惊讶地发现他的手竟然和女人的手一样柔软。在整个谈话期间，他一直抓住我的手不放。当我坐下来时，响起了一片沙沙声，因为一百名侍从这时也坐下来，他们僵硬的服装悉悉作响，他们的武器铿锵齐鸣。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我。

我还从来没有在这样奇怪的气氛中进行过非私人性质的“采访”。

我问国王对战后的中东有何希望。他说，在亚洲和非洲，一切殖民地和托管地的日子都快要结束了。大西洋宪章的诺言意味着这整个制度必须迅速告终；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也应该立即完全独立。

他说，“所有阿拉伯人都要求让所有穆斯林国家得到充分的主权，得到完全的政治和经济平等，当然，还要停止向巴勒斯坦移民！”

他详细谈到巴勒斯坦是伊斯兰教圣地，对全世界二亿五千万穆斯林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英美把那些从欧洲逃出的犹太人全部放在巴勒斯坦，是不公平的。对犹太人犯有罪过的，不是穆斯林，而是欧洲人自己。穆斯林和犹太人从前在巴勒斯坦曾经和平相处，今后只要得到独立和自治，他们可以继续这样做。但是，假如一方企图赶走另一方，或者，假如把一个犹太国强加在穆斯林头上，“那就永远不会有和平”。

国王总结说：“我们阿拉伯人在这次大战中得到过许多诺言，也上过许多当。假如这一次不听我们的话，那就会发生流血。流血，不仅是为了巴勒斯坦，而且也是为了非洲；不仅是为了处理意大利的殖民地和托管区，而且也是为了北非的所有尚存的殖民地。”

告别时，他用力握握我的手说：“下次再来看看我们。当你能够多呆些日子的时候再来吧。请向贵国人民介绍我们的友谊和我们的需要。”

一回想起伊本·沙特低声下气地向几位来访的、当时不愿

意让美国承担义务的国会议员乞求几块美元的这种情景，我就想到，我们当时还多么不理解这个距离我们半个地球之远的地方对我们有多大的利害关系；其实，由于美国的石油公司声称有权开采阿拉伯半岛沙漠中蕴藏的海洋般的石油财富，我们与那里的关系已经很深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落后的王国是迫切需要保护的“自由世界”的一个部分。十年之内，美国石油大王们就不仅收回了他们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初投资，而且还赚回将近十亿美元，这笔收入既不向国王交税也不向山姆大叔交税。然而，假如不是美国的石油大王去发财，又会是何人？共产党人吗？也许。但是早在一九四五年，我就觉得，老国王恳求赏赐这件事预示了另外的什么事情：有朝一日，阿拉伯半岛也会同所有东方人一样，叫东西方的异教徒都遭殃，把他们的资源收归国有，仅仅给阿拉伯人谋利润。在利雅得，一位已经穆斯林化的英国人、伊本·沙特多年来唯一的外国顾问哈里·圣约翰·B·菲尔比同我的一次谈话，使我感触颇深。

他说，“我给这些石油公司二十年时间。然后阿拉伯人就要接管。”

在德里的逗留

在新德里的威灵顿机场，我真有旧地重游之感。我曾经多次从这里乘飞机飞赴加尔各答，飞往孟买的白色别墅和棕榈成荫的海滨，飞往终年白雪皑皑的帕尔巴特山麓郁郁葱葱的杰卢姆河谷，飞往世界屋脊上的大吉岭；战争期间还从这里出差，

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在威灵顿机场，我曾最后一次见到史迪威将军，在他的座机上谈了一个小时。他向我介绍了他同“那个小人”——这是他对蒋委员长的称呼——之间出现的惊人纠纷，“这样，到时候，你就可以把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钱是怎样在中国白白扔掉的”。后来，在印度独立后不久，我还要再次飞到威灵顿机场来。

我到老德里城后，住进了塞西尔旅馆。那家旅馆经营得不错，跟大都会饭店相比真是乐园，我在那个舒适的环境中撰写了最后一篇关于俄国的报道，不必经新闻检查官的恩准，就发回了报社。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俄国仍然不相信我们》。我根据当时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的看法，总结了我们的援助俄国四年的结果。凯南当时正在逐步形成一种论点，这一论点后来被称为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但是美国人后来歪曲了这一政策，过分强调了共产党的武装侵略，认为这是对政治现状的主要威胁，尽管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政治现状是由于别的原因而遭到破坏的。

塞西尔旅馆坐落在老德里城边缘上，占地面积不小，有宽敞的草地和花园，有一些高大的榕树遮荫，还有几个网球场和一个大游泳池，路边有一个孔雀园，常常能见到一些温驯的孔雀，这些都给旅馆增色不少。日暮时分，塞西尔旅馆的穿着白外衣的招待员请客人们在露天喝茶。新奇的是，人们必须迅速地把三明治之类的点心送进嘴里，否则就会被鹞子抢去吃掉。这种飞行迅速的大鸟常常在天空盘旋几个小时，我们肉眼几乎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们的眼睛很锐利，连一块面包皮也能看清。一看到有可吃的，它们就象流星一般猛冲下来，客人一不提

防，它们就可能在盘子和客人的嘴之间把面包叼走，甚至还可能蹭破他嘴角一块皮。假如把一块烤饼抛向似乎空无一物的天空，在它落地之前，准会有一只鹞子把它叼走。

几年以前，当我头一次访问德里的时候，这里到处都能见到猴子。它们常常偷袭人们家里的冰箱，跟鹞子争夺零散的食物。尽管室外有这种小危险，室内有时也有壁虎、变色蜥蜴和蝎子之类的东西，塞西尔旅馆还是常常客满。这家旅馆的女主人、一位老妈妈似的瑞士人霍茨太太，却总是能够给新闻记者找到住房。她专门留了一张大圆桌让我们这些记者就餐，给我们吃好菜好饭，常有美味可口的咖喱食品和肉饭。在前几次来访的时候，跟我同桌就餐的有：《纽约时报》的赫布·马修斯；全国广播公司的瘦削冷峻的比尔·查普林；时代-生活杂志社的安静而又敏感的比尔·费希尔（他后来投海自杀了）；合众社的不幸的约翰·莫里斯（他也是自杀的，在合众社纽约分社跳楼了）；美联社的普雷斯顿·格罗弗；《先驱论坛报》的阿奇·斯蒂尔（他也是我在中国时就认识的老朋友）；合众社的感情奔放、善于同所有在亚洲漫游的人们交朋友的达雷尔·贝里根；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在一架快速客机上丧命的本·罗伯逊；还有疯狂但有天才的杰克·贝尔登（我曾经同他一起报道过中国的战争，并且在克什米尔一艘游艇上一起漫游过）。

如今，这批人当中的幸存者都已劳燕分飞，各自西东。可是印度却处于大转变的前夕，它很快就会成为头等新闻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非常引人注目。英国人守住了印度，没有让日本人占领；可是英国人现在却再也守不住印度而不得不把它交给印度人了。甘地的力量也许还不够，但是一支新建立起来

的，装备精良而又训练有素的印度军队及其军官们却肯定有足够的力量。这时，工党在英国执政，而工党的政策是让印度独立，越早越好。在这一点上，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和北非以及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表现都不如英国人明智。英国人适时地退出印度，这就避免了印度退出大英帝国，即后来的英联邦。

这一次当我离开印度的时候，我知道印度永远不会再是原样的了，对于英国人以及对于任何白人来说，都是如此。靠着白人统治者的威望而享受特权和自命为种族优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的一幅情景，却饶有奇趣地象征了这个帝国崩溃的时代里的最后一个时代错误：

战争期间，我在一次访问伦敦的时候，曾经到唐宁街拜会L·S·艾默里先生，他当时是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位。他坐在一把高高的雕有花纹的椅子上，他面前是一张巨大的雕有花纹的老式办公桌。他耐心地向我解释，为什么英国人未能防止印度发生饥荒。

“由于打仗，航运受阻，因而粮食进口也就少了。印度人生性好囤积，自然市场上就出现了食品脱销的情况，你明白吧？我们的中央政府根本没有力量去组织全国范围的分配。”

没有，的确没有这种力量，我想。当他说话的时候，我环顾了这个房间，它镶着暗色的橡木板，灯光昏暗，墙上光秃秃的。只挂着几张有苍蝇尿污点的历任总督及其副官的肖像。我不禁想到所有这些贵人的屁股一定都在这里坐过。黑斯廷斯^①

^① 黑斯廷斯(1732—1818)，英国政治家，曾为英国的第一任印度总督。——译注

本人或许也在这里坐过？威灵顿^①、明托^②、基切纳^③、柯曾^④这些影响深远的巨人，帝国的铸造者，肯定都在这里坐过。

采访谈话结束时，我绕过艾默里的办公桌去向他致谢，他的椅子太高了，我踮起脚才能同他握手。这时，当我也站在他的办公桌后面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艾默里是一个多么矮小的人。我想，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没有站起身来，是因为他需要利用脚凳才能站起来。他正是利用脚凳才登上那把高椅子的，现在他的双脚正搁在脚凳上，高高地离开了地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那些曾作为印度的统治者在这里坐过的英国绅士们，一定在前些年就认识到了，英国再也不能高高在上，从这么小这么遥远的一个房间里统治一个人口在世界上居第二位的国家了。

印度总督官红石上的铭文写道：“自由不会从天而降，人们必须奋起争取自由。”英国人如今已听到和注意到人们奋起的事实了。

今天已难以想象有哪一个国际会议可以没有印度参加。可是十年前，还没有哪一个邻邦能够不经英国国王的恩准就跟印度打交道。当时，印度在世界舞台上仍然是一个政治上无足轻重的角色，而在我们美国历史上，还不曾有由印度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派驻美国。

① 威灵顿(1769—1852)，英国将军和政治家，曾在印度担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译注

② 明托(1845—1914)，英国将军，政治家，曾任印度总督。——译注

③ 基切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曾在印度当过英印军队总司令。——译注

④ 柯曾(1859—1925)，英国政治家，曾任印度总督。——译注

英国用分而治之的手腕，统治着这个次大陆上的大大小小的民族，达二百年之久。如今这一统治即将结束，在印度的英国人说出了他们最后一句辛酸的俏皮话。当他们关闭自己的俱乐部和收拾行装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过去是分而治之”，原先的英属印度分成了两部分——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现在是分而离之。”

不过，蜜蜂掠走花蜜，也传播了花粉。英国人离开亚洲，也给亚洲文明留下了一些长久的贡献。尼赫鲁的一位密友、由英国培养出来的印度最能干的外交家之一K·M·潘尼迦，在他的一部光辉历史著作《亚洲与西方统治》（纽约约翰·戴出版公司一九五四年版）一书中，列举了欧洲人的长期统治所产生的一系列好处：出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亚洲改革运动（其中包括印度教的改革），“教育方针，福利计划和政治培训”，以及“亚洲人思想上第一次出现的现代国家的概念”，还有“为适时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原理”。潘尼迦进一步承认，西方帝国主义在巧取豪夺、压榨剥削的同时，也促使亚洲人用共和理想去取代“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并形成了“真正宏伟的法律结构”。在这法律结构之下，有组织的劳工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妇女的地位大有提高，通往现代科学体系的大门打开了，语言和艺术也极大地丰富了。

亚洲的共产党人恐怕不会赞成这样慷慨的评价。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本身也是在西方的统治时期传入亚洲的。几百年前，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对东方的信仰和哲学提出了挑战，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则继续了这一挑战。

新“帝国主义”

在公开的历史和非公开的历史的合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原子时代初露曙光的时候，经历了一次突变。

在莫斯科，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共产党人受到一种内在的压力，要他们修正过时了的教条和原则，以便与欧洲大大变化了的形势相适应。回到亚洲以后，我现在看到美国必须同样迅速地在思想上来一个转变，要在新的高度和平等的基础上去迎接那些从殖民地脱胎出来的自由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出现，世界上的政治成员实际上将增加一倍。

在俄国，我已经放弃了我也许有过的关于斯大林主义者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帮助欧洲联合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幻想，尽管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这样做。克里姆林宫一心想着他们自己的严重创伤，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弱点被西方发现和利用，而美国突然拿出了原子武器，更使克里姆林宫的内疚感和自卑感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疑惧心情几乎达到了偏执狂的程度，因此，克里姆林宫那些最容易伤害社会主义在西欧的朋友和最叫社会主义的死敌高兴的错误行径，在今后也恐怕避免不了。美国的敌对政策切断了俄国战后恢复浩瀚建设工程所迫切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进口（这也要归咎于俄国自己在外交上的错误），于是俄国领导人采取了另一种严酷的做法：毫不留情地压榨那些被占领的国家，逼它们赔偿。这种做法使得他们在卫星国中的盟友，即“当地的”共产党人，很快就变成了单纯收账的人

和充当警察的角色。

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早期矛盾在于它的两重性：它既是解放者，又是监狱官；既是革命者，又是剥削者；既是慷慨大方的同志，又是报复心切的伊凡雷帝式的人物。斯大林企图整垮铁托，使苏联对兄弟共产党国家的政策的自相矛盾达到了最戏剧性的不可调和的地步。铁托顶住了俄国的绝对专政，蔑视了克里姆林宫一贯正确的原则，这标志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异端开始出现。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野蛮镇压阻滞了这一进程，但是这一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在南斯拉夫同斯大林决裂后不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曾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一篇文章《铁托异端分子能阻挡俄国吗？》谈了上面所说的这个意思，我的这种预言受到了苏联党的雇佣文人的谴责，他们骂我是“帝国主义代理人”，而且永远不许我再去斯大林的俄国。

在亚洲，美国也进退维谷，只不过情况有所不同。这种局面所引起的国家品格的分裂也是很带根本性的。

美国在历史性的中立主义（“不陷入联盟”）和“天命所定”的态度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要支持西欧及其殖民体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又对一切不自由的民族抱有托姆·潘恩^①式的同情心，因此，虽然到处都谈论民族自由，但是在行动上却是一会儿支持独立，一会儿又支持霸道；一会儿是解放者，一会儿又跟独裁者成了盟友，一会儿主张孤立主义，一会儿又主张干涉主义。我国对外政策中的这种精神分裂症，会使得我们承认一种新的传说，这就是，按照托马斯·B·柯蒂斯众议员的

^① 潘恩(1737—1809)，美国政治思想家和作家，鼓吹人权和民族自由。——译注

说法，把“自由世界”理解为“铁幕之外的被我们误认为是‘自由世界’的七十一国”。美国同其中的四十一国陆续结成了军事联盟。柯蒂斯先生说，“在这七十一国当中，四十九国……是独裁或寡头统治的国家，其中的大多数甚至不能说是‘慈善’的独裁政权。剩下的二十二国，大多数肯定有某种权利使用‘自由’这个形容词……但是就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管理而言，也仍然是寡头统治，国民中的百分之一是靠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养活的。”^①他这次讲话还根本没有考虑到我们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支持的“自由”盟国统治之下的为数更多的殖民地国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主要是指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欧洲，铁托主义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暴露出，苏俄对东欧卫星国的“殖民”政策体现了沙俄专制的隔代遗传。现在，在东方，当起来造反的亚洲向一种新的均势摸索前进的时候，我们难堪地看到，美国逐渐变成日积月累的种族仇恨以及民族愤懑和怀疑的一个新的焦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国、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朝鲜和马来亚，都酝酿着如同当年美国独立战争一样真正的和民众的革命。美国几乎不曾公开援助革命派掌权，也不大理解殖民地的各族人民是把自己的解放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目的。所有这些地方的动荡实质上都是本地人发动的，带有反帝、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的性质，最初并不是反美的。他们曾指望得到美国道义上的援助，甚至是物质上的援助。

^① 见1955年2月18日的《美国国会记录》，1958年在纽约出版的K·齐利亚克斯著《自由的新生》一书曾加以引用。——原注

美国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定义对不上号。这一定义的基本内容是殖民垄断集团在市场 and 原料方面进行剥削，为外国资产阶级谋取超额利润。实际上，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点古怪，即，执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利润，往往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对自己国内市场的剥削；政府从美国公众手里征收成百上千亿美元，以利润贡金的形式把这些钱交给那些最初参加租借法案援助计划、后来参加军事援助计划的私营工业家和银行家。尽管如此，在捍卫民主和自由方面，由于惧怕共产主义，美国的这种“自我帝国主义”仍然造成了一些令人难堪的自相矛盾之处。

例如，在打败日本以后不久，美国人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支持法国的花花公子傀儡皇帝保大而反对印度支那一场合法的独立革命的境地；在中国，则是积极干预一场内战，企图拯救一个代表私有制的独裁政权，使其免遭一个主张实行国家所有制的独裁政权的摧毁；在朝鲜，当我们的军队到达汉城以后，镇压了已经在那里掌权的一场早期的社会主义(非共产主义)革命，把我们的长期流亡的李承晚先生弄回去，成立了一个私人警察国家；在印度尼西亚，我们给荷兰人提供资金和武器，因为他们梦想推翻当地的独立政权，把这块土地重新纳入荷兰女王的管辖之下，最后还是白日梦一场；在泰国，我们支持的是那个在战争期间曾领导自己的国家站到了轴心国一边的亚洲酋长(銮披汶)；我们在西班牙和菲律宾所推行的政策的结果，是让那些在政治上曾与轴心国相勾结的人得以稳定他们的政权。

在西贡，我见到英国军队玩弄了一个特洛伊木马的花招。当时指挥英军的道格拉斯·格雷西将军是一个正直的军人，他

反对搞政治欺骗，曾表示他个人厌恶这种花招，但是他不能不执行命令。英国人先对当地的越南革命者（当时大部分还不是赤色分子）保证，他们进入越南只是为了解除日本人的武装。在当地的越南人让英国人不流血地登陆以后，英国人却把在押的法国维希政府的官员和外籍军团的军官统统放出来。然后，他们又帮助法国人打越南人，企图重新使越南人屈服，可是法国人当初却一枪不放把越南拱手让给了日本。为了重新征服越南人，盟军曾广泛利用他们本来应予以解除武装的日本军队。

我在《邮报》上报道过，有些越南人曾向我抱怨盟军的叛卖行径，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安南人真的要独立，就别等待我们的帮助。你们要拼命战斗，忍受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坚持长期流血斗争，让法国人对你们感到厌烦头疼，要让他们觉得打下去得不偿失，所付的代价要超过重新征服你们的好处，你们还要争取转变美国的舆论……假如你们不打算作出这样的牺牲，你们就最好低头屈服，重新戴上枷锁。”

有一次，我在东京见到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我向他谈起这些事情，他听了之后的那种激动情绪使我吃惊。他说：“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叫我热血沸腾的话，这就是见到我们的盟国在印度支那和爪哇调动日本军队去重新征服我们曾保证要解放的那些弱小民族。斯诺，这是一种最卑鄙的背叛，它危害了我们在东方各地的事业。”

我问：“将军，这是不是说，你主张让他们全都自由行动？”

“对极了！”麦克阿瑟象是回答人们没有说出来的批评似的补充说：“假定他们的政治腐败，假定他们不会进行诚实的选举，保罗·麦克纳特就对我预言说，在菲律宾将不会有诚实的

选举，那又怎么样呢？他前几天向我抱怨这一点的时候，我对他说，‘保罗，你完全正确。他们不会进行诚实的选举。但是我也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菲律宾人的选举将会象你们在印第安纳州所曾进行过的选举一样诚实！’在这以后，保罗一声不吭。他还能说些什么呢？”

可是，我们仍然给法国人提供武器和舰船，假如没有这些东西，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一年也坚持不了。他们为印度支那的内战白白丢掉了十年时间，那场战争杀死了几十万对我们丝毫无害的人。到法国人这次冒险结束为止，法国为此浪费的钱相当于我们的马歇尔计划给法国的全部援助，而杜勒斯还轻率鲁莽地威胁说，假如中国胆敢给“我们曾保证要解放的那些弱小民族”提供同等的援助以抗击法国，美国就要扔氢弹。

到头来，走的是法国人，留下的是当地人，付钱的则是美国人——而且至今还没有付完。

更远的东方

美国人在菲律宾也付了钱，只是结果略好一些。他们相信美国对他们的独立的保证，而且满怀信心地盼望我们的援助。

的确来了大量的援助，几十亿美元的款项和物资。不幸的是，这一援助是以我们的经济所特有的挥霍浪费的弊病为特征的，因而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可疑的榜样。这一援助对于种植园主和工商业家来说是够慷慨的了，可是破落的农民和城市中的贫民大多数却几乎一无所得，手里有现金的人（往往是那些跟日本占领军勾结过的人）马上囤积居奇，不断吮

吸消费者手里的日益贬值的美元。当独立来临的时候，菲律宾人还没有学会怎样利用本国异常富饶而又几乎尚未开发的资源，建立自给的经济。

一个周末，达雷尔·贝里根和我一起乘车越过吕宋那些坑坑洼洼的公路，到达碧瑶，去探望我从前住过的那幢坐落在芬香的松树林中、覆盖着美丽的山兰的别墅。从外表看，那个地方似乎完好无损。我们站在陡峭悬崖的边缘，从房子的位置往下看，可望见一条五千英尺深的河谷，再往下的远方，则是太平洋白沙滩的激动人心的景色，我们从这座一英里高的高台上走下来，进了别墅，才发现有整整一个村落的伊戈洛人在这里安营扎寨了。他们男男女女穿着土布褂子和三角短裤，蹲在那里。他们的头发都箍着，咧着白牙笑着，自己编织的腰带上插着刀，可爱的黑眼珠的孩子们碍手碍脚。这一切，就在这座当年由美国派到吕宋非基督教部落的第一个专员迪安·沃切斯特建造的、如今烟雾缭绕的美丽房屋中，形成了一幅既有条理而又杂乱的景象。

墙壁上精美的奈良镶木板全都拆掉了，桃花心木的地板也大部分被拔掉，当了柴火。在房屋里面，按照典型的伊戈洛人的风格，建起了六个小木棚，每个棚屋都有用树皮和竹子编起来的墙壁，和刚刚能让人爬进去的入口，还有往大屋子里喷烟的烟囱。这些伊戈洛人的老家在邦都，他们那多雾的和常常出现彩虹的乐土遭到了轰炸，或是被烧掉了，他们惊恐之余，坐牛车来碧瑶寻找栖身之所。大概是有一位老汉还记得沃切斯特老爹，就到这里来找他。可是他们却发现了这座别墅，里面还有那么多镶板和地板，真是方便的柴火，可以用来升火煮饭，把

他们在陡峭山坡上的梯田里收获的褐色稻米煮成美味的米饭，这些简直象是祷告上帝后得到的恩赐。就这样，棕种人在白人留下的房屋里建立了他们的家……

至于日本，最初看来，美国在那里的成就好象会成为表彰麦克阿瑟将军领导有方的一座比较持久的纪念碑。这位将军也许是经过了毕生的锻炼才扮演了这个角色。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阿瑟将军从内心来说，是一个比温斯顿·邱吉尔还要保守的保守派，可是他却执行了波茨坦协定的那些真正激进的指示。他认真执行，一丝不苟。短短六个月的工夫，我就看到日本变了样。这个国家迅速彻底地解除了武装，军事工业全部拆毁，主要战犯受到了审判和惩罚，警察镇压被取消了，反对党合法化了，劳工已组织起来，开始由工会出面与资方进行劳资谈判了，极权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遭到了禁止，财阀垄断集团瓦解了，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法律地位，土地改革也开了一个头。最后，麦克阿瑟这位总督还为日本人起草了一部崭新的宪法，它在保障所有这些革新方面，超过了当年杰斐逊起草的美国宪法。这部宪法宣布日本永远不以武力为国策手段。

有一天，麦克阿瑟同马蒂·萨默斯、格罗弗·帕特森和我共进午餐，他向我们吐露：“啊，假如我在国内做我在这里做的一些事情，我有可能被人开枪打死。假如我用粉碎日本财阀的办法去粉碎美孚石油公司或者美国钢铁公司，他们就会说我是布尔什维克了。”他似乎对他自己的——或者说波茨坦协定的——大胆做法感到后怕。“当然，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但是，这实际上是革命，先生们，这是革命！”

确实是这样，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否则，麦克阿瑟最后也

不会当上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董事长。我们拯救了天皇，从而也拯救了基本的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在我们的占领结束以前，各种改革的做法就已经大大缓和下来了。麦克阿瑟打碎了财阀，把大财阀变成了小财阀，可是谁也不曾指示他把这些财阀变成别的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对它们实行国有化，因为不曾得到这样的授权。我们不能借钱给普通的人去购买财阀的资产，即使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业合作社团。也不能借钱给他们；有人曾介绍我给这样的社团当顾问，我就发现了这种情形。事实证明，谁也没有钱去购买财阀扔下的工业资产，只有财阀的朋友、代理人和亲属才有钱这样做。所以，三井、住友、三菱等等这些财团又回来了，几乎与德国的克虏伯财团一样，而形形色色的老党派也跟随这些财团一起，打着新的旗号复活了。

日本真该感激美国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使日本避免了苏美共同占领，避免了象德国那样的分裂的命运。可是，从经济上来看，日美共生大概基本上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只是当日本软弱和依赖美国援助的时候，这种共生才是有生命力的。当初，在麦克阿瑟统治时期，曾对日本实行和平主义的教导（这种教导要日本准备充当中立国），后来，美国的政策又要求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作为矛头指向美国过去的两个盟国、即中国和俄国的反共联盟的一部分。一旦日本治好了战争的创伤后，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不仅给日本在国际上的处境，而且也给日本的国内生活带来深刻的麻烦。日本已经在中国进行过一次“反共十字军远征”，最后打了败仗，帝国也垮了。因此，在日本看来，除了美国付给的巨额津贴以外，再为这样一种战争充当前进基地的前景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美

国的津贴十年之内共有几十亿美元。一旦这种津贴取消了，或者弊多利少，就可以预料日本将会遵循印度那样的政策，而不会给隔着福摩萨海峡彼此对峙的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方充当工具。

俄国人和美国人曾保证朝鲜人的独立，常识也表明，中立是朝鲜人民所能作出的最明智的选择。可是命运却没有给予他们这种选择的自由。这方面的原因在一九四六年就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亲眼见到了我们和苏联方面各自企图在那里建立彼此不相容的政府。

我们阻止一场革命

朝鲜有文化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差不多同菲律宾一样高。它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日本还给它留下了在发展水平上超过中国和印度的工业，这些工业在战争中没有受到多大的破坏。朝鲜的悲剧的实质在于，它本来似乎具备了一切条件，可以几乎毫无痛苦地从殖民地过渡成为一个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开大步的共和国，可惜的是：朝鲜被迫经历了一段盟军的占领，不是美军或苏军一家的占领，而是美苏两家的占领！

我记得一位多愁善感的老先生，他是由我们挑选出来担任开城市长的。他通过一名朝鲜翻译跟我谈话，我听出他的话的大概意思是：

“日本人占领时有一个好处。那时我们是一个国家，全国在一起，大家都恨日本，大家都希望自由。”

开城是三八线上的一个城市，我在那里同我们的部队一起

度过了除夕、元旦和一九四六年的第一个星期。在美苏互相产生不满情绪的那个冬季，我们的部队与俄国的部队面对面地对峙在三八线上。

那位市长接着说：

“我想，最好是根本不让外国来占领。在日本人退出战争以后，我们自己可以打发他们回国去。我们喜欢的就是那样。可以象杜鲁门先生说的那样自由。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

“是的，我知道。从西贡到汉城，一路上都有人向我说起过，”我回答说。“杜鲁门的话是：‘所有的人民都应当享有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他们自己的政体的权利——不仅在西半球，在亚洲也一样’。”

“正是这种权利。但是，当我们没有这一权利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只有一国的军队在这里，就是只有美国的军队在这里。但是不喜欢有两国的军队。也许，只有俄国的军队，朝鲜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现在这样子，我们永远不能自由。”市长摘下了他的古怪帽子，用布擦擦头，然后擦眼镜，擦眼睛，擤鼻涕。他最后说，“唉，唉，我们南北两方的人都会哭泣。”

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这位市长也知道，美国在朝鲜阻止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如果发生，就有可能把他象日本人一样地给打发走。

朝鲜的整个地下运动是由一个左翼革命联盟领导的，其中的朝鲜社会党和共产党虽然占少数，但却居于支配地位。假如我们没有干涉的话，即使没有俄国的帮助，这个左翼联盟也会迅速赢得全国的控制权。当时，他们的胜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朝鲜国内不存在任何一支能

成为对手的领导力量。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了战争期间在朝鲜国内和满洲积极参加抗日的工人、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体。仅仅在满洲，他们就领导了几万人的武装游击队。因此，朝鲜独立军队的唯一核心力量掌握在他们手中。

当然，在日本人训练出来的朝鲜官员、警察以及日本商业界的朝鲜伙友和助手中间，有一些谨慎小心的爱国者。但是这些人是“体面”的人，他们遵守日本的法律，以便保护自己的财产。解放后，他们很自然归向保守的民族政党。而这种政党还需要由李承晚以及金九和金奎植这样一些年长的流亡者来建立，李承晚是我们从华盛顿送回国去的，后二人则是从重庆飞回国的，他们在重庆曾得到蒋介石的庇护。倒楣的是，这些人在朝鲜国内的政治组织是微不足道的，在日本投降前夕，当地下独立运动第一次爆发，在汉城等地街头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这些人还起不了多大作用。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驻朝鲜的日军司令想要阻止一场起义，就释放了朝鲜政治犯并给予人民以有条件的结社自由。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在许多地方都涌现了一些自治团体。几十个市镇举行了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选出了“人民委员会”，然后这些“人民委员会”又选出代表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一次中央会议。代表们在那里宣布了朝鲜独立，成立了一个“人民共和国”，还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筹备全国选举。这个“中央委员会”所管辖的“人民委员会”扩散到了南方的广大地区，而且遍布北方各地，直到日本投降以后整整一个月，约翰·L·霍奇将军抵达汉城建立了美国军政府为止。

在这之前，支持“人民共和国”的各政党已经向全国和全世

界广播了它们的“共同纲领”。它们号召对日本人的土地实行国有化，把日本人的厂矿企业、公用事业、住宅、商店和旅馆都收归公有，同时在工作日、劳动条件、妇女、童工和教育等方面实行先进的法律。

参加这些活动的各个团体只不过是居民中极小的一部分能言善辩的人，其人数大概并不比当年支持乔治·华盛顿的那批革命家更多。而在消极被动的群众当中，明显反对他们的人，甚至比当年反对华盛顿的人更少。这就造成了假若美国人和俄国人都不曾插手的话，整个朝鲜就会和平地落入“人民委员会”的控制之中的第二点主要原因。当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任务是迅速没收敌人所有的巨大财富并使之投入运转的时候，国有化看来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朝鲜的特殊情况是，它的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现代工业以及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各种现代城市企业的业主都是日本人。在土地方面，日本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也占有主要的支配地位，因而整个朝鲜的财富大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日本人控制的。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全部大公司，包括铁路、电报、电话、航运、矿山、公用事业、钢铁和其他重工业、银行、保险公司、供销和服务行业以及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轻工业，全都属于一个外国所有，这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朝鲜的情形却正是这样。假如美国是这种情形，它会采取什么行动来把这些财富转入本国的并不存在的公司，或者说，洛克菲勒、福特、梅隆等等公司的手中？朝鲜在当时根本没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几乎是与民族敌人日本人通用的名词。因此，民族主义的目标和社会革命的目标就统一表现为工业与土地的国有

化。在朝鲜的观察家们觉得，要设想出一种公平的办法把日本的亿万美元的财产转入私人手中，那真比实行公有制要困难得多。

在北朝鲜，“人民共和国”迅速把一切日本财产收归国有。然而在我们的地区内，霍奇将军不许再给任何带有社会主义气味的行动开绿灯。他坚持说，只有当朝鲜人在我们的监督之下选举产生出一个新的“代议制政府”以后，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认为“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并不代表大多数。霍奇将军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批准在几个有代表性的郡里面进行美国监督之下的自由无记名投票，选举区议会。他没有想到，“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候选人竟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而保守派人士却无一人当选。这些区议员始终没有就职，这一试验以后也没有再进行过。慢慢地，我们的地区内的“人民委员会”全都解散了，“中央委员会”也解散了。但是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

在这期间，我们是通过日本训练出来的并由日本留下来管事的那些朝鲜助手，来管理朝鲜的。同样地，我们不得不使用许多由日本人任命的朝鲜官员和警察来执行美军的命令。公众却认为这些人是“伪职人员”或“朝奸”。霍奇将军并不喜欢这种状况，可是过错不在他。美国军队和国务院对于接管朝鲜是毫无准备的。我们有一些会说日语的军官可以用来管理日本，可是会说朝鲜语的军官却一个也没有。霍奇将军和他的军政府首脑阿诺德将军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我们会讲日语的军官，首先把命令转达给日本人，然后再传达给朝鲜的“伪职人员”。有人把我们的政府叫做“翻译官政府”，这使我们感到苦恼。

李承晚直言不讳地说他仇视俄国和尊重私有财产，所以霍

奇就认为他“可靠”，霍奇这位老式的步兵军官当时感到心烦和困惑，他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就知道，凡是看起来象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就都是违禁的。李承晚还有两个有利条件，就是他懂得英语而且有一个美国妻子。我们觉得他这个人总是坏处少好处多。霍奇和阿诺德让李承晚用他自己物色的人来充实我们在汉城成立的“国务顾问委员会”。李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临时政府”。

并不是霍奇将军或者我们在朝鲜的文职官员有意作这样的安排。就我所知，他们从来没有下达过任何前后一致的指示，除了圣诞节让人人回家以外。我们有个人的癖好或倾向，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政策。我们不过是“生来”不信任那些谈论国有化和社会改革的人而已，所以在任命官员的时候，就把他们完全撇到一边了。

然而，最后打败南朝鲜社会革命势力的，并不是美国人。这些势力丧失了他们早先的声望，甚至是在他们亲密追随者中间也丧失了声望，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生来”宠爱李承晚及其“顾问委员会”中的保守派同事，也不在于我们帮助李承晚及其同伙跟那些小工商业中的“体面人”、看风使舵的暴发户以及行政机构和警察中的“伪职人员”建立了联盟。没有能够在南朝鲜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因，在于北朝鲜人所不得不依赖的那些俄国顾问们过于无知和失算，而且还把他们自己的策略强加于南方盟友。除了他们自己那一套做法以外，别的策略他们都学不会。他们无法相信议会的棋法在这里行得通，而且对他们有利。他们输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理解美国是希望走的，而不是希望留下来建立一块殖民地。他们坚持说我们是“帝国主义者”，

他们自以为对帝国主义者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

俄国蓄意切断北方与南方的联系，俄国人拒绝采取最微小的第一个步骤来重新开放他们占领区的旅游和贸易，北朝鲜领导人在早期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成千成万破产了的难民逃到南方诉说他们的苦难——所有这一切，使得南方那些原先同情俄国的人的热情逐渐凉下来了。这一情形，加上美国人笨手笨脚和三心二意地、一阵又一阵地压制左派，就使他们失去了人们的支持。从根本上说，共产党人失败，是因为他们操之过急，而且除了斯大林主义的严厉方法以外，他们看不到有任何别的比较现代化的方法去掌握政权。

在革命形势下，斯大林主义的手腕已经过时，这一点在朝鲜后来的事态中，在一次严重失算中暴露得很明显。这就是北朝鲜愚蠢透顶地武装入侵南朝鲜，以为美国和联合国不会有所行动。结果，一场战争死了一百万人，造成了三年的破坏，最终还是一个僵局。它使得美国又牢牢地回到了亚洲，使蒋介石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开始在福摩萨过着靠人供养的将军生活，使南朝鲜成了美国的一个保护国。这场战争摧毁了南朝鲜旧的经济基地，因而使得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出钱资助南朝鲜在私营资本主义基础上重建其经济。最后，这场战争使得苏联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威信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其全部后果之所以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企图反过来征服整个北朝鲜，从而激起了中国的武装干涉，要恢复原先的均势。但是苏联在朝鲜的政策当然脱离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世界其余地方，“美国和苏联都日益坚决地采取了彼此敌对的态度和政策”——利兰·M·古德里奇在他的那本

值得称赞的《朝鲜：关于美国在联合国中的政策的研究》（对外关系委员会纽约一九五六年版）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这本书中相当清楚地说明，我们自己是怎样不遗余力地防止朝鲜早日实现统一，成为一个“能够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选择自己的政府”的独立国家。

但是，正象毛泽东喜欢说的那样，事情是复杂的，必须全面地看问题，每件事都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下面，再谈点印度的情况，然后，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与朝鲜大不相同的中国革命。

甘 地 之 死

我从朝鲜回国，在国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书^①，主张继续执行罗斯福的“宏图”来发展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关系。然后我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工作了将近一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又被派到印度和东南亚。我到达新德里仅几个星期，圣雄甘地就被人以暴力手段杀害了。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遇刺，象那以前和那以后的任何悲惨事件一样，使我感到悲痛和苦恼。但是，只有在这一次，我看到举国上下如丧考妣，人们怀着弑父般的悔恨心情举行哀悼。我又一次懂得了，正象一些高尚的事业往往由于某些微不足道、并不相干的缘故而遭到失败一样，一些伟人不是被那些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对手杀害，而是被一些愚蠢的年轻

^① 即《斯大林必须有和平》一书，于1947年在纽约出版。——原注

人杀害，这些蠢人还自以为是善良的工具而不是邪恶的工具。打死了甘地的那个浦那人是一个可悲的年轻狂热分子，他认为甘地是邪恶的化身，因为甘地承认了巴基斯坦和印巴分治，而没有打内战。这个凶手不明白，杀害甘地只会提高他的声望和扩大他的事业；同样，各个国家也不明白：思想是不能用暴力消灭的，只有时间的流逝和思想本身的改善才会使思想得到修正。

当然，在发生这个事件以后，人们相当清楚地看到，甘地是死期到了。正象吉米·希恩所说的，他的“显灵时刻”到了，他是该进入伟人祠了。但是我知道，我对此事没有任何“预感”，因为我在这以前的几天的日记表明我同魔鬼毫无接触。

吉米预感到甘地即将绝食至死，就从卡拉奇赶到新德里。我同吉米共进晚餐的时候，注意到吉米“差不多就要入教，也想住进甘地的乡间冥思小舍”。我对他说，甘地并不想死。我看见过他从前多少次绝食都活过来了，他非常明白应当在什么时候停止绝食。生活竟是如此地不协调，我的日记接着记载了吉米从欧洲听到的一件轶事：

“英国工党政府的国防大臣辛威尔走进了下院的一个公用电话间，但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带两便士的硬币。他探出身子，想要向第一个路过的人借钱，这时候恰巧温斯顿·邱吉尔走过来，他们两个人是老对头了。辛威尔招呼说：‘喂，温斯顿，我有一个朋友在等我的电话，我需要一枚两便士的硬币。请你借给我，好吗？’邱吉尔把手伸进背心，慢慢地摸出了四便士，说：‘给你，辛威尔。请拿两枚两便士的硬币，给你的两位朋友都打电话吧。’”

我的日记继续写道：

“我回敬了吉米·希恩一下，把阿特金斯夫人关于她的鸡尾酒会的谈话告诉了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甘地是圣人。阿特金斯夫人是这里的美使馆一位馆员的妻子，她邀请了一些官员和记者参加一次星期六鸡尾酒会，碰巧，甘地为了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停止暴乱而在最近开始的决死绝食也到了高潮。星期四，她向一个朋友吐露了她的忧虑。她说：“天哪，我的确希望圣雄甘地今天吃点东西。假如他在星期六以前死了，印度人就不会来参加酒会，酒会就只好无限期地推迟了！”

在甘地逝世的那一天上午，我在日记里记载的还是这些烦人的内容。吉米·希恩已约好下午去同甘地谈话，他要我跟他一起去。我说我不参加祷告会，不过在那以后，我可能去见他和他的导师（这是吉米对甘地的称呼）。当我去帝国饭店要出租汽车的时候，一个印度记者冲进来喊道：“甘地刚刚被人开枪打死了！”

我赶到比拉大厦，已经快到黄昏了，可是夜幕还要几个小时以后才降临。然而我记得那里是一片黑，只有圣雄停止呼吸的房间里的灯还亮着。花园很快就挤满了人，但是又象是空无一人，因为每个人都由于突然失去唯一的朋友而黯然神伤。

甘地逝世的时候，每个印度人确实都感到象是失去了父亲。不仅如此，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充满了对所有人的热爱，其影响超出了印度，也超出了时间。他以世事为己任，凡是亲身感受到、或从理性上认识到、或者象我自己这样只是由于岁月的磨练而体会到他的爱的人们，他都是热忱相待的。圣雄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美丑善恶，一旦这面镜子碎了，他周围的人们就失去了一个光辉的真理形象。

几天以前，甘地还曾经把我研究过一番，提醒我在战争初期曾写过批评他的东西。他一面摇着一台新纺车纺纱，一面摇摇头说，“你最近那本书里对我不是很客气哩。”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比这更和善的责难。我回答说，我当时可能研究得不够。“你写的，是你的诚实的看法，”他说，“我们尊重你的诚实。”突然，他握住我的手说，“我知道，你现在比较愿意听我的意见了。”不用多说，我就明白了，他指的是原子弹和将要来临的种种更坏得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对“热爱自由的盟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含糊的回答。而当初甘地拒绝为此打仗，我曾因此讥讽过他。

我并不象希恩那样，把甘地看作是圣人，我也不信奉他那一套形而上学的哲学。我觉得，不论他怎样地用《吠陀经》和《奥义书》中的寓言或者圣经中的比喻来装扮他的哲学，他的学说基本上仍然是耶稣的“登山训众”。他象托马斯·阿奎奈^①一样，相信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上帝并不具有人形。他谈论上帝就象谈论一位密友一样。他说上帝是“一种渗透于一切事物之中的难以言状的、神秘的力量”；而且还不止是如此。

在甘地看来，宗教信仰是一种“不断的探索真理的奋斗”。他寻求上帝，仅仅是寻求使自己与“最高真理”相等同，虽然他知道这一目标是达不到的。由于甘地希望使人更象神，他力图使人们懂得他们还不是人，只不过是正在成为人而已。“生是形成，死也是形成；人生即处于形成上帝的过程之中，但上帝是

^① 阿奎奈(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译注

形成，亦是存在，它反映于形成之中。”这里借用了保罗·科恩—波特海姆的词语（同时也忠实地反映了印度教和道教的辩证法），这差不多就是甘地对于真理的领悟的定义。正象尼赫鲁所说的那样，甘地与这一“过程”的协调一致使甘地具有了“某种未知事物”的素质；在甘地逝世的那个黑暗的夜晚，尼赫鲁曾经在比拉大厦站在甘地遗体后面，试图向我们解释某种事物。

尼赫鲁向盼望着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安慰的全国人民说，“我们所能作的最大祈祷，就是我们自己献身于真理，献身于我们这位伟大的同胞为之牺牲的事业。”

这一“事业”从最狭义来理解，就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和睦，但是从一种深刻而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甘地为之而牺牲的，是敬生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不伤生，即爱，即非暴力，即真理”这样一种信念的理论和实践。从我第一次见到甘地并且同他一起在西姆拉翻山越岭去看望欧文勋爵以来——那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了——直到这个悲伤的夜晚，我对于甘地的一生所能说的话，不能比这更多了。许多人都寻求真理，但是几乎没有谁能够象甘地这样，在自己身后留下这些与美好思想和美好言词相一致的文明杰作。

他犯过错误，而且充满了自相矛盾。圣西门^①有一句至理名言说“人孰无过”，而甘地在印度人心灵王国中则是至尊。他谦卑地使用这一权力，祈求别人也以同样的精神这样做。当发生了苦难和流血的时候，他承担责任，诚心诚意地进行自我批评，希望赎还那些误解了他的人所犯下的罪过。他把自己的长

^① 圣西门(1760—1825)，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期被监禁看作是有益的苦行和修身的机会，他不恨那些监禁他的人，而是称赞他们忠于他们自己的原则。在他遇难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杀害他而未遂。甘地自然有点愤慨。他谈到那个差点把他杀死的人时说，“那个年轻人应该懂得，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一贯正确，他从不自以为有权垄断真理。

他说：“我唯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在我死后开始对我搞个人崇拜。”不要崇拜我，而是要照我的样子做。

他不相信机器和科学，这似乎狭隘而又陈腐。但是他手摇纺车，身穿土布衣服，就使所有的印度人明白了，他们已经到了该摆脱英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治的时候了。甘地也象他的朋友和社会主义同仁、素食主义者肖伯纳一样懂得，为了吸引人们对最简单的真理的注意，夸张是必要的。

尼赫鲁说甘地“使印度挺直了腰杆”。甘地说这不过是一场“真理的实验”。他在南非就是这样做的，在那里，他第一次尝试了非暴力抵抗，打破了印度人当契约工的制度。在印度，他让英国人看到了，他能够以非暴力的方式发动一百万印度农民用海水煮盐而不给英国国王纳贡，这就使人们看清了一条真理，即大英帝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甘地还作了其他实验，为印度的国语奠定了基础，以便把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最能显示“不伤人”的力量的，大概就是他毕生为贱民（“不可接触者”）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印度成立共和国以后，终于把这些人从两千多年之久的等级歧视中解放出来。甘地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没有仇恨任何人。

甘地并不是单枪匹马地赢得了印度的独立；他不过是引导

印度不经过战争而获得自由的那些人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他声称他的追随者甚至也包括英国人。他对我说过，“他们并不一定要给我们送这份大礼不可啊。”他认为英国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终于“为印度坚决恪守非暴力准则的态度所深深感动”。后来，当英国决定放弃武力而印度可以自由地脱离大英帝国的时候，印度却自相矛盾地决定留在这个帝国之内。甘地说，印度和英国都在这一转变中“获得了一定的道义资本”，如今可以平等地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了。

甘地在朱木拿河畔火化的那一天，你感到全世界都承认弱者使强者发生转变的这一胜利。火葬的地点是叫做朱木拿台阶的一块平坦开阔的场地，在庞大古老的红沙岩的德里堡和白大理石的沙阿杰汉宫的下方。在这块开阔地的中央，甘地的遗体安放在一个砖砌的小平台上面，他的长子握着一把银槌站在旁边，等候着用这银槌敲碎他父亲的颅骨，好让他父亲灵魂升天。印度的内阁成员和甘地的生前友好都蹲在他遗体周围。我也在那里，离甘地遗体很近，几乎都能摸着；在我身旁的，是安·莱亚德和阿瑟·穆尔。

“甘地对人们的私生活表现出一种极其惊人的关心，”我向安·莱亚德追述往事，“他还有令人极其惊慌不安的情报来源。我和他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在谈论政治的中间，他突然问我为什么同尼姆·韦尔斯离婚了。你想想看，他居然关心到如此地步，连这一点都问到了！”

甘地的遗体上撒满了玫瑰花瓣，精心堆放了一些檀香木。尼赫鲁和另一些人站在旁边，给甘地遗体抹洒酥油、蜂蜜、杏仁霜和香水。我拿了一些檀香木片，把它们添放在柴堆上，然后

就在那里等着。在我们后面有两百万印度人，他们的黑脑袋密密麻麻的，就象箱子里的葡萄。他们不断地向前挤着，挤着。我曾经以为我在身体上和感情上都被中国和俄国的人群吞噬和压倒过，但是现在我才懂得了真正的人群是怎么一回事。新近才独立的印度，警察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以挡住人群，他们的封锁线一下子被冲破了。男女老幼似潮水一般猛然冲向柴堆，前面的人被后面的人流推向前方。

此刻的情景就象是我们从空中朝下一定会看到的那样：在花心，是就要焚化的圣雄甘地；在他的周围，是黑压压的人群形成的花瓣，这些人不断向中心收拢，仿佛是整个印度即将吞掉圣雄，要扣住他的灵魂不放。惊慌不安的尼赫鲁站起来，挥动双手叫人群退回去。蒙巴顿勋爵也跟他一起喊。这喊声，只有前面的人听得见，可是这些人被后面的人慢慢往前挤，谁也没有力量站稳脚跟。我想，假如这时候有人把油透的柴堆点燃，把我们这些人全都跟圣雄一起送上天，那将是专门喜欢报道纵火事件的新闻记者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阿瑟也认为我们该离开这里了。我们往外挤时几乎是从圣雄遗体上爬过去的。我从尼赫鲁身边挤过的时候，他用忧虑的目光瞅了我一眼，接着又大声责骂疯狂的人群。我们拖着安·莱亚德往外挤，至于是怎样钻出人群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在那朵黑花的中心窒息了几分钟以后，我们突然被弹了出来，到了一片草地，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批持枪的廓尔喀兵^①正坐在人群给他们留出的一大片空地上喝茶，他们还不知道一百码以

① 印度(或英国)军队中的尼泊尔籍士兵。——译注

外出现混乱的情况。我向他们报告险情以后，他们的训练有素的队长立刻采取行动，指挥戴着宽矮帽子的士兵，连踢带打冲进人群，凶狠地挥舞警棍打人，就象当年手执长矛的英国骑兵凶狠地对付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的情景一模一样。有几个人头被打破了，发出了惨叫，人群骚动起来，往两边闪开，终于让出了一条通往柴堆的通道。蒙巴顿总督和夫人又坐了下来，尼赫鲁的脸上也露出了宽慰的神情。一股橙红色的火苗从甘地身上腾起，人们把一些哭泣着的妇女从劈劈啪啪正在焚烧的遗体旁拖开。浓烟腾空，汇成一抹微云，缓缓地飘浮在朱木拿河上空。伟大的灵魂上了天国之路。

就这样，如同甘地在世时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中一样，我看到他在自相矛盾的状态下离开人世。在这最后的具有嘲讽意味的时刻，他的宿敌，即武力，不得不扫清一条道路，好让这个个人世间最和善的仁爱使徒安宁地升上极乐的涅槃。

甘地的实质

甘地的学说写入了大量的著作，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之所以被人奉若神明，有三个原因。他阐明了如何去满足人的三种需要：一是个人管好自己身体和精神的需要；二是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社会改革和造福于全体的治理方法的需要；三是采取有效的手段，既为个人也为集体作好安排，以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并且不经过战争而向世界大同发展的需要。

我们见过许多导师回答过如何去满足这三种需要中的一种或两种。但据我所知，只有甘地才在行动中把这三点全结合在

一起。他使得宗教在政治中发挥作用，收到了非常积极的成果。他实际上使得上帝帮助了弱小的队伍。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他曾对我说，人们把许多成就都归功于他的方法，归根结蒂，这些成就“实际上不过是弱者的消极抵抗”。但是他也明确说过，他作了一点新贡献。

“我对世界的微薄贡献，”他说，“就是我证明了，不伤生和非暴力的不合作不仅仅是伦理学的原则。它们可以取得实际可见的政治成果。”

在甘地所体现的当代人的三种需要或三条真理中，他最艰苦的任务是做到心灵诚实。“对我来说，手段和目的实际上是同一的，”他反复这样说。“我们不可能用谬误的办法达到正确的目的。”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应当让大家看到。甘地知道，在他解放自己以前，他不可能领导印度人获得自由，所以他认为他个人的修身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只有绝对控制肉体的欲望和感情，才能做到不惑，获得真理。他的种种苦行就是这种无止境的探索真理的过程的一部分：他喜爱“清白无辜的食品”，他戒酒忌烟，他不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他强调非暴力和非自私的性生活（他决不是独身主义者！）以及他许多别的克制和禁忌，都是如此。

甘地并不否认人的躯体需要是首要的。他说过：“对一个空肚子的人来说，食品就是上帝。”但是他给这样一种现象打上了一个大问号，这现象就是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和财产，把这当作文明的生活目的，而在颜色和化妆品的伪装下，野蛮人的本性却依然如故。他认为，五千年的向上奋斗，名垂史册的志士仁人，所有的古希腊人，古代诗人，伟大哲学家，曾以自己的

成就划破夜空的许许多多的人物，为了使人成其为人的理想而献身的亿万年轻战士，这一切决不等于沙漠酋长的凯迪拉克牌卧车，胸前挂满勋章的将军们的原子玩具，决不是为了极少数人一天收入一百万而无数的人却食不果腹的资本主义。

如来佛说：“讲真话，以爱制怒，以真克伪。”象如来佛一样，甘地要求人们以真理解放自己，这就使得他有别于那些仅仅企求在反社会的孤立和禁欲中实现自我的众多的神秘主义者。他不是托钵僧。他的禁欲主义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全仗他自己的政治行动。他是把良好手段和良好作品结合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体现者。他也是自成一家的社会主义者。

甘地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他还在南非的时候，他就“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当时，共产党人说他是一个思想混乱、浑浑噩噩的伤感主义者；虽然他同意马克思要国家消亡的愿望，但是他拒绝把专政作为实现这一点的手段（专政正是他的哲学的对立面）。然而，他不是空想家，他承认国家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一个必要工具。

“严格说来，”他说，“凡是集聚财富或囤积财富超出自身合法需要的行为，都是盗窃行为。如果有一套完善的集聚财富的条例和社会正义，就不会发生盗窃行为，因而也不会有贼了。然而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同任何别的事物一样，首先应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因此他希望看到人们说服自己，自愿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要强迫人们进入社会主义。他说，他不会把拥有财富的人叫做坏人；他将“要求所有的人进行合作，把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不论是百万富翁还是乞丐”，谁都不应是“社会的弃儿”，因为大家都是“同一疾病的患者”。

尼赫鲁和印度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经常感到恼火的是，甘地对阶级区别似乎处之泰然；有时候，他甚至好象是把这种阶级区别理想化了。但是，圣人和政治家内心世界的界限在哪里，往往不易说清。甘地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也象毛泽东一样，知道什么时候该“走曲线”以达到目的。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期间，他需要使所有的印度人团结一致；一旦实现了独立，他就领导一部分人要求在全国实行彻底改革。印度社会党领导人J·P·纳拉因曾经在甘地遇害前几天对我说，甘地是“我们在对我国社会最落后的势力进行斗争中最强大的个人力量”。

印度经常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在挨饿，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严重营养不足，但也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富豪。甘地知道，在这样一个国家，人们的愤怒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有极好的时机感，并且了解本国人民在特定的时期有多大的能力。甘地的国家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

“印度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尼赫鲁说，虽然他也几乎象别的人一样对甘地感到迷惑不解。“所以甘地很了解印度，能感觉到它的最轻微的颤动，能够准确地而且几乎是本能地对形势作出估量，恰好在适当的时刻采取行动。印度，甚至是印度城市，甚至是印度新的工业，都带有农民的印记。印度使它的这个儿子〔甘地〕如此象它又如此不象它，使他成为崇拜的偶像和敬爱的领袖，这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他使印度重新想起古老的和几乎淡忘了的过去，同时窥见自己的灵魂，〔直到〕未来呈现出诱人的美景。”①

① 见《走向自由》，纽约，1941年版，第191页。——原注

在宗教即哲学、哲学即历史的这样一个国家里，甘地的禁欲苦行不仅使他享有了圣人的威望，而且还使他和人民之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他自愿实行的绝食，比起千百万印度人仅仅由于贫穷而不得不忍受的“正常”饮食，也相差无几。甘地通过与群众一起受苦而理解了群众；通过这一点，群众也理解了他。他的伟大贡献，就是使自己成为知识分子和农民基本力量之间的桥梁。我常常觉得奇怪，毛泽东和甘地虽然在大多数事情上是相反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很相似。毛泽东也是在青年时代就主动去体验极端贫困的生活，后来，他又引导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同甘共苦，同农民打成一片。这样，他就同人民（象印度一样，主要是农民）建立了真正亲密的关系，而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则从来不曾想过要这样做。

在印度，共产党人和国大党人最后也会在农村决一雌雄。甘地直觉地感到了这一决斗迫在眉睫。他在去世前不久，由于对迟迟不能实行最低限度的改革感到愤怒，曾经喟然感叹说：“谢天谢地！幸亏已不再是只由国大党一家掌握农村了！”假如国大党失去对通往农村的桥梁的控制，共产党人就可能接管，印度就会走中国的道路。

甘地的方法的确给印度带来了自由，使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他在道义上的影响也奠定了印度的中立和拒绝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政策的基础。如果以克什米尔为例来否认这一点，或者断言非暴力方法已经同圣雄一起消亡，那是不对的。甘地曾对印度在克什米尔使用武力表示痛惜，假如没有他的影响，印度也许会陷于严重得多的困境。它也许就会情不自禁地利用自己在人数上和资源上的优势，来粉碎巴

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驻军，而不会忍受巴基斯坦在那里造成的现状。

甘地传下来的方法，对印度的内外政策是否有足够的影响，能不能使这个大国避免最终发生暴力的社会革命，还有待于日后见分晓。对于这一考验的性质，没有人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更清楚。甘地和历史如今已经把无可争议的领导衣钵交给了尼赫鲁。在甘地逝世后几个星期，在我即将启程离开德里的时候，我单独同尼赫鲁夜谈良久。当我倾听他表述他的忧虑和希望的时候，我懂得了，他这个人，以及挑选他作为政治接班人，就是圣雄甘地给他的同胞以及给和平事业留下的最后一份最好的礼品。

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共进晚餐

尼赫鲁用不着别人为他说话。没有哪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领导人能够比他更透彻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以更生动的英语解释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源泉。但是，关于伟人的记载是不断地在增加的，对甘地是这样，对尼赫鲁也是如此。

我以前常常见到尼赫鲁，并且写过一两篇他的传略，但是在我离开新德里之前的那个最后的夜晚，我同他谈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些是过去一直不得发表的。那是在甘地逝世以后一个多月，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政变上台执政以后两个星期。冷战已开始了它的不可挽回的进程。刚刚当权领导自由印度的尼赫鲁，对未来深怀忧虑，现在回顾起来，他有些话有助

于理解我在本书中所力图向读者介绍的那些经历。

我记得，那天晚餐吃了羊羔排骨（尼赫鲁在饮食方面，如同在他的不可知论的观点方面一样，可不是甘地的门徒）。晚餐以后，我们竟然讨论起怎样倒立的问题来了！倒立是瑜伽派的一种练身法，他做得十分认真，每天早上六点钟，他都要倒立五分钟。他很熟练地给我表演了这个动作。当我也要试一试的时候，他告诉我，靠墙摆的那把椅子很有用处，可以帮助初学的人。

“把正常的东西完全颠倒过来，”尼赫鲁解释说，“这种倒立动作能够使脊椎和腹肌突然之间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是非常有益的。”

“我在北京认识一位汉学家，名叫L·C·阿林顿，”我说，“他常对我讲：‘斯诺，你要想懂得中国，就必须头朝下倒立，好好思考问题。’我从来以为他不过是打个比方，现在才明白他真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我们西方的政治家们都应该开始练习这个动作，假如他们想要懂得亚洲——还有非洲——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话。”

尼赫鲁笑了。“这个主意不坏。一个人想要在心理上和生理上作好应付一天艰苦工作的准备，没有比倒立更好的了。做倒立思想上的疲劳和消极感很快就会消失。”

后来，我自己也经常做倒立活动，还体会到瑜伽派的另一种练身法的价值：这就是用俯卧的姿势做气功，全身僵直和通体放松交替进行。这种活动能使人心境悠闲，精神焕发，比任何别的方法更能缓和紧张状态。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时候，尼赫鲁问我：“共产党人打败蒋介石，要多长时间？”当时，报纸上天天都报道国民党打胜仗的

消息，所以他这样提出问题，使我感到意外。

“要两三年吧，”我说，心想他也许不同意这种看法：“你看呢？”

“大概会更快一些。蒋政权在精神上已经吃了败仗。大战期间就看得出来。”

“你感到担心吗？”

“国民党这样腐败无能，是叫人惋惜的。显然，社会革命已不可避免。我们担不担心呢？我们国内的问题太多了，顾不上考虑去干预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已经不得不跟一个共产党邻国相处。现在，我们将不得不学会跟两个相处。”当时，尼赫鲁寝室里挂着两位妇女的照片。一张是他的已故的爱妻卡马拉。另一张是孙中山的夫人。他在中国的时候同孙夫人谈过话，我不知道这一谈话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帮助了他，使他懂得了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他接着说，“要是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也许还维持不了这么久。美国现在会不会为了救他而再次进行干涉呢？我们很想知道这一点。”

“我认为不会。我认为，我们和蒋介石已经完事了。”

“我希望你是对的。干涉对我们不好，对亚洲其余各国不好，对你们也不好。”

“你的意思是说俄国和美国会打仗？”

他点点头。“印度尤其需要和平。至少要五年的和平。假如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印度可能也会卷进去。”

“我想，在最近的未来不会发生大战。”

“你怎么这样肯定？在我看来，形势发展很快，日益动荡不

安。俄国自从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以来，正在处处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挑衅。贵国的人则以日益强硬的威胁口吻说要对俄国人使用原子弹。”

“俄国要治愈战争创伤，差不多得十年时间，”我说。“它目前的战略是以攻为守，目的在于保护它已有的东西，或者，至多不过是在边界上顺手拣一点东西。可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克里姆林宫将忙于巩固共产主义在战时取得的成果，而不会进攻美国或美国的盟国，自找倒霉。”

“我同意你的意见，”尼赫鲁说。“但是贵国怎样呢？许多人觉得美国比俄国更加难以预测。”

“也许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用几个瞄得很准的炸弹把俄国消灭，”我回答说。“但是我国政府现在决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当然，我不了解贵国。我觉得似乎有一种危险，就是一旦发生严重的萧条，你们的资本家可能会诉诸军国主义和战争。”

“军国主义，也许，但不会是战争。美国资本主义还有别的出路，并不是要么打仗要么立刻实行社会主义。”

“你说的是新政——回到福利国家？”

“只要美国资本主义还是象今天这样充满自信，就不会。更可能的是，我们会看到重新武装，大规模武装。另一种可能是美国津贴国外的福利国家体系——把钱送给那些陷于破产的国家，让它们用这钱来买美国的产品，从而剥削美国的纳税人，而不会成为一个新的殖民帝国。我们从大战期间的租借法案学会了这种办法。这对美国资本主义来说，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但是它总比完全依赖国家对军火市场的补贴要好一些。

你知道，我在去年就写过一本书，提出了一个论点：当我们雄厚的财富、对原子弹的垄断以及俄国的虚弱使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拥有绝对优势的时候，我们可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引导大家回到老的军备竞赛的死胡同，还是把大笔款项用在国外（今后十年可能高达一千亿美元），作为和平投资，帮助建设那些遭到战争蹂躏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俄国，并且帮助为亚洲和非洲的解放和现代化提供资金。”

“这不是马歇尔将军的主张吗？”

“这的确是他的希望的一部分。但是他的计划提出得太晚了。俄国和美国已经失去了接触。我们之间只有怀疑和仇恨。它不但不能叫俄国人放心，相反，还使得他们更加害怕。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们出于他们自己的疑惧和无知而作出的回答，这就是‘把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的愚蠢的华沙宣言。这正是对我们自己的无知的最好的回答。今后，马歇尔计划很轻易地就会变成一场新的重整军备的竞赛，而饥饿的世界就会吞掉最落后的一家吧。”

尼赫鲁叹一口气，摇摇头。“可惜，因为马歇尔给欧洲提供的那种经济援助正是几乎每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印度所迫切需要的。”他说。“但是我们对谈论‘两个阵营’不感兴趣。印度永远不会出卖自己的独立而加入任何一个‘阵营’。我们将竭尽自己一切力量防止它们之间的任何战争，万一发生这种战争，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不卷进去。我们根本经受不起跟强大的敌人作对。我们唯一的机会是争取五到十年时间，搞建设。”

“我想，我们还远远不会承认作为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势

力的社会主义，就象俄国不承认这种社会主义一样，”我说。“你是被列为社会主义者的。这就足以吓跑我们的国会议员们。”

当时，我刚从缅甸来。在缅甸，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提出了一项新颖的纲领，它比印度的纲领激进得多。当时，缅甸正在实行土地和某些基本工业的国有化。的确，这个政府仍然在同本国的进行武装斗争的共产党打仗。可是我们美国驻在那里的代表们却以极端厌恶的心情看待这个缅甸政府。他们认为缅甸的社会主义和那些跟莫斯科的“阵营”联在一起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的纲领，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要求建立一种既有国营企业也有私营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其中包括以最温和的方法实行土地改革，而且仅仅对新建的大型基本工业、公用事业、电力工程和灌溉工程实行国有制。在不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不采取大规模剥夺本国有产阶级资本的做法的情况下，尼赫鲁和他的同事们能找到资金来建设现代化经济的那种“骨干”工程吗？假如他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印度将会被迫向哪一个“阵营”寻求条件最有利的必要的外援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将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因为假如印度的三亿五千万人同中华联邦和苏联及其盟国的亿万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人类的大多数就会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系之中。印度的归顺将会使这一体系称霸亚洲和欧洲，如果说还不是控制所有国家的议会和内阁的话。

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是“等十年看看”，他说，“我们也许就能知道该怎么办了。现时，我们的纲领决不是象某些人

错误形容的那样‘突然跃向社会主义’。它不过是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变革进程的继续，我说的世界各地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只有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例外——就是你们美国。”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位老社会主义者始终不变地坚持他的信念，即亚洲国家、最终是所有的国家都一定会走这样一个总的方向：

“我们不可避免地都会被引导到唯一的可能的解决办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各国范围以内，最终是在全世界，将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控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怎样做到这一点，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显然不应该因为某些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反对变革，就妨碍一国人民或人类的利益。如果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阻碍这样的变革，那就必须把它们搬掉。”

可见，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在世的政治领导人，即尼赫鲁和毛泽东，对目的的看法看来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在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上，他们仍然有很大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对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目的也没有异议。它最后甚至会听任尼赫鲁运用他的费边式手段——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会这样。至于美国，我们的领导人固执地坚持这种看法，即只有在为私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下，才能有民主与自由。所以，不论是尼赫鲁的手段还是他的目的，我们的领导人都不能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偏见，美国最终极有可能不仅在亚洲的大多数国家，而且在欧洲陷于孤立。

当人们已打破物质和空间的秘密的时候，当计划经济正在解决三分之一人类的生产与分配方面的重重复杂问题的时候，在美国大陆疆界以外，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再相信，政府必须站

在一边，对古老而神秘的“财界”毫无作为，怡然自得地等待着“工商界情况好转”，就象米考勃^①期待着“某种事情将会发生”一样，而与此同时，却有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失业，几十亿几十亿美元的产品被耗费在那凌驾于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之上的自由竞争之中。

在我离开德里以前，我又一次向尼赫鲁谈起过甘地。

我的迷信的爱尔兰朋友吉米·希恩一直念念不忘一件事，就是他的手表曾经在一次采访甘地的时候停过，后来在甘地被杀害的时候又停过。一天，在尼赫鲁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坐在那里听他讲，过了一段时间，希恩突然要我看他那块值得注意的、已经修理过的手表。

他低声地说：“又停了，正好停在我们跟尼赫鲁约定会见的时间。”

我自然而然地瞧瞧我自己的表。它也停了。

这时，我想起了，在甘地遇刺后那天早晨，吉米一觉醒来，手指头上出现了一些“圣痕”。诚然，它们的样子有点可疑，象是香烟头烫的泡；但是我也想起了吉米对甘地之死的惊人预感。现在，这手表的事真是难以解释。记者招待会以后，我向尼赫鲁谈起了这桩神秘的事。他怎么看呢？这位“玄秘的”亚洲的儿子，被本国人民称为“印度瑰宝”的人，把他头上的甘地帽推到一边，笑了起来。

“你们需要的，”他说，“是新手表。”

^① 米考勃是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个幻想乐天派人物。——译注

需 要 新 表

一九五二年，美国一个负责的政党设下了“二十年叛国案”的骗局，使共和党得以上台执政，蛊惑宣传搞得那么成功，在美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在我国历史上也不曾有哪一次宣传运动，象麦卡锡和尼克松打先锋所发动的这场谎言与诽谤的胜利这样，给美国人民、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以及我们国内的团结和自尊心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这场谎言与诽谤的运动，竟然指责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杜鲁门、艾奇逊以及美国外交部门一些忠诚的人员背叛祖国和“把中国出卖给俄国人”。而后来当了两任美国总统的那位英名赫赫的统帅，竟然听从他的顾问们的意见，支持了玩弄这些骗术的家伙，亲自到威斯康星同麦卡锡参议员一起到处周游，可是这个麦卡锡却公开地把艾森豪威尔战时的上级马歇尔将军说成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叛徒”，我们全国都不能不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这一表现深感惋惜。

中国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被任何美国人所“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曾是我们可以出卖的东西。它在四十年代不曾属于我们，就象它今天也不属于俄国一样。中国的革命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与外界无关的真空中，但是它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外界的影响只是次要的。

当麦卡锡主义的严重越轨行径奴役全国人民时，岁月是怎样失去的，现在来辩论这点已经太晚了；情不自禁地发表感慨，说什么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前，倘若美国国会做了比较清醒

的反省，情况又会是怎样怎样，那就更是马后炮了。就我个人而言，事后聪明尤其是不能允许的；我当时的想法都已记录在案。差不多十年前，作为《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我谈过我们与革命中国未来关系的问题；早在美国进行干预之前，我就预言过中国的革命会取得完全的胜利。遗憾的是，我在下面不得不大段地引用我自己的文章，但是我在别的地方见不到一篇分析文章也包含着这样的对中国和俄国的如实认识，我当时是这样认识的，自那时以来也基本上一直是这样认识的。

“中国出现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不是就必然意味着中国沦于克里姆林宫的绝对控制之下？”^① 我问道。“莫斯科是不是能够也象它在东欧那样，在中国警察、军队、党政治局和国家机关中安插它的‘专家’，构成一个凌驾政府之上的政府？克里姆林宫是不是能够支配中共的国内政策并控制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

这些就是我国领导人在一九四九年为之发愁的那些“伦理上”和“道德上”的大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怀疑过中国人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美国人在一七七六年就宣称拥有这一权利——就是通过革命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我继续写道：

“首先，看看几点具有根本意义的地理政治事实。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为苏俄的两倍。它人力资源雄厚，自然资源富饶，而且拥有古老的文化，这一文化历经三千年间的多次灾祸，——而其基本价值始终完好无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中

^① 见《星期六晚邮报》，1949年4月9日。着重点是这次加的。——原注

国是共产党赢得了政权的头一个国家。

“其次，中国是在俄国之外落入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的第一个大国。

“第三，距现今这场战争之前很久，中国红军就在丝毫没有得到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生死搏斗。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就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既没有依靠俄国的直接军事干涉，也不象布拉格那样依靠这种干涉的含蓄威胁，而是依靠自己上台执政的。

“第四，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尽管共产国际要把他撤职，仍然能继续当权。

“第五，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而独立发展，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充分的自信心。整整一代人之久的内战，训练了大量能干的军政领导人……俄国将军们要在他们占领的东欧小国中任意摆布那里的军政头目，这是一回事。可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国，由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所领导，这个党又控制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它能够很好地抵御任何外国而捍卫党的独立；要操纵这样一个大国，就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第六，毛泽东的个性反映在党的内部结构之中，这个党具有很鲜明的中国特点。绝大多数党员是通过中国革命史、教科书以及毛泽东和其他本国领导人的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论原则，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第七，在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决裂以前，除了俄国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公开宣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作出了重大的新贡献……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首先证明，在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要把民族解放的任务同

反封建的社会改革运动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胜。他们在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完全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下证明了，不依靠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不依靠俄国或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而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作为主力军，这样的革命就可以成功。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地赢得了胜利，在东亚已经存在着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内外均有重大意义的新情况。莫斯科必须同外国共产党人所统治的一个大国打交道，而这个大国拥有一切条件来保持真正的平等和独立。

“如果俄国现在试图不让北京政府控制满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生活，那么在共产党世界就会发生民族主义的迎头相撞。中国共产党人决不能容忍俄国夺走满洲，正如同俄国决不会允许乌克兰并入共产党波兰或加入共产党的波德联邦一样。

“中国共产党人决不能让满洲或整个中国充当卫星。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可能成为新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①的核心，这个联邦将独立存在，其地位与苏联完全平等。克里姆林宫对于这样一种前景，也不会比对铁托的巴尔干联邦计划更高兴多少，但是，如果以为俄国人在中国会很快地重犯他们在南斯拉夫所犯过的错误，那也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他们将会极其谨慎小心，盼着美国人犯错误，从而加以利用，相应取得他们自己的成功。

“中国现在成了克里姆林宫一个长期的‘经营管理’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变得很简单，也可以变得非常复杂，就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只要美国仍然是支持中国旧制度的主要力量，只要美

^① 包括中国，满洲，蒙古，西藏和其他非汉族地区。——原注

国仍然支持中国的一部分或者全体的反共党派、政客以及准备把现在显然已输了的战争继续打下去的军阀，那么美国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保持他们目前这种头号外部敌人的地位。

“北京的共产党新政权是通过一场革命建立起来的，这场革命满足了农民的某些迫切需要，同时也通过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洋口号激起了人们的活力。它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继续保持同样的格局——把争取国内进步、实行得人心的改革和真正的国家独立这样一些最重要的诺言予以兑现。如果它放弃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屈从俄国的要求，它就会毁掉，因为俄国可能要把中国变成对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殖民工具或基地。

“北京新政府的纲领设想要迅速实现工业化，扩大各种公共工程和交通、邮电设施，大大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民众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设施，培训成千上万的新技术人员，使他们能够管理国家计划统一协调的经济。然而起点却是一个沦于破产的国家：城市变成了废墟，铁路遭到了破坏，机器设备陈旧过时或者毫无用处，河流和运河系统阻塞不畅，人民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他们渴望工作，却缺乏各种劳动工具。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至于如此蠢，以为他们大权在握以后，就可以在解决国内的所有这些问题的同时又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

“麦克阿瑟将军最近说，中国赤色分子的胜利并没有危及我们的安全，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一定就失去了中国这个市场；多年来，我们的对华贸易一直是入超，逆差很大。现在正是山姆大叔把决定我们两国未来关系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中国人的一个极好的时机，给他们充裕的时间，需要的话几年也可

以，让他们认识到主要的事实。这就是：中美贸易对中国来说，至少是象对美国一样的重要。

“我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抱负与俄国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实行的民族主义扩张这两者之间，是有严重‘矛盾’的。但是，这种分歧如果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抱负’与美国继续对中共进行干涉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相比，就成为很次要的了！假如美国政策的目的是巩固中国的独立，使它摆脱对俄国的依赖，那么，逼得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自卫，因而不得不接受与俄国结盟的条件，这种做法是达不到上述目的的。假如美国用事实证明并不想控制中国的任何一个部分，也不想跟形形色色的反共势力结盟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那么，我上面谈到的种种因素就会起作用，影响中俄两国共产党人的关系的性质。

“无论如何，从长远看，中国共产党大概不能、也不会把中国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如果我们的政策消除了干涉主义，历史就可能沿着现在已具备一切必要前提的方向发展。中国将会成为第一个不听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共产党大国。

“北京最终可能成为一种亚洲的莫斯科，东方的罗马，它传播一种不受莫斯科控制的‘亚洲马克思主义’。作为这样的一种力量，它当然要成为在亚洲推翻欧洲殖民体系的象征，同时也拒绝我们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权利相联系的民主原则。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在东方构成一道屏障，阻止作为俄国民族主义的一种延伸的共产主义的扩张，这道屏障会同贝尔格莱德现今在西方建立的屏障一样起作用。

“习惯于从意识形态绝对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也许会认为难以理解，‘共产主义’怎么会受到共产主义的‘遏制’，或者，除了他们认为是共产主义对立面的‘资本主义’以外，怎么还能有任何别的东西来遏制它？但是这类名词的含义和发展是有许多不同的色调和变种的，而且将来会更多。因此，苏俄世界专政的威胁有可能受制于与它竞争的共产党国家的发展，就象受制于社会民主党力量和修改过了的资本主义一样。”

“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采取不干涉内政的方针，是有风险的；而无限制地支持现状，也许会招致更大的风险……整个殖民体系行将告终。任何否认这一点的政策，或者企图重振帝国主义——不论何种名义之下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都只能拖延争取平等与独立的斗争，进一步造成可怕的人力浪费。在世界的这一地区，要恢复任何帝国都为时已晚。对俄国来说，也象对任何其他大国一样，都是为时晚矣。”

引文完毕。

我写这篇文章，是在我们身受麦卡锡主义之害的一年以前，当时我们还能够自由地探索亚洲的“稗米之上的丘山”^①。

朝鲜战争造成了一种令人感情冲动的气氛，使我们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一段时间内模糊了。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就不会再有几个学者否认上述分析有道理了。几年前，象迪安·艾奇逊、参议员诺兰、乔治·凯南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一些极不相同的人，都习惯于把中国说成是俄国铁蹄之下的一个傀儡或“奴隶国”不屑一顾，而无视中国发生一场伟大革命

^① 语出《庄子》《秋水篇》：“知天地之为稗米，知毫末之为丘山，则差数黍矣。”——译注

的事实。今天，这些人谁也不会再坚持任何这类说法了。显然，中国已经不仅成为俄国在政治上的一个身份相当的对手，而且还理所当然地在现代历史上头一次成为地球上的四强之一。

中国在完全不同于东欧卫星国的水平上惊人地崛起，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内部的力量对比，也改变了这一世界与美国统治下的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国完全收回了满洲和大陆其他边疆地区的主权，在“混合经济”的基础上，以及在按部就班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纲领的基础上，取得了异常迅速的经济进步，这些也是整个共产党国家结构中的重要变化因素。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并没有象他们的许多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重犯斯大林在南斯拉夫所犯过的错误，因而他们也不得不开始修改克里姆林宫对所有其他各国共产党绝对专政的刻板的观念。

因此，中国证明了自己是由第一个不靠俄国警察力量上台、因而也无需绝对依靠俄国警察力量维持生存的共产党所统治的大国。可是美国不仅继续充当“支持中国旧制度的主要力量”，而且还不断地加强自己作为新共和国“头号外部敌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的抱负和俄国民族主义扩张之间的矛盾”在一九四九年确实存在。但是，这种“矛盾”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抱负与美国对他们的干涉”之间的“矛盾”相比，正象我预言的那样，成了“很次要的”了。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反应已固执地使中国与俄国的合作日益密切。

朝鲜战争使我们的判断力发生了畸变，因而我们当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象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看我们的那样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很少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我们处于他们的地位，我

们的立场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中国人以安全为由，在我国境内的水域横行，那又会如何呢？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忘记了，我们是怎样地让蒋介石占有福摩萨，使我国陷在那里，跟强加于当地大多数人头上的几十万逃亡者结了盟。我们忘记了，我们关闭了设在中国的所有领事馆，从中国撤回了我们的外交官，断绝同大陆的联系，这都是出于美国的主动，而不是由于革命领导人提出了要求。我们实在太健忘了，仅仅为了援助蒋介石我们就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物资，蒋介石用这些东西打内战，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我们似乎也不记得了，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拿出了二十亿美元援助蒋介石和追随他的逃亡者，继续拿钱津贴他们去空谈“光复”中国，支持任何别的人都不支持的一种立场，这使我们有可能同大陆上的共和国打起来，而一旦真打起来，我们将会是单枪匹马。

至于亚洲十五亿人民的大多数领导人，他们完全是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福摩萨保护领地的，把它看作是美国企图用来恢复战前的老式均势体系的一个支点。可是，这种均势体系，由于殖民主义的崩溃而受到了彻底的打击，已不可能重建，因为决定性的力量如今已在俄美两国真正的势力范围之外。它掌握在取代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民族主义或社会革命政权的手中，掌握在如今中立的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手中，而日本也渴望加入它们的队伍。

加强中立国体系也许有助于在东亚建立或多或少比较稳定的均势。可是，只要我们仍然抓住“蒋介石即中国”这种虚构的说法不放，并且坚持认为持不同观点的国家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不配得到它们全都需要的美国的大规模的援助，那么，对

于加强中立国体系的办法也就不可能有全心全意的支持了。

美国自称在道义上有权干涉中国内政，这在亚洲人看来是最虚伪不过的了。显然，福摩萨这块保护领地是在美国武力庇护之下建立起来的。显然，只有美国的武力维持着蒋介石政府。可是我们却反对承认中国的共和国及其对福摩萨的主权要求，唯一的理由就是硬说我们不能赞助“用武力带来的变化”。

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不仅切断了我们同中国的共和国的一切关系，而且还造成了美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误解。中国和印度加在一起，占人类的五分之二，占亚洲人口的大多数。我们不仅仅是不承认中国人有权以革命手段推翻和改变一个政府；美国的政策还表明，印度拒绝同我们签订一项反华军事条约，就被我们看作几乎同样应“在道义上”受谴责。然而，正是印度先于各国以非暴力手段建立了一个新共和国，而且印度最杰出的领袖在世时曾经比任何别的人作出了更多的努力，争取把文明的行为运用于人与人和国与国的关系之中。

西方世界要想避免一场灾难，就必须学会听取和重视显然从苏醒与复兴的亚洲所发出的这样两种权威的声音——一种声音呼吁容忍，要求表现出兄弟般的谅解精神并且趁为时未晚之际提供慷慨的帮助；另一种声音则是用革命的语言来抗辩，亚洲人现在已经证明他们有效地使用这种语言的能力已超过了我们与之抗衡的能力。

正当原子能有可能给人类提供普遍摆脱奴役和贫困的大好希望的时候，旧的亚洲已消逝，自由的亚洲和即将自由的非洲正在崛起，它们将取得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我们需要有新

的、富于想象的思考能力，来衡量各种社会之间和各类人之间的时间空间关系的迅速变化，正如同我们需要有这种思考能力来控制 and 利用核裂变与聚变所释放出的可怕而又神奇的质量和能量的作用一样。

这并不是说亚洲人和我们之间的冲突之路是美国一家修筑的。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哈里·S·杜鲁门曾作了一个朴素的、谁也否认不了的判断。他说：“我决不会声称我国十全十美，完全正确。我们犯有过失罪和失职罪，需要上帝的宽恕。但是，我敢向世界说，我们做过许多正确的事情。”

在短短的二十年期间，美国以世界为己任，向其他国家提供了规模空前的军事援助和非军事援助。

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从来都不会全部实现。即使是实现了一定的目标，在当时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最终的结果也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每一种强权政策都会引出一个对立面（“反”）；随之而来的综合（“合”）总是反映出正反两个方面，因而既不同于“正”，也不同于“反”。我们进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是为了“让世界能安全地实行民主”——当时却同沙皇专制主义结盟。在那个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大概就是俄国革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温斯顿·邱吉尔曾吹嘘说，他“不是为了主持帝国的消亡而担任国王陛下的首相的”。英国打赢了仗，可是帝国也消亡得差不多了。斯大林反对马歇尔计划，“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他吓坏了被“分裂”的西方，竟使西方结成了他本来希望加以阻止的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美国对中国实行了禁运和经济封锁，希望加快北京政权的完结。中国回答了这一挑战，把它的丰富的人力资源空

前地动员起来，实行迅速的工业化和教育计划，从而加强了中国的经济独立，一九五八年，中国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医生和工程师数量超过了美国，教师则相当于美国的三倍。

我们越是坚决起劲地否认苏联制度的稳定性，它对西方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就越大。我们过去写了一些书企图证明苏联“即将破产”（如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所断言的那样），就证明了这一点。反过来，俄国人越是固执起劲地诋毁掠夺成性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种种弊病，并且想“证明”我们的制度不行，是在“自掘坟墓”，苏联上层人士就越多地抄袭美国的工业技术和羡慕美国的享受水平，苏联领导集团也就越多地承认级差物质报酬所带来的个人成就。在我们方面，正象埃德蒙·威尔逊在《我的思想片段》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在一些不那么富于建设性的方面，例如在我们近来的保密清洗和搜捕政治异己分子方面，我们也是在抄袭俄国人的做法。”

当然，美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去包揽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美国的“失职罪和过失罪”实际上往往可以追溯到一种倾向，就是总想在海外做太多的事——而且是单枪匹马地去做——却没有首先尽可能把国内的事先办好。令人尴尬的事实依然是：在地球上，每十六个人当中，就有十五个不是美国人，我们决不可能指望他们服服贴贴地完全响应我们自己的政策所依据的历史脉搏。在科学领域的发现和推翻非常迅速，因而在今后一代人的时间内——只要人类仍能生存的话——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进步可能会超过以往的七千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变革是无法防止的。最多也只能为了普遍的生存而使这种变革略加修正。凡是没有自觉地着眼于顺应

不可避免的变革的政策，或者一味怀念过去梦想复旧的政策，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特别吸引人的阶段——别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这样——但是它显然也是通向区域组织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而区域组织本身则是向世界秩序迈出的一步。每个国家越是努力加强联合国组织，越是把自己与别国交往的手段(援助，投资，贸易，文化交流，防务)集中用于中央集权的计划以及与别国和对别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它的对外政策就会越现实，它被即将来临的改革和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可以预见的革命所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少。

苏联过去孤立无援，单枪匹马对付全世界，为“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达二十年之久。今天，欧洲和亚洲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实行国家计划经济的国家，他们向我们提出“竞赛共处”的挑战。

苏美两国在竞争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不仅用物资竞争，而且用政治思想竞争——但是在这一竞争的背后，还有一个长远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几乎没有人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各方面身居领导地位的一些最有头脑的人士日益对此感到不安，每当国家由于国防开支而有可能大大削减对私营工业的补贴时，尤其如此；我国二十年来经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私营工业。这个问题就是：大体上仍然是无计划的、不协调的、以私利为动力的经济，面对着完全由国家制定计划的社会化了的的经济，还能够再成功地竞争多久？近几年来，后一种经济(在俄国和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方面，比美

国快两三倍，目前，这一增长速度翻了一番，而相比之下，美国的生产却处于衰退之中。

在当代，“竞争共处”，不只是表现在我们能不能说服羞答答的柬埔寨人或阿拉伯产油国的国王或独裁者们接受美元，而不要接受卢布或中国钱，并且还表现在我们能不能在国内生活中提出有吸收力的办法，这些办法不仅要能够博得各国的钦佩，而且还能够被各国立即加以仿效——所有落后国家现在或者不久之后都能够迅速加以仿效。对外政策受国内制度的支配，因此对外政策不可能取得大于国内制度的成就，而美国在国外追求冷战目标的时候，国内的严重问题却堆积如山，触目惊心。

教育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种族偏见和歧视依然如故；越来越多的成千成万的青年受到排斥，没有把他们吸引到建设性的生活中去；公共卫生、监狱和诉讼的制度陈旧过时；医院、医生以及支持非军事性科研和医疗研究的经费日益不足；在经济中，一方面价值亿万美元的剩余商品越积越多，一方面又把日益增多的亿万美元支付给农场主作为日益减产的补贴，与此同时因通货膨胀失去控制食品却日益涨价，——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想方设法实行改革和更新，假如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落后的话。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有相当重要的一个起因，就是我们实行显然无限制地发展核武器的政策，而且迅速地毒化我们的大气层，这可能是在为我们自己和为世界准备坟墓，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的人可能是一些畸形怪物，根本不象我们的子孙。

此时，我们在方生之地的旅行，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史无前例的人类进步浪潮的巅峰，这一浪潮将要把几乎二十亿之多的

吃不饱肚子和多半文盲的人民推向前进，他们正在觉醒，认识到新的需要，要求达到新的境界，憧憬着新的充满希望与自由的未来。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今天每一个国家都应该首先正己而后正人，应该与我们的史前史告别，真正结束自己的童年，终于开始象一个人一样地行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迫切需要领会和实践甘地关于博爱的教导。否则的话，我在三十年前开始见到的所有一切，所有这些

繁华绿荫的城市

以及议会，政府，礼貌和风气

就可能全部毁于一旦，甚至来不及留下一句话，说明他们是怎样地利用了他们最初的完全自由的时刻，把绿色的地球变成了一片荒芜的没有生命的灰烬。